第三辑
3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2010/2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论
最后的奋斗：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和影响
政治法统、挪用与纪念日的演变
宋庆龄在德国
大革命失败后的邓演达与宋庆龄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第三辑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编审委员会

顾　　问：鲁　平　金冲及　许德馨　张　磊　姜义华　林家有
沈渭滨　熊月之　吴景平　盛永华　郭岱君　林孝庭
宋曹琍璇

编委会主任：秦　量
副　主　任：马玉成
编　　委：黄亚平　邹　镭　刘金驰　秦　刚　金晓春　朱玖琳
宋时娟　孙娟娟　廖大伟（特邀）　邵　雍（特邀）
刘国友（特邀）　王锡荣（特邀）　沈海平（特邀）

主　　编：黄亚平
副　主　编：朱玖琳　宋时娟

目 录

专题研究

001 超越思维定势——全面推进民国人物历史研究 / 姜义华

005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 张　磊　张　苹

036 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从学习美国到“以俄为师”/ 李　杨

055 苏联顾问团与孙中山黄埔建军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 周兴樑

081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以其与苏联的差异为视角 /［日］安藤久美子

095 论孙中山与中华文化近代转型——兼与沈渭滨教授“转型第一人”说商榷 / 关志钢

107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兼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当然领袖 / 谢俊美

123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 孙娟娟

137 宋庆龄：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 盛永华

读档札记

160 中国福利会藏英文档案及其价值 / 沈海平

196 台湾地区藏宋庆龄档案文献及其价值 / 朱玖琳

206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简介——以孙中山、宋庆龄的日文史料为例 /［日］徐小洁

回忆口述

211 我亲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 / 鲁平口述　沈海平整理

228 见微知著：回忆宋庆龄二三事 / 章开沅

232 怀念宋庆龄 / 邓广殷

档案选编

23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宋庆龄英文档案选译 / 李玉贞　译注

251 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档案资料选译 / 宋时娟　王志鲜 译注
300 孙中山和宋庆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爱泼斯坦1986年11月在日本东京和神户的演讲 / 孟胜德 译

海外译文

329 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 / 朱玖琳 译注

史料辑存

369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下） / 任冉冉 编

Contents

Monograph

001 Jiang Yihua, *To Get Rid of the Fixed Thinking—Comprehensively Promoti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aracters of Republic of China*

005 Zhang Lei, *Zhang Ping, Sun Yat-sen and Xinhai Revolution*

036 Li Yang, *Sun Yat-sen and Xinhai Revolu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rospective—from Studying American to "Taking Russia as a Teacher"*

055 Zhou Xingliang, *The Soviet Advisory Group and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n Yat-sen's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Causes*

081 Ando Kumik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n Yat-sen's Socialist Thought—mainly about the Differences from the Conception of Soviet Russia*

095 Guan Zhigang, *Study on Sun Yat-sen and Chinese Culture's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Discussion about "The First Man to Propel" by Pro. Shen Weibin*

107 Xie Junmei, *Zhang Taiyan and the Xinhai Revolution—with Study on Sun Yat-sen's Undoubted Leadership in Chinese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123 Sun Juanjuan, *Sun Yat-sen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Party's Flight School*

137 Sheng Yonghua, *Soong Ching Ling: a Loyal Keeper of Sun Yat-sen's Thoughts and Causes*

Reading Notes on Archives

160 Shen Haiping, *The Archives in English Collected in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and Its Value*

196 Zhu Jiuling, *Soong Ching Ling's Archives Collected in Taiwan and Its Value*

206 Xu Xiaojie, *Brief Introduction of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Taking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s Japanese Records as Examples*

Oral History

211 Lu Ping, My Experie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Reconstructs"

228 Zhang Kaiyuan, Recollection of Soong Ching Ling

232 Deng Guangyin, A Memoir of Soong Ching Ling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238 Soong Ching Ling's Records in English Selected from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251 Charles Jones Soong Reference Collection Selected from Duke University Archives
300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as Pioneer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I. Epstein's Speech in Tokyo and Kobe in Nov. 1986

Overseas Work in Translation

329 *The Soong Family in the Book of MY FATHER IN CHINA Written by James Burke*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369 Ren Ranran,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Shun Pao Daily News" on Sun Yat-sen's Grand Funeral (Part III)*

专题研究
Monograph

超越思维定势
——全面推进民国人物历史研究

姜义华

近年来，民国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首先要归功于大量档案的公布和方便的利用，同时，也得益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新档案的公布和利用，口述史的兴盛，又给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以极为有力的支撑。要使得民国人物研究获得全面推进，第一位的仍然是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但与此同时，进一步超越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思维定势，采用新的视角，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其重要性绝不下于前者。

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思维定势，主要是：阶级划分的思维定势、革命史观的思维定势、观念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政治挂帅的思维定势、英雄史观与领袖决定论的思维定势。

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阶级划分的思维定势。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一条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把握的重要路径。阶级，是一个由特定社会生产力、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占有的特定状况、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定地位所决定的科学概念。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阶级关系无疑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然而，在人与人之间，还有族类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职业关系、宗教信仰关系、政治认同关系、知识传授关系、情感关系等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就涵盖着所有这些关系。人们的活动，经常受到所有这些关系的制约。阶级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属于什么阶级，究竟代表什么阶级，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有利于哪些阶级，不利于哪些阶级，就决不能简单化、模式化地加以处理。至于用贫富差异来划定阶

级，用政治态度来划分阶级，用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来划分阶级，则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化的阶级划分方法和非马克思主义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它们在社会动员中尽管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却经常会歪曲甚至完全屏蔽了历史的真实。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将蒋、宋、孔、陈定位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将众多知识分子定位为资产阶级学者，形式上坚持了阶级分析，实际上屏蔽了当时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及激烈变动，屏蔽了这些历史人物思想与行动同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简单化地给所要研究的对象戴上一顶属于什么阶级的帽子，而是要深入而具体地揭示这些对象作为单个人的活动如何实际地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异己力量的支配，特别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内外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客观形势的支配。

与此相联系的是革命史观的思维定势。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习惯于用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来给民国人物划线，用是否参加或支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来给民国人物划线。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从中华文明转型、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现代化大业中的立德、立功、立言来建立新的人物评价体系，肯定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的积极贡献，展现了许多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真实作用的多面性，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革命史观的思维惯性还相当顽固，成王败寇仍常常使历史人物过于神圣化或过于妖魔化，历史真相难以据实呈现，毁誉严重失衡。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诠释"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时强调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

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且因为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这样做就更容易了。”按照革命含义的这一诠释，往昔革命史观的思维定势极有必要加以全面的检讨。

其三是观念决定论的思维定势。它包含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反科学或伪科学、进步与反动等等截然两分的思维定势，以及优胜劣汰、线型发展的思维定势。所有这些思维定势，几乎都是近代以来西方尤其是苏联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强势输入的产物。在考察和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时，人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去选择资料、确定关注重点、衡定是非得失。人们这时通常不太注意在一种更为开阔的大历史中，在独立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这一世界上最具完整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宏大文明体系中，在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对各个历史人物作全方位的考察，而很少冷静地思考非常机械地依据截然两分的这种思维定势，依据线型发展的思维定势来裁定复杂的历史人物是否适宜。

其四，政治挂帅的思维定势。这一思维定势主要表现为在民国人物研究中，特别重视政治人物，而轻视实业界、科技界、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人物。在民国历史发展中，政治人物无疑很重要，但实业界、科技界、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人物在社会、经济、文化变化中，在人们思想、观念、信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变迁中的作用，其实常常比之许多政治人物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更不容忽视。

其五，英雄史观、领袖决定论的思维定势。它突出地表现在孤立地研究单个历史人物，对于个人与群体、精英与草根不可分割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值得高兴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愈来愈重视各种群体的研究，并取得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历史活动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丰满的个人进行的，然而，绝大多数个人的活动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据以复原真相的必要资料。群体研究的长处，是通过彼

此密切相关的一群人既有共性又各富有个性活动，避免将历史完全概念化，也有效地防止将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普遍化、必然化。它借助血缘网络、地缘网络、学缘网络、宗教网络、权势网络、利益网络等等的分析，将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社会分析方法、知识与心理分析方法具体化，更易复原历史的真实，更易揭示历史活动的各种外部环境和纷繁复杂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对一大批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展开深入研究的同时，通过群体研究，将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草根型人物，放到自己研究的范围之内，这应当是民国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张 磊 张 苹

[内容提要]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主要业绩就是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他提出了比较先进和科学的民主革命纲领，组建了民主革命政党，坚持了武装反清斗争，创建和捍卫了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实现了从封建帝制到共和国的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导致了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性质的思想解放，激励了“实业主义”的昂扬，涤荡了陈腐的社会陋习，为后来的进步、革命的浪潮打开了闸门，成为迈向近代化的重要步伐。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变革在终极意义上未能完满结束——没有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亦未彻底改变人民无权与贫困的状态。当着民主革命新阶段到来后，孙中山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正是历程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并发展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

[关键词]

孙中山 辛亥革命 “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

时光流逝，辛亥革命已到百年。在这期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并没有被淡化和忘却。确切评定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深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发扬先行者的爱国主义和变革精神，依然是一桩兼具重大学术性与现实意义的工作。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主要业绩就是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这场正规的民主革命虽然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们的悲惨处境，但却结束了绵延久远的封建帝制，打倒了清朝政府，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进行了政治、思想启蒙，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孙

中山不愧为辛亥革命的旗帜，这位巨人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分割的。

孙中山是革命民主派卓越的政治、思想代表。他首先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条件下，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社会变革方案，在解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中心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方面，较之农民阶级和维新派的纲领优越得多。旧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三民主义的指导，方才具有了比较完全的意义，从而跨越了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阶段”。

孙中山也是革命民主派的杰出领袖。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十年后，他创建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有其他派别不可比拟的优点。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固然难以望其项背，维新派的“学会”也不可同日而语。革命政党的领导，是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同盟会所领导的。

孙中山又是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他把反清武装斗争当作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推翻封建王朝与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清帝国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还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在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半数以上省份独立的时刻返回祖国，建立共和国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他立即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和主持了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在政权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们攫夺后，他又举起了旨在捍卫共和国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的旗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革命元勋孙中山的活动是与辛亥革命的全过程相始终的。

（一）

民族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有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继承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民族思想”，而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又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

“反满”，力求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是孙中山在清末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兴中会的誓词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同盟会又在宣言中明确重申了同一课题，指出清朝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1]孙中山还在许多著述中反复阐明了“反满”和意义，驳斥了保皇派的妥协谬论。在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必然是建立在一个民族——确切地说是建立在该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上面，由是，成为民族压迫和民族运动的最初产生地和主要舞台。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推行的民族政策虽然日趋温和，但始终未能排除民族压迫的因素。清朝政府日益成为侵略者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既以自身的腐败为侵略者欺凌中国提供了可能性，更在后来充当了“列强”的奴隶总管。所以，战斗的民族主义不能缺乏“反满”的主题。事实上，这个口号在当时起到了不容否认的广泛动员作用。

---

[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与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他的阐述中没有获得应有的主导地位，但它显然是民族主义的要旨。孙中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踏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兴中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集会众而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1]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孙中山进一步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2]他认为必须避免“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的屈辱，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悲惨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以“革命为惟一法门”，“非革命无以救垂亡”。在著名的《〈民报〉发刊词》中，他更明确地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的原因。[3]如何避免“瓜分”、“共管”厄运的答案是明确的，即“非先倒满洲政府”。[4]他也像维新派人士那样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较为片面地归咎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以为“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过，孙中山却从这里强调了“反满”即否定现存政权的反侵略意义。

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构成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内容的另一方面。他坚持以民主主义精神处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认为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必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满族也不例外，理当一视同仁。他一向把“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的主张视为“大错”。[5]革命党人的“反满”口号“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对于

[1]《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
[2]《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1905年2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60页。
[3]《〈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
[4]《驳保皇报》（1904年1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019页。
[5]《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满族“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1]在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自当“立于平等地位”；“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2]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始终未能真正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阐述。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口号，缺乏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内容。仅仅提出避免“瓜分”、“共管”厄运的主张，并在很大程度上把这桩首要任务归结到“反满”的斗争中去，不但难以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质，而且难免导致对帝国主义的轻信和幻想。“反满”的口号不可能包含反帝的巨大内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的崩溃决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消除。其次，民族主义也糅杂了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因素。过于强烈的“反满”色彩不仅是不当的，而且冲淡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务。但是，民族主义无愧于那个历史阶段的战斗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人民群众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斗争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到新的高度。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主要课题。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也居于主要地位，同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另“一座大山”。“宰制于上”的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广大群众呻吟于封建暴政的桎梏下，完全没有权力。以民主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不仅是人民的愿望，而且也是近代化的重要条件。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为民主革命的内在主题，民主主义构成了先进思潮的主流。

以太平天国为高潮的近代农民反抗和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暴政，但不可能否定君主制度，不论是在实际意义抑或在思想意义上。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但也没有突破君主制度的局限。然而，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共和国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历史

[1]《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916页。
[2]《五族共和之真义》（1912年9月1日），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82页。

的需要迫使孙中山进行艰苦的探索，举起“政治革命”的旗帜。他承袭了农民战争的武装反清传统，而又摒弃了皇权主义。维新派重视社会政治变革和仿效西方的观念给他以深刻影响，但却未能使他局囿于“君主立宪”准则与“渐变”策略的藩篱。当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才是孙中山熔铸自己政治思想武器的主要素材。他把18世纪法国革命的“平等”口号和林肯的“民治”主张纳入民权主义。欧美的“共和制度”则被视为——特别是在政体方面——民主建设的可资效法的楷模。此外，古代中国的某些政治思想和制度也在他的政治方案中留下了痕迹。

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业已成为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压抑了生产力的增长；剥夺了人民的起码权力；推行了思想钳制政策。为了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必须剥除封建君主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还在孙中山刚刚踏上民主革命道路时，他就同现存政权决裂，斥责统治者是“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1]稍后，他进一步指出广大人民在封建暴政的压榨下无异于“被困于黑暗之中”；“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他认为封建专制是野蛮而愚蠢，决非“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根本改变“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社会政治状态，代之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民主立宪”。

经由“国民革命”途径推翻封建暴政以建立共和国，是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严峻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后，他就坚持以革命暴力去摧毁清朝政府。“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实行改革”必然使统治者“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2]孙中山告诫人们切勿为清廷的“改革诏旨所迷诱”和被保皇派的谰言所欺骗。归根到底，武装反清斗争是埋葬清王朝的途径。至于“国民革命”在“建设”方面的内容，就是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和“国民”的国家。兴中会已把“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奋斗目标，这种表现在简陋形式中的共和制度的要求不愧

[1]《兴中会宣言》（1894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

为近代中国正规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雏形。从1903年开始，孙中山在日本、南洋、美洲和欧洲各地所联系和组织的革命团体都把“建立民国”作为政纲。[1]同盟会则明确宣称：“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

在封建专制主义盛行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崭新的共和制度难免被许多人视为过于激进的、缺乏现实基础的政治方案，为了论证共和国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孙中山不得不驳斥各种怀疑和反对的论调。他批判了“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因而政治改革“殊难望其速效”的观点，指出由于中国得以在“政治革命”中借鉴西方，所以能够较快地实现共和制度，正如机器的仿造远速于创制。[3]对于认为今日中国“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主张，孙中山从“取法乎上”的原则加以反驳，强调中国决不可因袭西方的陈旧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定要采用更先进的共和制度。当时还流行着“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之治”的说法，孙中山在据理批评时承认“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可悲事实，但却指出他以“幼童将欲入塾读书”为例反问道：难道能因其“不识字”而“不可使之入塾读书”吗？正确的回答应是“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4]

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存在着局限性。缺乏深刻的、彻底的反封建内容，显然是民权主义的主要缺陷。孙中山认为只要推翻体现了“封建帝制”的“恶劣政府”，民权主义的“破坏”任务就算大体完成。没有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5]其次，民权主义提出“四万万人一切平等”，不过是“法律面前的平等”，缺乏具体的、实际的保证。此外，他对西方“共和制度”的几乎无保留的倾慕也妨碍了他的眼界。但是，民权主义——它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无疑是近

[1]《警钟月报》1904年4月26日。
[2]《同盟会宣言》（1905年8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3]《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7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6页。
[4]《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1917—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5—156页。
[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页。

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的出现，显然是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变革。在此之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于复兴汉族帝国——“反清复明”；或者以为温和的君主立宪方案可使中国复兴，而不必否定历史悠久的封建帝制。在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先进的共和政治方案。与之相应，群众的斗争也就“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这样，辛亥革命所达到的成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清朝政府的覆灭，也是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即使后来出现过“称帝”和“复辟”，都注定了只能是一幕短命的丑剧。

力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志士仁人的目光。因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贫困和落后日益严重。追本溯源，基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虽然，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触角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分解着封建主义的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漩涡。但是，它们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因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桎梏。其次，封建主义是阻挠中国近代化的又一障碍。腐败的清朝政府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它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可见，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独立和民主。然而，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也有赖于国家的富强。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先进人物都把祖国的富强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任何进步的社会运动，决不能忽视这个主题。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因袭了农民阶级的某些朴素的经济平等观念，但又摒弃了绝对平均主义。他接受了维新派把中国的富强同资本主义化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却又抛弃了他们不敢与不愿触动现存社会秩序（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西方的社会经济思想给孙中山以深刻影响，他十分赞扬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著作。“资产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2页。

阶级土地国有论者”亨利·乔治的学说被他认作社会主义，大量地吸取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方案中。此外，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流派以及古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制度和思想也在民生主义中留下了痕迹。

民生主义的内容较为复杂，但“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土地问题在民生主义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地尽其利”，曾是孙中山早期著述的主题之一。不过，当时尚未触及土地制度的变革问题。1895年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期间认真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才知道“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的西方世界“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和“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于是复在民族、民权主义之外“采取民生主义”。[1] 1903年后，孙中山所联系和组织的革命团体已把“平均地权”列为纲领之一。当时的“平均地权”主张还没明确和完满的内涵。“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似乎仍占重要地位。他在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一再表示过：“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2]认为“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3]不过，亨利·乔治的影响已经日趋明显。同盟会的“宣言”完整明确地表述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4]

从“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内涵来看，孙中山显然充分吸取了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和约翰·穆勒的土地国有论的素材。民生主义中的土地纲领的内容大致如下：“核定天下地价”为“第一步”，即要求土地所有者“自己报告地价”。“自报”不会造成“以多报少”或“过抬地价”的弊病，因为报价高则纳税重，报价低则纳税轻，“两者相权，虽不得不出于平。”[5]其次，“照价收税”。“贵地收税多，贱

[1]《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1917—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
[2] 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期第114号。
[3] 章太炎：《訄书》，“定版籍”，1906年修订版。
[4]《同盟会宣言》（1905年8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5]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总理遗教》“演讲”，第49页。

地收税少”。[1]再次，“照价收买”。这个环节包括双重涵义：其一，国家实行“土地征收权”以惩罚少报地价的土地所有者；其二，即是“土地涨价归公”。孙中山认为“土地涨价归公”对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一方面，得以防止地主“不劳心，不劳力，无思无维，坐享其成”。因为地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进步发达”，而“社会进步发达”是为“众人之劳力致之”，所以，地主的不劳而获实为“天下不平之事”。[2]另一方面，此举可以使得“社会发达”和“公家愈富”。“土地涨价归公”在方案中居于关键地位，因为“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3]这才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方案的真谛，孙中山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平均地权”，不是把土地“从实分配”；“土地国有”，也非将土地“尽归国有”。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方案是建成“社会的国家”的主要措施。在他看来，这种土地纲领能够防止社会的疮疽——“垄断”。他深为“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的状况而忧虑，把“垄断”、“贫富悬殊”的形成归结为西方国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要之，即地价的迅速上涨结果为私人获得。同时，这种土地纲领还会给社会全体成员带来福祉，因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4]此外，改善农民的状况也是他的土地方案的主旨之一。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平均地权”观念形成的原因时指出：“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5]他始终认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6]

与土地纲领相联系，资本乃是民生主义的另一主要课题，促使中国近代化，是青年孙中山的最初理想。《上李鸿章书》中所提出的“人

[1]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总理遗教》“演讲”，第14页。
[2]《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1917—1919年），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861页。
[3]《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156页。
[4]《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1906年），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78页。
[5] 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
[6] 凤岗及门弟子：《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卷，上海，1939年印行，第123页。

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 和 “货能畅其流” 的四点要旨，实质上是温和渐进的近代化方案。孙中山确认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我国必矣！”[1]他在这里比民粹派的思想家们优越得多，没有对资本主义趋向表现出恐惧和伤感，而是现实主义地 “承认生活所强迫他承认的东西”，并批评了那种 “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发展” 的观点：“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在民主革命浪潮高涨的日子里满怀希望地瞻望未来，相信 “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2]因为在新生的共和国内，将会 “开放对外贸易”，修建铁路，开发 “天然资源”，人民 “日渐富裕”。甚至在辛亥革命后捍卫共和的十分困难的时刻，孙中山还在《实业计划》中为祖国近代化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在有关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和方式上，孙中山很早就提出了颇具特色的 “节制资本” 和 “国家社会主义”（亦称 “集产社会主义”）主张。主要内容为限制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3] “国家社会主义” 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节制资本” 的补充——“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4]在孙中山看来，“节制资本” 和 “国家社会主义” 是十分理想的 “实业化” 道路。一方面，它得以避免 “文明的恶果”。鉴于 “欧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所以在实施 “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 的同时，又采用这种手段以 “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垄断” 是可怕的灾难，因为 “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5] 另一方面，它又是迅

[1]《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2页。
[2]《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7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
[3]《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1917—1919年），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552—553页。
[4]《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4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27页。
[5]《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1—8月），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36页。

速摆脱“不发达”状态和实现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孙中山以铁路和煤矿为例，指出“少数富豪投资，全社会受其制裁，价格之高下，不得不听其垄断。不能推广，难以发达”。反之，“如能合全国之资力，分头开采，并多铸铁路，以便转运，能如是则民富矣！”[1]所以他反对私人占有的“托拉斯”，但却十分称赞“人民公有”制度的“托拉斯”，因为“在公司能节省浪费，能产出最廉价品物，非私人所能及”。[2]此外，“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也内含着对无产者利益的关怀。孙中山认为“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工人“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然而，工人却受“强有力者之虐待蹂躏”，甚至“反受资本家之戕贱”。[3]

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一样，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明显存在的。首先，土地纲领中缺少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和真正实现“耕者有者田”的内容。这不仅表现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土地涨价归公”，因之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与农民切身利益攸关的耕地；同时，也反映在土地方案的实施方面——国家“收归”的途径。[4]他不止一次申明民生主义决非“夺富人之田为已有”或“推倒富豪，如世俗所传抢富济贫之说”，[5]认为“土地资本收归国有之时”无需“激烈恐吓，迫之推让”。要之，不必进行“农人革命”。这种缺陷削弱了孙中山的土地纲领的科学性、革命性，并使它失去付诸实践的可靠基础。其次，民生主义中含有的主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因素具有消极意义。他把自己的社会经济纲领视为“社会主义”是不难理解的；当年青的革命民主派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形象进行社会变革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溃疡业已暴露，曾经参与民主革命的“第四等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现代社会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因此，孙中山在完成历史所提出的任务——反对封建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却同步地形成了主观社会主义。“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

[1]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演讲”乙，近芬书局1944年版，第1页。
[2]《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1917—1919年），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697页。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1912年），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15—116页。
[4] 朱执信在《土地国有与财政》一文中曾对“收买”制订两种办法：“先给国库券而后偿还”；“划定价值后有增价悉以归官，然后随时依价收买。”
[5]《黄远生遗著》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121页。

耳”——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论断展示了孙中山的真实思想，将现实主义同主观主义糅合起来。主观社会主义的消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幻想由于“中国落后”而便于“预防”资本主义弊害与实现社会主义的观念是臆造的。它干扰人们对历史的必然趋向和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削弱了革命民主派的社会经济纲领的科学性。第二，力求使“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得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也是不可取的，它“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1]

但是，作为社会经济思潮的重要部分的民生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首先，民生主义是促进近代化的纲领。尽管它被涂饰了主观社会主义色彩，但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土地纲领的实现将会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以及由此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摧毁私有者的垄断，在农业中比较彻底和完全地实行自由竞争。”[2]同样，“节制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作用也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允许私人资本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充分发展；具有独占性的大企业由国家经营。应当指出，“企业国有”的形式并不确定地意味着社会主义。它的性质和作用，主要取决于社会基本生产关系以及国家政权性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而革命民主派所要创立的“民国”也是西方式的共和国，即“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它可能产生的客观效用才是关键所在。事实上，“国有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方案。因为“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4]其次，民生主义中的土地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摆脱封建压榨

[1]《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155页。
[2]《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1914年11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8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8页。

和获得土地的意愿，同时，也包含着对全体人民利益的关怀。“农民可以大苏”是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他竭力使农民免除“地主从中朘削”。孙中山相信“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将使“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便可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劳动者“赡养尚不能敷”的状况必须改变，应当使他们“得其劳力获之全部”。再次，民生主义还包括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贪婪榨取的谴责，以及对“垄断”之类的弊端“贻祸全国”的揭露，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民生主义在近代中国无疑是比较完整、自觉的近代化方案——而对那个历史阶段说来，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向。

还需指出，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观念中也包含着科学的成分。他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始终把他笃信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社会化、近代化的大生产基础上。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先驱深知历史的进化程序，即“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步步前进，永不落后”。他摒弃了“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而是明确宣称：“吾之意见，盖于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社会主义。”此外，预防和消除资本主义的“恶果”、“祸患”也是避免贫富悬殊，“反对少数人占经济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防止“加痛苦于人群”，而以“共富”为目的。以上观念和主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特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防止两极分化。

（二）

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是时代和革命的迫切需要。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的正规民主革命，既非农民阶级的旧式秘密结社——它们普遍带有宗教、迷信和封建宗法色彩——所能承担，[1]也非维新派的各种“学会”——它们大都缺乏稳定的领导核心、明确的政纲和严密的组织原则——所能肩负。革命民主派必须自我组织起来，建成近代形态的政党，发挥“革命的中枢”作用，才能胜任正规的

[1] 孙中山曾经指出：“清世秘密诸会党……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国父批牍墨迹》，台北，1955年版，第11页。）

民主革命领导重担。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清王朝的颠覆则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结果。所谓“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指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当孙中山走上新辟的革命路途时，就把组建革命团体作为当务之急。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的侨胞中成立了兴中会。这个革命小团体虽然只是略具雏形，但已大致具备了政党的基本属性。首先，兴中会的纲领开始比较完全地体现了民主主义原则。它在入会誓词中规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章程内容则充溢着爱国主义——力求避免“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厄运，“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2]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个要求以共和国取代封建君主制的革命纲领。其次，兴中会在组织原则方面也一扫会党的陋习。领导机构由会员推举，会员之间的关系排除了封建宗法遗毒。地域性的限制不再存在，兴中会希望容纳一切“有志华人”乃至外国友人：“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3]事实上，两湖和江浙地区的毕永年、秦力山、吴禄贞和沈翔云等后来都加入了兴中会，宫崎寅藏等外国朋友也介入了兴中会的活动。兴中会员多为侨胞或粤籍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当时还未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它的领袖在初期尚未被广大革命志士所公认。兴中会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这个政治派别初步形成的标志。辛亥革命史的上限追溯到兴中会的建立，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

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在艰苦的十年战斗历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兴中会在侨胞中有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它在日本、南洋和欧洲地区建立了分支和联络点。兴中会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并不局囿于广东，它同两湖、长江流域的反清力量——主要是会党——有着联系。孙中山的战友史坚如曾北上联络会党，旋即在香

[1]《檀香华侨》，檀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第16页。
[2]《兴中会宣言》（1894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
[3]《香港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23页。

港建立了“兴汉会”。把兴中会同广东、两湖和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系起来，推举孙中山担任总会长。可见，兴中会组织的能量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兴中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兴中会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兴中会的宣传鼓动工作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懂得“革新之机”完全“遏绝于上”，抛弃对清廷的幻想，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1900年后，兴中会还同保皇党展开论战，揭露他们“假革命、真保皇”的反动面目，把惑于“邪说”的人们——包括部分兴中会员——解放出来。孙中山从1903年起陆续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派》等文章，以兴中会在各地控制的报刊为阵地，向保皇派大张挞伐，揭开了1905—1907年间两派大论战的序幕。革命的思想启蒙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民主革命的开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其次，兴中会还把武装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因事泄流产，但却以革命民主派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发端和走向共和的第一步而载入史册。1900年的惠州起义取得很大战果，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虽然结局仍归失败，而其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孙中山后来忆述：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大抵为“诅咒谩骂之声”；惠州起义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这种意味深长的变化自然有形势的影响，但兴中会的坚持战斗更是重要原因。人们逐渐从兴中会的活动中认同了它的革命性质，确信这些叛逆者都是志士仁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兴中会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民主革命思想没有广泛传播，保皇派颇有政治影响，清朝政府的窳败尚未彻底暴露——孤军作战的，它多方面的活动确实具有开拓性意义。

从事变进程的角度看来，首先，兴中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孙中山在创建兴中会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又在以后的实践中将它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待到建立同盟会时，已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理解和赞同的三民主义政纲便被当然接受。其次，兴中会在组织上也为同盟会提供了

条件。尽管兴中会会员不满500，1900年后又没有较大发展，但它在国外各地的分支及国内（主要是华南地区）组织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正是这样，兴中会才成为同盟会组建的基础之一。再次，兴中会还为同盟会提供了一些骨干。经过十年的战斗历程，兴中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已经成为大多数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并且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声誉。1903年出版的《孙逸仙》一书的序言指出：数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1]时至今日，“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2]。孙中山在当时不愧为比较有威信、影响和经验的革命家，由他来“领袖群伦”是必然的。

甚至兴中会的教训，也为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般说来，兴中会始终存在着两个弱点：第一，未能在国内各个地区立足扎根，与内地的革命力量联系较少。兴中会初创时有三分之二的会员为侨胞，这种状况后来也未发生根本变化。第二，兴中会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重较小。两个弱点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给兴中会的活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显而易见，革命运动是不能过多依靠以国外为基地的“输入”。它的存在和发展，决不能离开内在的条件和因素。所以，革命党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各地建立基础，而不能把主要的活动局限于国外，虽然促使侨胞的革命化是重要的任务。事实证明，这是多次反清武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广泛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能够承担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加强革命组织的活动能量与提高斗争水平。兴中会员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比重较低，并不完全是客观条件所造成。[3]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来说，也存在着认识问题。只是在1900年后，他们才从实践中意识到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抛弃了过去所持的“谓秀才不能造反”的旧观念，对争取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深以为然”。他自己积极地结交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还嘱

[1]《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
[2]《辛亥革命》第一册，第90页。
[3]孙中山曾经指出：革命党人开始进行反清斗争时，“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

托廖仲恺、何香凝“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从东京青山军事学校到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的建立，显示了孙中山在这方面活动的实绩。应当指出，孙中山在1900年后很少发展兴中会员，“虽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2]他所联系和建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也大抵不再冠以兴中会的名称。这种情况表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兴中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斗争，难以承担起“革命之中枢”的大任，而开始为建立新的革命党创造条件。

随着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把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党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将分散的革命斗争汇合起来，并把参差不齐的斗争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许多革命党人亲身体验到这种时代的需要，深切理解这桩历史的使命。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促使同盟会在1905年夏应运而生。在组建同盟会的过程中，孙中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些革命党人在1903年后已经意识到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必要，主张建立“中国本部统一会”，作为“中央机关，建瓴而立，扩张其势力线，挟风雷而走之”。[3]但是，只有孙中山才最深刻、最痛切地认识到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性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兴中会成立以来的“艰难顿挫”的战斗历程使他懂得：在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单股的、不相汇合的水流是不可能“涤荡旧污”的；只有形成巨大的洪流，才能冲毁封建帝国的堤防。他回顾了十年的战斗历程，确信“但从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4]所以，决心“召集同志，结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5]为推动和实现革命的联合，组织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孙中山反复向革命党人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必要。”同时，他在其他革命团体的骨干中间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经过了相当充分的酝酿，条件终于成熟。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倡导下，建立了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

---

[1] 1903年的拒俄运动，显然是知识分子革命化的重要转折。
[2]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商务印书馆1945—1947年版，第32页。
[3] 《浙江潮》第二期，“非省界”。
[4]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页。
[5]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卷首，原函影印。

同盟会的成立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革命民主派的活动进入新的阶段。从各个方面看来，这个正规的革命政党远非先前的革命团体所能比拟。第一，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受为斗争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的概括，堪称比较完整、自觉的民主主义纲领。它同兴中会初创时的政纲相比有着长足的进步，主要是明确了共和国的观念和补充了社会经济方案。较之华兴会、光复会的政纲则具有更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有所消弭。同盟会的纲领表明，它在政治、思想上趋于成熟。第二，同盟会在组织方面也大有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政体，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秘密会社的封建陋习彻底消除，同盟会具备了近代政党形态。第三，同盟会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作为其所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加盟，增加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他周围团聚了黄兴、宋教仁等一批较有威信和经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承担起领导的重任。显然，近代民主运动的物色之一就是领导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第五，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纲领、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制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八个重要文件：《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除《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外，其他文件的内容主要关乎方针、政策问题。后者体现了前者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部。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仅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加盟者就达一万余人。同盟会摆脱了先前一些革命团体的地域性和分散性，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枢。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活动：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批驳了反动的保皇谬论，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坚持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从而为辛亥革命这场全国范围的、推翻清帝国的战斗积累了必要基础和胜利条件。

同盟会的建立无疑成为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只是在这时方才意识到胜利并非遥遥无期，确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1]

当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不可能不反映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他弱点，并表现出自身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不少同盟会员对三民主义纲领缺乏全面的理解和信仰，他们实际上是"一"民主义者或"二"民主义者。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不统一，严重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同样，组织上的松散现象也是明显的。门户之见甚深，小团体的宗派习气颇浓。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加盟后依然不能舍去原有的旗号，他们的许多活动仍旧采用光复会的名义。上述缺陷在革命低潮期往往恶性膨胀起来，甚至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分裂态势。于是先有共进会的建立，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并未否认同盟会，虽然他们更改了三民主义的纲领，又在组织活动方面恢复了某些会党习气。稍后章太炎、陶成章等则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他们对孙中山进行无原则的攻击和污蔑，在1908年后的困难阶段产生了颇为有害的影响。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等还在上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它虽然"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2]也对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有所推进，但却在"章程"中删略了民生主义，并在另立组织的重大问题上没有先期征得同盟会本部领导的同意。因此，中部同盟会的建立也具有分裂倾向。不过，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带有消极因素的活动并未造成同

[1]《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1917—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21页。

盟会的瓦解，也没有否定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在度过了短暂的低潮期后，成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依旧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所策划和领导的。至于点燃了辛亥革命火焰的武昌首义，则是湖北新军中受到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所发动的。该省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大都是同盟会员。这就不难理解湖北革命党人在发难之初就打出了孙中山的旗号，正如主要首义者熊秉坤所宣称：“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1]所以，孙中山返国后理所当然被推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参与创建和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在民主革命浪潮汹涌的年代，它不愧为“革命之中枢”。这是历史的真实，决非某些个别的、片面的、表面的现象或假象所能掩蔽或改变。“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孙中山所做的历史结论，确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述评。

（三）

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活动的特点和优点。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某些规律。严峻的现实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而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权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任何反抗，都会招致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甚至可称为“跪着的造反”的维新运动，也以“六君子”的血洒长街而夭折。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尔作出的“改革”姿态，实质上都是为了苟延残喘的狡猾政治手段。以清末新政为例，无论是尚未兑现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已经开设的谘议局、资政院，丝毫都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状态。因此，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手段，即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和实践了这个道理，对于他们从事的

[1] 熊秉坤著：《武昌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5—256页。

革命事业大有裨益。

对于革命暴力手段在斗争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已认清。只是在经历了一段实践活动后，他才获得了武装反清斗争的观念和决策。农民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曾给他以影响，但最终使他踏上武装反清斗争路途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教训。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终于“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2]因为指望统治者“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迫于形势而作出的“改革”诺言，也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3]正是这样，所以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立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来，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筹款、联络会党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反清武装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马上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准备武装起义。1907—1911年春，孙中山在华南、西南地区（主要是广东）策划了八次起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对于其他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孙中山也极力给予支持。

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很多：没有锻造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外面“输入”械弹以及战斗人员；各自为战，不相联属……而更严重的弱点则是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致使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带上了不同程度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因素，不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反清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持续不断的起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一幕幕悲壮的史剧激励了群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每一次武装起义都为最终推翻清朝政府积累着

[1]《伦敦被难记》（1897年初），《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2]《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7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7页。
[3]《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

胜利因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这场规模空前的反清斗争，无疑是在过去多次起义基础上爆发的。革命党人的“战争事业”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多次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锻炼了大批懂得武装斗争的骨干。尽管孙中山在长时期内对“战争事业”的经验和教训未能作出科学总结，但前一阶段的斗争实践还是为后来的反清武装斗争提供了借鉴。孙中山开始策划起义时大都倚重会党力量，认为“借会党暴动为可靠”。[2]他和他的战友结纳会党，加入洪门，依靠秘密结社组织，以会党成员为发难的主力军。然而，几次起义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迅速发动，但往往难以坚持到底。由于会党组织形式的落后，加之它的成员大抵缺乏革命意志和组织纪律性，所以常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初步总结了这种教训，认识到“革命起义，不可专恃会党。”从1908年起，他开始注重运动新军。革命党人对有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参加的新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吸收了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入盟。广州新军之役就是以新军为基干。“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也计划以新军为主力。武昌首义，新军更是充当了先锋和基干。其次，在武装起义和战略部署方面积累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长期侧重西南地区和边境一带，多次在这个范围内发难。这种战略部署虽有其客观原因，但也反映了他的决策的失之偏颇——过于强调境外“输入”和“接济”的因素，忽略了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要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后，湘、鄂、赣等省的同盟会员总结了“偏于一隅”的深刻教训。中部同盟会派出代表“分赴江、浙、皖、赣、鄂、湘、川、陕”，策划各省同时大举。把武装起义的中心转移

[1]《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54页。
[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到长江中、下游，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为后来武昌首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辛亥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多次起义还为组织具体战役积累了经验教训。继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于同年再次发起防城之役，初步总结了过去战斗的不足之处，他派遣王和顺深入钦州腹地“三那”一带领导农民起义。由于万余农民的参与，壮大了起义的声势。为了继新军之役后在广州重举义帜，孙中山同许多同盟会骨干在槟榔屿会议上较为认真地检讨了过去武装斗争的得失。他们决定加强同盟会的领导，派遣优秀会员充当“选锋”——骨干和突击队；广泛发动各种力量，以新军为主力而辅以防营、会党、民军和绿林；以广州起义为起点，把革命的火焰引向全国。尽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仍然失败，但其斗争水平和影响是空前的。至于在长期起义进程中磨砺出大批熟悉武装斗争的骨干，对于革命事业显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归根到底，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

以1895年广州起义为发端，孙中山毅然踏上武装反清的道路。十七年的战斗历程充满了艰苦和牺牲，许多革命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然而，他们始终坚持斗争，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革命的胜利积聚着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历史证明，这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既非统治者“自己交出政权”的结果，也非立宪派上书请愿所造成，而只能是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持续的反清武装斗争所导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革命的武装斗争确是新制度的“产婆”。

（四）

由于革命党人的长期战斗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起，武昌起义的枪声在辽阔的九州大地上迅速得到了反响。这年年底，一半以上的省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而“独立”。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革命处于凯旋行进的高潮阶段，虽然政治的逆流也在潜滋暗长。尽管百废待兴，但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这关键的时刻，孙中山从欧洲返回祖国。自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流产后，他长期被迫流亡异域。12月下旬，他经由香港抵上海。作为被一致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理所当然地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国外的长期活动阶段结束了，他现在亲临“前方”，“身当其冲”，直接领导革命运动。

同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进程不同，辛亥革命并不是以共和政权建立为其基本完成的标志——从根本意义而言，旧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未能彻底胜利。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着严重复杂的任务：建设共和国，捍卫共和制。形势的日趋险恶并不在于清朝政府的垂死挣扎，因为它的瓦解已是指日可待。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才真正是同革命党人较量的主要对手。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阴险狡诈的权术家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他们急于选择这个“强有力的人”来使迅速崩溃着的旧秩序在已经形成的新形式下稳定下来。袁世凯全部活动的中心内容，即在于此。其次，立宪派卷入革命浪潮也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一方面，促进了“光复”、“反正”或“独立”过程；另一方面，他们眼明手快地攫取政权——为此，甚至残酷屠杀革命党人，力图阻抑革命的深化，大造“非袁莫属”的舆论。再次，从革命队伍内部看来，同盟会正在迅速地趋于涣散瓦解，“革命党消”不幸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共和国在诞生之际，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厄运。

孙中山并没有陷入盲目的乐观和轻信，他意识到面前的严重斗争任务。因此，他在返国途中经香港时拒绝了“退就粤中，以修战备”的请求，决意前往沪、宁，主持“对内对外大计”。甫抵上海，他就宣称自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在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上，他指出当前形势还是“元凶未灭，如虎负嵎，成败不可预睹，即日成矣，而吾党之责任岂遂终此乎！”[1]要求同盟会员紧密团结，贯彻三民主义政纲。他认为已经开始的南北和议决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目的”，更不能够松懈斗志：“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

[1] 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80页。

懈。”[1]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比较全面地说明了自己的职责：“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2]显然，遵循《革命方略》的准则，建立共和制度，当是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主导方面。

作为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热望在新政权中有所建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3]。在赴宁就职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内曾和一些同盟会骨干讨论政体问题。他坚决主张总统制，反对实行内阁制，因为，在当前这种“非常时代”不宜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4]他不顾“北方将派大军渡江”的流言和汪精卫等借故劝阻，毅然赴宁就任。尽管孙中山组建和主持的临时政府困难重重，而其短暂过渡的命运也成定局，但是，他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还是竭尽全力扶植新生的共和政体。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临时参议院仅用了月余的时间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起草过程中，孙中山强调“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以如此，“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颇不完备，也未真正实行，但这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确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6]它所包含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对于长期被封建专制所君临的中国有着重大启蒙意义：作为共和国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成为后来孙中山同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此期间，临时政府还陆续公布了三十九项法令。在革除封建陋习和发扬民主方面，主要内容为剪发辫、禁缠足、废除体罚刑讯、取缔封建等级称呼、不准贩卖人口和拐骗华工、取消奴婢卖身契约、保护人民和华侨生命财产……在文化教育的除旧布新方面，主要内容为禁止“小学读经”，教学内容不得有悖“民国精神”，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此外，还有诸多条例鼓励工商业和农垦业的发展。这些法令难免成为具文，但表明了孙中山忠实于民

[1]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文电”，第22页。
[2]《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1912年1月），《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3]《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8页。
[4]《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北，1953年版。
[5]《居觉生全集》下册，台北，1951年版，第548页。
[6]《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1917—1919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7页。

主主义原则、纲领和方案。

毫无疑问，同袁世凯的较量才是孙中山当时全部活动——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虚位待袁”已成定局。国内外反动势力、立宪派乃至革命民主派的一些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基本取得一致：清帝退位，北方承认共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这种难以有所作为的情势下，孙中山在同袁世凯的对话中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他对袁世凯保持着一定的戒心，坚持共和制度，维护革命原则，认为“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宗旨是不可动摇的，南北议和与统一不能离开“民国巩固”的前提。同时，准备督师北伐以“共破虏巢”。对于袁世凯的露骨的反革命行径，也给予了反击。当袁世凯阴谋同时取消南、北政权而自立政府于天津的消息传来，孙中山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斥之为“民国之蠹”，确信“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1]直到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在荐袁以自代后依然对信誓旦旦表忠于共和国的继任临时大总统心存戒备，并在解职前制订了一系列防范性的措施。为了防止袁世凯的背叛，孙中山提出下列要求：袁世凯必须“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南京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定都南京，到宁宣誓就职。上述措施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却表明孙中山在离职前夕仍在为了“保障共和”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确对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不够。这个善于以假面示人的窃国大盗的表演，时而蒙蔽了孙中山的审视的目光。加以政治逆流业已潜滋暗长，特别是“非袁莫属”的鼓噪不绝于耳，使得孙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前者曾经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后者却迅速地变为现实。所以如此，主要是为客观情势“所迫”。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革命运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不利于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相对强大；革命民主派及其所掌握的物质力量相对弱小。这

[1]《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种严酷的实际，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充分展现。同手握军政大权、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积极支持的袁世凯成为鲜明对照，南方革命政权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因此，政治逆流日渐汹涌。立宪派则充当了拥袁的吹鼓手，充分发挥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同盟会的蜕化，“维时官僚之势渐涨，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以是对于开国之进行，多附官僚之主张，而不顾入党之信誓。”[1]许多领导者倾向于妥协，甚至讥讽孙中山的原则性主张为“理想太高”。胡汉民后来忆述这段历史，比较真实地承认他和汪精卫在导致袁世凯攫取总统职务的南北议和中起了“功魁”或“祸首”的作用，因为他自己“力挽先生之意于内”，而汪精卫则“极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2]至于经济方面，临时政府频于绝境。以军费言，月需500万元维持南京和各地的近20万军队。其他各项开支的数量也颇为可观。但是，收入却数量甚微而又不稳定。海关税收被帝国主义以各种无理借口所冻结。两淮盐税为张謇——已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所把持。独立各省没有上交分文田赋。工商业税也无形取消。四个月内，临时政府各项收入（包括银行借款、公债、军用纸币和江南造币局的收入等等）合计不过746万元和46万两。财政部长甚至连月份收入概算都无从着手，因为它“向以全国赋税为大宗，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3]军事方面也是纷扰混乱，困难重重。由于军费无着，各军催索银饷的代表纷至沓来，陆军总长黄兴焦灼成疾，表示一旦南北交锋，“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大量民军被迫解散，则使革命党人失去了得以控制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虽然表示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的问题在所必争，实际往往一筹莫展，“忝为总统，乃同木偶。”[4]正是力量对比、客观情势和条件，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事变进程的趋向。显而易见，孙中

[1]《八年今日》（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1页。
[2]《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台北，1973年版。
[3]《临时政府公告》第43号，大总统府印铸局1912年版。
[4]《致南洋革命党人函》（1914年4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82页。

山让位于袁世凯的主因是迫不得已。作为一个阶级、政党的代表，孙中山从未对政权表示过冷漠。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直接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后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做出了正确总结："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1]历史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胜任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并非没有给历史进程打上自己活动的印记。虽然客观条件制约着人们的活动，杰出人物的演绎离不开历史的舞台，因此，对于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不宜苛求于个人。但是，实事求是地判明他的活动是否达到历史条件允许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则是应当的。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让位及在此前后的活动留下了深刻教训。首先，他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革命纲领，反而一度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务之急为"实行经济革命"。[2]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倡导"社会革命"上。这种有悖实际的政治论断必然会造成消极后果，妨碍人们认清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降低对现时中心任务的努力，减弱了同袁世凯窃国勾当的斗争。其次，他在群众奋起的时刻未能予以充分的发动和组织。革命党人没有高举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旗帜，未曾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课题提上日程，从而更广泛地动员群众——特别是农民投身于革命洪流。反之，各地的革命党人甚至采取了压制群众斗争和大量解散民军的措施，既挫伤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削弱了革命民主派的群众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没有能把充分的中国广大群众

[1]《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2]《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4页。

吸引到革命中来”,“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做得很差。”[1]这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就未能组建成一支足以克敌制胜的大军——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固统治,必须具有由革命理论掌握群众而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辛亥革命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至于孙中山荐袁以自代的行动虽有其内在的客观社会原因,但无疑也是不足取的。对此,孙中山后来曾深刻反思。把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职务交给袁世凯,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当的。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发表的解职词中宣称:“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争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他的解职决不表明辛亥革命的完满结束,却标志了辛亥革命失败终局的起点。即使把后来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视为辛亥革命的延续,那么,前者不过是强弩之末,后者则只是微弱的回声。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建树了不朽的业绩。但是,他们不可能把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仅由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还因为革命民主派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缺乏18世纪法国革命的力量和性格。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无法挣破,民主革命与近代化是不可能胜利实现的。

历史进程虽然往往出现暂时的逆转,但决不会停滞不前。在辛亥革命后捍卫共和的艰难岁月中,却已呈现出时代的曙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显示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迭遭挫折而始终坚持战斗的孙中山积极迎接了历史的转变,他带着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另为彻底之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适应

[1]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了历史的特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这场以广东为策源地的大革命风暴，才“把袁世凯留下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 * *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首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无可置辩的。辛亥革命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光辉业绩。

确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大乐章的演奏中承担了指挥兼“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决不意味着贬低或抹煞其他领导者和相关团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任何杰出的领导者都对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近代形态的政治运动有其特点——它的领导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其他相关的团体对革命运动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只有依靠各地广大革命党人和群众的英勇战斗，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燃起革命的燎原大火。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某些领导者在一定阶段和个别问题上的能量、水平和影响接近或超过孙中山。然而，从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和全局看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终归是无可比拟的。

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造就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

（作者张磊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从学习美国到“以俄为师”[1]

李　杨

[内容提要]

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由外力推动而产生的，关键人物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从早期的英美议会民主的“宪治”模式，转变为苏俄集权式的“党治”模式，其中又以国民党“一大”为转折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虽然从模仿美国建国模式开始，却没有继续沿着美国式的宪政立国之路走下去。同样，孙中山虽然转向“以俄为师”，但也只是一种“为我所用”策略，孙中山一直坚持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

[关键词]

孙中山、民主共和、三民主义、“以俄为师”

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不仅是革清朝之命，也是革中国三千年的政统与教统之命。[2]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启中国的共和时代。辛亥革命具有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提到现代化意义，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视角，即国际化视角。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产物。鸦片战争近百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生，与英、法、美，甚至俄国都不同，后者的动力来自国内。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是在外力推动下产生的，关键人物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史扶邻说过：“中国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孙中山那样一直易受外部影响。日本为他提供了迅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先例；英国和美

[1] 本文由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2] 参见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39页。

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俄国人则提供了组织方法。”[1]

本文主要对孙中山吸取国外先进思想作一脉络梳理，主要思路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从早期的英美议会民主的“宪治”模式，转变为苏俄集权式的“党治”模式，其中又以国民党“一大”为转折点。笔者仅对这一过程作概述，并对其影响略作分析，期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以美国“共和”为立国蓝图

孙中山早期为什么选择学习美国？这与他的“西方化了的农民”身份有关。

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的人物。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农家，他的中学是在檀香山的普纳荷中学（Punahou School）就读，[2]大学在香港就读，孙中山接受的是一套较为系统的西方教育。故此，孙中山被美国学者史扶邻形容为“西方化了的农民”。[3]

被西化的孙中山之国际视野，比一般人开阔。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相对同时代的先进中国人，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创立合众政府”。[4]

“创立合众政府”口号，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它其实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翻本。孙中山是这么解释的：“中国同欧洲一般大，不适合中央集权，拟仿照美国实行联邦制”。[5]这个口号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颠覆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要以美国式的共和制度作为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点。在国民党历史上，兴中会的地位极为重要，其成立日1894年11月24日被定为中国国民党的建党日。

首倡革命的孙中山很快将口号付诸实践。次年2月，孙中山在香

[1]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

[2] 普纳荷中学建于1841年，最早是为太平洋地区传教士子女受教育而创立。1883年，孙中山在普纳荷学校就读，他这样说过：“这是我的夏威夷，我在这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我是在这里懂得现代文明政府的实质与含义的。”

[3]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15页。

[4]《檀香山兴中会盟书》（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98—599页。

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同时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3月，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据孙中山对日本驻香港外交官说，起义目的就是要颠覆现政府，“要在广东独立成立共和国”。[1]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要模仿美国联邦制，建立共和。早期的孙中山是完完全全的亲美派。

当时不仅孙中山亲美，国内的立宪派也亲美。立宪派就主张将各地的咨议局改为像美国联邦制的州议会、省议会。如果立宪派掌权，“他们是一致偏向于地方自治，在中国建立联邦制”。[2]建立联邦制，能尽快平稳局势，也最能保护他们（士绅阶层）在地方的利益。当时国内的改革潮流，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渴望与国际接轨。

1903年，孙中山又提出“建立民国”。“民国”的概念直接来源于林肯思想，林肯是孙中山少年时代就崇拜的英雄偶像。孙中山解释说：“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3]1905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政纲提出“建国民政府”，[4]并在第二年正式采用“中华民国”名称。孙中山解释说：“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个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5]即为人民当家作主。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新国号为“中华民国”。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立国模式，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建立民国”，再到“中华民国”，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式的共和影子，即要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为政体的共和国。孙中山说过：“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6]这句话包含了立国的政体和国体，民主是政体，共和是国体。因此有学者说，美国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发祥地。[7]

---

[1] 邱捷：《孙中山因上书被拒而转向革命？》，《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0日。
[2] 周锡瑞：《满汉关系恶化引爆辛亥革命》，《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9日。
[3] 蒋永敬著：《国民党兴衰史》（增订本），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8页。
[4] 同上。
[5] 台湾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1—6月，第8—9页。转载自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第39页。
[6]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6页。
[7] 郝平著：《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形成，更是受到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影响。孙中山自己坦率承认，他的三民主义就是起源于美国，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通，“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总统生平所提倡之三民主义”。[1]

其中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和最完整的民权思想，直接受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尔确斯（Delos F. Wilcox）的影响。孙中山一向对美国的新思想敏感。威尔确斯的名著《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刚出版，孙中山立即吩咐孙科赶快翻译，后孙科因事未及翻译，孙中山又催促廖仲恺翻译。

《全民政治论》的核心思想是张扬民权，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管理。这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相通。孙中山的民权包括四种权利：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除了第一个选举权外，后三权都引自威尔确斯《全民政治论》一书的观点。孙中山说：

选举权与罢官权是对官吏设的。国家设官用人，人民要有权力可以选举，可以罢免。人民一定要有这两种权；有了这两种权，他们的政治地位，才算是巩固，才可以叫做一国的主人。他们能够实行这两种权，才可以去治国。创制权和复决权是对法来讲的，是关于法律的。有治人还要有治法，因为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对于不好的法律，必要有权进行修改，这便是复决权；对于良好的法律，要有权可以创造的，这便是创制权。人民是实在有了这四种权，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2]

孙中山还说，“我们要想是真正以人民为主，造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必须要国家的政治成为一个‘全民政治’”。[3]这也是威尔确斯《全民政治论》的核心观点，孙中山在西方先进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民权思想，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核心价值。

我们再来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重要的“平均地权”观点，就是深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单一税”理论影

[1] 孙中山：《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见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2] 张益弘著：《三民主义之考证与补遗》，（台湾）恬然书舍1996年版，第208—209页。
[3] 黄季陆著：《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上册，“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年，第113页。

响。孙中山的第一篇对外宣言《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提出“人民主权论”观点。[1]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分别吸收了著有《自由》的塞西尔(H. Cecil)、著有《自由与政府》的伯吉斯(J. W. Burgess)、著有《天道渊源》的丁韪良(William Martin)等美国学者的观点。[2]

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最重要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均是美国舶来品。孙中山还将美国人时常挂在嘴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与他的三民主义相关联,“自由”应对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就是提倡国家自由。“平等”与民权主义相通,民权就是要打破专制,人人享受平等。“博爱”与民生相同,民生是为人民谋幸福,幸福就是博爱。[3]

美国自南北战争后,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末,美国国力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年轻的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宪法的国家。正当其时,孙中山前后10次到过夏威夷和美国本土考察,孙中山的结论是:最快富强起来的国家就是共和制国家。

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信奉基督教的孙中山,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当时西方先进的新思想,甚至可以说,孙中山思想几乎与时俱进。张玉法说过,“在他主导的革命时代,没有其他革命领袖对西方的认识像他那样广博”。[4]比起国内其他党派领袖,孙中山的国际化特色最为明显。

因此,我们有如下结论: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一直把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推翻满清、成立新政体的模式。孙中山是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付诸实践的亚洲第一人。1912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获胜,孙中山据此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在中国展开。孙中山坚持其治国理念“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5]

---

[1] 郝平著:《孙中山革命与美国》,第254页。
[2] 同上,第256页。
[3] 同上,第253页。
[4]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第20页。
[5] 《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可惜的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辛亥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太急促，就中国近现代史的曲折和复杂性而言，国际化和本土化并未衔接好。清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仅仅当了数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辞职，他的建国方略并没有得到实施，他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五权共和主张也被搁置一边。不久，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再次革命惨败，不得不流亡日本。社会舆论也批评国民党先启兵端，“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1]接着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国会不久也被迫解散，这使得一心模仿英美议会制的孙中山大受打击。

由于一连串的失败，孙中山痛定思痛，开始对议会政治中的“你争我斗”导致议会运作混乱极度不满，认为党的力量太散太弱。1913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为加强党的力量，将个人权威引入党组织。他甚至回复会党传统，要求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并按指模，而且不惜与持反对意见的黄兴分道扬镳。孙中山开始建立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的统一模式，以此对抗袁世凯的军权专制。至此，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倾向已相当明显。

二、孙中山转向“以俄为师”

关于孙中山转向苏俄，传统史学的观点是：这是孙中山在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重新作出的重大决策。笔者认为这种提法虽不无道理，但比较空洞。以五四为分界限的所谓新旧民主革命，区别在于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孙中山的“联俄”（或者“容共”）举动并不能说明其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更不能说孙中山从此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孙亲美，但只是一厢情愿。辛亥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孙中山一直未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第一个想到就是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孙中山

[1]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均被拒绝。结果孙中山失望离去。当时美国对华实行“不干涉政策”以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其实是观望，看鹿死谁手。美国官方普遍认为孙中山没有足够的筹码以稳定中国乱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依然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承认。美国《纽约太阳报》的评论，很能代表美国官方的看法：“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1]1912年2月初，孙中山专门接见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亲自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现在不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2]孙中山仍不气馁，2月10日又亲自接见美国国务院代表邓尼，再次表达这个愿望，结果事与愿违，“美国的外交代表，以毋庸置疑的明确性与毋庸置疑的强调语气告诉孙中山，美国是决不会承认南京政府的”。[3]当时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报告称：“美国这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决不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任何外交上的关系。”[4]美国的对华政策没变，还是不看好孙中山的治理能力。美国的态度是，“假如中国能表现出治理自己的能力”，“外国的承认是无问题的”。[5]

尽管孙中山一再努力，英、美、法、日等国家始终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西方国家的立场，使得新政权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困境。与此相反，西方国家一致支持后来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及其北京政权。1919—1920年，孙中山撰著《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希望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仍被英美等国漠视。就连军政府就广东关余交涉，都遭列强出动军舰威胁。孙中山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对西方国

[1] 转引自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载《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3页。
[2] 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8—1359页。
[3] 同上。
[4] 同上。
[5] 《接见麦考密克时的谈话》（1912年1—2月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141页。

家，尤其对美国政府深感失望，认为西方列强“断无表同情于吾党”。[1]

那么，孙中山为何转向苏俄？

与西方列强的傲慢态度不同，苏俄是主动联系孙中山的。苏俄先是声明放弃沙俄时代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主动提出帮助国民党完成中国统一。1922年4月，苏俄正式委派全权代表达林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而孙中山本人，那年刚好发生一件重大事件。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叛变。事件给孙中山以沉重打击，陈炯明统率的粤军属广东革命政权嫡系，朱执信称这支军队为“党的遗腹子”，是革命的种子。党的“遗腹子”竟然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狼狈出逃。这对孙中山刺激极深，遭亲信反叛最有挫败感。

屡战屡败且又孤立无援的孙中山重新审时度势，寻求新的政治盟友。他决定改弦更张，争取外援。在上海，他很快与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接上关系。孙中山在重大关头时，常做出惊人之举，眼下争取西方尚无眉目，唯有联俄。受到重大打击后的孙中山决定“联俄”，希望借助苏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跌入人生低谷的孙中山说，“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2]“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备尝艰辛顿挫的孙中山迫切急需苏俄援助。他认为，与西方列强不同，“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何况这次“乃俄国自动也”。[4]正是在这艰难处境下，孙中山终于抓住了俄国人伸出的橄榄枝。

早在1920—1922年，苏俄积极推行东方战略，与吴佩孚、孙中山、陈炯明同时进行密切联系。但随着联吴、陈的不成功，苏俄于“十二年初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和他的党”，[5]并于1923年1月确立“全力支持国民党”政策，认为“国民党为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

[1]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8页。
[2] 达林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4]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8页。
[5] 同上，第497页。

民族革命组织”。[1]苏俄“支持国民党”的行动迅速，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公开“联俄”立场。3月，莫斯科决定资助国民党200万墨银，5月，对孙中山表示“准备对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金钱、物质、武器和人员的协助。[2]但苏俄对国民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军事和财政上，他们很快从出钱出枪上升到能左右国民党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进而参与国民党的政治规则的制定。

以1924年国民党“一大”为例。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影响深远，被国民党人称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之所以说它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大会的三个关键词来分析：

1.《新党章》

这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的重要文件。鲍罗廷是由斯大林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是共产国际公认的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被列宁称为“革命奇才”。[3]由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新党章》章程，基本照搬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它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重心在“集权”，“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4]苏俄共产党的优长在于强大高效的组织能力，这正是孙中山所迫切需要的，他希望借助具有铁血般强硬的革命政党模式来改造松散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列宁主义的党务组织原则，呼吁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铁的纪律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化。

2.《大会宣言》

这份重要文件主要由鲍罗廷操刀，鲍以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大会宣言》之重要性，在于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早年民权主义的一

[1]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361页。
[2]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501页。
[3] 参见何云庵等著：《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4] 参见《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2—162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94—599页。

个基本理念，是建立一个以议会民主为政体的共和国。但重新解释民权主义后，原被推崇的议会制遭到批判，民权被看作是资本家压迫平民的工具。[1]国民党在淘汰议会民主制的同时，引进俄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反帝口号。这两个口号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口号我们耳熟能详，但它原意是什么？进入中国后又起了什么变化？“帝国主义”是列宁的表述，原意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种形态，但引进中国后，就本土化为“列强侵略”的代名词。[2]这个口号引进中国后，曾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抵制，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一个整体组织，侵略中国也不是整个国际，而是国别。他们认为，“反帝国主义”是苏俄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背后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革命世界观。[3]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19年3月，苏俄将第三国际设立在莫斯科，就已视己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中，已“把中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全盘布局之中”。[4]如吕芳上所言，“列宁输出革命，在中国获得了初步的实现”。[5]当时苏俄的“世界革命”目标，就是要在落后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最终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6]这是列宁提出的国际新秩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俄迫使孙中山只能和苏俄合作，不能与敌视苏俄的国家来往，斯大林甚至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是反对革命，《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7]并警告国民党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这是一种“我要管住你”的大国强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2]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载《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3] 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
[4] 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6—497页。
[5] 同上，第497页。
[6]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13—714页。参见何云庵等著：《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第182页。
[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权，当然也是苏俄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权四面楚歌，就连弱小的北京政府，在英、美、日的支持下，也装模作样地出兵西伯利亚。苏俄期望能在远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以保障他们的远东边界安全。

无论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口号推动了苏俄“世界革命”战略在东亚的贯彻，它既有带政治策略含义的民族主义诉求，更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苏维埃联邦革命的内涵。我们从以后的历史看到，俄共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理论，将20世纪中国的革命任务和范围都大大地加深和扩延了。

《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党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日后“总理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新的建国方针

孙中山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效仿“先进的民主国家制度”的主张，这一主张现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列宁式“以党建国”的主张。孙中山在“一大”开幕词中说：“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即是采用新的革命方法，重新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党，进而重建共和。孙中山概括为八个字：“以党建国”、“以党治国”。[1]孙中山认为俄国成功的经验就是“将党放在国上”。[2]这也是孙中山积极接受苏俄“在革命经验中提示‘好方法’，以实现统一中国的强烈主张”。[3]孙中山认为欧美的议会民主弊端极大，主张效仿苏俄实行一党制，由国民党肩负起建国治国的责任，即以党统政为“以党治国”核心。

以上这三个关键词，都深深地打上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烙印，也就是说，是由俄国人参与制定了国民党的政治规则。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居然由外国人来执笔，甚至“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4]说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4—15页。
[2] 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3] 《国父全集》第2册，第565页。转引自吕方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9页。
[4] 罗章龙著：《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9页。

孙中山早期的建国理念是以美国为蓝本，怎么转而接受布尔什维克主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后，孙中山和很多国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俄国的制度比英美的更先进，孙中山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孙又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2]孙中山还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师法俄人”，“以党治国”。[3]

孙中山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没有什么比随机应变更能体现孙中山特有的作风：与任何国家结成同盟都是可能的”。[4]孙中山急于与苏俄结盟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联俄”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获得苏俄援助以统一全国。孙中山毫无掩饰地说：“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随时“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5]至于“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每一个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6]在孙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支配下，“孙中山对苏俄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的利益要求表示了同意”[7]。

从此，国民党的政党政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从英美式议会民主的“宪治”模式，转变为苏俄集权式的“党治”模式。蒋永敬对此评论说：“如果实行前者，则后来国民政府的政制，应是欧美式的民主；但一全大会采取了后者，使国民党走上‘一党专制’之路。”[8]这种党治

[1]《总统新年在桂之演说》，《民国日报》1923年2月23日。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14—15页。
[3]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7—268页。
[4]［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422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6]《与邓泽如等的谈话》（1923年11月），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7]何云庵等著：《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第264页。
[8]蒋永敬著：《国民党兴衰史》（增订本），第107页。

体制与孙中山早年提出的民主共和制大异其趣。在拥抱了俄共的“以党治国”理论以后，孙中山之前的“民主宪政”主张，已渐行渐远。

关于这一点，当年的胡适看得最清楚。胡适直指1924年的孙中山，已不是1911年的孙中山。[1]罗隆基甚至直言孙的这一套“党在国上”的源头出自苏俄。郭廷以也说，国民党改组的措置和表示，“与共产国际的主张大致吻合”。[2]上世纪40年代，政治学家李剑农对国民党“一大”有一经典定论：“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3]

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到1924年为止，辛亥时期实行的依托于议会斗争的英美式政党政治，逐渐被苏俄式的政党政治所取代。

三、接受苏俄“党治”模式之后果

在转向“以俄为师”后，苏俄的政党政治对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带来什么影响呢？简单概括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以党治国”成为日后国民政府的建国方针。

“以党治国”，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国家权力的运作集中于党中央，使党有强大力量，孙中山的原话是，“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一切权力属于党”，[4]并将党的权力延伸至社会基层乃至个人。一时间，“‘党国’‘党军’‘党治’‘党化’等新名词喧腾于当时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之口。当时广州甚至有‘党市’之称”，[5]广州成了国民党改组后的首善之市。1925年的广州国民政府，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相继成立，标志着“党国”体制已从理论付诸实践。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时，也就标志着中国议会民主试验的结束。

其二，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因此发生变化。

---

[1]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载《人权论集》，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2]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363页。
[3] 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书店1932年版，第531页。
[4] 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5] 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有政治就有派别，就有斗争，政党内部总是难免因思想及政治立场歧异而出现派系纷争。国民党自建党以来，党内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但斗争方式比较温和，即在三民主义框架内，不同派别只分急进和稳健，各派虽有冲突，但都是三民主义的同盟者，党的主义是一致的，斗争方式是“你活我也活”。

引进俄共的政治斗争方式以后，规则变了，党内不同派别被标签化为左、中、右，原来的稳健派被视为右派而成为异己力量。划分派别是以阶级属性为标准，阶级是对立的，因而派别也是对立的。于是，党内斗争方式是“你死我活”的。鲍罗廷一再提醒国民党，“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1]这就造成党的主义是对立的，党的组织是分裂的。这是因为苏俄的政党理论是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基础，它是打天下的理论，不是治国的理论。革命政党如何转变为民主政党，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从此，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上，国民党内政治派别斗争之激烈，蔚为奇观。

这种规则的改变，也与苏俄对国民党的策略有关。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发现，苏俄从一开始就对国民党采取分化、改造政策。它的分化目的是什么？鲍罗廷说过，苏俄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内造就一支“亲俄”的政治力量，“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2]最终通过控制国民党从而控制中国政局，从而达到在远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的目的。

第三，影响国民党的重大人事安排。

孙中山逝世后，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的国民政府，在鲍罗廷的主张下，国民政府主席的人事问题，居然可以绕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会，直接由政治会议做出决定。在代理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不知情之下，内定由汪精卫出任，由此埋下引发党内斗争升级之伏笔。国民政府成立仅一个多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右派胡汉民被逐放莫斯科。不久，爆发中山舰事件，又轮到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被迫去法

[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2]《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1页。

国等等。左右之争，轮番上场，造成国民党核心层的分裂。国民党早期的“多党共存”的宽容理念逐渐被“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所取代。

苏俄模式的引进，对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乃至中国的政治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从国民革命到阶级革命，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党政治被演绎得轰轰烈烈。杨天宏对此有一概述：“国民党离开长期追求的议会政治道路，选择了通过自己一个政党于武装革命成功之后‘以党治国’的路径。在同一政党内部，原先共存的老成持重与锐意新进两类同志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形同水火。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苏俄的作用如影随形。”[1]采用苏俄经验，改组为新式的革命政党，确实大大提高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使得国民党打破困局，并为挥师北伐统一全国打下基础。但与此同时，联俄政策，“不论在意识形态上、权力分配上，都伏下了后来国民党纷争的根源”。[2]

四、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

综上所述，辛亥期间以及后来的以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例的中国政党政治有一鲜明特点，即不论是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还是苏俄共产国际的“一党政治”，都是舶来品，都是国际化的产物。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重读这段历史，尤其不能忽略国际化这一视角。20世纪初年，不管是英美式的民主共和，还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世界潮流。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红潮”，更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直呼为“第三种文明”。罗志田对此分析：“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3]

---

[1] 杨天宏：《苏俄、中共与国民党的“左右”分化》，载《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5页。

[2] 吕方上著：《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560页。

[3]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但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不管来自“西”或“东”的舶来品，都经历了一段逐渐被本土化的过程。孙中山虽然接受了美国先贤者的共和原理，但孙的共和并非全盘西化，其中有取自于中国古代“共和行政”之义。同时，孙中山的共和是“民主共和”，非美国的“立宪共和”，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1]

辛亥革命虽然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使得民国初年的政治中心演变成权力之争，国会成为各党派争权夺利的舞台。例如国家的行政权，几个月内像走马灯似的，一时是内阁制，一时是总统制，转眼间又成了内阁制，以后更是演变成“府院之争”等等。这种因人而异的制度安排，是造成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例如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内阁制。1912年1月2日，临时参议院因孙的要求，变内阁制为总统制，[2]不久孙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匆忙推出《临时约法》，转而仿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的内阁制。孙中山等用意明显，就是防止袁世凯的专权。当时就有舆论批评，所谓约法是对人立法。袁世凯非等闲之辈，岂会善罢甘休，《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又被改回总统制，甚至变本加厉，将共和改为君主立宪。袁世凯完全将《临时约法》当儿戏！

辛亥革命从模仿美国建国模式开始，却没有继续沿着美国式的宪政立国之路走下去。同样，孙中山虽然转向“以俄为师”，也只是一种“为我所用”策略。一般说法是借用苏俄的组织制度以强化国民党的凝聚力和组织效率。李云汉甚至认为“中山先生之联俄实具有防患与借援二重用意，一方面联俄以防制俄患，一方面联俄在获取俄援。”[3]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到底没有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理论，“甚至可以说防止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发展，是中山先生联

[1]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许纪霖：《自美国革命始，于法国模式终——辛亥后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载于《东方早报》2011年4月25日。
[2]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283页。
[3] 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上册），第191—205页。转引自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9页。

俄的基本条件”。[1]《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第一条就郑重声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2]孙中山宣称：他“从未计划，且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3]孙坚持认为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近现代以来，“中国国情”一直是国民党人抵御外来共产主义的遁词。孙中山甚至也并没有接受苏俄所标榜的所谓国际主义。[4]

孙中山的坚持与苏俄目的相背离。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制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发展。因此，苏俄对孙的这一坚持非常不满。当年苏联公布《孙文越飞宣言》时，就隐瞒孙中山的这段话，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档案揭秘后方才被公布。孙中山从不视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没有接受苏俄、共产国际的核心理论。孙中山曾对马林说过：“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5]国民党“一大”，远非人们想象的是俄国人的彻底胜利。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俄援助，是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孙说道，“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6]

史扶邻说过：“在文化的及政治的传统上，孙中山确是和英、美而不是与苏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鲍罗廷也承认孙受美式影响很大，他说：“美国精神在他（孙中山——引者注）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7]在孙中山已确立“联俄”后，也仍不放弃争取英美支持，毕竟“美国是中山先生认识最深，期望最大的国家”。[8]《孙文

[1] 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9页。
[2]《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3]《国父年谱》下册，第704页。转引自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6年，第216页。
[4] 参见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2页。
[5] 邓家彦：《马丁谒总理实记》，《革命文献》第9辑，第204—205页。转引自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499页。
[6]《与□□记者的谈话》（1923年），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99页。
[7] 蒋永敬著：《国民党兴衰史》（增订本），第108页。
[8]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501页。

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孙中山又发表另一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在广东关余交涉失败，对美国期望降到冰点时，“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请美国起而促成中国的和平计划”。[1]《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孙中山的外事顾问陈友仁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2]他们期盼西方支持的目光一直未曾收回。1923年4月，陈友仁再次对外宣布孙的外交政策时，仍然表示希望得到英美援助。[3]1924年1月6日，国民党确定联俄的“一大”前夕，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惟一可以信赖的国家”。[4]虽已确立了“以俄为师”，孙中山依然期望得到美国支持。可惜舒尔曼甚至没有将孙的这一意愿报告华盛顿。

孙中山经常重复的名言是：“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5]虽然国民党“一大”确立“以党治国”方策，但孙中山的“基本观点和作风没有改变”。[6]革命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学习，主义上则不作让步，这就是“孙文策略”（吴相湘语）。如史扶邻所言：

孙中山虽然表现了十分灵活的运作能力，但对其目标却坚定不移。特别显著的是对其事业开创初期指定的目标，终其一生，从未犹豫不决。在1905-1906年创立同盟会期间他所制定的目标，直至20年后他去世时，实际上都没有丝毫改变。

史扶邻还说：

就孙中山而言，其意向丝毫不容置疑，他从未想过以权力集中替代民主政府，更没有视其为最终目的。他坚持民主政府的特别计划，即五权宪法。他还试图倡导国会制度，建立像瑞士那样的最新式的地

[1] 吕方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502页。
[2]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422页。
[3] 3月，梁士诒在香港代孙向英借款。参见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362页。
[4]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430页。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会词》，《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2页。
[6]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431页。

方自治政府，再次证明了他醉心民主理想的诚意，甚至在最后遭到挫折而转向苏联的那几年里，他仍然坚定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1]

问题是，军政和训政时期的“革命政党”，在宪政时期，如何适应时代转化成为“民主政党”，还是个任重道远的问题。在《建国大纲》里，孙中山明确“党治”只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推行，“宪政”时期，则一切依宪法行事，总统与国会议员均由人民公举，也就是“还政于民”，这就又回到孙中山早年的“宪治”理想，以制度化的手段抑制政府权力，显示出孙中山早期对民主诉求的郑重承诺。孙中山的“军政”和“训政”是为了“宪政”，前者是功利性手段，后者才是终极目标。当时的国民党人也将“联俄”形容为“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即国民党的主义不变。

当面对这些历史问题时，回望前尘，我们会自问，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一问题？中国走上现代化以后，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一直纠缠不清。落后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甄别、选择和同化过程，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句话可作为本文的一个总结，他说：

在他们寻求新的和进步的东西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抱住一个观点又舍弃一个观点，或者把那些很难共存的观点兼容并收在一起。……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革命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2]

（作者为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

[1]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第491—492页。
[2]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5页。

苏联顾问团与孙中山黄埔建军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周兴樑

[内容提要]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百余名男女顾问组成的苏联驻广州顾问团，是一支活跃在我国华南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国际革命力量。他们当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创校建军。顾问们在广州军务委员及政治与军事总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的领导下，积极指导并参加了黄埔军校与教导团及党军，乃至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工作，以及其反对军阀势力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色、成绩斐然、贡献良多。遗憾的是，对于该顾问团的人数，及众多顾问人员在广州的具体工作情况和他们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建树等问题，我国学界尚无专文进行论述。本文不揣浅陋地对此加以考察，乃冀能收拾遗补阙之效果，且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苏联顾问　广州军务委员会　孙中山　黄埔创校与建军　革命军的东征北伐

一、苏联顾问抵穗及广州军务委员会的设立

1923—1925年间，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请求，先后派遣了几批顾问人员到广州，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苏联驻广州顾问团（苏方的文献中多称为顾问团华南组或广州小组）。这些顾问全力帮助和指导国民党的黄埔创校建军等项工作，并亲自参加了广州革命政府组织进行的历次反军阀战争。他们为黄埔军校的发展、广州革命军骨干队伍之壮大，及东征与北伐等战役的胜利，作出过贡献和建树了功勋。

关于苏联派到广州的顾问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目前还没有人（含苏联学者）进行过统计，因而也就尚无一个可信的说法。笔者目前见

到的相关记载有以下几种：一是苏方已解密的档案材料（中译本）载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5年5月7日之会上决定："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从它后来的会议录可知，这一决议并未完全付诸实施。因为在同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国委员会秘书隆格瓦向与会者报告说，苏联顾问已在广州、北方的冯玉祥和岳维峻两部共设有3个"军事小组"，这"三个小组和北京中心的教官总数定为128人"；稍后该委员会又请求政治局拨出5.2万卢布生活津贴费，"用于超（出规定）标准"向中国"派遣25名教官"——此申请在10月22日的政治局会上获得批准。[1]由此可知，苏联在广州、保定、开封和北京4个地方服务的教官共为153人；而其中有多少人在广州工作，政治局后来的会议记录并未说清楚。二是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在其著述中，转引卡札宁《在加伦总部》一书中之说法，有"加伦'在华期间，曾多次召集有五六十名顾问参加的工作会议'"云，并列出了其中21名顾问的任职简况。[2]三是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说广州有"50名苏俄军事教官"，或谓"加伦将军率领下的50名苏俄红军顾问"。[3]我们从这些记述中无法了解到在广州工作的苏联顾问人数。幸好在一些苏联顾问所写的回忆中，有切列潘诺夫中将1976年完成的《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译本以原书第二部分之题目《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书名，而将原书名作为副题）一书，对驻广州顾问们之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由于作者"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任总教官何应钦的顾问，以后他又一直作为何的顾问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和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及亲身参与后来"北伐的一些重大战役"，因而"掌握的军事行动材料较多"，又了解到"某些战斗的组织与指挥工作"内幕，再加上其"书中大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编，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1、624、673—674、725页。
[2]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67—130页。
[3] 陈洁如：《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量引用了当时的札记、书信及其他文件”，[1]故该书为我们今天考察研究广州苏联顾问团的有关情况，提供了丰富和扎实的史料。

据切氏说，苏联政府于1923年秋至1925年底至少派出过4批顾问前来广州：第一批顾问是由越飞的助手格克尔从全俄参谋学院师生中选出来的5个人，其中之4人在10月6日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夫妇抵广州之前后（1923年9月—1924年1月间）陆续来到羊城。[2]第二批顾问人员是在1924年6—7月之交，随首任军事总顾问巴浦洛夫（巴夫洛夫）将军抵达广州的。事情之缘由是这样的：加拉罕和鲍罗廷在4月16日致电莫斯科，请求本国政府“（一）选派五十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二）让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代表团”开展工作。[3]苏联政府接此电后，在挑选这位“能使孙中山敬服”的顾问团领导人时，选中了受过良好教育、年方32岁的军团司令员A·P·巴浦洛夫将军，让他到广州任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的首任军事总顾问。巴将军“大约在六月二十一日化名哥沃洛夫（即高和洛夫——引者）来到广州”时，[4]跟随他的“一批军事顾问也来到广州”。他们的人数多少不详，切在书中只列出6个人名。第三批顾问是乘运载“援孙”第一批军火的俄舰“沃罗夫斯基”号，于10月8日抵广州的。切在书里具体列出了9人的姓名，并说他们“都派到了黄埔军校”；而受命前来接替巴浦洛夫（他7月在东江视察时以身殉职）军事总顾问职务的加伦将军及夫人，也于是月底到达广州上任。随着1925年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广州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顾问，于是有些苏联“国内战争的英雄”，作为第四批顾问于该年底奉派“来到了中国”——切书列出了到广州的11个人。上述前来广州协助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工作的这些俄国顾问，可分成“三类”人：“大部分

[1]［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译者前言”第1—3页。
[2]［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2、16页。
[3]［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4]（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人（主要是军事顾问）”“都忙于直接的军队工作”，此为第一类；某些被“叫作‘政治家’”的人“属于第二类”，他们“基本上是研究中国社会生活问题的顾问”；而“在职务性质上与纯粹的政治关系较少的同志们（飞行员等），列入第三类”。[1]这三类苏联顾问共有多少人呢？如前述，切氏之书中列出的4批顾问（含总顾问在内）计35人。这显然人数不全，幸好他在书里叙事时还提到了其他的不少顾问。笔者综合切书的这些记载，再参考其他的各种书籍与资料，统计出在华南（广州和武汉）工作的苏联顾问约有百余人。现将他们的具体情况列简表如下：[2]

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服务的苏联顾问情况简表
（1923年9月—1927年7月）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鲍罗廷	1923年10月6日	苏俄驻广州政治军事顾问团总负责、广州军务委员会政治总指导员、政治总顾问、军校3期政治讲师
巴浦洛夫（又作巴夫洛夫、高和洛夫）	约1924年6月21日（有说是1924年5月）	首任军事总顾问（1924年6—7月）
加伦（布留赫尔）	1924年10月底	第2、4任军事总顾问（1924年10月—1925年7月，1926年5月—1927年7月）、首任广州军务处（院）长、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参谋长、军校3期军事教官
罗加乔夫	1924年10月8日	军校第4期政治顾问、代理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参谋部顾问

[1]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21、126、298、427页。

[2] 本统计表主要是依据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卡尔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1924—1927）》、勃拉戈达托夫的《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贾比才等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及黄修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丁言模的《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第一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陈建华总编的《黄埔军校研究》第2辑等书的叙述内容辑成的。由于一些顾问有几个名字，加上各书中的人名译法不统一而又无原文可参照，故表内所列名单可能有错漏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季山嘉（库伊（依）贝舍夫、古比雪夫）		第3任军事总顾问（1925年11月—1926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总监顾问
萨赫诺夫斯基（尼洛夫）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顾问、军事副总顾问、粤军第2师顾问、二次东征时第4军顾问
捷列沙托夫	1924年1月25日	军校顾问、加伦的副官、第2任广州军务处（院）长
波里亚克（又作鲍良克）	1923年10月6日	军校的顾问组长与首席顾问
切列潘诺夫（又作契列帕诺夫、蔡诺比拉夫）	1924年1月25日	军校第2任首席顾问、教导1团顾问、二次东征时第1军1师顾问、北伐时东路军顾问
沃里金		军校代理首席顾问
格尔曼	1923年9月底	军校的军训顾问
沙尔费耶夫（沃罗比约夫）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顾问、先后任巴浦洛夫和加伦之副官
乌格尔（列米）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顾问、广州空军与装甲兵顾问
丘芭列娃（萨赫诺夫斯卡娅）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顾问、桂军学校顾问
艾蒂金（勃拉伊洛夫斯基）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顾问、广州军务处（院）人员
舍瓦尔金（普里贝列夫）	1924年6月下旬	军校步兵顾问、二次东征第1军2 师4团顾问
波洛（又作帕洛、帕罗）	1924年10月8日	军校顾问、教导2团顾问、二次东征时第1军2师顾问、北伐时第4军12师顾问
齐利别尔特	1924年10月8日	军校顾问、警卫军顾问组长、粤军第7旅顾问、北伐时第1军顾问
马采伊利克（又作马赤利克）	1924年10月8日	滇军学校顾问、军校3期军事教官、北伐时第3军顾问
别夏斯特洛夫（又作贝斯查斯特洛夫）	1924年10月8日	军校炮兵顾问、教导1团顾问、二次东征时第1军2师顾问组长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吉列夫（又作基列夫）	1924年10月8日	军校军需顾问、二次东征时炮兵顾问、平定杨刘之役炮兵连长、北伐时炮兵军需顾问
格米拉	1924年10月8日	军校工兵顾问、警卫军顾问
泽涅克（杰卜罗斯基）	1924年10月8日	军校顾问、黄埔4期军事教官、北伐时第2军顾问
斯切潘诺夫	1924年10月8日	军校顾问、首次东征右路军司令部顾问
马迈耶夫（又作马马耶夫）	1924年10月8日（？）	军校政治顾问、广州军务处（院）主管工兵事务人员、黄埔4期军事教官、北伐时第7军顾问
科丘别耶夫		军校通讯顾问
德拉特文（又作德嗽特温）	1924年10月8日（？）	军校通讯顾问、首次东征右路军司令部顾问
亚科夫列夫		军校工兵顾问、粤军工程兵顾问、二次东征时第1军2师炮兵顾问
帕纽科夫		军校翻译及4期教官、二次东征时第1军3师顾问、北伐总参谋部顾问
捷列辛科（捷斯连科、捷列申科）		军校4期军事教官、二次东征时独立师顾问、北伐时第6军17师顾问、叶挺师顾问
铁罗尼（又作泰伊洛夫、塔伊罗夫、塔伊罗）		黄埔4期和武汉分校之政治教官
沃林（别连基、又作瓦林、互林）		军校4期工兵顾问、后在鲍身边从事农运理论工作
白礼别列夫		军校4期步兵顾问兼顾问长
嘉列里		军校4期炮兵顾问
米哈伊洛夫		军校顾问
阿赫篾多夫		军校卫生顾问
阿利		军校交际顾问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萨莉姆		军校和粤军的枪械顾问
卡拉绰夫		军校政治顾问
纳乌莫夫		军校政治顾问、后在鲍身边从事理论工作
叶弗列莫夫（阿勃诺尔德）	1925年底	广州军事顾问
科尔涅耶夫	1925年底	广州军事顾问
科托夫（卡丘申）	1925年底	广州军事顾问
卢涅夫	1925年底	广州军事顾问
斯米尔诺夫—斯维特洛夫斯基		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海军顾问
斯米尔诺夫		广州军务处（院）人员
鲁达科夫		警卫军顾问
洛夫—施曼		警卫军顾问
莫伊谢耶夫		警卫军顾问、粤军之炮兵顾问
尼库林		警卫军顾问、首次东征时教导1团顾问
什涅伊杰尔		首次东征右路军司令部政治顾问、二次东征时第9旅顾问、北伐时任政治顾问
瓦西列耶夫（又作华西列耶夫）		首次东征时教导2团工兵顾问
瓦西列维奇（亚诺夫斯基）	1925年底	二次东征时第1军3师顾问、北伐时总参谋部顾问
沙尔费耶夫		二次东征时第4军1师顾问
涅费多夫（巴夫洛夫）	1925年底	北伐时第8军顾问
康奇茨		二次东征和北伐时的第6军顾问
阿基莫夫（西林）	1925年底	广州军事顾问、北伐时第1军2师顾问、后调往河南任开封俄顾问组付组长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斯涅戈夫		北伐时加伦的参谋长
格津斯基		北伐时广州后方留守处的顾问
勃拉戈达托夫（罗兰）		北伐时任加伦之参谋长
科尔涅夫		北伐总司令部的军事顾问
尼基京		北伐时第4军顾问、后到武汉协助鲍工作
戈列夫		北伐时第4军12师顾问
卡札宁		广州顾问团书记、加伦的译员和秘书
斯坦因		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顾问
夏斯		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顾问
切尔尼科夫		北伐时第6军顾问
利曼诺夫		北伐时第3军顾问、武汉时期在鲍身边工作
奥利舍夫斯基		北伐军攻河南时任总司令部顾问
奇海捷		武汉政府时期的军事顾问
拉兹冈		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的顾问
约尔克	1925年底	在广州政治总顾问处从事农运工作
维什尼娅科娃	1925年底	在广州政治总顾问处工作
塔尔哈(汉)诺夫（叶尔多勃尔克、埃尔德别格尔）		在鲍身边工作的农运问题专家
库满宁		在广州鲍身边工作的顾问
米柳特克维奇		在广州鲍身边工作的政治顾问
西纳尼		在广州鲍之身边从事理论工作
普利奇（普利契）		武汉政府时期在汉口工作的顾问
戈莱斯基		武汉政府时期在汉口工作的顾问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泽勃罗夫斯基		武汉政府时期在汉口工作的顾问
齐冈		武汉政府时期在汉口工作的顾问
沃伊尼奇		武汉政府时期在汉口工作的顾问
拉祖莫夫		武汉政府时期在鲍身边工作的政治顾问
米夫		武汉政府时期在鲍身边工作的政治顾问
库丘莫夫		武汉政府时期在鲍身边工作的政治顾问
卡连扬		武汉政府时期在鲍身边工作的政治顾问
科莉丘基娜	1925年底	在广州政治总顾问处工作
鲍罗廷娜	1923年10月6日	鲍罗廷夫人并担任其秘书
巴夫洛芙娜	1924年10月底	加伦之夫人及助手
普罗列塔里耶夫（卜陶明）		广州顾问团译员
符拉基米罗娃		广州顾问团译员
阿勃拉姆松(马祖林)		广州政治总顾问处译员
诺维科夫		铁罗尼之译员、攻打武昌时（1924年9月5日）牺牲
费罗多夫（富大成）		北伐时东路军译员
朴某（在俄出生之朝鲜人）		北伐时东路军译员
拉祖莫娃		在汉口任加伦的通讯联络员
谢尔盖耶夫		广州空军飞行队长、航校教官
马拉弗佐夫		广州飞行队飞行员
科斯丘钦科		广州飞行队飞行员

（续表）

顾问名字	抵粤时间	主要工作
帕科夫		广州飞行队飞行员
巴泽纳		广州飞行队领航员
塔科别尔格		广州飞行队通讯侦察员
科久拉（维里）		广州飞行队飞行员
科比亚科夫		广州飞行队飞行员
索科洛夫		广州顾问团医生
玛采伊莉克（索尼娅）[1]		广州顾问团俱乐部的负责人

上表共列出了苏俄顾问106人，其中军事顾问人员约65人，政治经济顾问约22人，不过军事顾问与政治顾问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彼此有时会转换工作角色；此外还有服务于军事、政治顾问的秘书、翻译、飞行员、通讯联络员及医生等19人。这是截止目前所知的苏联驻广州顾问团有名可考之人员。

为加强对日渐增多的顾问人员之管理，及协调鲍罗廷与加伦间的工作关系，苏联政府早在前3批顾问抵达广州后不久，就向鲍、加两人下达了9条指示，令其马上在广州“设置军务委员会”，以便“议决俄方在该处之一切军事问题”，而有利于“指挥广东军事”。鲍等奉示后于11月初正式成立了广州军务委员会及其下辖的军务处（加伦谓“院”），由鲍罗廷任军务委员会“政治总指导员”，负责根据“政治情形发布命令”，指示“军务处进行之方针”；加伦则担任军务处（院）长，实际主持“一切军务之进行”，及管辖“苏俄军务人员……一切事务”。该军务处（院）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处（院）长“兼任中国总司令部之参谋长”，从而为顾问们更好地做好本身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显然，广州军务委员会与广州军务处（院），对苏联驻广

[1] 玛采伊莉克的身份较难确定。她负责的顾问俱乐部，是供众顾问休闲娱乐的场所，可视为顾问团附属的后勤服务机构。其本人应是某顾问的家属，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由顾问之家属组成。据此暂酌定玛氏为顾问团中的一员，俱乐部的其余成员则不计入。

州顾问团而言，是一个“最高决策机构”；而其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个协调联络机构。这个组织结构的成立，既有力地促进了鲍、加两人工作上的密切合作，保证苏联顾问团能做到“政治、军事计划互为补充、互为督察，构成为一个整体”，[1]同时又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起了友好合作的共事关系，从而为苏联广州顾问团开展工作和完成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创造与准备了良好条件。

二、苏联广州顾问团与黄埔军校及党军的创建

苏联驻广州顾问团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全力帮助孙中山和指导国民党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进而组建一支苏联红军式的国民党党军。它本身具有完成这项工作的条件，因为在广州军务委员会及其军务处（院）领导下的驻穗顾问团里，汇聚了苏联不少高级而优秀的政治与军事干才。如任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是俄共（布）最早的党员之一，自1904年结识列宁后就在其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他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职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期间，曾奉派秘密出访欧美一些国家，并兼任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驻英国委员，显然是一位久经历练的革命活动家。几任军事总顾问都是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如巴浦洛夫将军是战功卓著而又年轻的军团司令员；加伦则曾于1921—1922年间任苏俄远东共和国的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是一位兼备军事家与政治家素质的优秀将领。顾问团之成员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及任过军师旅团等首长的将校级指挥员，还有一些高等军事院校的教官、教授、工程师等专业骨干人才。因此应该说，广州顾问团的主体是由苏联的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和技术专家所组成的。他们具备了完成协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创办军校与组建新式革命军使命的素质和水平。而这些顾问陆续来到广州后，又始终受到国民党和中共人士的尊重与支持，从而使他们能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大好形势下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有的顾问指出：他们所以能在帮助国民党黄埔建军之工作中做出成绩，这除了顾问团本身

[1] 转见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287页。

的坚强领导及每个顾问自己的积极努力工作外，还与以下三大因素分不开：一是孙中山的坚决支持——其“在世时没有人敢于公开阻拦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孙中山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二是蒋介石的合作态度——“他比所有的军事人员都更接近我们，几乎是无条件地采纳我们”关于“军校的组织问题和教学问题”，及“后来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批团队”的所有建议；[1]三是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跨党之中共党团员对顾问团工作的密切配合。

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军校并努力指导它开展教学与训练活动，是苏联军事、政治顾问们的重要任务和日常工作。加伦将军在谈及此时指出：黄埔军官“学校从创建到教学，始终有俄国教官直接参与。”[2]曾参与其事的切列潘诺夫也说：“在黄埔军校开展工作成了在广州、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活动的主要内容。”[3]事情正是这样的。早在廖仲恺受命着手筹备军校事宜的1923年冬，苏联顾问“鲍良克（波里亚克——引者）同志及其他人”，就拟订提供了一份与省教育厅长陈汉尤计划“完全不同”的“办校计划”，[4]而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此间则与廖一起商定了军校首批教职员名单。在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后、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办公之初，驻校顾问小组的波里亚克、捷列沙托夫、格尔曼和切列潘诺夫“由于要开展工作”，经鲍罗廷引见“认识了蒋介石，及他在教务方面的副手（教授部主任——引者）王柏龄（王茂如）和队列训练方面的副手（军事总教官——引者）何应钦”；随后，他们又在鲍和瞿秋白带领下“一起去见孙中山”。孙在与顾问们谈话时再三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样式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学生——革

[1]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06、370、367—368、110页。
[2]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55页。
[3]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05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编，黄修荣等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页。

命军队的未来军官。”随后波里亚克等4人“来到了黄埔岛上的住所”，开始为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按照红军的组织原则”和“遵循红军战术思想的革命军队”，而积极开展和进行着办校建军的各种工作。

当时的驻校顾问小组既分工又合作，很快就把军校的教学训练工作抓了起来。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波里亚克负责“主管教学，他和王茂如将军直接共事；我和尼古拉（即格尔曼——引者）从事学员的队列、射击及战术训练，并同何应钦将军保持工作联系”；军校的“整个教学过程实际上都是顾问指导的。”为做好上述工作，顾问小组制定了全校的教学训练大纲，“合理地安排各门课程的教学时间，从加速培养学生（一期只有六个月）的考虑出发，……决定大部分时间进行实际操练。”由于“这批顾问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所以他们“不但善于组织学员的课堂教学，而且能够通过实践讲明一切基本原理，……使学员在初学阶段最大限度地掌握实际要领”；他们在对学员进行队列与“战术训练（战斗保证、侦察、观察等等）和射击训练”的过程中，完全依照苏联红军的条令来进行教练，并注重“采用示范教学法”和对“每个学员单兵训练”，“努力把自己的全部军事经验传授给中国朋友”，以使“这些未来的指挥员能够懂得队列训练、一贯精神集中、良好的军风纪、服从命令的重要性，并且自己准备克服军人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1]军校学员对于顾问们指导下的教学训练工作有口皆碑：李奇中后来在忆及当时的学习和受训情形时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紧急需要，必须把三年的功课半年学完。根据这个要求，苏联顾问团会同何应钦、邓演达、王柏龄、严重等进行研究，决定首先进行两项工作：（1）制订军事教育计划，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妥为安排各项科目的进度、日程，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2）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讯五大教程，由顾问团提供苏联红军最新、最实用的资料作为编写的基础材料。在教育实施方面，学科按照新编的讲义进行讲授，而术科则因为各级队长对于新的内容都是新

[1]［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91、112、109、133、111页。

手，要重新学起，所以都需要苏联顾问负责讲解示范。每一个新科目，都先由顾问和何应钦总队长集合队长、区队长教练一番，把他们教会，然后再由各队长分别集合各该队的分队长……（来）教练，然后再去教学生。”[1]由此可知，苏联顾问小组在指导军校的全部军事教学与训练，以快速养成革命的军政人才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顾问团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创校建军的又一功绩，是将红军中的政治教育制度移植到黄埔军校中来，坚持用政治、军事并重之模式来培养军政干才。在黄埔军校筹建时期，鲍罗廷是促使国民党仿照苏联红军实行政治办校的最早倡导者。他在拜会孙中山时着重“讲述红军的情况，使他注意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意义”；孙在听了鲍介绍“苏联军队的组织和战斗生活后表示：‘我们的军队中就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事实上，黄埔军校及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在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和同意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军校内之顾问小组及中共党员也在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切列潘诺夫在论及此事时指出：“学员的军事训练是与政治教育相结合进行的。孙中山充分理解政治教育对于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军官的意义”；“当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开始建立时，我们的顾问和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便在编写大纲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2]加伦将军也说：“政治工作的大力开展和政治工作的多样化，多亏了全体俄国顾问。他们在初期甚至参与了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部并且配备了一名专职顾问。”[3]鲍罗廷和加伦还始终关注着军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进展情况，如果在这方面需要做些什么，他们就会通过孙中山或廖仲恺去进行，这样做可以减少工作的阻力，并避免国民党右派指责顾问们在“输出共产主义”。

在顾问小组的指导下，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中共党员领导并参与其主要工作的政治部，且在全校开设了多门内容丰富的政治必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
[2]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3—34、113页。
[3]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42页。

修课程。政治部还请“不少苏联顾问讲述红军战史、战例等等”，并不时聘任国共两党的一些知名人士“到军校来讲课”。有人指出：当时的“政治课程比军事课程的分量还要重一点”。政治教育的方针并不是向学员们灌输“有关政治科学的传统知识，而是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促进和提高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认识”，“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1]苏联顾问和黄埔师生们对军校仿效苏俄红军开创政治教育先河所产生之政治影响，及其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的成就，皆交口称颂。他们说：“在中国军队史上，这所学校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成为一名“军事领导人才”和“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他们更指出：“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有方，组织安排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所以收到了很大效果”。在社会上来说，“到（1924年）10月，军校的政治影响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军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跃，……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新的指导力量”。就军校本身而言，“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它还进一步“要求学生做到‘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终生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服务”。统一广东的实战证明，由于军校坚持政治与军事并重，全校师生很快就成长为“用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黄埔精神，即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所武装起来的一种革命势力”——黄埔革命军。[2]

苏联顾问团还在协助与指导国民党创立党军方面卓有贡献。特别是在确立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党军的建制，及其党代表制度方面，它起了别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早在黄埔军校筹建方案确定“建校原则以营为单位”时，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每个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18页。

[2]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55、41页；[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6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25、231、235—236页。

营设3个连的建议”，[1]希望其军队能仿行苏联红军的“三三制”。其后来又利用不同场合多次向孙强调了党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及苏联红军实行“党指挥枪”的宝贵经验。他指出：“国民革命有两个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军队，党与军队有联结之关系”；“一个革命的党非有严密的纪律和有纪律的军队不可，——但要有纪律的军队，就非有党的指挥和训练不可！”[2]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鲍在黄埔军校筹办伊始就极力主张由孙中山亲任军校校长，并推荐廖仲恺为军校政治部长。他此举之目的在使新建立的军校及校军能掌握在党的手中，不再重蹈军阀独揽兵权、祸国殃民之覆辙。孙中山对此心领神会。这是他日后坚持在军校和党军中设立党代表，并先后“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及“令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均以廖仲恺为党代表”的原因。[3]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在工作中与鲍罗廷密切配合，对加强军校及其教导团、党军乃至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建设，贡献尤多。苏联学者认为：“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以及黄埔军校得以加强，都应归功于加伦。他极为重视黄埔军校军官的政治教育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4]史实的确如此。在1924年11月组建军校教导团时，刚到广州未久的加伦不仅指派军校顾问斯切潘诺夫等负责指导此工作的进行，而且他还在18日亲自同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商定了为教导第一团配备各级党代表之事：当廖说到“已从应届毕业生的学员中选了五十——六十名适合担任党代表职务的人，目前已为该团任命了十六名党代表，即连党代表十二名，营党代表三名，团代表一名”时，加伦表示“赞同这一组织设想”，并认为还应给航校、孙中山卫队和铁甲车队各派5人去；他还特别“提出起草党代表条例的问题”，廖仲恺对此均表同意。为此，加伦领导下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草案，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及经济的权力，而且拥有监督作战命令的权力，从而使党代表与军队指挥官享有平等权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编，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376—377页。
[2] 转见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第195页。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903、2058页。
[4]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41—42、73页。

力。该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下达黄埔军校”，蒋介石只好表示同意。这样一来，是年11月和12月先后组建成立的军校教导一团——由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为党代表、教导二团——由王柏龄任团长、张静愚为党代表，就成为在建制上基本仿照苏俄红军实行“三三制”——团辖3个营、营辖3个连，连辖3个排，及在连、营、团各级均设党代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教导团在各级设党代表制意义重大，其原因是孙中山从苏顾问们口中得知“苏俄革命之成功，实赖于采取党代表制之红军，故特于教导团成立之始，委派各级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1]军校的两个“教导团编组完毕后即加紧训练。训练工作是在苏联顾问热心指导下进行的，教材是采用苏联顾问指导编写的新式典、范、令，训练方法是采用苏联顾问提出的速成法。”[2]12月初，加伦再向廖党代表建议：应到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前，“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向黄埔军校学生团授团旗，并同时举行学员和士兵的宣誓仪式”，他强调这样“举行宣誓，有巨大的心理作用和相应的政治影响。”[3]由于军中党代表制的确立，再加上其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之开展，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很快就成为军事和政治都过硬的新式军队。切列潘诺夫在谈到苏联顾问对创建教导团的贡献时说：“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我们的顽强工作，在孙中山军队里才能一天天建立起自己可靠的支柱——广州革命军。”[4]

进入1925年后，加伦在1月上旬写的《近期工作展望（综合报告）》中，又提出了“保证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正常进行”问题。他当时强调：应在各军及其附设之军校内“逐渐提倡军队设立政治部门的主张，进而争取将政治部门建立起来”，要继续“深入开展政治工作，直至实行党代表制”；对蒋介石之党军，则应“全力以赴使该师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以我们的全部威信、经验和知识，扶持刚刚实行的军队

[1] 参见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北伐战争》（一），台北1967年版，第108页。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35页。
[3]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83页。
[4]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54页。

党代表制，为党代表撑腰。对黄埔军校亦给予同样的关注。”[1]在苏联顾问之倡导和孙中山、廖仲恺及跨党的中共党员支持下，党代表制在1925年初的第一次东征中，因“党代表条例”之正式颁行而在右路军中得到了推广；这一制度在同年10月后的第二次东征中，则更在参战的国民革命军各部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后，曾取消第一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赶走了黄埔军校内之中共党员。后来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由于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的坚持，及原任各军党代表与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党员之出色工作表现，已深得人心的军队党代表制才又在北伐军中得到了恢复或重新建立起来，并发挥出其顽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作战方面最可靠的那些军，恰恰是政治工作特别强的那些军。……这绝不是偶然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东征、北伐的胜利，政治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2]

由上可知，在苏联广州顾问团的帮助与指导下，孙中山和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与建立革命军的工作不仅进展顺利，而且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亚于国民党改组工作所取得的胜利。苏联顾问团在此过程中将其红军之军事建设办法与政治教育制度移植到中国来，是为中国的新民主革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影响深远的好事。

三、苏联顾问与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北伐中壮大

苏联驻广州顾问团的不少顾问，亲自参与组织并积极投身于广州革命政府所进行的历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战争，他们指导着军校教导团及党军和其他革命军队，在各次战斗的历练与洗礼中成长壮大起来。自1924年10月起，孙中山创建的黄埔校军及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一些军队，在两三年间先后进行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

[1]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07—108页。

[2]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69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12页。

和南征邓本殷、讨平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之叛乱，以及打败北洋直系军阀等的北伐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苏俄顾问团成员是无役不与——他们于政府军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时，曾在协助蒋介石和“黄埔军校紧急成立了十四人的机枪队，配置了两个炮兵连”参与平叛战斗，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小小的黄埔岛变成孙中山及其周围人们的安全保护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日后的东征与北伐中，顾问们不仅在战前参与了作战计划方案的制定，而且还以参战各部队顾问的身份亲历戎行，并在每次战斗中注重言传身教，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加伦将军则更显露出军事家的战略与指挥才干。可以说，这些顾问的工作与每次军事斗争的胜利及革命军之发展息息相关，他们指导并教会了全体指挥官在战争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保证每次战斗皆能克敌制胜；他们还促使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在战斗胜利后扩建壮大革命的队伍。就这样，“在战争进程中，一支新的中国国民革命军逐渐形成了。”[1]

在第一次东征军阀陈炯明之前，加伦面对东江陈逆的虎视眈眈，不顾滇、桂军总司令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反对，“向广州总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毫不迟疑地出兵讨伐陈炯明，1月底即作出了出兵的决定”。紧接着，东征军于1925年2月1日出师讨陈。当时，自总顾问加伦以下，有切萨赫诺夫斯基、列潘诺夫、别夏斯特诺夫、帕洛、尼库林、斯切潘诺夫、什涅伊杰尔、齐利别特尔、亚科夫列夫、格米拉、瓦西列耶夫等一批顾问，随同由黄埔教导第一、二团，及粤军第二师、第七独立旅等部组成的右路军出征——此为俄顾问首次指导广州革命军进行作战。在这次东征的过程中，加伦不止一次地向顾问们“讲解作战计划，并给每个人布置了具体任务”。他强调：“顾问在部队里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你们应该以清醒的革命热情施展军事艺术”；他又说：“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粤军上，尤其寄托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上”，“应当经常了解事态的总形势，以应有的坚定性说服将军们采纳我们的建议，……在行军和战斗中指教他们，……不

[1]［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130—131、187页。

要从自己手中放过战役和战术问题。”[1]随军之顾问们牢记总顾问的这些指示，并在挥师东进的每次战斗中尽量将之付诸实施。他们或陪同指挥员一起观察地形，研究攻略方向与火力配备，或督促各部队官兵修筑防御工事，或在攻淡水城时指挥炮兵轰击敌人，及亲为奋勇队示范徒手爬墙办法，或亲临棉湖与兴宁前线等参与战斗之决策指挥，甚至还有顾问带领一个连在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另外，他们又不时地督促各师团加强对军民的政治宣传工作。在苏联顾问的协助指导下，东征右路军攻无不克，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则始终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模范作用。他们仅花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讨陈作战任务，取得首次东征的胜利。大批的俘虏和战利品武器等为校军的扩大准备了条件。就在此次东征后——也是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之后不久，黄埔军校于1925年4月21日又组建了第三教导团，以钱大钧为团长，曾扩情为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于是月秉承孙先生的遗愿，下令将校军扩建为下辖3个团的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兼旅长，以蒋介石任党军司令官，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

有了首次东征的实践，苏联顾问与革命军将校在以后几次讨伐军阀的战斗中配合得更为默契，他们因此也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杨、刘的滇桂军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阴谋发动叛乱，而国民党高层又围绕着“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军事总顾问加伦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强调“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东征军必须火速回师“打垮反动派”。他俩最后说服了许崇智、蒋介石等，并在5月13日的汕头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加伦拟定的平叛作战方案：以蒋介石率领的东路军（由东征军中回师的黄埔党军及部分粤军组成）为主力，另以驻在广州附近之政府军各部组成北、西、南3路军；这4路军应在各顾问的指导下合力围攻广州，一举消灭株守在城内之叛军——滇桂军。在执行这作战方案时，加伦得知蒋有“湘军、黄埔军校和李福林将军的部队才是（平叛）主角”的想法，即于5月28日急电指示东路军的苏联军事顾问斯

[1]［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67、165、185页。

捷潘诺夫说："我们应当克服蒋介石的这种有害于战争的情绪，务必叫他明白，正是他的东路军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而其他各路军只是协助他取得成功。"[1]捷顾问奉示后及时地纠正了蒋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想法与行动，保证了正在执行的平叛计划不至于落空。在东路军返抵广州东郊、其他3路军协同它于6月12日总攻广州城时，黄埔军校师生在驻校首席顾问切列潘诺夫等的指导协助下，组织了两支奇兵配合参战：一支是由张治中总队长率领的黄埔学生军突击队2000余人，"在腊德炮台附近上岸，袭击滇桂军后路"；另一支是顾问基列夫指挥的水上炮兵连发威——"作战到了紧急关头，苏俄顾问在飞鹰兵舰上陆续不断地开炮助威；……事有凑巧，刚刚一个炮弹射进了广九铁路车站赵成梁的司令部"，把正在和杨希闵吃饭的赵师长"炸掉了半边"，受到惊吓的杨总司令在这突变的形势下，也就"一溜烟跑进了沙面，滇军就此完全瓦解了"；桂军见状退至西村后，也乖乖地"全部缴械"。[2]在平定杨、刘叛乱之后，顾问团建议国民党中央改大元帅府为广州国民政府，及成立军事委员会着手进行组建国民革命军之工作。于是不久国民政府就组建了几个军：由刚建制成立的党军第一师扩建成以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为军副党代表的国民革命第一军，而将湘军之谭延闿、程潜两部，滇军朱培德部，粤军的李济深、李福林等部，分别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六、三、四、五军。在这次改组建军的过程中，确定"每个军的人数和编制"之谈判任务，全由"总顾问一人承担"。加伦在与每位军长"经过一轮谈判"后，"说服了将军们，使他们赞成将黄埔军校办成唯一的一所正规军官学校，培养年轻军官"；并"最后就部队正规化方案取得一致意见，确定了相应的编制"，"军队设政治机关和开展政治工作这一原则，也普遍得到认可。"[3]显然，加伦等苏联顾问对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及其走向正规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

[1]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75—176、191—192、135—136页。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35—136页。

[3]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06—208页。

1925年10月开始的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是以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联合其他各军的一些师旅，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出师讨贼的。其旨在消灭广东境内之军阀陈炯明和邓本殷，最后统一全省。当时，加伦为这次东征和南征派出了更多的随军顾问——除了上述参加过首次东征的顾问外，还有罗加乔夫、帕纽科夫、舍瓦尔金、基列夫、沙尔费耶夫、捷斯连科、康茨奇等顾问，也分配到各军师旅团一起出征。在10月13—14日第一军2师4团和第3师强攻千年要塞惠州之战斗中，苏联顾问中之飞行队员所驾的战机，及基列夫、别夏斯特洛夫指挥的、由几门坂炮和山炮联合组成的炮突击队，在攻坚破城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飞行队长谢尔盖耶夫等驾驶着3架战鹰参战，“向要塞投下了近百枚炸弹”；而炮突击队则不断地轰击惠州北门和西门的塔楼及城堞，“把北城门上炮楼的城堞、北城墙、西北城墙上的城堞，以及西南门上的部分城堞都摧毁了”，连敌人的“电台和城防司令部也被击中”。这给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奋勇队爬云梯抢登城墙创造了良机。顾问亚科夫列夫还与第一批进攻队员一道，在响亮地喊“杀——”声中于14日下午4时把军旗“插到了城墙上”，大部队很快就取得攻占惠州城的胜利。国民革命军在攻克惠州后，3路纵队按东征原计划分兵向东捷进，而中路纵队主力第四军之大部则稍后回师进行南征。在这个过程中，随军的各位顾问“尽力深入研究军队状况，熟悉指挥员，也熟悉士兵群众”；他们“帮助指挥官分析形势，作出适当的结论，给予必要的指示，预见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顾问们的“建议在大多情况下被无条件的接受并付诸实施”，这就保证了东征和南征的各部队能够迅速战胜敌人。结果是：何应钦的右路军在击败敌人洪兆麟和林虎两部后，迅速攻占了海陆丰、普宁、汕头；李济深的中路军在吴铁城独立师之增援下，也最终打败了林虎残部，很快占领了紫金和潮州；程潜的左路军则顺利完成了进军河源、五华、兴宁和梅县的作战歼敌任务。回师南征的第四军主力也在广西李宗仁部的协助下，最后消灭了邓本殷部，攻占雷州和海南地区。由此可知，在这次完全解放广东的“军事战役期间，顾问们无论是在制定计划还是在实施计划方面，都起了重

要作用。”[1]在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不久的1926年春夏间，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又新增加了广西李宗仁的第7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8军。

上述情况表明，广州革命政府在反对封建军阀的过程中，其所辖之党军和其他各部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还乘胜不断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统一广东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除了各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之外，还与苏联顾问的指导与帮助分不开。苏联学者在论及这点时指出：“由于苏联顾问的一再坚持，改组后的国民党革命军统帅部很重视历次作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士兵和军官都懂得了每一次出征的目的，了解到取得胜利对于解放中国的整个事业之意义，以及军队与城乡群众统一行动的必要性。”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苏联顾问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尤其是加伦……经常亲临前线，甚至于关键时刻亲自在装甲车上指挥战斗，这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使他们建立起战胜军阀的信心”；“受过俄国教官指导的部队，特别是黄埔军官学校和国民党的师团，都是冲锋在前，不畏险阻地打击敌人”，[2]从而一次次地克敌制胜。

两广统一之实现，为广州国民政府于同年出师北伐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基地，而国民革命军8个军的官兵，又为其7月正式出师北伐奠定了实力基础。当时北伐战争的进行与胜利，同样离不开苏联华南顾问团尤其是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指导和帮助。早在北伐之前的1925年9月，加伦就在《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之规划》中提出：“要及时向北扩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让国民党登上华中政治舞台，也就是说，应当及时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着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在该文件中还认为，为确保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必须解决以下6大问题：一、军队给养必不可少的财政问题——“出师北伐所需军费问题，可用向商人借款的办法来解决”；二、军队的扩充问题——应使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总兵力，到

[1]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278—279、284、286、296—297页。

[2] 同上，第296页。

1926年上半年时“达到七万八千至八万人”；三、全军之整编问题应“仿照黄埔军进行，……军队要设立政治机关，并实行党代表制”；四、切实提高部队的素质问题——“训练指挥员和军政干部，提高军队现有军官的战术和政治水平，是当务之急”，为此应开办各类军校及其训练班；五、北伐进军之战略决策问题——他在分析了北伐开始后附近几省的形势，及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等情况后指出，对北洋军宜采取分化之策，各个击破之，为此我军作战部队“要集中突击，江西、湖南两省应择其一攻打之，攻克一个省，再迅速廓清另一个省”；六、在北伐计划实施之前，应提请苏方“在武器装备上给予必要的支持”。[1]加伦在此对国民革命军1926年下半年举行北伐之事作出了正确可行的规划，从而为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制订详细的北伐计划提供了依据。而且，“他在和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一路由广州打到武汉时，常常亲自上战场直接领导北伐计划的实施”；[2]并在北伐军两次攻打南昌失利时，临危受命“全权领导作战部队”。加伦“与各军建立了经常的电话联系”，其“命令译成了中文并由蒋介石签署，命令的俄文本则同时分送给了我们所有顾问”。他“在战役开始前就要求团长们全部了解作战计划”；他强调保障南昌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各军无论如何应力求沿铁路沿线同时发起进攻”，“坚决、迅速地执行命令”，“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不仅不应当白白浪费日子，甚至不应当丧失钟点。”[3]在加伦的直接指挥下，国民革命军各部于11月8—9日完全拿下了南昌城，在江西战场上给孙传芳部以沉重打击。

华南苏联顾问团在促请苏联政府为北伐军提供武器装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加伦的北伐大计划送到莫斯科后引起了重视，“以斯大林助手而出名的布勃诺夫”，在1926年2—3月间率使团访华时，“非常关心北伐问题，……认为条件已成熟，应在半年到一年后开始北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苏联政府认可加伦关于为实施北伐计

[1]［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14—224页。
[2]［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58页。
[3]［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84、486—487页。

划，“还要做一些工作，并且必须给与必要的武器援助”之请求，[1]于1926年间先后“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9 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 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 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 000个，大炮12门，炮弹1 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 000支，子弹5 000万发，机枪50挺，大炮12门。”[2]广州顾问团争取到指标、由广州国民政府出资购买的这一大批军事器材，从装备上保障了北伐军的顺利进军。

广州苏联顾问团在北伐中派出了强大的顾问阵营随军北征——“在所有的主力军内都有顾问”亲历戎行，其人数在30人左右（上文已有笔者统计名单，在此从略）。这些军事与政治顾问们，或参与正确作战计划的制定，或负责所在部队的训练与政治工作，或临时担任一些重要战役与战斗的前敌指挥——他们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充分地展示出各自的军事才干；而其飞行员所驾的战机，则“振奋了我方司令部的情绪，同时它飞到前线的什么地方，就使那里的敌军惊慌失措”，其超低空飞行的机枪扫射和投炸弹，则更令敌军官兵“丧魂落魄”，从而加速了北伐每次战斗胜利的到来，以致第四军在报告攻克武汉胜利的情况时说，是“空军和第四军占领了武昌！”[3]总之，全体苏联顾问在这次北伐过程中，继续为孙中山开创的、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进行的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通过全文的论述可知，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从事黄埔创校建军及进行反军阀斗争事业的过程中，苏联驻华南顾问团始终扮演着指导员与帮助者的重要角色，的确对此项事业之进展与胜利卓有贡献。可以说，从创办黄埔军校建校计划方案的制定，到全校教学与训练及其政治教育工作之开展；从校军建制的确定到其党代表制的完善，从几个教导团之组建，到党军成旅与扩建为师；从国民革命军之成立及苏联政府为它补给所需军事器材，到这支队伍在壮大发展中先后取得东征和北伐的胜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苏联顾问们的大力帮

[1]［苏］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143—144、57页。
[2]黄修荣著：《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3]［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489、420—517、453、490页。

助。尽管这些顾问在广州为孙中山政府服务不是无偿的，而始终是由国民党花钱聘请他们来的——我们从1925年5月7日齐契林在俄共（布）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可知，苏联贷给孙中山的经费，从一开始就有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广州（顾问）小组”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5月29日会上作出向国民党提供有偿军事物质援助决定的同时，又规定“将广州组的经费纳入中国军政工作的总预算”。[1]这些都明确了苏联顾问们的所有费用全由孙中山和国民党政府负担。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钱还是花得值。因为苏联顾问们在工作任内大多能尽心尽职，确实为孙中山的创校建军等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对此，蒋介石在1926年时曾强调说：“苏俄帮助我们，不止是物质帮助，并且是智识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团体）纪律严明”；[2] “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3]的确，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和武汉等地工作期间所建树的巨大业绩，及他们传授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政治建军经验和军队的政工制度等，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之深远影响，决不是以金钱可以计算出来的。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编，黄修荣等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611、624—625页。
[2] 转见丁言模：《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第336页。
[3] 《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政治周报》第5期。

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
——以其与苏联的差异为视角

［日］安藤久美子

［内容提要］

孙中山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孙中山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与民众的幸福而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海外避难期间，在亲眼目睹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之后，孙中山认为当时在欧美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新时代的潮流，满怀使命感地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至此以后，孙中山在肩负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重任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使这一变革的成果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更能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相衔接的具体途径。在实际操作上，1903年，孙中山尝试了“平均地权”方案。1905年，孙中山申请加入第二国际，他也以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在欧美世界闻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并将“平均地权”以及一系列全新的资本限制等民生思想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这一构想并不是要一举消灭地主以及资本家，而是要与其妥协，通过制度安排有效弱化资本家与地主的剥削和垄断，实现土地与资本的公有化，通过较长时间、和平与渐进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成为孙中山毕生的追求。这一构想中包括了后人熟知的“耕者有其田”以及“公正分配”等主张。列宁将孙中山视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评价也被共产国际继承。孙中山在得到了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支援后开始推动国共合作，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表示了民生主义的主张。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的背景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范围延及20世纪初的亚洲殖民地；而

且，当时其他阶级反抗地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势头并没有完全兴起，这也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

[关键词]

孙中山　平均地权　资本限制　民生主义　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　共产国际　一大宣言

一、平均地权的设想与申请加入第二国际——辛亥革命以前

据孙中山自己的记述，在兴中会第一次高潮失败后出逃海外，从日本经美国，最后远渡英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欧美列强虽然国家富强、人权发达，但还不是民众的乐园，这说明孙中山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民生问题。[1]此时的孙中山，有感于当时欧美各国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为解决资本主义阶段的阶级矛盾，决心寻求与以往欧美革命不同的道路，即国家的发展造福于民众的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孙中山几乎每天往返于当时世界最大的知识宝库大英博物馆以及英国议会，阅读欧美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的各类著作。[2]通过广泛阅读，孙中山接触到欧美市民运动发展的历史与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工会主义等思潮。

就在孙中山到达伦敦前两个月，1897年7月27日—8月1日，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倡议实行土地公有制，但由于各国阶级情况不同，其实施办法也是千差万别，具体实施方法则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自行选择。[3]

第二国际中势力最大的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拥有很大的影响，主张其他社会主义的各类政党与

[1]《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2] James Cantlie and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London, 1912, P248.

[3]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104页。

组织，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以及合作社主义等，也参加了大会。除了德国、丹麦、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以外，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日本社会党等均在其列。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意思是，采取渐进的和平方式，通过议会实行变革，此外，社会主义一词意味着针对形式上的政治民主主义采取实质上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主义，而持此类观点的也包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国际是各国各自组织运动时代的松散的联合体，该组织自1889年成立以来，直到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各成员间出现分歧而最终分崩离析为止，在此期间，尽管不断出现各种思想争执，但依然是“社会主义者相互团结，寄托重要理想的”组织，同时也是“欧洲境内主要的知识群体之一”。[1]孙中山很快便敏锐地感受到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将成为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开始不断接触、吸收其中的各类思想，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汲取必要因素，多年后，当孙中山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时候，曾申请加入第二国际。

梁启超于1924年著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其中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列为清末主要的四大新思潮之一，他写道：“孙逸仙（文），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敏锐，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2]梁启超与孙中山在两人思想还比较接近的1899年夏秋之际，在日本讨论过土地问题，据梁启超记述，孙中山表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剥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3]孙中山主张为了救助农民考虑土地国有化和耕者有其田，梁启超将其归为社会主义思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在考虑平均地权之前就已认识到推动土地国有化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了。

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到：“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

[1] James Jol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preface*, London,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1955.
[2] 梁启超著：《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3]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

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这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深思熟虑后的成果，并得出了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平均地权”这一结论。在这里，孙中山认为当前的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较之于欧美贫富差距并不大，因此应该在革命的同时推动平均地权。[1]1905年，平均地权被由各派革命党人组成的中国同盟会写入了革命纲领。但当时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而是以实现“社会的国家”为目标。[2]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夕，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访问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二国际书记处，并申请接纳其领导的党加入。5月18日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佛兰德语版的《人民报》（Vooruit）、5月20日法语版的《人民报》（Le Peuple）都刊登了“中国革命社会党领袖、我们的同志孙逸仙”与第二国际书记处主席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书记胡斯曼（Huysmans）的谈话，并在谈话内容中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首先，“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认为通过这种制度可以防止在欧洲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削其他阶级的现象。结论是尽管我们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但是通过去除许多弊病，“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3]M·伯纳尔（Bernal）在介绍这一新闻报道时表示，孙中山提出的“从封建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最早的历史发展阶段飞跃论（skipping）概念之一”。[4]

E·弗里德曼在评价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社会党总部的演讲中提到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使用了与伯纳尔同样的术语“历史发展阶段飞跃论（stage skipping）”。[5]而且，E·弗里德曼还认为，孙中

[1]《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29页。
[2]《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3]《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2—274页。早期由久保田文次在《孙中山的地权平均论》（《历史学研究》，1980年12月，487号）中引用，近期则由姜义华在《重新审视孙中山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研究》第一辑，2008年4月）中进行过类似分析。
[4]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65—67.
[5]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26.

山极力主张在全新的革命组织名称中加入“革命同盟”，取名“中国革命同盟会”，是因为其申请加入的第二国际对抗“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而自称“革命同盟（Revolutionary Alliance）”所致。[1]

二、民主主义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辛亥革命以后

1915年11月10日，孙中山向第二国际总部寄去一封信，请求该机构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派遣人材，他写道：“当第一次革命完成之后，我当选为民国总统，本想以社会主义理想来整合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又在8月出台的国民党纲领中也降下了民生主义的大旗，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孙中山依旧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这在他给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孙中山开始自称其为社会主义者。例如，1911年12月30日的“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与江亢虎的谈话）、1912年4月4日的“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答《文汇报》记者）、10月14日的“鄙人久为怀抱社会主义之一人”（中国社会党总部的演讲）等发言中都有明确表示。[3]此后，孙中山开始集中精力在全国各地展开民生主义的演讲活动。在每次演讲中，孙中山都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社会主义。[4]

最早是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送别会上发表的题为《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5]孙中山首次提出在平均地权内容的基础上增加节制资本，并将民生主义构想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具体内容包括：在资本家出现之前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革命未必需要使用武力，只要实行平均地权，社会革命的大部

---

[1]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P10.

[2]《复社会党国际执行局请协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函》（1915年11月10日），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1—535页。英文原版，《国父全集》第十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第420—425页。参照姜义华：《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的先行者——跋孙中山1915年11月10日〈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孙中山：历史、现实、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年版。

[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0页、第二卷第332页、《孙中山全集外集补编》第103页。

[4]《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18—329、332—333、337—339、339—341、369—371、371—375页。

[5]《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3月31日），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282—288页。

分就可以取得成功，这将使社会主义易于实行，而通过地税和印花税增加国家的收入，为了防止资本家垄断的流弊，要将铁路、电力、水利等国家级实业收归国有，这样可以避免私人垄断上述实业之利。有关民生主义的这种基本内容以后一直没有改变。

1912年10月14日、15日、16日三天，孙中山在中国社会党总部进行演讲，在这一过程中开始着重阐述其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开篇即坦言："鄙人久怀抱社会主义之人"，然后介绍、批判了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关于他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及其方法，主要内容如下："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分为两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包括国家社会主义），一即共产主义（包括无政府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便、电政、矿产物、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至极端"。"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要图"。"社会主义所主张，原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说，而以平和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其主张均分富人之财产，表面似合于均产之旨，实则一时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社会主义学者知罢工要挟绝非根本之解决"。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中，激进派施行均产主义，为了避免引发招致掠夺混乱的灾祸，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贫富冲突，学习亨利·乔治以及马克思学说，主张土地和资本的公有，避免少数资本家对财富的垄断和独享，倡导平均分配。为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即调查地主所有之土地，使定其价、自由呈报、国家按其地价，征收地价百一之税……此后地价之增加，咸为公家所有"。还要遏制私有大资本家、培育国家资本。通过这种方式，中华民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家将拥有铁路、矿业、森林、船舶运输、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由此才能推动公共教育，实现教育平等，设立公众养老院、公共医院等社会福利将得到充实。"[1]

孙中山反对激进派的均产主义，但由于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

[1] 包括开篇部分全文收录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21—632页。

级阶段，当前无法实现，因此赞成通过和平的方法推动土地与资本公有的集产（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孙中山认为，最初要保障地主现有的地价，不是将所有的资本公有化，而是仅仅抑制大资本，允许私有制以及私人经济，采取避免与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冲突的妥协，以这种方法开始，但应通过制度建设从实质上消除剥削与垄断，实现土地与资本的公有化，使公有制经营的公有经济成为整个经济的核心，通过较长的时间，和平、渐进地建设社会主义。

孙中山3月31日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被欧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受到广泛关注。其前半部分的法语译文被比利时劳动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Le Peuple，7月11日）以及《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 243期，7—8月）刊载，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英文译文被美国的《独立杂志》（The Independent，7月13日）刊登，题为《中国的下一步》（China's Next Step）。[1]此外，孙中山的演讲还被《国际社会主义评论》（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从《社会主义运动》上以转载的形式刊登在1912年10月号刊物上。[2]同时，又从《人民报》被译成俄文刊登在7月15日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3]列宁在阅读了《涅瓦明星报》后，得到了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将其视为社会主义者的不同的结论，认为孙中山是“主观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在1913年将孙中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反复介绍其活动以及思想。1913年1月号中，编辑Mary C. Marcy评论道：“孙中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当代最为著名的人物。”[4]9月号中，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介绍了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社会党总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详述了国家社会主义概念。[5]11月号中，当

[1]《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4—329页。《国父全集》第十册，第97—99页。

[2]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reprinted 1968, Greenwood Reprint Corp, Chicago, Vol.13, PP339—340.

[3]《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4—326页。

[4] Mary C. Marcy, *Changing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3, PP528—532.)

[5] *Dr. Sun and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4, PP172—176)

时流亡美国的片山潜叙述了辛亥革命的经过，将孙中山视为社会主义者。[1]12月号中，Ajax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等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者，表示“孙逸仙博士是一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2]最令人关注的是1914年4月号中，Mary C. Marcy评价孙中山的设想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共和国”，[3]这样就充分把握了将平均地权看做是孙中山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的事实。此外，第二国际向当时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及其组织派出的代表Gardner L. Harding[4]，也经常向《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投稿。[5]由此，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孙中山为欧美的社会主义者所熟知。[6]这可以以近年介绍过的书信为例。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派往美国的高尔基在阅读了孙中山刊登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后表示，孙中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并在书信中热情地称其为“同志”。[7]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指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涵盖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建立工农专政政权，实现全部生产方式的国有化，消灭所有的资本主义等内容。在阅读了《涅瓦明星报》7月15日刊登的孙中山的演讲后，列宁将孙中山定义为“民主主义者”，同时认为平均地权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土地纲领”，“仅仅废除了封建剥削的纲领”。但是，列宁看到了孙中山“对勤劳大众最诚实的连带感”以及“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憎恶”，这种民主主义者是“革命的”、“战斗的”、“纯粹的”、“诚实的”“民主主义者”，是“主观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尽管其理论是“反动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作为处于前进途中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代表则是“进步的”。[8]列宁的上述评价被俄国革命后新成立的共

[1] *Chinese Refugees in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4, PP273—275.)
[2] *Reaction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4, PP346—349.)
[3] *China and Standard Oil*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4, PP594—595.)
[4]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P15.
[5]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14, PP464—467, Vol.17. PP598—600. 作者本人在1916年于纽约出版了题为Present-day China的著作。
[6]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P15.
[7] 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6—17页。
[8]《列宁全集》第18卷，日本大月书店1956年版，第164—170页。

产国际所继承。[1]

三、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共产国际

1. 平均地权——土地革命纲领

1923年5月，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即“五月指示”）里首次提出，以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无偿交付农民的农民革命作为民族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战线所有运动的基础。[2]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五月指示”的基础上，根据国共合作以及国民党一全大会准备工作的八点内容，制定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要求对三民主义重新作解释。在第五条里，民生主义不是被解释为土地国有化，而是规定应该向广大的无地农民大众说明，土地国有化就是直接将土地分给耕作的农民，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所有者以及中小土地所有者。[3]192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一全大会上拥护共产国际11月28日的决议。[4]

1923年10月6日，由苏联派出的鲍罗廷在广州与孙中山会面。此后，国民党改组以及全国一大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改组顾问以及国民党组织教练员。[5]受孙中山之托，鲍罗廷就大会宣言草案与国民党党员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秋白以及共产党员瞿秋白等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审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相互妥协并最终通过草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围绕草案内容也不断出现争议，并经过了再三的修改，最终以国

---

[1] 轻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并认为这是封建地主制度的残余等观点曾在日本学界占支配地位，在拙文《孙文一派的土地国有论与辛亥革命》（《史艸》1968年）中，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对，认为孙中山尽管主张土地国有论观点，但与列宁的观点相同，因而将孙中山视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8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34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5] 《给鲍罗廷委任状》（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00页。

共两党共同纲领的形式于1924年1月30日正式通过。[1]在此期间，鲍罗廷不断沿着共产国际11月28日的决议继续做工作。孙中山尽管在部分观点上作了让步，但在对其而言最为重要的土地革命纲领平均地权上则始终保持自己的观点。

鲍罗廷在11月13日的广州各区党部委员会上，提议应制定三个法令：其一，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之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的土地分配法令；其二，针对劳动者的工会法；其三，针对小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法令。16日早晨，孙中山召见鲍罗廷阐述对三个法令的意见："同意工会法和社会法令，但关于土地法需要先加强与农民的联系，把握他们的诉求"，对土地法持保留意见，当天孙中山向临时执行中央委员会传达了自己的想法。[2]

鲍罗廷由此判断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在国外获得了不完全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知识。根据鲍罗廷的看法，孙中山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想保持传统的土地关系，希望通过税收以及购买的方式消除土地占有和使用的不公，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是完全错误的。[3]显然，孙中山关于继续维持现有地价，期待由此开始彻底实现平均地权后的土地国有化和耕者有其田，这种想法并没有进入鲍罗廷的视野。

尽管鲍罗廷仍在积极游说，[4]最终大会还是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写进了宣言草案。大会第二天，宣言审查委员会草案审查的结果，民生主义作为还有问题而没有被付诸表决，于是，孙中山再次对此进行了说明，而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相关的讨论。孙中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即民生主义——作者按）中"，"若俄国今日所行之政策，实非纯粹共产主义，不过为解决民

[1] 关于上述经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第364—377页、第419—487页的"鲍罗廷杂记"，以及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7—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等，都有表述。

[2]《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3年11月16日），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24—425页。

[4] 同上，第450—451页。

生问题之政策而已”，他批评老同志和新同志，表示“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尝试以此取得支持。[1]23日，采纳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宣言草案获得通过。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1924年2月13日，加拉罕写信给鲍罗廷，说：“我认为，代表会议的成果是很可观的，您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作的让步”，应继续做工作，“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2]。

鲍罗廷与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共产党员一起商议了土地革命问题。他们一致认识到在尚未实现社会分化、大土地所有者并不多的中国，在目前还未能与农民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的时候，不能没收地主的土地，所以只可以主张分地给农民，不能指出土地的来源。[3]

2. 节制资本——企业的国有化

11月28日，共产国际决议第五条关于企业国有化的内容中，把民族工业的国有化作为原则，同时，尤其认为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以及河道的国有化有着重要的革命意义。[4]大会宣言中的“国民党之主义”论述了节制资本的内容，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5]宣言中，国有化的对象限定在垄断性的银行、铁路、航运等大企业，去除了“工厂”，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的“中国与外国所有产业的国有化”建议。不过，国有化的对象中包括了“外国人的大企业”。鲍罗廷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迄今为止的纲领中尽管有条文表示要实行国有化大生产，但不包括对外国大生产的国

[1]《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0—113页。
[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8页。
[3] 同上，第469—470页。
[4] 同上，第344页。
[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页。

有化，国民党人并不希望对外国人的巨额私有财产实行国有化。[1]对此，孙中山做了很大的让步，之后孙中山再也没有提及“外国企业的国有化”。

对于孙中山意图引入外国资本的“实业计划”，鲍罗廷批评其为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表示“国民党的思想与行动中难以显现与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决心”。[2]孙中山的引进外资构思是希望通过国家引入世界垄断大资本，由国家经营，使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进而消除其剥削和侵略性，以全球视野致力于世界和平。[3]与始终坚信“资本主义正在没落”[4]的共产国际不同，孙中山把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看作一种巨大的力量。孙中山对马克思消灭资本制度的预见提出了异议，并认为与资本家进行适当的接触与妥协的做法是明智之举。[5]因此，孙中山的反帝国主义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的三民主义，并通过实现建国而达到的目标。

四、“民生主义”的演讲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演讲。同年8月，连续4天进行了“民生主义”的演讲。[6]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尽管有着相同的目的，但方法不同。孙中山主张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生问题。孙中山对马克思从事的“社会病理专家”的科学研究表示敬意，但指出马克思本人并不是“社会生理的专家”，未能解决如何废除资本制度的课题并留至后世，“所以我们今天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7]马克思以阶级斗争的原理，企图通过革命的手段解决社会问

[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25页。
[2] 同上，第426页。
[3] 参照中村哲夫著：《孫文の経済学説試論》，法律文化社，1999年，第23—43页。
[4] 见1922年12月5日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发表的《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372—373页）。
[5]《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71—372页。
[6] 同上，第355—427页。
[7] 同上，第392页。

题，不与资本家妥协，主张不妥协，否定国会的方法不仅与欧美资本主义自我发展后的社会状况不相符，即使到了遵循其理论完成革命的俄国也不得不进行修正。孙中山的主张是："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我们实行民生主义……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1]

国民党成立首次便面临了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孙中山在一直强调的平均地权以及节制资本的基础之上，新增了本不该遗漏的"耕者有其田"。孙中山认为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这在之前从未对国民提及。同一时间，孙中山在其他演讲中表示"耕者有其田"是农民问题最终解决的结果，同时告诫农民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联合起来。[2]但是，孙中山认为应该避免农民与地主的直接冲突。由于中国的大地主数量不多，除农民以外的士工商等阶级几乎都属于中小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也将使农民之外的其他阶级成为农民的反对势力。全国人口中农民占到九成，但作为社会势力很弱，当前无法对抗地主阶级的反击，因此，国民党应该组织农民，使之团结到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与法律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方法。

同时，孙中山强调，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生产问题，还需要解决其他如分配、消费（衣食住行，其中"行"没有在演讲中具体阐述）问题。孙中山认为在以赚钱为目的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分配的公正和普及。同时，对于提倡"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公正的分配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应该允许由于能力大小而产生的分配差异的存在。

这些演讲中，孙中山重新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重视分配问题等主张并没有改变民生主义构想的实质，而是充实并明确了民生主义的真正内涵。

---

[1]《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10页

[2] 7月28日，"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以及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卒业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460—467、554—558页）。

五、结　论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产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20世纪初的亚洲殖民地，当时能够对抗地主与资本家的社会力量尚未出现，这是世界最早的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孙中山通过学习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消灭资本主义的“意义”，尽管与俄国革命有着共同的目的，但反对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非妥协的方式颠覆原有体制的革命方式。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是期望不通过暴力、以渐进的变革实现，这与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相类似，与现有的势力妥协，通过长期的变革以实现最终的目标。这一目标并非追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而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即世界大同。而其特色便是在远大的理想与实际情况之间寻找契合点。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中村哲夫先生以及久保田文次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为日本孙中山研究会以及日本宋庆龄研究会会员）

（陆长荣译，邵力群校）

论孙中山与中华文化近代转型
——兼与沈渭滨教授“转型第一人”说商榷

关志钢

[内容提要]

在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立足国情对外来文化进行学习、引进、批判，从现实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利用、改造的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孙中山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居有不可替代之重要地位。但因此而称其为“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人”，与历史事实不符。

[关键词]

孙中山　三民主义　中华文化近代转型

辛亥百年纪念到来之际，孙中山先生历史地位的评价再度成为海内外学界的关注点，其中就包括孙中山与近代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确，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如何正确处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一直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却又倍受困扰的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几番“国学热”，争论焦点几乎不离中西文化关系定位问题。笔者认为，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不仅为国共两党、为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民留下了推翻皇权专制的宝贵政治遗产，同时在中西文化关系处理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问题上，也为我们留下极富启迪意义的精神遗产，孙中山当年有关文化问题的一系列重要阐述极具思想价值，迄今有待深入研究。然而说到“中华文化近代转型”，将推进转型“第一人”和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推手”的桂冠加诸孙中山，[1]历史依据不足，实有商榷之必要。下面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沈教授及学界同仁。

[1] 沈渭滨：《孙中山：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一）

孙中山一生为反对皇权专制，实现民主共和，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从不抱残守缺，思想与时俱进。其三民主义学说若就思想理论渊源讲，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热忱向往者。但作为富有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十分珍视数千年延绵之中华固有文化，反对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继承、利用、改造，好的保存，不好的放弃，是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对皇权专制政治、宗法制度、纲常名教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和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国民思想解放，意义不容低估。然而这次运动在文化选择问题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偏差也是毋庸置疑的，极端之时，连京剧、中医、汉字等几乎都在扫荡之列。这种现象令孙中山深感忧虑。正因为如此，曾受西方思想文化系统熏陶，一向重视学习西方的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回归”倾向，主张恢复包括“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在内的“一切国粹”，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精神”。学界有人因此而将孙中山的这种“回归”简单等同于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复古守旧，认为是走回头路。这显然是对孙中山传统文化观的误读。

首先，孙中山有关恢复“国粹”的主张，是同他对于民族精神可能“沦丧”的担心以及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的强烈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基于德治教化的古代思想传统，对于近代以来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迅速落伍和衰败，特别是民风日下和国民的一盘散沙，多年飘泊海外的孙中山有切肤之痛，且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失了民族的精神”，而“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不仅经济和科学技术要跟上，“还有道德问题”。因此，在他看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1]近些年来，人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越

[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1—8月），《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680页。

来越多地关注到了道德层面的因素，固有道德、民族精神乃至“道德血液”等越来越成为热门词语，德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相辅相成作用，亦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由此观之，孙中山先生近一个世纪前的上述论断，见识之深远不能不令人由衷佩服。

其次，孙中山主张恢复国粹，发扬光大固有的民族精神与道德，并不意味着他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分良莠地盲目鼓吹和提倡一切传统文化——如当时的顽固守旧势力或“中体西用”论者，以及“预备立宪”前后的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之所为。恰恰相反，他所提倡和主张恢复的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精华部分，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与内涵。众所周知，孙中山晚年论及传统文化，比较多地谈到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儒家道德，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古代传统政治哲学。在皇权专制时代里，这些伦理纲常、政治说教的确是以服务君主专制为旨归。但对于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忠孝仁爱”也罢，“格致诚正”也罢，孙中山均根据时代发展和革命需要，作出了自己全新的解释，赋予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内涵。[1]而且孙中山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所谓“回归”，其出发点始终不离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因此在提出恢复国粹的同时，仍不忘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一生中趋新向西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未变更。

正是基于上述立场，孙中山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意义给予充分肯定，确认其为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和“最有价值之事”的前提下，对于新文化运动中把新文化同旧文化、旧道德绝对对立起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孙中山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主张区别对待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实事求是立场，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其正确性，其与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完全一致的。“文

[1] 详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第678—691页。
[2] 同上，第680页。

革”时期所谓“批四旧”的做法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肆意践踏，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时至今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仍时有抬头，值得警惕和反思。

（二）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而不衰，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吸引众多学习乃至顶礼膜拜者，影响至为深远。这一历史情况的存在，加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的封闭半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时期里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缓冲带，日渐助长了中国人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外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茫然无知。直至近代鸦片战争爆发，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逐渐懂得“睁开眼睛看世界”之重要，开始了学习外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的艰辛历程。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怎样学习，如何鉴别，在近代中国文化人中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而对孙中山来讲，**外国好的东西应当学习，但须立足国情，为我所用，而不能盲目照搬，这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

同近代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孙中山文化观构成元素中，除了借鉴他人和自己独创发挥之外（后详），其思想理论来源主要有两部分，即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两种文化元素在他的文化观念体系中并非不分主次，其中西方先进文化是其学说的主要来源，学习、借鉴西方近代文明是他一贯的文化价值取向。上面谈到“回归”，其实更多时间里，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是某种程度的“离异”。在这方面，孙中山既不同于晚清以来顽固守旧势力的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尚旧复古、凡外必排，同时也有别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保守思维模式，对西方文化之吸纳较为积极、彻底。在他看来，中国若想摆脱贫困，进步富强，“跟上世界的潮流”，就“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取法于人，因为“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

[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1]所以，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2]

众所周知，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盲目排外与全盘照搬是文化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两种倾向，孙中山则有所不同。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著名讲演中，孙中山曾旗帜鲜明地批评文化选择上“极端信仰中国”和“极端崇拜外国”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要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3]他认为这种简单化和形式主义态度是不足取的。由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不能完全效仿”，因而学习外国必须有所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而不是鹦鹉学舌，照抄照搬。唯有如此，“社会才可以改造，国家才可以进步”。[4]至于外国思想文化的好与坏，标准是看其是否“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5]显然，无论传统还是外来，文化选择的关键是“照自己的情形”，“合我们用”，这在今天也不过时，依然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文化价值取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孙中山对于“迎合世界潮流”、“合乎全世界的用途”的突出强调，实际上还向世人传递和送达出这样的重要思想信息，即在孙中山看来，包括文化和社会制度选择在内，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顺应世界潮流，符合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规律；国情固然重要，但不能动辄拿“国情”作挡箭牌，据以固守传统，抵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

[1]《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年1—8月），《孙中山选集》，第759页。
[2] 同上，第688—689页。
[3] 同上，第760页。
[4] 同上，第763、764页。
[5] 同上，第651页。

不仅如此，在强调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时候，孙中山还尤为注重文化超越的问题，即中国不仅要取法于人，积极努力地向西方国家学习，“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更要“取法乎上”。通过学习西方，不仅要做到与列强并驾齐驱，而且要后来居上，重新恢复中国曾有的世界领先地位。在究竟是“步欧美的后尘”还是“驾乎欧美之上”的问题上，孙中山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以近代中国及日本学习西方的经过为例，指出学习西方，不是为了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而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只有取法乎上，“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掌握人家最先进的东西，而且“学得比外国还要好”，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甚至“后来者居上”。[1]总之，学习的目的不是“简单仿效，照样去做”，而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2]孙中山这种建立在民族自尊和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超越意识与远见卓识，无疑值得称赞。

（三）

从早年对皇权专制政治猛烈抨击，积极主张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到晚年力倡“固有道德”、“民族精神”，试图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汲取复兴国家、振兴中华的精神力量，现象上孙中山似乎在走着一条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道路。其实并非如此，**融汇中西，兼收并蓄，综合创新，与时俱进，才是孙中山文化价值取向的最终归宿**。

近代中国，面对割地赔款、挨打受欺的国家厄运和一波强似一波的“西学东渐”之文化冲击波，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再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同时段的中国知识精英们都曾面临中西文化的比较取舍问题，并为此而长期争论不休，各自开出自己的医国“药方”。其中，早期改革派

[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1—8月），《孙中山选集》，第690页。
[2] 同上，第790页。

的“师夷长技”说虽有“开眼看世界”的启蒙意义，但骨子里未脱长久以来中国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天朝上邦的自傲心态。洋务派以“制器”、“练兵”、“自强”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西方列强的努力，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序幕，但囿于“中体西用”的狭隘思维定式，洋务运动终究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以及救亡图存的沉重历史主题。维新派之“君主立宪”主张，在近代历史上首次触及了皇权专制政治这一敏感制度神经，将改革由经济层面引向政治领域，可面对共和浪潮的汹涌澎湃，加之内心深处对于儒家道统的难以割舍，使他们最终选择了滑向保皇。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肩负推翻帝制之使命，政治变革无疑是其必须优先思考的问题，辛亥结束帝制、创立民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他无愧“国父”的光荣称谓，而他在中西文化优劣短长对比中做出的适应时代需要的选择，同样是我们今天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宝贵思想遗产。至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精英们，其对于西方新文化欢迎之积极，对中国旧文化清算之彻底，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此前任何新学运动，所遗憾者，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一难得的正确把握中西文化关系的机会，被随后复杂的政治因素提前中止了。

说到孙中山先生的文化观，尽管他早年也曾接受较为严格的传统文化垂训，“幼读经书”，与同龄人一起“随口唱过四书五经”，但按照他自己的讲法，当年所受之儒家正统教育“数年之后，已忘其大半”。秉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于人群之需要”的一贯立场，其思想能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鉴别、融会贯通、择优而从。对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孙中山皆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孤立自大，盲目排外，“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固然是错误的，而不论“是否合用”，一概接受，事事模仿，“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亦不足取。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1]

对于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体系，孙中山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余之

[1]《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当然，此三者中最能体现孙中山思想本质和特色、最具文化价值的当属“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因为独见和创获的前提是融汇与创新。由此出发，中国既可以“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又不失文化根基，立足民族传统，“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2]正确把握中华文化的发展路向。这种立足国情、融贯中西、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意识，正是孙中山较之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

若论文化学术功力，孙中山或许不能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大师媲美，但独特生活经历赋予他融贯中西的明显优势，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综合创新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配合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及考试制度，演化成他的“五权宪法”、“权能分治”理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加上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升华为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结合，催生了“知难行易”的行动哲学结论；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固有道德”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政治哲学”的甄别和重新诠释，产生了以恢复民族地位为旨归并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哲学。到晚年，与时俱进的孙中山将其文化融贯推演至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更高层面，由以往“仿效欧美”转向“以俄为师”，凝结出新三民主义这一时代产物。

以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融贯也许还不尽完备，但他那种立足国情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引进、批判，和从现实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利用、改造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于推进近中华文化之近代转型乃至当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无疑大有裨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曾谈到，“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

[1]《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2]《在欧洲的演说》（1911年11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0页。

切照搬，机械搬用”；“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两代伟人文化选择旨趣上的这种惊人相似，绝不是偶然的。

（四）

孙中山先生有关中西文化关系处理的论说已如上述，其对中华文化近代转型思想贡献之重要毋庸置疑，这方面，沈渭滨教授《孙中山：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一文亦有详尽阐述和深度挖掘，但对沈教授文中将孙中山定位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人”或“第一推手”的结论，笔者实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由儒学独尊为主导，到主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中华文化的转型路经过了一段漫长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这里面有几代人的努力付出，无数人参与其中，所谓“第一人”或“第一推手”，其目标通常会导向某一文化群体乃至一代文化人，而以革命者和政治家享誉近代中国政坛的孙中山，无论就时间早晚还是观点重要与否而论，都难称文化转型“第一”。

说到中华文化转型，始作俑者当属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之“师夷制夷”说，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分子，他们才是“西学东渐”的最先应对者。以今日眼光看，其以天朝上邦自居为前提的“师夷”，无论观点还是论证都还十分肤浅，经不起仔细推敲，可时间上，他们才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思想启蒙者。尤其魏源“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一番要求变革论说，对于因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而导致迅速落伍的近代中国，实有振聋发聩之效。

继之而起的是前述冯、薛、马、王、郑等早期改革派，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图富强的吁求，上承“师夷长技”说，下启“中体西用”论；郑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3页。

观应、王韬等的“君民共主”、“君民共治”与后来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也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至于洋务派，特别是其后期领军人物张之洞，尽管其尽显保守特色的“中体西用”论一向遭学界诟病，然平心而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从精神文化向物质文化层面的推进，洋务派功不可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正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

如果说龚、林、魏“师夷长技”说拉开了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历史序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则上演了文化转型的第一出悲壮剧目。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政治上的皇权专制，思想文化领域的独尊儒术，经济上高度封闭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加之清代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几乎引入了死胡同。而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一路下来，尽管朝野都在努力，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中国在半殖民地泥坑中越陷越深。此一背景下出台的维新变法运动，不仅文化批判锋芒直指纲常礼教、皇权专制，更将“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要求破天荒地提到了体制变革的前台。变法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还是以他们特有的姿态——六君子之血，在中华文化转型的画卷上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只不过因为康有为后期在文化问题上显而易见的倒退，给维新派的文化转型事业留下了一个“尾巴”，以至梁启超无奈间表示“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乃近代中国民权运动之巅峰，中国人最早切身感受“天赋人权”的真谛，就是从中华民国的创立开始的。“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民族民权民生”，各种革命口号一时间铺天盖地，广为流传，延续达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寿终正寝。然而无论辛亥革命还是孙中山本人，其对于近代中国的主要贡献在政治而非文化领域，除了沈渭滨教授文中谈到的民权主义对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外，孙中山对于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推动，如本文前述，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文化态度或文化价值取向。孙中山生前比较多地关注文化问题，是在晚年《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讲期间。且不说《三民主义》的文化反省深度能否与随后的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相

提并论，其中有关儒家道统的过多强调，恰恰被不少学者视作孙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化转型方面，孙中山的思想贡献自然有目共睹，但称之为转型“第一人”，十分牵强。

近代中国，对中华传统文化反思最深刻、清理最全面的非新文化运动莫属，其接受西方新文化态度之积极，批判中国旧文化立场之坚定，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此前历次新学运动，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巅峰。基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清算运动，以文化转型为国民革命与民主共和鸣锣开道，弥补辛亥缺少“头脑革命”之不足。这样才有了“科学与人权”大旗高扬，才有“打倒孔家店”为标识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更有为了拥护和捍卫“德先生”与“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的态度鲜明。尽管由于时局的剧烈转换，新文化运动没能按照既有轨道走完应有的形程，可运动达到的认识高度，已然是龚、林、魏以来的几代先进文化人望尘莫及的。总之，如果真要给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寻找和确定“第一人”的话，若就观点重要性而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吴虞、钱玄同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精英群体，才堪称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人”或“第一推手”，只有在他们这里，中华文化才基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另外，沈教授文章中的一些具体提法，也有值得存疑之处。例如，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实现与否，应该以超越和扬弃儒学为核心的古代传统文化为标志，沈教授文中却以新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理论的提出为坐标，强调“三民主义”对儒学的推陈出新，“主要不是在‘道’的方面，而是在‘术’的部分”，认为文化转型“主要指应对社会需要的方法论层面的转变”，这是否合适？试想，所谓“转型”，触碰的当为本、体、道之层面，依照本末、体用、道器的辩证关系，“道”不变，何言“转型”？再者，沈教授文章提到，“近代志士仁人对中华文化转型所作的努力，都无力使中华文化更新，难以形成理论体系。只有孙中山的‘三

[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民主义’才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这样的结论是否过于武断？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篇幅所限，不作展开。

（作者为深圳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1] 沈渭滨：《孙中山：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
——兼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当然领袖

谢俊美

[内容提要]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和民族民主革命家。甲午以后，眼见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他走出书斋，以学问经世，积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以及在《苏报》案中的出色表现，曾使许多人放弃改良主张而转向革命。他是一个强烈的种族革命论者，竭力主张“排满”、“倒满”，在未来国家政体设计、民权运作，乃至政党政治等方面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存在严重对立。他从佛学观点出发，鼓吹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虚无思想。进入民国后，他大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给革命带来极大的伤害。但孙中山仍从民主共和革命的大局出发，聘请章太炎参加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以及后来的护法斗争，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孙中山无愧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

[关键词]

章太炎、孙中山、《苏报》案、种族革命、五无论

早在孙中山生前乃至逝世后，总有少数人不承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这当中也包括当年曾与孙中山一起革命的人，章太炎就是其中一个。近年来，在近代人物研究中，时不时出现褒章贬孙的现象，少数影视作品，如前数年的《走向共和》甚至还出现丑化孙中山形象的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所以，对此再作深入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本文依据历史事实就章太炎与辛亥革命，以及其与孙中山的矛盾冲突，作一评述。

一、深重的民族危机将章太炎卷入民族救亡的大潮

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划瓜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变得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

同是救亡图存，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种主张体制革命，武力推翻清政府，持这一主张的，以孙中山为代表。还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表示了他学习西方、推翻清朝，变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决心。甲午战败前夕，孙中山即开始谋划发动广州起义。

一种主张实行体制内改革，对现存政治制度加以改良，来实现民族自救。持这一主张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想通过支持光绪帝推行维新变法来实现他们的主张。但戊戌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被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宣告了维新改良救亡图存的道路行不通。

章太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书斋里走出来而卷入民族救亡图存大潮的。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出生在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的一个读书世家。轰动晚清、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发生在这里。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成年后，因仰慕顾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出身，“家资百万”，“藏书甚丰”。父亲章濬为当地有名中医，一度担任余杭县学训导，后因卷入杨乃武案，被革职。章太炎先前曾参加过县试，但因患有癫痫（俗称羊角疯）而无法应试，从此绝意试途，专心学问。明末清初，浙江士绅曾进行过激烈的抗清斗争。入清后，这种反清意识依然不减，清政府采用严酷的高压政策，先后制造了曾静案、吕留良案、查嗣廷案、戴名世案、庄廷珑案等文字狱。[1]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这种种族意识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轻减。父亲去

[1]《检论》、《哀焚书》、《太炎文录》卷一，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1939年版，第6—12页。

世前对章太炎说：章氏入清已经八世，先辈入殓都是深衣，穿明代的上衣下服。望不违祖训。后来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那里问学，一次读到蒋良祺《东华录》中有关曾静案的文字，外祖父就给他讲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话，太炎问其有何依据？答以顾炎武、王船山说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太炎就说：“明亡于清，反不若亡于李闯（李自成）”，因为他们都是汉人，文物制度尚能保存。[1]他觉得异种乱华，是心中的第一恨事，反满的种族革命的意识由此萌发。后来他就是带着“为浙父老雪耻”的强烈种族复仇意识投入到当时民族救亡大潮的。

遵照父亲的遗嘱，章太炎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进入杭州诂经精舍研习，一待就是八年，直到1897年才离开。诂经精舍系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所创办。现时主持人为学者俞樾。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在河南学政任上出题舛误，被参劾，奉旨革职永不叙用。但因系曾国藩的门生，后在曾氏和李鸿章的护佑下，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教书之余，研究经训，著有《群经评议》，成为晚清经学研究的绝响。经太平天国起义十多年的洗礼，江南已是田园荒芜，文物荡然。世家大族大多家破人亡，子弟无力读书，而一般为宦者也无暇绩学，章太炎在俞樾的指导下，苦研经训，饱读史书，凡经、史、子、集无一不读，并对佛学，尤其是对华严宗、法相宗有着很深的研究，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由于深通古今经学，不仅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国学大师的基础，而且也使他拥有了日后政治生涯中的“傲人”资本。如果说孙中山是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审视中国，振兴中国。那么，章太炎则是从中世纪走来，拿着古圣先贤们曾经鼓吹和使用过的夷夏之防的传统“武器”，掷向他所憎恨和要复仇的满清政府，最终仍旧回归到传统中去。这就是孙、章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来他们彼此矛盾冲突的根源。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章太炎从杭州来到上海，进入汪康

[1]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第25—26页。

年所办《时务报》馆任撰述。那时梁启超正担任该报主笔，大力宣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氏撰写该书，目的是托古改制，将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为自己的变法主张提供依据。他不是为经学而经学，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假借。殊不知章太炎是一个纯粹的经学研究者，其著《春秋左传读》所阐述的观点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的观点正好相反，因此，与梁启超等并无共同语言，双方时常发生龃龉，最后章太炎被迫离开《时务报》馆。戊戌政变后，他因支持变法受到通缉，避居台湾。他以为当年郑成功抗清离今不远，遗风尚存，在台尚有可图，但终而不果。次年又因反对废黜光绪，再遭通缉，亡命日本。唐才常力主勤王，他不表赞同，当即断发，以示决绝。在《解发辫》一文中，他说："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1]剪去它，以明自己"不臣满清之志"。章太炎的剪辫在当时轰动一时，被视为大逆不道、惊世骇俗之举。孙中山在看了章太炎的《解发辫》一文后，对其反满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2]但此时孙中山尚未与章太炎见过面，对于章太炎的全部思想还不了解。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訄书》行世，巡抚恩铭又欲行大狱，章太炎再次亡命日本。

经由庚子、辛丑之变，清廷已沦为"洋人的朝廷"，国人对于革命排满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林白水说："中经六士（指戊戌六君子）、三忠（指袁昶、许景澄、徐用仪）及汉变诸子（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人员汉口被杀），因聚怨于朝廷，乃创为革命之论。"[3]孙中山直接觉察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说："当初次失败（指广州起义）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嘴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而"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之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

[1]《訄书》末篇，《太炎文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影印本，第17—20页。
[2] 王林著：《章太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3] 林獬（林白水）：《政冶之因果关系论》，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62—763页。

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1]然而这时的“革命之思”主要是指“排满”、“倒满”的种族革命。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主张革命的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苛派勒索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和高超见识的人”。[2]章太炎就属于第二类，他的种族革命思想，适逢其时，迎合了当时的需要，1903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蔡元培组织爱国学社，安顿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章太炎应邀到校讲学，多述“明清兴废之事”，而中国教育会则每周两次在张园举办讲座，公开宣讲革命，讲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其中以章太炎“排满革命之论”最为激烈。邹容作《革命军》，章太炎为之润色并为之作序，宗仰和尚出资，将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一时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引经据典，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阐述排满进行种族革命的必要：“彼（指满族贵族集团）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效也”。“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是，识不逮耶?！”[3]文中还将光绪帝比做“未辨麦菽”的“小丑”，以致引起了清廷的震怒，遂勾结租界当局，一手制造轰动当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因此被判囚禁三年。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排满平议》、《讨满洲檄》、《复仇是非论》、《正仇满论》等文章，历诉满清政俗14大罪状，指出：“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4]这种文字鼓吹，对于长期遭受封建满清王朝压迫的民众来说如饮醍醐，从未有过这样的痛快。加上当时科举废除，大批士子为

[1] 孙中山：《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2]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10月12日），《孙中山选集》（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页。
[3]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卷二，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1939年版，第14–15页。
[4] 《讨满洲檄》、《正仇满论》，《太炎文录》卷二，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1939年版，第21–23页。

出路苦闷之际，看到章氏文论，备感振奋，以致章太炎一时名声大震，“国民咸慕，翕然从风”[1]。除了著文鼓吹排满反满外，章太炎平日与友人交谈也率多类此。“以明末遗民故事及清末革命故事为多，盖前者为先生革命思想之所出也”。[2]他是“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3]

章太炎鼓吹反满排满的言论对于人们放弃改良观点转向反清革命固然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正如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说的那样，“这种宣传起了很大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鼓动起来的。”[4]但毕竟纯粹的种族复仇和种族革命主张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的纲领相距甚远。孙中山是为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力主推翻清政府的。推翻满州贵族建立的清朝只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作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的前提条件，而章太炎则将它当作追求的最终目的。而且这种纯粹排满、倒满的种族革命主张还忽略了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除了满洲贵族，还有大量汉族地主官僚，这就放过了清朝统治中的汉族封建势力。他的这种简单而片面的种族革命主张在日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过程中，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民主革命主张的矛盾日深。

章太炎对自己在庚辛前后反满、排满的文字宣传颇为自得。1912年10月，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对民国功臣“授勋”，授予孙中山、黎元洪为“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等为“一等勋位”。章太炎则被授予二等勋位，他对此非常不满，并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同孙中山相比。在致友人书中写道：“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动，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两途：软弱者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即《驳康有为论革

[1] 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3页。
[2] 左舜生：《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1868—1936），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196页。
[3] 钱玄同挽章太炎联语，《逸经》第十一期，1936年8月。
[4] 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

命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认为自己有"首正大义,截断众流"之功。[1]这里,章太炎将自己与孙中山相比,显然过高地估量了自己。孙中山从成立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及光复会,组建中国革命同盟会,领导和发动武装起义,奋斗了十多年,并非像章太炎所说的仅有"鼓吹之功"。正如林家有教授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国在革命民主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孙中山的经历,也没有一个人有孙中山的威望和系统的革命思想,更没有一个人比孙中山更了解世界和中国,所以辛亥革命的领袖非孙中山莫属。"[2]章太炎用自己鼓吹种族革命方面的贡献来掩盖甚至抹煞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显然是不对的。早在东京同盟会活动时,就有人批评章太炎,说:"他是个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3]孙中山是民国的缔造者、民主革命的领袖,被授予大勋位,是当之无愧的。

二、认为共和政制不如专制为善,公开鼓吹"五无论"

1906年6月,因《苏报》案而被囚禁三年的章太炎获释,随即被孙中山派人迎往日本东京。到了东京,又在神田区锦辉楼为其召开欢迎大会,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除了仍然讲他自幼读了蒋氏《东华录》中有关曾静、戴名世、查嗣庭等文字狱内容后,胸中发愤,立志排满的话,以及甲午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还大讲特讲"佛教,华严、法相宗,次说国粹,人物事迹",竭力宣传他的反满、排满的种族复仇主张。[4]

章太炎来日后,开始孙中山对他非常尊重和信任,在他来日不久后,便委以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重任。许寿裳曰:"凡开国的典章制度,多与先生商榷,先生亦佩服国父的善于经画","国父和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千载一会,张良之赞汉章,刘基之佐明主"。[5]比喻

[1] 章太炎致王揖唐书,见王林著:《章太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2] 林家有著:《共和、民主、富强——孙中山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3] 乃蒙:《章太炎讲学》,《宇宙风》第22期,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171页。
[4] 详见《民报》第六号上有关报道。
[5] 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30页。

虽带旧时代痕迹，但也将孙中山与章太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各自的地位、角色、作用说得很明白了。

章太炎主编《民报》后，继续撰文发表排满、反满的主张，同时又从佛学的观点出发，阐发他对未来国家政治的看法。认为共和政治有危害，不若专制政治为善。他说有民族即有国家，有国家必有政府，比较世界各国政体，惟有共和政体危害较轻，要消除共和政体的危害，应当做到土地平均分配，使耕者不为佃奴；官立工厂，使佣人得分赢利；限制继承，使富厚不传子孙；议员有贪污行为，平民可以解散议院，使政党不能纳贿。认为若做不到这四点，“不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都不如专制为善”。并谓：“专制国家没有议院，无议院则富人穷人地位相等，若设议院，而充当议员者，大都出于豪门，名为代表人民，实际上依附政党，与官吏朋比为奸，所考虑的不是民生利病，而是一党之私，因此，虽有共和政体，还不如专制政体为宜。章太炎这里讲的，包含以下三层意思：一、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之于中国；二、政党与议员勾结，这种共和政体还不如专制政体为宜；三、现在建立共和政体只能是不得已之举。他认为清朝推翻后，中国还是行君主专制为好。“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1]

为了证明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之中国，他在《民报》上专门发表了《代议然否论》，认为欧美、日本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是因为其封建历史太短，而中国的封建历史太长，“民众皆平等，则不能实行”，如果行之，只能使民众产生贵族平民之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识字人又少，议员选举将难以进行。人多无法开会议事，如按纳税标准来限制选举权，必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选民多，内地贫苦地区的选民少，选举的结果只能是富豪。此外，选举中黑幕难免，有力者以权势笼络人，善言辞者哗众取宠以骗人，甚而以金钱、物质，乃至色相打通关节，这样选出来的议员只能代表个人或党派利益而不能代表民意。他说，既然如此，还不如行专制，让一个统治者来掌握政权。个人对于民众的苛察不能周至，民众则得以自由生存。

[1]《代议然否论》，《民报》第24号，第12—13页。

那么，中国未来究竟行何政体和制度呢？ 1907年9月，章太炎在《民报》上著文，提出《五无论》。所谓五无，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

章太炎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人类互相残杀争斗的根源，要消灭战争，只有废除政府，废除的办法是实行共产，断绝贸易，销毁武器，废除家庭。认为只要有聚落的存在，惨烈的战争就不会停止。各聚落因气候差异、土地肥瘠、资源多寡而不免发生战争，因此应取消聚落，办法是使农为游牧，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贫寒地方的人与温暖地方的人每年轮流易地而居。认为政府和聚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残的事都是因为有人类的原因，如果没有了人类，就不可能有这一切发生。如何做到无人类，办法是找出一二个超人来，引导人们行独身主义，断绝人欲，最后使人断根绝种。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而来的，只要一物尚存，进化到最后，还是会出现人类，只有无众生，才能无人类。如何做到无众生，办法是以观无我为本因，以断交接为方便，人人都视自己为虚无，不相交往，自生自灭，认为现实世界本来就是虚无的，无众生，无人类，即无世界。号召人们去学佛，先以佛净化心灵，然后“轻去就而齐生死”。

章太炎的“五无论”充满了虚无空幻的色彩，使人感到悲观绝望。其实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就拿章太炎本人来说吧，十分虚伪，嘴上说不要政府，他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担任东三省筹边使，并嫌这个官职有名无实。嘴上说要去人欲，但又十分计较个人的勋位，嫌二等勋位太小。嘴上说不要聚落、家庭，却又登报征婚。1913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期间，强令服侍人员称他为“老爷”、“大人”，每逢朔、望向他行“叩首大礼”，违者轻则罚跪，重则罚款。[1]这一切都有违辛亥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现实，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国战争，章氏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在赴贵州毕节时，见副元帅唐继尧着上将戎服，心里很不自在，遂命人赶制“大纛”，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其规制超过唐氏帅旗三分之二。[2]

[1] 徐一士：《再记章炳麟羁留北京时期轶事》，《逸经》第十二期，1936年8月。
[2] 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49页。

章太炎的“五无论”源自他的佛学观。他崇尚华严、法相两宗，认为华严、法相心、佛、法三者相通，认为佛教是无神教，重平等，他从平等主义推论，满人待汉人不平等，必须铲除掉，依照佛教之说，逐满复汉，正是份内的事。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上说，国王暴戾，菩萨有权，可以将其废黜。总之，在章太炎看来，万事皆空，人世间的一切所作所为皆是无所谓的，革命也好，改良也好，专制也好，民主共和也好，都不过是虚幻的东西。

同一时期，章太炎还发表《国家论》、《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一系列文章，反对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治。他的“五无论”和号召人们学佛，连同这些言论在当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引起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指出《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报纸，“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指责他的文章是“无的放矢”。若中国人人皈依佛法，岂不成了印度?！什么民族，国家，革命，岂不成了空论?！人人都成了法师，谁来拯救民族、国家的危亡?！[1]但章太炎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主张。以致同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政治思想上渐行渐远，无法相容。

三、罔识大体，不懂军事斗争和政治谋略

革命事业的成功，除了宣传鼓动外，还离不开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且不说章太炎在宣传鼓动方面存在不少缺陷，即论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在这方面他的知识可以说非常欠缺。由于无知，又罔识大体，他的不少做法直接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06年7月，章太炎主持《民报》后，孙中山正计划前往南洋各地募集资金，准备在国内发动新的武装起义。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于次年3月下令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离日前，在日华侨商人吴锦堂（移晴阁主人）特地资助孙中山10,000日元，日本外务省也秘密地给了8,000日元，合计18,000日元。孙中山拿出其中的1,000日元用于与同人的告别宴，另拿出2,000日元交给章太炎，作为《民

[1] 李植：《余杭先生事略》，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45页。

报》的办报经费，余款项则带往南洋，作为筹划起义的活动经费。章氏在得知这笔赠款的全部数目后，大为不满，认为孙中山私吞了这笔赠款，有违革命道德。愤激之下，竟擅自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待到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相继失败，孙中山回到东京，章太炎非但不予安慰，反而与张继一道，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务，后经黄兴调解，事情才告平息。[1]

作为一名文人，章太炎对于军事几乎一窍不通。1907年9月，为了支持同盟会，日本人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在日本购得一批枪支，准备供孙中山领导起义使用。章太炎和宋教仁从日本人平山周那里得知这批枪械陈旧无用，急忙以《民报》社的名义拍发电报告知同盟会在香港的机构《中国日报》社，说明此批枪械旧劣无用，请停止购买。这一电报无异是将革命党人的秘密和盘暴露，是严重的泄密。港英当局得知后，遂查获这批从台湾运来的枪械，勒令退回日本，抵日后又被日本当局全部没收。当时清政府也获得了这一消息，故加强了对边境口岸的搜查。事后孙中山认为这批枪械运送泄密事件，完全是章太炎等拍发明电码一手造成的，自此对章太炎及宋教仁等有关人员越发不信任。对于此事，在香港接获章太炎、宋教仁所发电报的冯自由也批评章太炎不谙军事，冒昧发电，以致造成大错。凭心而论，章氏等此举虽然主观动机没错，但客观上的确起了泄露军事机密的严重后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章太炎为办《民报》向孙中山要钱无着，因而对孙中山心怀不满。而孙中山对章太炎在《民报》上大谈“五无论”以及佛法之类的虚幻内容也早已不满。《民报》被查封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前去东京复刊，不再让章太炎参与其事。章氏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于1909年竟发表所谓《伪〈民报〉检举状》，与陶成章等在南洋公布的《孙文罪状》相呼应，对孙中山、汪精卫等加以攻击，再一次掀起倒孙风潮。邹鲁等则在

[1] 据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回忆说：当时《民报》社房屋是租赁的，每期报纸内容编辑排版好，交由日本印刷所代印。全部费用由孙中山负责向华侨等筹措供给。后来孙中山往欧洲及南洋筹款，可是一去无消息，以致《民报》经费大成问题，欠债很多，结果报社办公处房主和报纸印刷老板以章太炎为债权人，向法院诉追，太炎无力偿付，判决拘押数月。因此，对孙中山怨恨极深。（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145—146页。）

香港《中国日报》上著文反击，将他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谋款而致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信公布出来，称章太炎为端方的“暗探”，为“万金而出卖革命”，是革命的“罪人”，满洲之“鹰犬”。[1]1910年后，双方彻底闹翻。孙中山继续组织同盟会，开展武装斗争。而章太炎则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并担任该会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公开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章太炎出任重组后的光复会长后，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根本提不出新的革命纲领，仍旧继续坚持原先光复会提出的“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纲领和誓词，牢牢坚守种族革命的主张，“提倡革命就是光复汉民族”，[2]“总之，不离吕（留良）、全（祖望）、曾（静）之旧域”，“欲为浙父老雪耻”。[3]陶成章也说：“革命就是造反”，“汤武革命，改朝换代。”。[4]与此同时，竭力反对孙中山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并在南洋爪哇、新加坡等地设立分会，大力发展会员，创办报纸，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此时的章太炎已逐渐变为革命阵营内专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立的一股消极力量，对民主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18日，章太炎回国。他与黄兴、宋教仁一起，附和一些立宪官僚，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次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念旧恶，仍从大局出发，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但章氏回国后，“周流十年，政治上并无所表现”[5]。临时政府成立后，经费奇缺，孙中山准备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向日本贷款。围绕这一问题，章太炎再次与孙中山意见对立。3月，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虑其难制，欲令南来以困之”，章氏又表示“反对”。此外，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上，也是明显地表现出拥袁反孙的立场。[6]

---

[1]《党人》，《新世纪》第117号，1910年1月，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52页。
[2]〔日〕中村哲夫著：《移晴阁遗闻——孙中山与吴锦堂》，神户阿吽社，1993年，第125页。
[3]《检论》九卷《大过》附录，《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51页。
[4]林增平等编：《辛亥革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99页。
[5]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171页。
[6]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46页。

还在武昌起义期间，章太炎就和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而本党之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孙中山继而气愤地说：“我党失败全在这两句话上”，后来“袁世凯并倡军人不入党之论，以防止革命，因得肆无忌惮，帝制自为，皆此说阶之厉也”。[1]章太炎一方面反对同盟会，主张“革命党消”，而自己却与黎元洪、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相继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等政党，并担任共和党副理事长，同同盟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相对抗。这种带有分裂性质的对抗活动，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斗争中，常处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地位，待到“宋案”发生，孙中山决定实行“二次革命”，章太炎虽表示赞同，迨至以后的护法战争，虽与孙中山看法一致，然而为时已晚，已是革命党人丢失政权若干年之后的事。也许是囿于政治学理的不足，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比如国家统一、联省自治等问题上始终与孙中山意见相对立，不能趋于一致。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章太炎在敬送的挽联上写道：“洪以甲子兵，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仍将孙中山视为洪秀全的继承者，而不承认其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这显然是对孙中山形象的歪曲。[2]后来有人对他这样评价孙中山颇不赞同，他又在《祭孙公文》中辩解说：“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乐专一，吐辞为矱。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在章氏看来，孙中山被尊

[1] 孙中山：《对广州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代表的演说》，见黄彦主编：《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2] 另据陈存仁在《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一文中说，章氏在闻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后，曾书以下一联挽之：“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对孙中山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实现和平之举表示不满，治丧委员会以其联不妥，未予悬挂。（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187页。）但另据曹聚仁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章氏送的挽联内容是：“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对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进行攻击。如果属实的话，那简直就是恶毒攻击了。（见《人间世》杂志，1934年9月，第11期。转引自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211页。）

奉为领袖，众人纷纷赞同，而我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循着“千夫之诺诺，不若一夫之谔谔”的古训，不愿随声附和，而愿做他山之石，用以攻厝。这显然是为自己贬低孙中山行为的辩解。

四、评价孙中山私心自用，有违公允

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当然领袖。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本人说自己是“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1]。国民党人尊称他为“国父”，谓：“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万世。”[2]中国共产党人称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毛泽东还说过：“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4]，孙中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先进分子中的“杰出者”、“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5]。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这一点都是公认的。其实，对于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当初章太炎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后来随着个人声望日隆、颂声鹊起，个人欲望膨胀，自以为个人功高勋崇，而滋生功勋盖过孙中山的看法，1903年，章士钊将宫崎滔天所著《孙逸仙》一书译成中文出版，章太炎欣然为译本写了一首诗序，将

[1] 孙中山：《哀悼列宁逝世》，见黄彦主编：《论改组国民党和召开“一大”》，第138页。
[2] 《国民政府训令》，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见广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附录，第637页。
[3] 《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4]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1—569页。
[5]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孙中山比做“赤帝子”，说孙中山将“继承郑成功、洪秀全的反清事业，成为四万万人的领袖”，[1]公开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高领导。宫崎这本书以及章太炎的诗序，的确对宣传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真相、提高和扩大孙中山的知名度起了不小作用。但后来在袁世凯授勋时，章太炎竟然将孙中山被人们拥戴为领袖，归功于是因为他所写诗序所致：“中山本无人提携，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言下之意孙中山之所以成为革命领袖是他章某“吹嘘”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领袖人物的地位不是靠某个人的几句话，几句诗所塑造出来的，而是由人民、尤其是所在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所决定的。孙中山作为“千秋国父，百代人师”[2]，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历史斗争铸就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章氏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私心自用，不自量力，严重违背历史史实。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说的是，本文无意贬低章太炎先生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作的贡献。正如章太炎的弟子汪炳正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3]，我认为这个评价还不够，他应该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大学问家”。还是薛福成的后人薛慧山评价得好，说他是“权威性的国学大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先进”。[4]称章氏为“国学人师”是因“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的，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称其为“革命先进”而不称其“大革命家”，是依据历史事实而论的。[5] 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去世，南京国民政府闻讯致悼，明令褒扬，特予国葬。令文中说：“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6]章太炎遵循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以经史之学投身民族救亡的大潮，为推翻

[1] 王林著：《章太炎》，第97页。
[2] 国民政府诔文，见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南京博物馆编：《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3] 王林著：《章太炎》，第125页。
[4] 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附录，第201页。
[5]《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
[6] 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第119页。

满清王朝鼓吹呐喊，做了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在革命斗争中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大节无亏，不失为正人，应予肯定。尤其是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为护法奔走努力，尤为难能可贵。终其一生孜孜于学，造就人才，成就斐然，也应予肯定。国民政府对他的这个评价是恰当和中肯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孙娟娟

[内容提要]

飞机是在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新型交通工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才开始运用到军事上。孙中山在飞机发明之初，就以敏锐的眼光加以研究和关注，并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策划第三次革命，在制定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方略时，他首次将飞机项目列入方略中，并亲自着手飞行学校和飞行队伍的创建工作。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的创办正是孙中山真正开始有步骤地培养、建设一支空军队伍，实践他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开端。

[关键词]

孙中山　近代航空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创办的一所航空学校。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日本飞行家坂本寿一从1916年2月7日至4月24日曾19次到孙中山住所与孙中山商谈，时间一般为30分钟至1小时，他最后一次拜访孙中山是在1916年4月24日下午1时55分，3天后即4月27日孙中山即启程回国。在此期间，坂本寿一曾发给孙中山5封函电。

坂本寿一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在策划部署第三次革命并准备回国亲自领导反袁斗争的紧张时刻，孙中山为什么会在这么异常繁忙的时刻，频繁地会见一名飞行家？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一份1916年4月25日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周应时与坂本寿一签订的“契约书”，从中我们可以初见端倪。

“契约书”全文如下：

大正年四月二十五日东京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

周应时[1]为甲方，坂本寿一为乙方，甲乙双方就左列飞行教授事宜缔结契约。

一、学生人数为十人以上，至每个学生学习飞行技术至毕业为止，甲方支付乙方学费每人一千元；教授期，从开始教授之日起满六个月。但教授期间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飞行机借用、机体的整理修缮、飞行练习上需要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二、费用支付方式如下：

甲、教授开始时支付费用五千日元；

乙、教授开始后满两个月，学生达到相当成绩时再支付两千五百日元；

丙、教授开始后满四个月，学生达到更高成绩时再支付两千五百日元；

三、教授期间

乙方保证甲方学生掌握飞行技术，若期满以后学生尚未达到十分技术（但因学生个人先天未成熟的例外），乙方有继续教授的义务，并承担一切所需费用。

四、甲方向乙方提出到中国内地出差时需要双方同意，并支付报酬。

五、乙方预定将应甲方要求到中国从事航空事业。

六、对本契约当事者一方不履行契约的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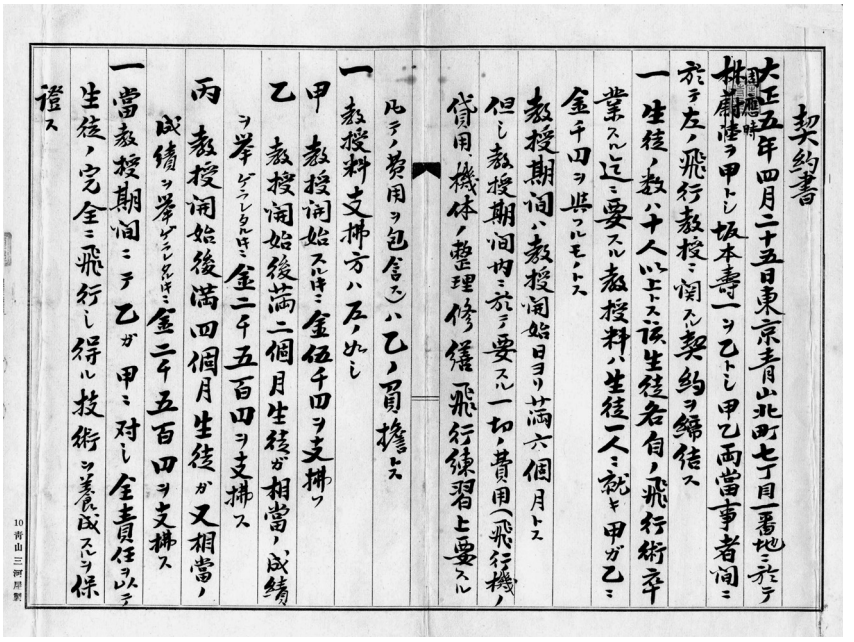
本契约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周应时（签字盖章）

坂本寿一（签字盖章）[2]

[1] 原件上甲方原标为“林蔚陆”，后删除，换以“周应时”。时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的办公所在寓所对外挂牌即“林蔚陆”。

[2]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案号393—10。原件为日文，承蒙久保田文次先生校译。



契約書

大正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東京青山北町七丁目一番地ニ於テ
林蔚（周應時）陸ヲ甲トシ坂本壽一ヲ乙トシ甲乙両當事者間ニ
於テ左ノ飛行教授ニ関スル契約ヲ締結ス

一 生徒ノ数ハ十人以上トス該生徒各自ノ飛行術卒業スル迄ニ要スル教授料ハ生徒一人ニ就キ甲ガ乙ニ金千円ヲ與フルモノトス

教授期間ハ教授開始日ヨリ満六個月トス

但シ教授期間内ニ於テ要スル一切ノ費用（飛行機ノ貸用、機体ノ整理修繕、飛行練習上要スル凡テノ費用ヲ包含ス）ハ乙ノ負擔トス

一 教授料支拂方ハ左ノ如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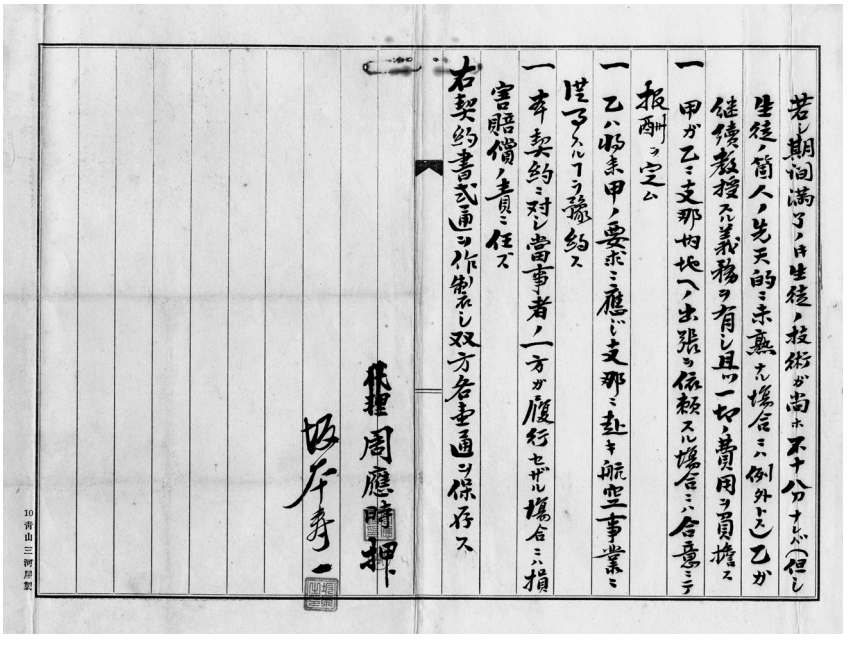
甲 教授開始スルトキニ金伍千円ヲ支拂フ

乙 教授開始後満二個月生徒ガ相當ノ成績ヲ挙ゲラレタルトキニ金二千五百円ヲ支拂ス

丙 教授開始後満四個月生徒ガ又相當ノ成績ヲ挙ゲラレタルトキニ金二千五百円ヲ支拂ス

一 當教授期間ニテ乙ガ甲ニ対シ全責任ヲ以テ生徒ノ完全ニ飛行シ得ル技術ヲ養成スルヲ保證ス

10 青山三河屋製



若シ期間満了ノトキ生徒ノ技術ガ尚ホ不十分ナレバ（但シ生徒ノ箇人ノ先天的ニ未熟ナル場合ニハ例外トス）乙ガ継續教授スル義務ヲ有シ且ツ一切ノ費用ヲ負擔ス

一 甲ガ乙ニ支那内地ヘノ出張ヲ依頼スル場合ニハ合意ニテ報酬ヲ定ム

一 乙ハ将来甲ノ要求ニ應ジ支那ニ赴キ航空事業ニ従事スルヿヲ豫約ス

一 本契約ニ対シ當事者ノ一方ガ履行セザル場合ニハ損害賠償ノ責ニ任ズ

右契約書式通ヲ作製シ双方各壱通ヲ保存ス

代理 周應時 押

坂本寿一

10 青山三河屋製

周应时与日本飞行家坂本寿一在东京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签订的“契约书”

从这份“契约书”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孙中山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与坂本寿一接触并商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创办一所飞行学校。作为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周应时是代表孙中山签订这份契约书的，他后来成为航校首批学员之一，协助坂本寿一创建航校。第二、中华革命党是花了重金聘请坂本寿一等来帮助培训飞行人员的（笔者按：这笔钱由梅屋庄吉资助）。第三、孙中山当时已有邀请坂本寿一到中国协同作战，并为创建中国的航空事业服务的打算。

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反袁斗争的紧张时刻，用一大笔资金创办一所飞行学校？它的意义是什么？学界尚未有专文对此作详细论述，本文拟就此做一探索，以抛砖引玉。

一、飞行学校的创办是孙中山创建中国空军队伍、实践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开端

孙中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了第一架飞机，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他敏锐地意识到飞机未来在军事、交通、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将来世界中，无论为军事，为交通，为学术，为经济，均将以航空为唯一利器。至于吾国以面积之大，交通之难，各地政情民风之殊异，更非藉航空之助，不足以促成统一。”[1]1910年11月初，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收到了美国军事学家咸马里寄来的其刊登在《哈泼周刊》上的论文——《飞机在战争中的用途》。孙中山阅读后给他回信时说道：“至于你对飞机在战争中用途的见解，我已一再拜读，至为赞佩。你的所有论证均极正确。我完全同意你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但在第二部分‘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你忽略一事：飞机和飞船（可操纵气球）能作极好的摄影，有助于指挥官准确判断敌情。”[2]

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同时，就一直在思考让这项新科技成果应用到中国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问题。当时他就曾指示旅美同

[1] 戴传贤：《法国航空现状序》（1937年5月31日），《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二册，台北，1965年11月版，第1330页。

[2] 《复咸马里函》（1910年11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版，第490页。

盟会抓紧时间，组织有志青年学习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技术，以便日后为祖国服务。1910年3月檀香山同盟会分会成立，孙中山鼓励分会的同志筹办中华飞机制造公司；1911年5月孙中山在给华侨飞行家李绮庵信中说："飞船习练一事，为吾党人才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不独暗杀已也。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1]之后他又在致旅美同志的信中说："阮伦兄等谋设飞船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家出力，幸甚。"[2]1911年1月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在美国奥克兰作飞行表演，孙中山当时刚刚抵达旧金山，闻讯后立即赶到奥克兰观看，并即席发表演讲。他希望冯如能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不久冯如毅然回国准备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但不幸在1912年8月在广州进行飞行表演时失事逝世。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为增强革命力量，孙中山号召美洲华侨出钱出力，组建飞行队回国参加革命，得到华侨的支持。他们共捐款购买了6架飞机，组成了旅美华侨革命飞行团回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非常重视这支旅美华侨革命飞行团，特地拨南京演武厅之地为飞机场，任命李绮庵为飞行队队长。

飞机的发明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飞行热潮，但飞机还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大部分还只是在进行飞行表演，实际使用很少。孙中山当时看到了飞机未来发展的前景，但他对飞机能否运用到军事上还是存有疑虑的，认为条件并不成熟。1911年9月14日孙中山在复萧汉卫的函中说："承问飞机一事，此事当无碍于各种方面，但以吾党所欲求以发难者，尚不敢望此耳。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惟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为发难之用，是犹凶年欲食肉糜之类也。如（朱）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3]当时各个国家的一些军事统帅对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也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飞行对军队来说没什么用。

---

[1]《复李绮庵函》（1911年5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1页。
[2]《致旅美同志函》（1911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3页。
[3]《复萧汉卫函》（1911年9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38—539页。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作为新的战争武器首次出现在了战场上。当时飞机在战场上主要是进行空中侦察，飞机上没有安装武器，有的飞行员就自行将手枪等武器带上飞机向对方射击，由于没有固定装置，这些武器并不能发挥作用。直到有一天，法国的一位飞行员将一挺机枪带上飞机，沿飞行方向进行射击，结果将一架德国飞机击落，从而立即引起各国重视，他们纷纷开始研制军用飞机。歼击机、轰炸机的出现使战争由此从平面转向立体，空中作战思想开始在军队统帅的头脑中产生。1917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成立，空军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策划反袁斗争，他非常关注世界大战的战况，飞机在这次战争中显现的优势，使孙中山对其在军事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也应该是促使他下决心创办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14年12月制定的《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首次正式单列飞机项目，明确要在海军部下专设飞机科，负责关于“飞船、飞艇之编制、配备”；“飞船、飞艇之制造、修理、购买”；“飞船、飞艇之调查、研究训练、奖励”等事项。[1]同时，孙中山也将创办飞行学校正式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有了近江飞行学校的创办。

近江飞行学校的创办，不仅是孙中山为开展第三次革命的需要，也是孙中山为未来创建一支中国空军队伍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二、孙中山希望飞机能在开展反袁武装斗争中发挥它出奇不意的作用

1913年，为了捍卫共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不久便由于力量悬殊而失败。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避走日本，但他并未泄气，准备重振旗鼓领导革命党人开展第三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

[1]《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1914年12月改订），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页。

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1]他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全国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1914年11月18日，孙中山召集居正、胡汉民、丁仁杰、田桐、周应时、许崇智等人分析形势，以制定新的革命计划。

孙中山明白他面临的对手是拥有军事实力又得到西方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因此除了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体国民共同讨伐袁世凯外，从军事上作好积极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1915年夏孙中山组建了中华革命军，分别任命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总司令，随即便派他们回国组织开展武装反袁斗争。由于袁世凯握有重兵，要取得起义的成功，把握并不大。这就坚定了孙中山应该创办一支自己的飞行队伍，孙中山期望运用未来战争中的新型武器——飞机，来增强革命军在战场上的优势，为此孙中山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1．筹措资金购置飞机，以备军事之用。

孙中山要求海外同盟会支部积极动员会员出钱出力购置飞机，并亲自联系落实。1914年11月孙中山致函美国大银行家戴德律说：“我此刻急需用钱。你能否立即提供五十万美元以上的一笔现金？如能得到这笔款项，我尚能把握时机在今年或明年初采取一次成功有望的行动。如果你能为我筹得这笔款子，请代为购买至少十架最新式的飞机并立即运交马尼拉的古恩上尉（Capt. Tom Gunn）。如果不能购到飞机，则请购买那么多的发动机（至少一百马力）和必要的材料与配备。”[2]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决定返回国内亲自指挥反袁斗争，回国前他又屡就购买飞机事宜致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1916年3月21日电谓：“请将存款尽买百马力以上适军用之飞机十数台，速付来。并着能飞之同志及林森、邓家彦等回来。”[3]1916年3月25日孙中山又复函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悉。机价太贵，可否改买百六马

[1] 俞辛焞、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8页。
[2]《致戴德律函》（1914年1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37页。
[3]《致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1916年3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52页。

力之加的士机？价约美金万元，因机以多为妙。”[1]1916年4月9日电谓：“飞机寄时用Osaki Ukitern名义，并电告船名。如有款，请多购百五以上马力发动机寄东，装机体较廉。美、加同志曾习军操决心效力者，请资遣先来东。”[2]1916年4月22日电谓：“时事日非，袁党以假独立抵制民党，文非亲入内地，恐吾党不能造大势力，故决意廿七回国。飞机及各同志速回。”[3]

1916年春孙中山在就陈中孚报告关于购买日本飞机事所作批函中说：“此物甚急用，望查明何式，并马力如何，价钱如何，即复。”[4]

从上述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为了让第三次革命能多一分必胜的把握，迫切希望能尽快拥有一支自己飞行队伍的心情。他要求海外同盟会支部尽快落实购置飞机事宜，而且越多越好。

2. 抓紧培养飞行人才。

由于飞机问世的时间不长，会驾驶飞机的人才奇缺，因此光有飞机还不行，必须要有一支飞行员队伍。除了在海外动员、招募爱国的飞机驾驶员回国效力外，加紧培养革命党人自己的飞行人才是孙中山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随着反袁斗争有利时机的到来，孙中山感到创办飞行学校，培养航空人才，为军事之用已刻不容缓。1914年8月2日，他在复伍平一的函中说：“飞行学校事，当竭力促成之，而目前训练尤不可缓，盖时局正佳，飞机之用即在目前也。尚祈准备一切，以备军用，是为至祷。”[5]

得知孙中山决意创办飞行学校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表示愿意承担创办学校的费用。1916年2月6日，梅屋庄吉将日本著名航空工程师兼飞行员坂本寿一介绍给孙中山。坂本寿一1890年出生在日本山口县柳井，1907年于山口县立工业学校毕业。1908年到美国洛杉矶州立工业学院汽车系留学，毕业后在伏特汽车厂工作，但他对飞机有浓厚的兴趣，曾自制了一架三十匹马力引擎的单翼飞机，后进入

[1]《复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1916年3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54页。
[2]《致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7页。
[3]《致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1916年4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76页。
[4]《批陈中孚函》（1916年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5]《复伍平一函》（1914年8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06页。

查·卡奇斯飞行学校学习并取得了国际飞行执照。孙中山很高兴认识坂本寿一，两人用英语交谈，非常投机，孙中山要求坂本寿一“务必给我党当老师”[1]。多年以后，坂本寿一回忆说：当时“与我的飞机论共鸣的人，继梅屋先生之后，只有孙中山先生。”[2]在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坂本寿一频繁地到东京府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宿109番地的中山寓拜访孙中山，经过19次商谈和5次书信往来，创办航空学校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孙中山在启程回国前委托周应时与坂本寿一正式签订了建校协议书。

三、飞行学校在武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紧张的筹建，1916年5月4日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正式开学，校址设于滋贺县近江八日市町，学员多从华侨和留学生中招收而来。当时，有100多名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华侨和留学生报名，后录取了夏重民、周应时、简方杰、刘季谋、姚作宾、胡汉贤、马超俊、陈律生、曾更谟、苏玮鲲、李文耀等47人。[3]其中飞行班30余人，机械班10余人。周应时、夏重民负责学校事务工作，梅屋庄吉负责管理工作，坂本寿一负责教学工作。

航校有三架飞机，一架是旅美华侨捐赠的寇蒂斯詹尼教练机，一架是坂本自制的，另一架是由梅屋租来的“剪风号”飞机。飞行教官除了坂本寿一外，还有星野米藏、立花了观、尾崎行辉等。学校开设的第一堂课是自行车训练，以训练学员们的平衡技巧。同时开设的课程还有飞机构造、发动机、电器、飞行原理等，以及滑行训练等。由于孙中山已于4月27日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启程回国，领导反袁斗争，坂本寿一便定期向梅屋庄吉汇报训练情况。[4]

航校开学一个多月后便传来东北军攻战济南受挫的消息。孙中山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认为：“今日如欲挽救南方独立各省之

[1] [日]车田让治著：《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东京，1979年版，第306页。
[2] 同上，第306页。
[3] 俞辛焞、熊沛彪著：《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6页。
[4] 《梅屋庄吉文书》，小坂文乃藏。

危急，舍重新建立巩固之实力外别无良策。山东本为我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且有铁路、海运之便，如能在山东建立二个师团以上主力，则山西、陕西、河南各省必起而与之呼应。于是，则向北可攻取北京，向南可促进长江流域各省之豹变。”[1]1915年11月他派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亲赴青岛指挥起义，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共拥有兵力一万三千人。1916年2月东北军发动起义，不久便占领了周村、昌乐、高密、潍县等十多个县城。得此消息后孙中山非常高兴，4月4日复函居正，要求他全力以赴乘胜攻占济南，因为“占（领）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大约得济南，则两师之军械，一二百万以上之现款，俱可于此间筹取，持此以往，足能号召天下，幸勿忽视。”[2]之后东北军于5月15日、25日和6月4日组织力量三次围攻济南，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进攻受挫。孙中山一方面抓紧筹款购置武器运往前线，同时派夏重民带领华侨敢死队回国赴山东潍县参战，（笔者按：该校后改编为“东北军华侨义勇团”，由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直接领导）；另一方面孙中山决定启用飞机来助战。1916年5月20日，东北军顾问萱野长知从山东发电报给梅屋庄吉询问道：“将飞机立即送往此地（山东）就地训练为何？”[3]梅屋庄吉接到电报后说服坂本寿一将飞行学校搬至山东。6月7日孙中山发电报给居正，告之“飞行家尾崎同廖国仁、谢崧生赴潍，与兄商飞行事。”[4]

7月2日，坂本寿一率飞行学校师生100多人，携飞机及一批设备抵达青岛，随后迅速在潍县城外建设道路，修建飞机场。飞行学校搬到山东后更名为“东北军华侨义勇军飞机队”。飞行队有3架飞机，分为3个飞行小队，每队有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飞行队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原飞行学校设置的课程训练。[5]蒋介石当时在东北军任参谋长，他在日记中曾记下他所看到飞机训练的情形，“四日，

[1]《致田中义一函》（1916年5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95—296页。
[2]《复居正函》（1916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2页。
[3]《梅屋庄吉文书》，“萱野长知致梅屋庄吉电”，小坂文乃藏。
[4]《致居正电》（1916年6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02页。
[5]叶介蒲：《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文史精华》2007年，第11期。

代理总司令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飞行机试验活走。”“七日晴，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飞高约八百米，突。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之久。第一师师长亦入场参观。”[1]

航校飞行队到达潍县后，不久即参加攻占济南的战斗，为了瓦解敌军军心，飞行队飞往北洋军上空，撒下了一万多张传单，向敌军宣传“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并告诫“速速投降！否则要以炸弹攻击。”[2]当时没有飞机专用炸弹，飞行队搜集了装“三炮台”外国香烟的空铁罐，装上炸药和雷管，每次轰炸时由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目标，负责投弹的人坐在后舱点燃导火线，然后用手投向轰炸目标，尽管这些炸弹的威力并不大，但由于北洋军第一次见到飞机投掷炸弹，吓得丢枪弃械溃不成军，大振了中华革命军的军威。坂本寿一后来回忆道：“孙先生对于利用飞机发挥战斗力的设想非常赞成，乃邀请我带飞机参战，我痛快承诺，便驾了飞机到达潍县，当地民众由于第一次见到飞机，大加哄动，都说‘神仙来了’！敌方对于这种空袭，好像是有了反应，他们派遣军使前来拜托——‘不管怎样，就只有一个请求，请不要再从飞机上扔炸弹下来’。”[3]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革命军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后由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7月25日孙中山通告各地中华革命党：“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4]经与北京方面谈判，9月决定解散东北军。孙中山原打算将航校迁到杭州，但因条件不具备而未成功。北京政府派曲同丰到潍县改编东北军时，试图将华侨义勇军飞机队全部设

[1] 见“蒋参谋长日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案号126—16。
[2] [日]车田让治著：《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第318页。
[3] 转引自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
[4]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33页。

备及人员，调往北京南苑，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按照孙中山电示：航校拒绝了北京政府的邀请，就地解散，3架飞机寄存青岛。1916年11月15日航校正式宣布解散。

四、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对孙中山创建中国航空事业的意义和作用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虽然只存在了短短6个多月，但它却是孙中山为发展中国航空事业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航校飞行队参加的攻占济南的战斗，是革命党人首次将飞机运用到战场的一次实战演练，虽然飞行队当时并没有什么战术，投掷炸弹技术也不高，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队在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为今后飞机配合革命军作战提供了经验。

第二、飞行学校的创办为孙中山实践他的航空救国思想，积累了经验，为未来培养、建立一支中国的空军队伍，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打下了基础。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航校不得不解散，但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创建一支空军队伍的计划，他随即指示杨寿彭要妥善保管好飞机，以便将来之用。他说："至飞机则务请尽力保全，勿令有损失。飞机存仓，用尾崎名义，将来有无窒碍？能否取出，另用兄或他人名义存放？请妥筹电示决定，至要至要。"[1]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后即再次把航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在大元帅府设立了航空处；1919年，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组成了以杨仙逸为总指挥的"援闽粤军飞机队"，配合"援闽粤军"作战。1920年9月孙中山还亲自指挥飞机轰炸盘踞在广州观音山的桂系叛军，令叛军闻风而逃。

1920年11月，孙中山再次回粤组织大元帅府时，又设立航空局，任命朱卓文为航空局局长，下设两个飞机队，飞机队在配合孙中山北

[1]《致杨寿彭函》（1916年9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65页。

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力地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为了能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1920年底，孙中山又派杨仙逸出国筹款购买飞机，并招募航空人员，组成一支新的飞机队。1922年12月6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设立航空局，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接着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由杨仙逸兼任厂长。孙中山对飞机的制造工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经常携夫人宋庆龄亲临飞机制造厂，鼓励职工们努力工作。当时的广东飞机制造厂，不论厂房、工具等设备都十分简陋，又缺乏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但在孙中山的关心下，杨仙逸信心十足地领导大家一起投入研制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制造出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后来就以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名字“乐士文”（又译“罗莎蒙德”）命名，孙中山与宋庆龄亲自到大沙头机场，参加试飞仪式。1924年孙中山创建了黄埔军校后又在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军事飞机学校（即广东航空学校），飞机学校第一期于9月开学，学生多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送。广东航空学校从1924年创办一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时被接收，共毕业了8期学员，培养训练飞行人员500多人，涌现出许多人才，为建立中国的空军队伍，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飞行学校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不仅是一位善于学习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成果，具有卓识远见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善于学欧美之长，以敢于赶超欧美的精神学习、运用最新的科学发展知识的实践家。飞机是在1903年发明的，1914年才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1916年孙中山就在日本近江创办了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空军队伍，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孙中山也为之感到自豪。1922年10月他在一位有志于航空事业的华侨的来函上批示说：“此间不日当开设飞行学校，如欲专飞机，请即回国便可，现时已得有高等飞机师，与美国无异”。[1]1924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赶超先进国家。他说：“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长，然后才

[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第1530页。

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很难，是不易学的。不知道外国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他们最新的发明是飞机。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飞上天，飞上天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中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到，其余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1]。

孙中山为创建一支优秀的空军队伍，使中国的航空事业能跟上世界航空发展的步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愧为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开创者。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1月至8月），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第478页。

宋庆龄：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盛永华

[内容提要]

研究孙中山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不可不研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孙中山的后期活动能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支持与影响，是这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她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赋予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力。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和革命不同阶段的津梁和纽带，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遗产和凝聚力。

[关键词]

宋庆龄　孙中山思想与事业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同时也是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忠诚守护者。

研究孙中山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不可不研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支持与影响。孙中山的后期活动能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因素固然是多发面的，而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支持与影响，是这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孙中

山的事业。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她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赋予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以新的内涵和新的生命力。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和革命不同阶段的津梁和纽带，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参加辛亥革命，是宋庆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的关键性的一步。1913年，这位年轻的美国留学毕业生返回祖国探亲，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在辛亥革命高潮已逝的革命尾声中，在孙中山极度困难、前途未卜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伟大事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中坚实的第一步。

（一）孙中山的助手与伴侣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共和制度的主要缔造者、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袁世凯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归来的宋庆龄，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由父亲宋耀如亲自引领，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在革命的低潮中，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刻，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给他以坚定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和战友，进而成为孙中山终生不渝的伴侣。他们互相砥砺，共同探索，一起与时俱进。

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学生、助手、战友，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十年征程。这是“艰难顿挫”的十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的大潮中奋进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当然更多地是接受孙中山的指引。但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是单向的，学生对导师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宋庆龄继承、捍卫和发扬孙中山的革

命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她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她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她无愧于她的丈夫、师长、战友和同志——孙中山。

大致说来，从1913年秋宋庆龄开始协助孙中山工作；1914年9月正式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至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的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在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时期；

从“二次护法”失败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上下求索，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求索拯救祖国的新道路，成为孙中山晚期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后至1927年8月出国访苏前，宋庆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砺，积极团聚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坚决维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1927年8月以后，宋庆龄旅居欧洲，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历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她捍卫发展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以下简称为“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以此为旗帜，召唤国内各阶层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朋友，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懈奋斗。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并肩战斗时，形势极为严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为袁世凯所窃夺，“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昙花一现。再次作为流亡者，孙中山陷入极端痛苦和困难的境地：“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1]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

[1]《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9页。

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1]他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前途也难预卜。宋庆龄这时的到来，使孙中山在顿挫中受到鼓舞，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籍。

宋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合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前夫人卢慕贞是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承担了孙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后果——抚养孩子，侍奉长辈，担惊受怕，颠沛流离……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孙中山的事业，更不能在事业上直接给予帮助。而宋庆龄则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及至大学毕业，马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给予具体的支持和帮助，终生义无反顾。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2]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她认真阅读各种材料并加以分析对比，进行反复的思考。据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二的谋反了。”[3]宋庆龄虽然在大洋彼岸，心灵却与祖国息息相通。乃至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将她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文章讴歌了孙中山领导的事业和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欢呼“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

[1] 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160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本。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3]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澳门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

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1]宋庆龄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2]，表达了她对祖国殷切的期望和深挚的爱。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压迫导致了革命”；“合理性”——“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剧变的形势的推动下有了飞速的发展——还在五个月前，她曾在校刊上发表过另一篇政论《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文章虽然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并且认为“‘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3]文章充满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不合实际的幻想。前后两文相较，说明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使宋庆龄的思想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承认革命的合理与必然，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宋庆龄1913年8月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日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的父母时，她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宋庆龄回国与家人团聚仅半个月，即跟随父亲和姐姐从神户移居东京协助孙中山工作。她几乎每天都会随父亲和姐姐往访孙中山，每次在孙中山处短则二、三小时，长则半天甚至大半天。有时一天会去两次。[4]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为筹组中华革命党以期发动武装讨伐袁世凯的“三次革命”，紧锣密鼓地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反复商讨，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会见来自国内的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

[1]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转引自《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2] 同上。
[3]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威斯里安》1911年11月号；《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卷，第65页。
[4]《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49—852页；《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卷，第95—97页。

氏父女除担负繁重的联络工作外，有时也参加会见与秘商。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工作的宋庆龄大大加深了对孙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业的理解。1914年9月，当宋蔼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正式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一名战士。不久，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与孙中山结合，成为他忠诚的伴侣。

宋庆龄忆述这段时期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时说：

从我的父亲与孙中山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说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1]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给他以慰籍，同时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这桩婚姻不能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当时对于中国来说最先进的思想——西方的民主主义。宋庆龄后来回忆自己在美国受教育的情况时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到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2]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她的好友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充满风趣和幽默的口吻来表达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

[1]《宋庆龄自述》，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一期；《致白塞脱》（1921年4月）附注，《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宋庆龄自传》，光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38页。

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1]宋庆龄忆述她的工作任务时说：“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2]当然，在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十年间，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宋庆龄不仅对孙中山有着深挚的爱情，为了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她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孙中山深深体会到宋庆龄对他的爱与支持，他深情地题赠宋庆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而宋庆龄在她的晚年，为感谢友人赠送鲜花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十周年而致友人的信中说：“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3]

（二）孙中山的学生与战友

尽管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了她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忱，但她对中国真正具体的了解，还是在与孙中山结婚以后。宋庆龄曾这样表述过：“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4]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理解很抽象。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这样描述她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5]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

[1]《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2]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3]《致廖梦醒》（1975年3月15日），《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4]［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5]《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英文版）1941年2月号。

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可是在军阀割据及至蒋氏政权建立以后，宋庆龄亲身体验到在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2]

当然，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旧中国的真正了解，主要来自于革命实践。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加强，军阀混战，生产凋敝，民生涂炭的悲惨状况。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她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诸役，革命的进程留下了她的足迹，同时开阔了她的眼界，加深了对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孙中山对宋庆龄极为信任，让她负责密电码的翻译和保存、处理机要文件、来往函电和对外联络的工作。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当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革命实践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当孙中山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狗咬狗”的战争，认为严守中立最合符国家利益的时候，宋庆龄在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信中，抨击了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11月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0、369页。

[2]《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20页。

段祺瑞之流为获得日本的借款而决定参战的卑鄙行径，认为“有很多自私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正竭力把中国投入欧洲大战。”[1]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以后，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与苏俄联系和学习苏俄的经验作好准备。他们设法与列宁取得联系。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2]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及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3]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是，当她还是孙中山的学生和秘书时候，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溶铸其中。她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孙中山思想的变化而发展。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介绍而窥见一斑：“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说到孙中山经常发表讲演时的情形，她说：“那都是他即兴讲的。讲话内容完全是根据政治局势和听众而定。他在讲台讲演时，我常常像猫一样坐在他旁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4]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在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从各种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的考虑，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那么，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跃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

[1]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3期；《致梅屋庄吉》（1917年4月2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1—23页。
[2] 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文件》，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3]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9—210页。
[4] 《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9—110页。

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1922年被孙中山称为“祸患生于肘腋”的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极度悲愤。但物极必反，这次失败成为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的转折，促使他不得不考虑“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成为促使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剂”；也成为孙中山、宋庆龄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契机。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优雅的妇女，内心却无比坚强。她深知当时中国不可没有孙中山，所以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及至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1]以免落入叛军手中。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宋庆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事实上，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动派的威胁。

孙中山不愧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于一生为“改良祖国、拯救同群”而寻求支持者和同盟军的孙中山提供了新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面对20世纪初，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度的关注。他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同盟军。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受帝

[1]《广州脱险》（1922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5页。

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战争。”[1]为此，他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及相应的战略策略，工人运动由此而蓬勃开展，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已自觉登上历史舞台，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将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代之。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并且在斗争的实践中愈益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列宁一样，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和他战友们也给予肯定的评价。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一九一八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她还指出：“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六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2]孙中山毕生期望找到帮助中国革命的“拉斐德”，终于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找到了。

在促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面，宋庆龄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3]1920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访问了孙中山。但很遗憾，这次会见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1921年冬，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和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

[1]《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7页。
[2]《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1956年11月8日），《宋庆龄选集》，第381—382页。
[3]《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5页。

表马林，商谈多次。他们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级的政党的建议——即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同盟的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同年夏，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以苏俄代表身份在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十余次，再次谈及国共合作。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认为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1]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从孙中山方面来说，“感觉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2]就在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来到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她后来回忆道：“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以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3]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4]可见孙中山、宋庆龄与李大钊关

[1]《先驱》第9期。
[2]《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第465页。
[3] 同上。
[4] 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政干部文摘》2001年第8期。

系的真诚亲密。

孙中山、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继续总结和探索。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回忆1923年2月的某一天，他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时，忆及“宋庆龄同志也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她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1]说明在酝酿国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还在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2]正是孙中山、宋庆龄从爱国主义的基点出发，经过痛苦的探索，取得了这极其深刻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3]通过他们多次的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一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当时真正彻底并始终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党员并不很多。就是在孙中山的亲密助手中，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虑。廖仲恺、宋庆龄是寥寥者中最坚定的两位。宋庆龄对于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三大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

[1]《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2]《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3]《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第462页。

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1]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2]

孙中山在制订三大政策时，压力重重。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民党命运的重大决策，他当然会思虑再三，内心也会有矛盾。这时，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涨，也体现了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升华，他们的思想适应历史的潮流，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进步性。

（三）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忠诚守护者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宋庆龄在廖仲恺牺牲以后，能坚定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继续与时俱进，实与她同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一致并参与制订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宋庆龄很快从失去丈夫与导师的悲痛中站起来，积极投入因国共合作而高涨的国民革命：她支持五卅运动；在国民党“二大”等一系列

[1]《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第465—466页。
[2]《宋庆龄纪念集》，第222页。

会议上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她大力推动妇女工作，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积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但是，就在国民革命高涨的时候，反革命的暗流也在潜滋暗长，反对孙中山手订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亦从幕后策划而逐渐变成公开进行。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被暗杀，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暴力对付左派的先声；“西山会议”使国民党原来潜在的分裂危机变成公开的行动；“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分共”、反共的信号。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政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的重担放到宋庆龄和她的战友的肩上。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之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相比，她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晚得多，也比他们年轻得多，但由于她忠诚于革命的原则，对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对革命事业充满献身精神，使她在国民党内和全国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何香凝在上海人民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致词时称颂宋庆龄“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1]这是国民党左派对宋庆龄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她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以及她对孙中山思想阐发的权威性的完全认可。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表现在她坚决支持和参与孙中山捍卫共和的斗争，促成孙中山后期思想的转变这两个方面；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则表现为把握孙中山思想的革命精髓，通过对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阐发，维护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纯洁性，对各种歪曲孙中山思想的观点进行无情的批判。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她的作用荫蔽在孙中山的光辉之

[1]《双清文集》下卷，第8页。

下，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作为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旗手，在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斗争中，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她仍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她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学说，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贯联起来，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生命力。

在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斗争中，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灵魂和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赋予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宋庆龄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不可分割。而在当时的实际斗争中，她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施。她视三大政策为新三民主义的灵魂，是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是实现新三民主义的途径，是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体现。她多次强调“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1]；“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2]“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3]孙中山“制订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4]宋庆龄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她的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仍多次指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5]这样，宋庆龄始终把握住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的背叛，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其次，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涵。

---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19页。
[2]《中国是不可征服的》（1937年8月），《宋庆龄选集》，第116页。
[3]《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第27页。
[4] 同上，第25页。
[5]《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第461页。

（1）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第一面战斗旗帜。在孙中山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进步，从旧三民主义时期对内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但孙中山始终对帝国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没能提出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反帝的旗帜，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联俄”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而在实践中，她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与深化。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宋庆龄第一次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惨案”发表谈话时，便指出要以“五卅运动”为契机，“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并指出与帝国主义“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在斗争中“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段……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1]表达了她与帝国主义绝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民众联合的思想。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之后，宋庆龄已经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2]这是她对民众联合所依赖的阶级基础的明确表述。在以后几年中，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又有了本质的飞跃，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自由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

稍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扩大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肆虐，宋庆龄呼唤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3]宋庆龄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充实以坚定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内涵，团结国内外一切爱国和友好人士，参加到中国共产党倡议和领导的抗日民

[1]《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8页。
[2]《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18页。
[3]《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33年8月6日），《宋庆龄选集》，第82页。

族统一战线中去。而她自己则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领导人，为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懈斗争。

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努力建立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以“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1]达到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殖民主义，彻底铲除民族压迫，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就是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完全一致，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特点。也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大发展。

（2）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没有使孙中山理想的共和国得以建立，却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蒋介石独裁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敏锐地察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并没有实现。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要不要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如何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怎样才体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宋庆龄忠于孙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的理想。她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同时又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重大发展：

首先，宋庆龄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来衡量民权主义是否得以实现。因此，她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她指出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应该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2]这种观念，显然是对孙中山晚年曾经赞扬的“人民独裁”论点的发展。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他们只能对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允许进行的

[1]《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第86页。
[2]《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第25页。

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1]受西方民主熏陶成长的宋庆龄对于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2]孙中山理想中的新式的共和国“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3]

其次，宋庆龄肯定工农大众以革命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真正的民主权利，才能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得以实现。这是对孙中山期待在民国成立以后的“民权运动之方式”，主要是采取“五权分立为原则”的思想的重大发展。宋庆龄认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4]“为了民主权力，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5]。针对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诬蔑，宋庆龄极为明晰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6]

以革命武力去实现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权，是宋庆龄给予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所增添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的内涵。从而使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阶段的时候，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宋庆龄对于民权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3）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主要归结为土地与资本问题。鉴于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民生主义，则更着重于土地问题的解决，给“社会革命”赋予了更深广的内涵。

---

[1]《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2年12月），《宋庆龄选集》，第60页。
[2] 同上，第63页。
[3]《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第90页。
[4]《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选集》，第53页。
[5]《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2年12月），《宋庆龄选集》，第63页。
[6]《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第88页。

由于国共合作而高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归于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项也没有实现，宋庆龄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1]、三大政策被彻底抛弃：“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2]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由帝国主义支持的新军阀，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蒋氏政权，即反对“三座大山”。

在革命的新时期，宋庆龄不得不重新考虑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权以及力量的配置等问题。在“宁汉合流”的前夜，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表示与国民党右派决裂。在此后的两、三个月中，宋庆龄多次发表声明和讲话，阐发民生主义的要义。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旗帜，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宋庆龄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作为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总纲，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3]但此时宋庆龄所指的社会变革，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所指的社会变革，含义已不完全相同。

孙中山为使贫困落后的祖国臻于富强，并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提出了民生主义，用以预防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希望采取“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主要手段，医治资本主义的溃疡，并求“毕其功于一役”，使得社会公正。但就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还是希望以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的手段，使土地逐步国有，由国家将土地授予农民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改良的办法，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阶

[1]《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18页。
[2]《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第27页。
[3] 同上，第18页。

级基础，因而他从来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之，他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同样，虽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节制资本”比过去给予了更大的注意，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但他也从来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地位与作用。孙中山没有把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同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而宋庆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分割。从而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生主义，使民生主义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而且更富有生命力，成为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对“社会革命”作了新的阐释。她认为：“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她认为首先“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1]。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宋庆龄以最明确的语言提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2]宋庆龄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表明她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何等真切，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准确。

对于革命的主力军，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3]

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宋庆龄在1927年就指出，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

[1]《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第18页。
[2]《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1927年9月6日），《宋庆龄选集》，第31页。
[3]《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选集》，第18—19页。

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活跃。”如果说1927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几年以后,即1933年9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中,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1]“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2]从宋庆龄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我们一方面可以体会她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定,同时亦可发现她思想发展的轨迹。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对民生主义是极为本质的补充与发展,使得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达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成为团结广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宋庆龄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三民主义加以阐发并提出实施的途径与措施。当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后,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被剥夺,她认为当时最必要的是实现“民权”,并创建了“民权保障同盟”;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时,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她领衔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递交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并号召全国人民本着民族主义的原则,同时要求实现“民权”与“民生”,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联合政府,她重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

[1]《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选集》,第87—88页。
[2] 同上,第85页。

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现在是用实际行动来建立民主的时候了”；“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别人民忍受饥饿……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1]

新中国的建立，使宋庆龄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宋庆龄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理解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总的方针和原则”，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及时地补充体现时代特点的内涵。她以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内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新的革命事业中，并为这个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宋庆龄理解的孙中山是：“直到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3]因而她号召人民学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和“不断进步的要求”，[4]为振兴中华而不断奋进。

多年以后，宋庆龄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对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的提问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5]

（作者为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现任中山市文化顾问、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高级顾问、特约研究员）

[1]《关于促进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选集》，第179—180页。
[2]《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第190页。
[3]《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选集》，第466—467页。
[4]《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11月4日），《宋庆龄选集》，第375页。
[5]《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1页。

中国福利会藏英文档案及其价值

沈海平

[内容提要]

中国福利会藏历史档案共202卷，约2万余页，绝大多数为英文。时间跨度从1938至1964年，以20世纪40年代居多。档案内容丰富，有各类会议记录、往来信函、财务与审计报表、物资分配与接收的记录和收据、机构年报、新闻报道、相关机构与人物通讯录、项目专卷等等，大致可分为17大类。从初步整理的情况看，较为珍贵的有三部份：一是宋庆龄、谭宁邦等致相关人员与机构的信函，内容涉及面宽泛，信息量大。二是机构的重要项目，皆独立成卷，详细记录了项目的缘起、起止日期、工作范围、内容及成效，以及重要人物与事件，有助我们了解项目工作的全貌。三是机构年会、主席会议和办公会议的记录，客观记录了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会议的人员，以及宋庆龄与机构对重大工作作出决定的出发点、思路与讨论过程，为我们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重点分析了宋庆龄致捐赠者信的特色，以及宋庆龄1950年致毛泽东的访问东北的报告。

[关键词]

宋庆龄　中国福利会　档案

中国福利会是一个拥有73年历史的机构，它由宋庆龄亲自创办并领导了43年。中国福利会的档案客观记载与收录了该机构重要的文件资料，内容丰富而珍贵。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大部分档案从未被整理过，甚至从未被认真关注过。

2010年，中国福利会启动了会藏档案的系统整理工作，本文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挑选出一些重要内容与线索予以披露，希望有助于宋庆龄研究不断深入，为解开研究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提供线索。

一、会藏历史档案概述

中国福利会在过去的73年里，经历了诸多磨难与变故，其中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数次辗转、搬迁，加上三度改组易名，致使档案无法完整保存。此外，即便当年清晰的文字记载，如今随着当事人的一一离去，也逐渐成为需要考证、推敲的课题。仅以语言为例，当年的档案，今天需要翻译后方能解读。因为，从1938年中国福利会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诞生之日起，到1964年为止，作为机构的档案，绝大多数为英文。

1. 英文档案的形成

中国福利会从1938年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机构。虽然机构名称始终以“中国”打头，办公地点也在中国，但是核心成员来自多个国度。当年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半数是外国人。名誉司库法朗士和名誉秘书克拉克来自英国，宣传委员贝特兰来自新西兰，爱泼斯坦为犹太人，王安娜和魏璐诗为德国人。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总干事谭宁邦与秘书希尔维娅都是美国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会还有两位美籍顾问，一批外籍专家。同时，本会一直与国外诸多机构与国际组织保持长期密切的往来。所以本会无论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财务报表、往来文函等等，一律都是英文，当年留存的档案自然也就全部为英文。在当时，不会使用英文，是无法在此机构工作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福利会的办公语言依然是英语。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福利会的人员结构与工作范围有了很大变化。尽管仍有两位美籍顾问——谭宁邦与耿丽淑，但英文已不再是办公语言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英文历史档案渐渐尘

封，无人问津，且越来越难以解读。

2. 档案整理的启动

2010年，中国福利会启动了整理会藏档案的工作，首先从英文档案着手。先将档案编目，然后将纸质档案输入电脑，使其成为电子文档，同时译成中文，旨在为深入研究宋庆龄及其创办的机构的历史，发掘相关史料。也为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约完成半数以上工作量。整理工作还在继续，任务相当艰巨。

3. 英文档案简述

中国福利会藏英文历史档案，共202卷，所属年代跨度很大，最早为1938年，最晚到1964年。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即1945年底至1950年初居多。档案主要为英文，约2万页。

这部分档案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其中约3 000多页因历年工作需要曾被陆续抽出，节选片断，译成中文，部分被编入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会庆纪念册，部分编入《宋庆龄选集》、《宋庆龄书信集》与《中国福利会志》、《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等，公开出版。其余则不曾被动过。

经编目，202卷档案大致可分为17类，按类别、涉及年份及卷数、页码制表如下：

编目	起止日期	卷数	页数
本会历史资料	1938.4—1958.5	16	662
国际和平医院	1943—1950.10	18	1307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1945.1—1950.11	3	566
老解放区工作	1943.3—1950	28	1428
上海儿童工作	1947—1949	4	188
财务、报表	1941.1—1951.2	7	327
人事、制度	1947—1950	7	649
战灾儿童义养会	1946.10—1951.1	20	1881

年会、年报	1938—1951	13	778
执委及主席会议	1945—1951	10	1242
宋庆龄往来信函	1946—1958	5	494
物资分配收据	1945.8—1949.11	6	738
相关项目合作机构	1941—1957	45	3699
重要工作信函	1945—1951	3	206
工业合作协会	1948.2—1951	2	226
各协作机构通讯录与资料	1946.2—1964.12	5	138
其他	1949—1951	10	450

仅以目前整理的情况，其透出的信息及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蕴藏的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福利会历史以及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二、会藏英文档案的价值

粗略浏览档案目录，至少透露了四方面信息。

首先，从档案的分类反映了该机构工作的范围、内容与工作量。从列表中可知，作为救援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有着惊人的工作量和广泛的关注面。从1946至1948年间形成的项目档案较多也较集中。

其次，从各类档案卷数的多寡可以看出该机构工作的倾向与重点。以卷数为例，由多到少排列依次为：相关合作机构45卷、老解放区工作（又分妇女、儿童、医务、救灾、文教）28卷、战灾儿童义养会20卷、国际和平医院18卷、本会历史资料16卷、年会与年报13卷、执委会及主席会议10卷、财务与报表7卷、人事与制度7卷、物资分配收据6卷、宋庆龄往来信函5卷、各协作机构通讯录与资料5卷、儿童工作(上海)4卷、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3卷、重要工作信函3卷、工业合作协会2卷、其他各类，皆每类一卷，共10卷。

位列第一的当数与各相关项目合作机构的档案，涉及45卷。其次是老解放区与义养会以及国际和平医院的档案。但是，国际和平医院实则也属于老解放区工作，只是当年的档案将其划为两个不同的专

项。如果将老解放区工作与国际和平医院相加，那就位列第一了。可见，与众多机构广泛而密切的合作，是中国福利会很重要的特色与强项。而对老区的全力支持与援助，是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自1946至1949年的三年间，涉及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际救援机构的各种往来文件量相当之大，共有100卷，几乎占档案的一半。

仅从三年时间形成的巨大文档的数量，足以表明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的救济工作项目之多，范围之广，贡献之大。同时反映出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际机构的联系广泛而紧密。

以下是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紧密联系的国际机构的列表。在会藏档案中，皆独立成卷：

美洲

美国援华会

美国援华联合会（团体会员有——美国公益服务会、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美国医药援华会、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美国援华会、美国对华急救委员会、美国教会对华救济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美国委员会等）

中国福利呼吁会

战灾儿童义养会

美国红十字会

美国犹太联合救援会

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

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美国费城医学院

美国康涅狄格州州立学院

加拿大红十字会

温哥华医疗援华会

不列颠哥伦布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

弗农战时救济中国委员会

多伦多妇女进步协会

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

欧洲

英国联合援华会

公益救护队

英国红十字会

中英科学办公室

亚洲

印度国民大会党医疗队

菲律宾救济中国委员会

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

中国红十字会爪哇分会

大洋洲

响应孙夫人呼吁筹赈会

墨尔本维多利亚中华妇女救济委员会

澳中协会

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包括：新西兰公益会、基督教全国协会、新西兰红十字会、新西兰华人联合会、新西兰商会等20多个团体）

新西兰左派图书俱乐部

新西兰内皮尔女子高中宿舍服务联合会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联合国儿童紧急救助基金会

世界卫生总署

国际救济委员会

以上单独立卷的机构中，美国援华会、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

会、中国福利呼吁会以及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卷宗都不少于4卷。

上述机构列表说明：一、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际救援机构交往的广泛性。二、作为救援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惊人的工作量和关注面。三、宋庆龄及其领导下的机构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其在中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四、中国福利基金会赢得了国际援华团体的高度信任。特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援华团体，在保持了长期和经常的捐赠与合作关系中，对宋庆龄领导机构予以充分的认可。

上述国际机构，绝大多数自保盟时期即开始建立联系，持续援助，长期合作，交往密切。正是如此广泛和如此众多机构的支持和援助，使得由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及后继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资金与技术、人员的帮助。成绩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援助战时医疗机构与战灾儿童两方面。

例如国际和平医院的蓬勃发展。国际和平医院从1938年的一所，至1946年发展到8所中心医院、42所分院、11 800张床位和20个流动医疗站的医疗网络[1]。这8所中心医院分别是：第一国际和平医院（延安）、第二国际和平医院（晋冀鲁豫）、第三国际和平医院（晋察冀）、第四国际和平医院（苏北）、第五国际和平医院（山东）、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晋绥）、第七国际和平医院（冀热辽）、第八国际和平医院（中原）。其专门的援助档案就有近40卷。

由此可见，没有广泛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没有长期积极的努力与奋斗，就没有如此杰出的贡献与成果。宋庆龄的崇高威望与其领导机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有影响和号召力的、代表公正与正义的救援团体。

第三，透露出该机构的工作在不同时间段，与不同机构的合作及工作重点。

如战灾儿童义养会项目档案的起止年份主要从1946至1950年，共有20卷。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重

[1] 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庆迁到上海，致力于战后重建工作。国际战灾儿童义养会任命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为该机构的中国代表，开展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项目工作结束。20卷档案中，包括有纽约义养总会来信：聘请谭宁邦为中国分会代表；关于在中国扩展工作；战灾儿童义养会工作提纲；战灾儿童义养会实施办法；义养生儿童名册；审查战灾儿童义养会年度会计报告；调查西安个别义养儿童的报告；有《义养会通讯》，有谭宁邦与纽约总会的来往信函，以及1950年纽约义养总会停拨中国分会经费、义养会会议记录、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义养会情况报告、义养会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关系等文件……20卷档案记录了自1946至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际战灾儿童义养会从合作开始到结束合作的全过程。

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指出“通过与美国一个捐款机构叫做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合作，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了战灾儿童的中国代表。……在全国通过三十几个机构或团体支持了五千个孩子。……当时这些学校或儿童机构很少有旁的经费来源，通过了义养会的帮助它们才得以度过了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1]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 870名。[2]

结合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数极少的5名核心成员中专门设立了义养会干事一职，而基金会的总干事谭宁邦又担任义养会的中国代表的史实，证明义养会项目的确是当年中国福利基金会相当重要的工作。

202卷档案中，儿童工作只有2卷，但却专门单列，且注明是上海儿童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47至1949年，表明宋庆龄在致力战后重建工作中，将在上海开辟新型儿童工作模式作为十分重要的项目。这一点，在会藏档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卷宗中也可得到印证。

1948年8月29日，谭宁邦提交执行委员会一份《上海儿童福利中心员工薪金比例的修订》的提案，请求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3页。
[2]《中国福利会志》，第163页。

上海儿童福利中心员工薪金比例的修订

a. 儿童福利中心的负责人：考虑到项目的拓展和中心的性质的改变——中心已从一个单纯给孩子的阅读项目转变为多方面的儿童活动项目。中心的负责人应当是一位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士。他应具备专门涉及儿童工作的社会工作经验。他还应有一些群众教育培训和管理的经验，尤其是如何推进“小先生”系统方面的。

b. 儿童管育员：我们中心的管育员应是一位专科毕业的护士。她已具有一些社会工作和管理孩子方面的经验。她还应具备开展公共健康卫生培训的能力，而且能够组织健康卫生方面的教育和活动。

由于这些负责人在管理一个中心方面都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他们就应当获得比我们起初想象的要高些的薪金。我们制定的管育员的薪金级差规定应予修改：

建议的薪金修改

	原先	修订后
中心负责人	45~55	60~70
管育员	40~50	50~60
中心的项目人员（不一定是专科毕业）	35~45	40~50
群众教育学校的负责人（依照我们项目聘用而定）		45~55
中心职员	15~20	20~30

负责当地项目的人应有按照薪金规定决定具体人员实际工资的权利。任何新进人员的工资都从最低的起算的这种武断的方法是不公平的，因为两个经历全然不同的人往往做同类工作。儿童福利人员应当比照从初级和中级起始的能力鉴别规定。

由于雇佣人员在不断地增长，和每一个职员签订一份工作协议比较可取，对于人事方面的复杂性而言，这对保护个人和组织双方的权益都好。

上述提案，得到宋庆龄、耿丽淑、鲍威尔等全体执行委员签名同意并获得通过。

此提案的批准，标志着儿童工作者获得专门人才的待遇，保证了他们在机构工作人员中取得较高薪金水准和增资空间，确保了儿童福利机构的骨干人员在时局动乱时期在岗位上保持稳定。

宋庆龄与美国援华会、美国援华联合会、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从合作、密切合作、到分手后促成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成立过程，也都在档案中清楚表明。涉及美国援华会的文档，从1941—1949年，共8卷。涉及美国援华联合会文档，从1947.03—1950.12，共1卷。涉及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文档，从1948.6—1948.12，共1卷。涉及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有4卷，主要时间段从1948—1952年。

第四，凸现出某些团体与个人的重要作用。

在202个卷目中，往来信函以个人名字单独立卷的只有3位：宋庆龄、谭宁邦和马海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为例，虽然标明《谭宁邦国内外往来信件》只有一卷，仅72页，但涉及与他往来的信件，遍及档案各卷，约计90多卷，近3000页。其中他与各合作机构负责人往来信函内容非常重要：有商讨、沟通各类问题、策划合作项目、澄清或明确彼此观点、申请或批准援助项目、邀请或聘请某某人等，特别是几次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准备函及文件……足见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谭宁邦的作用十分重要，而由他出面涉及的工作和项目，范围极广，涵盖的信息十分珍贵，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档案中，标有马海德名字的一卷，名称为《本会驻延安代表马海德函件》，共97页，51封。时间集中在1945.10—1947.3，正处于抗战胜利，保盟酝酿更名并迁出重庆，移到上海的重要时间段内。如此密集的往来信件，且不看文字与内容，仅从时间与频率两点，足以透露出值得研究挖掘的宝贵信息。

三、档案整理过程中的新发现

1．关于宋庆龄致个人捐赠者的信

中国福利会历史档案有一个专卷，全部为宋庆龄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答谢国外捐赠人的信函。从1946年6月至1948年4月，在跨度不足2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向捐助人共发出47封答谢信，分订为两册。

其中，1946年7封，1947年25封，1948年15封。除一封之外，其他答谢信皆已收入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中。

下面是档案中宋庆龄答谢个人捐款信的目录：

1）宋庆龄致杜法尔（Du Val）夫人的感谢信（1946年7月3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394页）

2）宋庆龄给格隆拜内（Grumbine）小姐的感谢信（1946年7月1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396页）

3）宋庆龄致梅格雷尼（Mcgrane）夫人的感谢信（1946年7月1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398页）

4）宋庆龄给斯托特（Stuart）小姐的感谢信（1946年7月2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01页）

5）宋庆龄给布鲁恩（Brown）医生的感谢信（1946年9月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21页）

6）宋庆龄给皮切（Peacher）小姐的感谢信（1946年10月18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34页）

7）宋庆龄给格隆拜内（Grumbine）小姐的感谢信（1946年11月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42页）

8）宋庆龄给皮切（Peacher）小姐的感谢信（1947年2月2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76页）

9）宋庆龄给弗莱明（Fleming）医生的感谢信（1947年4月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89页）

10）宋庆龄给法尔科尼（falconer）小姐的感谢信（1947年4月4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91页）

11）宋庆龄给法尔科尼（falconer）小姐的感谢信（1947年4月23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495页）

12）宋庆龄给弗莱明（Fleming）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4月30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00页）
13）宋庆龄致哈钦斯中学的感谢信（1947年6月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28页）
14）宋庆龄给皮切（Peacher）小姐的感谢信（1947年6月4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1页）
15）宋庆龄给哈勃格（Harburg）先生和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5月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13页）
16）宋庆龄给安德鲁斯（Andrews）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5月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11页）
17）宋庆龄给雷薇丝（Lewis）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6月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26页）
18）宋庆龄给奎丽奥（Qusreau）小姐的感谢信（1947年6月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0页）
19）宋庆龄给吉布（Gibb）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6月9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4页）
20）宋庆龄给弗鲁斯特（Frost）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6月30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46页）
21）宋庆龄给奎丽奥（Qusreau）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6月30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45页）
22）宋庆龄给克劳特（Crouter）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7月28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45页）
23）宋庆龄给匹克（Picker）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8月1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61页）
24）宋庆龄给霍恩（Hoehn）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8月1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59页）
25）宋庆龄给拉弗莱尼德（Loveland）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9月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68页）

26）宋庆龄给怀斯（Wise）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9月1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70页）
27）宋庆龄给罗兰（Roland）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10月13日）
（此信未发表）
28）宋庆龄给埃罗塞（Eloesser）博士的感谢信（1947年11月11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87页）
29）宋庆龄给布鲁恩（Brown）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11月20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88页）
30）宋庆龄致梅格雷尼（Mcgrane）夫人的感谢信（1947年11月29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91页）
31）宋庆龄致维勒里斯（Villoria）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12月11日）
（此　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98页）
32）宋庆龄致古尔德（Gold）先生的感谢信（1947年12月1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00页）
33）宋庆龄致赵（Chao）夫人的感谢信（1948年1月17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14页）
34）宋庆龄致奎丽奥（Queteau）夫人的感谢信（1948年1月21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28页）
35）宋庆龄致香港足球协会秘书的感谢信（1948年2月15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33页）
36）宋庆龄致怀斯（Wise）先生的感谢信（1948年2月26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35页）
37）宋庆龄致赵（Chao）夫人的感谢信（1948年3月5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37页）
38）宋庆龄致切尔（Scheer）先生的感谢信（1948年3月5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39页）
39）宋庆龄致菲妮（Phinney）小姐的感谢信（1948年4月5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69页）

40）宋庆龄致菲兹帕奇科（Fitzpatrick）小姐的感谢信（1948年4月5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67页）

41）宋庆龄答谢伦诺克斯（Lennox）先生和夫人的感谢信（1948年4月1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70页）

42）宋庆龄致温（Wong）先生的感谢信（1948年4月19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77页）

43）宋庆龄致赵（Chao）夫人的感谢信（1948年4月19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79页）

44）宋庆龄致国外朋友的捐款呼吁信（1948年4月19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75页）

45）宋庆龄致汉恩（Hahn）小姐的感谢信（1948年4月22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1页）

46）宋庆龄致斯切夫曼（Schiffman）先生的感谢信（1948年4月24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2页）

47）宋庆龄致雷纳德（Renard）先生的感谢信（1948年4月28日）

（此信收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5页）

尽管上述答谢信几乎已全部公开出版，但由于分别穿插在不同类型的书信中，翻阅时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印象。而在档案中则不同，均集中在一起，标明是宋庆龄答谢个人捐赠者信函，分为两册。从研究的视角，感觉与体会则完全不同。特别是宋庆龄对待捐助人尊重的态度，独特的行文与对文字词汇娴熟的驾驭能力，以及语气表达尺度的把握，让人印象深刻。

值得重视的是，宋庆龄的答谢信并非慈善机构通常惯用的格式文本，而是亲自拟写，一人一信，充满个性，针对性很强。

如，1946年7月3日，宋庆龄致信答谢一位捐了10美金的夫人。虽然这位夫人只捐出10美金，可宋庆龄仅在第一小段中，“感谢”一词接连使用了5个，语气充满感情，非常亲切。

内容如下：

我非常感谢您。首先，感谢您对中国的热爱。然后，感谢您介绍了您丈夫那么多有趣的事。最后，还要感谢您为我们捐了10美金。这些，我们都深深地感谢！

……很抱歉，我还没能和他交谈过，因为，近来我一直生病，没有见任何人。也许他从满洲回来后，我们将安排一次会见。

有关您的工作，为美国杂志写文章，最好联系美国和中国的妇女。这将使我们彼此在相关领域，相互更了解。我们可以更多地互相交流。祝您好运！希望您来上海时见您。

您的真诚的

孙中山夫人

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

宋庆龄通过真挚流畅的文字，顷刻之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使从未谋面的双方顷刻成为朋友。同时很自然地将中美两国人民的情感联系起来。令人不得不佩服宋庆龄高超的语言艺术。

在收到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捐赠的一个包裹之后，宋庆龄向捐赠者写信致谢：

亲爱的Brown博士：

您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转来的包裹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了。这些药品，食品，一件大衣，还有肥皂和毛巾，每一件都是急需有用之物，非常感谢您的礼物。

彼得逊少校告知我们，您还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这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知道我们最紧迫的需要，我们在这信里给您列了一个表。

中国福利基金会包括以下项目：

国际和平医院——为8个主要医院和所属分部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

儿童福利——为儿童福利中心，托儿所，婴儿诊所提供资金和衣物。

疫苗和医药制造厂——为疫苗、血清，以及青霉素生产的研究和两个制药厂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帮助。

结核病疗养院——目前在募集资金和设备，计划拓展到其他地区。

艺术家和作家的福利基金——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救助资金，因为在战争中，这个团体及其困难。

饥荒儿童救助基金——筹集基金开始这方面的救助项目，在贫困地区设立学生食品供应站和医疗站。

中国的民族工业——提供资金帮助使其在战后的严重损害地区能很快恢复经济。

学校和图书馆——为那些无法交纳学费和没钱租书看的贫穷孩子着手建技术和文化学校以及图书馆。

我传递给您这些信息以便让您知道您寄来东西的去处。

再次感谢您的慷慨，我们真诚地希望继续得到您的帮助。

在此封答谢信里，字里行间，充满敬意。针对捐赠人的情况，宋庆龄不忘及时地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所进行的工作项目和需要，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对一位捐赠了3本儿童读物的小姐，宋庆龄的答谢信同样一丝不苟，辞真意切，满怀热情，由衷感谢其为孩子作出的贡献：

Douglas P. Falconer先生和夫人一直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非常热情和给予支持。他们给了我们您捐赠的3本儿童读物，这将被放在我们上海的儿童阅读室。我们已经有好些译成中文的美国儿童读物，还希望把它们复印分发到其他的阅读室。孩子们非常喜欢美国儿童读物的纸张以及精美的印刷和可爱的图画。

我们儿童阅读室的项目刚刚建立起来。我们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获得了活动板房的材料，我们可以在那些孩子们没有机会上学的贫穷地区搭建起这样的活动板房。随着儿童阅读室的建立，我们还建了诊疗所，扫盲班。

我们实在非常感激我们朋友的帮助和支持，谢谢您的贡献。

您的真诚的

孙中山夫人

宋庆龄用亲切温暖的语言，细述捐出物品的用途以及捐赠的意义。使捐赠人感受到助人的神圣与快乐。

在收到当时实属昂贵的宝贝——一台X光机后，宋庆龄依然以她惯用的文笔致谢，通篇亲切自然，既不惊喜也不溢美，平实的言词中充满尊敬与感激：

亲爱的匹克先生[1]：

我们办公室已收到您慷慨解囊的信和捐给中国北部国际和平医院和医学院的一台珍贵的X光机。我希望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当然，我觉得我并没有这权利，因为，这感谢应来之这台重要机器的使用者。

您的捐助真是雪中送炭。正好9年前，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开创了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接着，这一医院系统发展到8个中心和40多个分支以及流动站。国际和平医院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正确无误地给人治病。他们的工作是在医疗物资和设备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医院男女同仁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现代医疗的便利和效益。因此，您这样一份礼物正是他们多年向往的心愿，这将激励他们在工作中创造更大的奇迹。

再次感谢您的这份礼物。我希望在我们的不断发展中，一直和您保持密切的联系。

你的真诚的

孙中山夫人

假如略去捐赠内容，仅从信件的用词及语气中，根本无法区分捐赠者捐出价值的高低。

下面这封信尚未公开发表。没有署名，使用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主席的信笺。

1947年10月13日

亲爱的罗兰先生：

按照纽约美国援华会的要求，我们想告知您，我们在上海已经收到了你们公司的一箱医药和药剂的资料。我们还想对您给了我们这么多必需的东西所付出的艰辛表示感激，同时，还想请求把我们的名

[1] 见《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但此信在《宋庆龄书信集》只发表了信的第一段。

单纳入您的邮寄名册，以便我们还可以得到你们以后的馈赠。

您也知道，这类性质的信息资料在中国北方是非常稀缺的，因此，医学院收到你们的这些东西会多高兴啊！我们在信中附上了一份有关国际和平医院和他们所附属的医学院的报道，希望会引起您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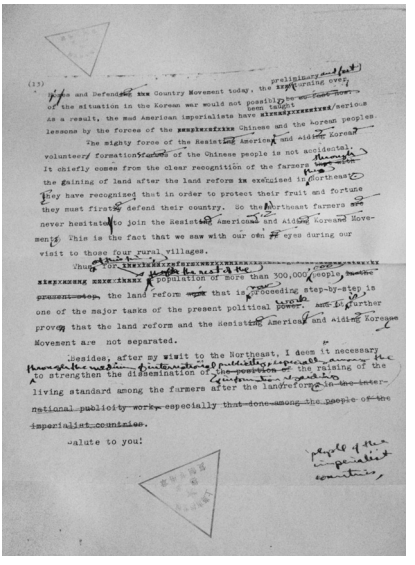
您的非常真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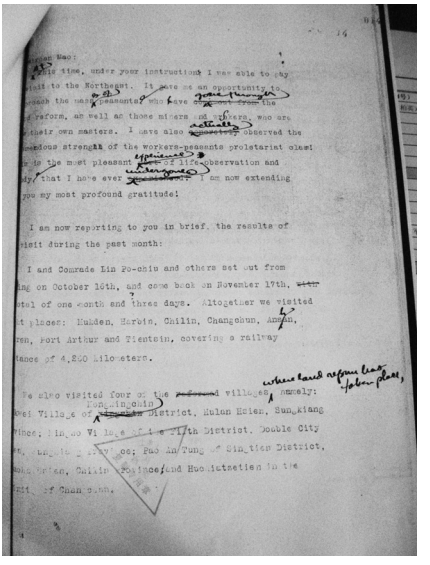
以上所选取的仅为宋庆龄47封致谢信中的5个典型，但它给人的启示耐人寻味。

对待所有捐赠人，无论捐赠数额大小，不管捐款还是赠物，不论捐助10美元，还是捐赠价值昂贵的宝物，哪怕是赠送一个包裹、或赠送几本图书，宋庆龄都及时回复，表达真诚的感激。态度一样恳切，语言一样热情，篇幅上也分不出长短。这体现了宋庆龄对捐赠人与捐赠行为的尊重，体现了她对救助事业的珍重与认真，以及一份责任。正因此，注定了宋庆龄以及其领导的救援机构的与众不同，也是其拥有号召力、凝聚力和公信力的关键。

2. 关于宋庆龄给毛泽东主席的《访问东北报告》

在标有本会历史资料档案卷中，有一份1950年12月宋庆龄





宋庆龄1950年12月12日致毛泽东函首页及末页

写给毛主席的访问东北报告。原件标明此系草稿，共41页，全部为英文打印件，上有多处宋庆龄手书修改的痕迹，字迹辨认相当困难。

初看以为这就是收录在《宋庆龄选集》上的《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1]（简称《东北旅行印象记》），只不过是一份留存在档案的草稿而已。细看之下方发觉，篇幅明显不符。档案中被反复修改的稿件，文字大大少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仔细对比后发现，尚有较多方面的不同。

首先，文体不同。《东北旅行印象记》1951年5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考察报告。而档案稿是宋庆龄给毛主席的一封汇报信，写于1950年12月12日，没有加标题。

以下是档案稿的起始部分：

毛主席：

在您指示下，我这次对东北地区作了一次访问。这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许许多多通过土改翻身的农民，还有那些现在已经当家作主的工人和矿工们。我亲身感受了无产阶级工农的巨大力量！这是我生平所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一次考察和学习。为此，向您致以最最深切的感谢！

现在，向您简要地汇报一下过去一个月的访问之行：

我、林伯渠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行于10月16日从北京出发，11月17日返回，总共历时一个月零3天。我们一共访问了8处地方：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鞍山、大连、旅顺港和天津，铁路线全长共计4 260公里。

我们还视察了4个已经完成土改的村庄：松江省呼兰县Kongkingchin区的永贵村；松江省双城县第5区的民和村；吉林省蛟河县Singtien区的保安屯和位于长春郊外的胡家店子。

我们视察了哈尔滨的铁轨制造厂、小丰满发电厂、吉林造纸厂、中央电影局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我们还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铁、炼

[1] 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4页。

钢以及轧钢诸多工序，还有太谷山铁矿、大连造船厂、大连Chienhsin公司的化工厂，天津中国纺织公司一厂，总共11个工厂和一个矿区。

此外，我们也视察了第二被服厂托儿所、市立托儿所，和哈尔滨铁轨制造厂托儿所。我们还去了小丰满发电厂的医院、工业博物馆、大连医药研究所、电讯公司的“工人之家”，码头工人的工人俱乐部、Sahoko区的文化宫、旅顺港的东方文化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我们总共参观了11个文化机构，还有大连和旅顺港的现代设备。

鉴于各省市同志们真诚和热情的欢迎以及苏联专家的深情厚谊，他们为我们整整举行了12个欢迎晚会，让我们忘却了旅途的劳顿。

我们先后听了6名来自松江、吉林、长春、沈阳、大连和鞍山钢铁公司的领导的工作汇报，内容主要是解放后他们面临的接收和恢复重建的困难。

在这33天里，我们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观察到土改后新中国的农民在物质生活、文化和卫生方面的巨大改善。我想给您一些我们在松江省呼兰县和双城县视察时的具体细节：

……

档案稿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认为，有必要把我视察东北的事向国际公众宣布，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加强宣传我国农民土改后生活水平的提高。

向您致敬！

信末没有署名，对宋庆龄而言，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符合她的习惯。

无论开头还是结尾，档案稿皆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显然，这是一封汇报信函。

其次，《东北旅行印象记》是按考察的类别如农村、工厂等分别陈述。而档案稿则依照考察行程的顺序，有选择地汇报。同时标注了日期。如：

10月20日—视察松江省呼兰县的Kengkingchin区永贵村的情况。

10月21日——访问双城县第5区的民和村。

10月23日——视察哈尔滨铁路修理厂。

11月6日——视察大连港。

11月4日——视察大连远东电力公司的疗养院。

11月13日——游览旅顺港。

《东北旅行印象记》面面俱到，篇幅冗长，仅考察农村这个部分，就分了农村和土地改革、农民是土地的主人、改进了的耕种方法、农业劳动力的良好组织、劳动模范与党团员、政府在人民遇到灾难时予以照顾、公粮与开支以外的剩余、供销合作社的任务、农村与政治进展、福利与文化的进展共十个标题。

档案稿则简洁而有重点。宋庆龄在考察了诸多地方后，只选择了行程中的6天和5种不同的类别作为典型汇报，而将一路考察时收集的资料与相关书面汇报作为信的2个附件。

以下是宋庆龄随信函呈上的附件目录：

I．有关汇报与介绍的书面资料

1. 沿长春铁路线的哈尔滨汽车修配厂；

附件：哈尔滨修配厂的总体状况

2. 哈尔滨第二服装厂的托儿所：

附件：财政东北局所属服装局第二服装厂托儿所的介绍

3. 哈尔滨市政府办的托儿所：

附件：该所的工作情况介绍

4. 松江省呼兰县永贵村：

附件：（1）该村的基本状况介绍

（2）永贵村1950年的生产计划

（3）涉及永贵村的一些其他情况资料

5. 松江省双城民和村：

附件：（1）民和村互助合作的总结报告

（2）Lieu Ying-Lai模范的事迹

（3）有关该村的新闻报道

6. 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

附件：保安屯的情况介绍

7. 有关松江省的文化和农业状况：

附件：（1）松江省的农业情况统计

（2）哈尔滨中小学的成人教育开展情况

8. 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Chow Ts-an作的吉林省总体状况汇报：

附件：（1）有关吉林省情况基本分析的资料

（2）吉林省1950年的林业生产计划

（3）1950年~1052年吉林省农业生产奋斗目标

9. 长春市长Sun Li-seng作的有关长春的工作状况的汇报：

附件：一份有关长春经济状况的简要报告

10. 沈阳市长Chu Chi-ven作的有关沈阳市的工作状况汇报：

附件：沈阳市的基本情况分析。

市工商局有关1950年上半年的总结报告。

市卫生局有关1950年上半年的总结报告。

11. 大连市长Mou Te-sun 作的有关大连和旅顺港的简要状况汇报

附件：由Han主席对巡防团成员作的大连和大连港的状况介绍。

Ⅱ. 在访问东北时所收集的资料：

工厂：

1. 哈尔滨汽车修配厂
2. 小丰满发电厂
3. 吉林造纸厂
4. 鞍山钢铁公司（包括太谷山铁矿）
5. 大连码头——船台
6. 大连化工厂
7. 天津第一棉纺厂

文化机构：

1. 大连远东电力公司所属疗养院
2. 大连工业博物馆
3. 大连通讯公司的“工人之家”
4. 大连Shao Hu-kow文化中心
5. 大连卫生研究所
6. 哈尔滨第二服装厂托儿所
7. 哈尔滨市政府办托儿所

（附上：哈尔滨的妇女民主联盟的Kou Chi-yuen 有关托儿所工作的发言）

8. 哈尔滨东北铁路托儿所

港口：

1. 大连港（包括Kan Tsin-ts 煤矿码头）

2. 旅顺港（包括旅顺港远东文化博物馆，旅顺港战争历史博物馆）

村庄：

1. 松江省呼兰县永贵村

2. 松江省双城民和村

3. 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

4. 长春近郊的胡家店子

谈论时的焦点：

1. 松江省的文化和农业状况

2. 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Chow Ts-an作的有关吉林省总体状况的报告

3. 长春市长Sung Li-sung作的长春的工作状况报告

4. 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Kao Tsun-Ming的发言

5. 沈阳市长Chu Chi-ven作的有关沈阳市的工作状况报告

6. 大连市长Mou Ta-sen 作的有关大连的简要状况报告

宋庆龄明确表示自己仅向毛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过去一个月的访问之行”和“具体细节”。她按访问日程，以汇报的语气，描述了考察途中的具体感受与印象深刻的细节。

以对农村考察的印象，档案稿选择了2个村——永贵村和民和村。

对呼兰县的永贵村，宋庆龄重点介绍了村里的政事：

永贵村的村长金成林是个富有才干的青年。他推心置腹地向我们介绍了他村的情况。他说，土改以前，村里仅有11户中农，其他72户都是贫雇农。但是现在，几乎百分之九十是中农。有些农户，尽管他们还没能拥有马匹，但可以足衣饱食。而且，他们居住条件也与其他中农相差无几。仅仅是没有马匹，他们才被称为贫农的。

当我们问及村里的政事，他说：“我们都是选举产生的。既然他们

把我们推选到这个岗位上，我们就应为他们服务。”

村里一共有33名村代表，其中14名妇女代表。村委会由11位成员组成，包括村长和副村长。其他村委会成员分别负责村委会事务、公共安全、民兵、生产、财务、食品、文化和公共卫生。还有一名书记，也是包括在村委会成员内。负责文化和公共卫生的委员都是妇女。在7个区代表中有两名妇女，而且两名区县代表中有一位妇女。妇女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基本原因，自然归功于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比如，妇女联合委员会的90多位成员中，有59位在自己田里工作，而那些不在田里工作的也从事一些副业生产。

接着介绍了村里的两大特点：

永贵村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粮食资源丰富。这可以以该村今年谷物种植面积的统计加以说明：

稻米……119.66垧
玉米……104.83垧
大豆……122.49垧
高粱……77.84垧
小麦……49.29垧
甜菜……19.04垧
其他……20.02垧
共计……511.17垧

（以上不包括1.63垧的集体种植面积）

以此估计，他们今年秋季能收获3 400担主粮，再加上170担小麦，总共有3 570担。如果除去上缴政府的500担税粮，以及1 500担作为男劳力和马匹的口粮、肥料，和种子外，至少还剩余1 000多担。这里还不包括干草、柴木等的收入。此外，还有甜菜的收入，差不多有6亿元（东北币）。整个村，今年总共能收入17亿到20亿。

第二个特点是文化水平的提高。

农村经济革命紧随其后的，自然便是农民们对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要求了。村里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进了小学，一共有147个学生。小学的就学年龄放宽至17岁的青年人。这一条是农民们自己提出来的，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当家作主了。尽管他们已经超过了读小学的年龄，他们还是想学习。村里类似这样的情况，有4个在读中学，有7个在读高小。

村里所有的青年都参加文化扫盲班，而且，他们还组织冬季学校进行扫盲。现在每一个青年至少认识80—100个汉字，有些甚至认识200—300个汉字。那些水平高的，现已能读报和写信了。村长从前是文盲，现在通过扫盲，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记录。

迷信现在在村里已不再有立足之地。那种“请大仙”的习俗，也完全被废除了。新年或者春节期间烧香拜佛的现象也没有了。

由于政府帮助，卫生习惯也得以改善。每年为他们打3次预防针，种1次牛痘。区里有一所卫生所，给贫苦农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绝大多数接生婆开始接受一些新的医学知识，所有割脐带用的剪刀都必须事先进行无菌消毒，以便降低新生儿的死亡率。

过去一年，44个新生儿出生，只有3个死亡。从新生儿的出生和死亡率上，就明显地反映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加之政府在妇婴卫生保健方面的加强，妇女和儿童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妇女刚生下小孩，给予一个月的休息，同时给予她们的营养品不再只是白面和米，另外又增加了300—400个鸡蛋，此外还提供红糖和鸡汤。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这些贫雇农妇女而言，解放前连做梦也不敢想。

对双城县第5区的民和村，宋庆龄将介绍的重点落在了两位能干的女性上。

首先介绍了女村长：

这村一共有229户，1 470名村民。民和村的面积有823垧又4.6亩。

这村村长是位妇女，Hu Ya-tung。她向我们介绍她村的情况。她说，“去年，由于遭受暴风雪，结果我们只收获了2 700担谷物，仅仅是以往的百分之三十。尽管我们春季遭受了雹灾，可秋季还是获得了好收成。估计今年能达到6 400—6 500担。这样，整个村在一年内就从先前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了。现在，全村除了7—8家，全都组成了生产

互助组，一共有39个互助组。

Pain Chen-lu，是村长的丈夫，土改后参加了东北解放军。村长和她的3个儿子极其努力地工作，所以，他们和村民们一起才克服了去年的自然灾害。她向丈夫提出相互竞赛的倡议，要丈夫在部队立功；她争取当上劳动模范。Hu Ya-tung 是全村先进的典型，她的行为也激励着其他人，她又被推选为省的模范。而她丈夫也在部队立了功，当上了营长。在广东与广西省交界处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今年3月从部队复员回家。我们看到他时，他正在疗伤休息，双手拄着拐杖，可是，情绪高涨（他的左腿骨压伤，还没有痊愈）。他为这么能干的妻子引以自豪，他自己也愿为村里的工作贡献力量。

Hu Ya-tung对自己村的情况，像人口、耕地、粮食产量和车马数量等等都了如指掌。她说，“以前，我们、孩子都没吃没穿。在冬天，全家只有一条单薄的裤子。我们还算好的，其他人家连裤子都没有。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我们要竭尽全力，努力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支援前线。虽然我们家是一个光荣家庭，还拿到政府的津贴，但是我们还是和其他人家一样向政府交税。去年的余粮我们至今仍有7—8斗。

宋庆龄在介绍女村长时还介绍了女村长的丈夫，不仅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体现出宋庆龄作为女性特有的人情味。

接着，宋庆龄介绍了一位女供销社长：

我们参观了村里的学校后，就去视察了供销社。供销社的刘英兰给我们做了有关该社的汇报。供销社1 116名成员共拥有1 252份股，每股5元，相当于60 000东北币。起初，他们仅仅只有7 574元的本金，然而，现今已超过了3 000 000 000。现在社里一共有270种货物，只要农民们想要的都能在供销社买到。假如农民找不到销售市场，供销社就设法为他们销售。她说，前一天他们的销售额就超过700 000 000，然而以前，他们只达到400 000 000，从农民们手里收购的粮食也只有400 000斤。过去的一年，他们一共出售了470匹布料。每个村民一年的平均购买力相当于201 000 000东北币。每年收购的粮食达到2 500担。这些都是农民的余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土

改和经济重建后乡村购买力的提高。

相比《东北旅行印象记》对农村概括的十个标题的写法，档案稿简洁、真实、生动、形象、感染力强。

浏览档案稿，通篇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典型事例与人物，以所见所闻与细节的描述，让事实说话，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为便于同《东北旅行印象记》做一番比较，不妨再看一看档案稿对另几个考察点的记叙。

在档案稿中，宋庆龄汇报的第二种类型是工厂。她选择了哈尔滨铁路修理厂，重点介绍了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工厂开展技术革新与劳动竞赛带来的可喜变化以及涌现出的大批劳动模范与革新能手。

她写道：

哈尔滨铁路修理厂，就是过去大家所熟悉的哈尔滨工厂。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有47年的历史了。刚开始，工人们在那儿建了36个工作棚。因此，它也被称为“36棚”。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就增加了两个车间，一个工具车间，一个材料车间。现在，在Chung-tung铁路段又全都建起了19个分厂。一共有4 730个工人，其中200左右是女同志。

抗战胜利期间，工厂被敌人严重破坏。1947年解放后，通过全面的检测和整修，很快恢复了生产。现今的设备已远远胜过以前。

这工厂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岗位是按照中—苏协议来决定的。现在的执行厂长是一个苏联的工程师赫里杰维赤少校，而副厂长是张鸿树同志。他们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工厂的情况，也向我们介绍了厂里的劳动模范：保罗金和庞玺顺。

保罗金是一个已是72岁的苏联老工人。他一直在厂里工作，已经整整38年了。他是汽锤车间主任，他掌握操作汽锤的所有技巧，而且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很谦虚，不保守，还培养了8个徒弟。他说，“我是汽锤工人，这儿每一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对于我们这些工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护他们的工具。因为，工具不行，我们也只能停止工作，国家就要受损失。这些年，我把汽锤当作我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

庞玺顺是铸造车间主任。东北还处在解放战争阶段，哈尔滨工厂就接受了制造枪弹的任务。刚开始他们一天只能生产350发，经过庞玺顺的钻研，发明了一种新的熔铁法后，枪弹的日产量达到每天1 500发。而且生产的合格率也从以往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现在，他还在为改进工作不停地钻研和探索新的方法。

过去几年，国家已经按照哈尔滨厂的日常工作下达了目标任务，而且这些已超过它日常产能的三分之一。例如，在修复横跨松花江和拉林河的佳木斯大桥时，给了该厂修复那足有3吨重的生产桥墩的电熔炉的任务。他们经过五天五夜的紧张工作，提前完成了给予的任务。今年6月，他们生产了一架足有80吨重的双臂架桥机，这将对我国未来在桥的维修和建造方面有很大帮助。

在修理和检测机车方面，他们几乎每年超额完成工作指标。许多损坏的机车都被修好，而且好些已成为著名的机车，诸如朱德号、沈阳号等等。

过去5个月，绝大多数工厂采用了记件工资制。由于采用了苏联先进的管理制度，才有可能在工人中促进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

材料利用车间的段尚俭同志，在吸取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压延作业法，因此，工作效率提高了6倍。最近，他又发明了砸铁机，就此，整个车间解放了15个劳动力，生产能力提高了280%。总体上，过去5个月中，哈尔滨厂的生产能力平均增长了30%。

至于工人们提出的革新建议，其中有320条被采纳了。譬如，所有的机车框架和车轮都是由离心浇铸机做的，现在可以确保100%地没有空洞，由此，提高了一倍的生产效率。在1月—9月的革新运动期间，全厂已经节约了足足35亿东北币。同时，他们又加强了预算和审计，清理出了价值4 500亿的存货和原材料（这厂一个月原材料的需求预算只有700亿），这样一来，节省了很多。厂里利用废旧材料，每年又节省了相当于500亿。而且，他们利用废弃钢板，建起了1 000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小医院，一个托儿所。现在，正利用废旧钢材建造一个2 200平方米的车间。

他们通过车间竞赛和传授经验的活动也取得了些成果。例如，卡

车车间的梁德胜小组在6月还只能完成15辆。但是，经过竞赛和经验传授的激励后，7月产量达到27辆，8月37辆，至9月，他们达到了56辆。和他们竞争的马金峰小组高达58辆。

哈尔滨厂已涌现出了387名劳动模范，64名劳动英雄，658名超等工人和398名先进工人。除此以外，他们还从各分厂和部门的干部中挑选了28名一流的干部输送到其他需要的地方。同时，又从工人中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充实到分厂和部门的领导岗位。关于人员精简，现在管理人员已经从日前的945名减少至621名。

……

哈尔滨厂内，中苏同志之间关系融洽。副厂长张鸿树表示要当好一名苏联同志的小学生时，赫里杰维赤同志带着满意的微笑，表扬着他学生的进步。张鸿树还觉得，这些珍贵客人的到来，使整个厂非常荣耀，大家都永远会记住这些日子。

大连港是档案稿中宋庆龄选择的第三类典型。宋庆龄的笔触主要落在工人的工作、学习与生活状况上。还特别描述了应邀到两位苏联专家家中做客的情况。

11月6日——视察大连港。

大连港的显著特点是：（1）水深，常年不冻。（2）港口容量大。同时能够停泊45艘4 000吨位的船只。而且，3 000吨位的船只能够直接停靠岸边。大连港总共有93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3）吞吐量大。日本占领期间，每年的吞吐量最高达到1 200万吨。但是，现在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一年仅能达到100万吨多一点的吞吐量。

日伪时期，有3万工人，加上临时工，达7万之多。现在，工人已减少至5 200人，工人的每月工资为2 295 000东北币。

港务主任诺维果夫说，自从执行了成本核算和革新系统后，工作效率提高了许多。政治部主任王伟补充道："在日本人时期，码头工人遭受牛马似的奴役。尽管工人众多，但工作效率低下，每天每个工人的装卸量只有3吨，而且，他们还偷货物。解放后，废除了对工人的搜身制度和帮会制度，工人们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现在，每人每天已能达到9吨。最近，涂甫秋工作小组又发明了新的装卸法，装卸大米创

造了新的记录。他们仅花费了6小时就卸完了船上的大米，而且，全装上了8节火车车厢。”

在港务楼的6楼，一个工人俱乐部被装修一新，还建了个足足可以容纳1 000多人的大会议厅。这是由苏联工程师设计的，所有的建造和里面的座位都是工人们自己干的。另外，还有一个展示他们工作照片和墙报的展览室和一个阅览室，这些也是工人们自己设计和布置的。港务主任诺维果夫说：“无论是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个个干劲十足。现在有多种文化娱乐活动和其他好些改善日常生活福利的活动。下班后，工人们有澡洗，还可以参加文艺活动。当俱乐部落成时（建造从1949年4月—1949年12月），工人们兴高采烈。他们说，娱乐厅里的小舞台是为毛主席来访时发言准备的。

工人的第二宿舍在5楼，可以住500名工人。都配有钢丝床和干净暖和的被褥。许多工人的床上，都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书和画册。“中国的工人兄弟学习的劲头和工作一样”。诺维果夫说：“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日伪统治下，港口的机械设备管理都控制在日本人手里，然而，现在中国的工人自己掌控了。

同样类型的宿舍两个是给单身工人的，还有几个是给那些有家属的工人的。

为了方便上船的妇女旅客，还设有一个拥有20多个床位的临时托儿所，每张床都铺上干净整洁的被褥。

码头工人的扫盲教育进展颇丰。原先工人中的75%是文盲，但现在，差不多600名工人能认识超过1200个汉字，还有600多名能认识800—1000个字，能认400—500个字的人数也达到了1200名工人。上述成果也就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取得的。就此而言，主要是大连的政府以及大连和旅顺港的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工人中积极开展组织工作。加之，工人们学习热情很高，如果组织工作到位，两年内扫除文盲的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充满着无限的热情和友好，港务主任诺维果夫邀请我们上他办公室休息，在那儿，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苏德战争期间，诺维果夫主要负责列宁格勒港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提升为陆军中将。他

儿子在苏军攻克柏林的战役中光荣牺牲。因此，他晚年失去了儿子。但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就又来到远东，参与大连港的建设工作。他们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确实非常可贵。

港务总工程师玛塞维克是个严谨好客之人。由于他的盛情相邀，我们也去了他的家。他年轻的妻子亲自制作了点心，来款待我们。他们家也住在工人宿舍楼。连同孩子，全家也就住在一个很小的日本式的两居室。房内布置得简洁，整齐。……

档案稿中宋庆龄介绍的第四种类型是一个疗养院。

11月4日，视察大连远东电力公司的疗养院。

我们驾车通过大连的主要干道，穿过西岗和中山区，在临南区的南端拐弯，来到了坐落在老虎滩的工人疗养院。

疗养院是在中国远东电力公司和苏联的共同资助下建立的，它的日常经费来自公司的劳动保障基金。一个工人在这儿每天的花费要67 500东北币。但是，这儿的日常供应都是由工人合作社以最低的价格供给，所以，每个工人每天的实际支出的市场价在120 000东北币左右。

来疗养院的工人都是生产能手、劳动模范，还有公司的干部。疗养院每期为时两周，一次可以容纳100人。每月两期，就可供差不多200人疗养。人员比例，干部平均为17%，职员平均占6%，其余都是工人。在来疗养的工人中，女工人占工人比例的12—13%。

工人们一进入疗养院就全都换上疗养院的统一服装，他们自己的衣服待离开疗养院时归还。现在，所有来疗养院的工人都穿蓝色棉布服装。疗养院的伙食依照季节做些调整。平均每人每天供给能产生5 000卡路里热量的伙食。

……

除了设备齐全的寝室和饭厅外，疗养院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拥有多种游戏的俱乐部，还有2艘游艇和5条船供工人们海上游览。工人们有一定的时间作一些有规律的锻炼和短距离的航海游览。夏天，他们能在海里洗澡。即使在冬天，他们也能享受到相似的温水海浴。而且，每星期有一场电影，一场舞会，每两周有一场中国的戏剧演出。

总之，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疗养院建筑现代，齐刷刷地坐落在山脚下，面临大海。在蔚蓝色的海洋和晴朗的天空之间，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中点缀着红枫和小白点点的樱花，它们交相辉映，使疗养院四周的环境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这儿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金融家的别墅，现在，在人民政府和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人阶级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这儿成了他们得以尽情享受的胜地。新社会将使劳动人民永远朝着富裕的康庄大道前进。

在档案稿中，宋庆龄还以轻松的口气记叙了游览旅顺港的过程。

11月13日——游览旅顺港。

旅顺港距离大连90公里，中间有座山相隔，两个城市坐落在山的两边。沿着海和山脚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联系着两处的交通。沿途都是盐场、林场、农村、海滩和许多优美的建筑。这也是我们国家众多小城市景色的特有韵味之一。

旅顺港有13万人口，居住在城里的仅仅3万。整个城市显得极其整洁，这也是该城的一个特点。

我们去那天，大连和旅顺港两城的主要负责同志迎接和接待我们，还有苏联驻旅顺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斯米尔诺和苏联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民用交通部主任托曼同志也来迎接我们，并陪同我们参访。托曼的汉语讲得很流利。

首先，苏联同志带我们去参观了在日俄战争中著名的Tien Yen要塞。在要塞上，旅顺港东南的海域，我们尽收眼底。为表达欢迎我们的热情，苏联空军的高射炮部队鸣炮致敬。我们也去参观了日俄战争期间修建的混粘土地下工事，那儿曾是沙俄司令官的总指挥部。

在港内的码头上，我们受到苏联海军同志热烈的欢迎。他们准备了两艘鱼雷快艇，邀请我们上艇在海的风浪中感受一次海上的战斗经历。他们也为我们备好了航海服和厚厚的皮帽子，这使我们斗志满腔。两艘快艇平行地驶出，很快就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海上飞驶。在海浪中经历了大概20分钟，我们回到了岸上。

我们上岸后，这些体格强健，精神饱满而又英武的红军战士从他们

的太平洋舰队的军帽上取下了两根黑飘带，把此作为纪念品，上前热情地献给林伯渠书记和我。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苏联的英雄们这些珍贵的礼物，因为这是来自保卫海上的世界和平堡垒的强健儿女的。……

诚如宋庆龄所言，她的考察是深入细致的。她善于观察。如在介绍永贵村时，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观察到：

从外面向村庄望去，到处都是干草和柴木，堆放得井然有序。房子屋檐下都挂着金灿灿的种子和红红的辣椒。院子里，成群鸡鸭，白头鹅，白毛肥猪，还有健壮的骡驴。屋内的炕上，铺着红红绿绿的床毯；房间里还有玻璃碗橱和时钟等等日常用品。所有布料，即使铺盖，衬里以及垫子的布也都是新的。村里的供销社6个月内就卖了8 000英尺的布料。他们进一步计划进货2 500英尺，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在考察铁路修理厂时，宋庆龄注意到：

厂里有一个疗养院，可供490名工人疗休养。还有一个托儿所，也招收了15名女工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个可以容纳1 000名工人用餐的食堂。

厂里还建了一个技校，已经有102名青年工人在这里完成了2年的培训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现在，还组织干部学习班，诸如：汽车制造班，工厂管理班等等，总共有11个班之多。苏联的专家们被邀请担任老师。

另外，在工人夜校里学习的人数也已达到了2 317名，占了整个工人数的51%。学习的班级包括技术培训，政治，文化，俄语等等。那些以前一字不识的工人现在能认100个汉字，好的学生已能读报了。

她善于用数字说话。无论介绍农村收成还是供销社的情况，无论疗养院的伙食，儿童与青年、工人受教育情况以及卫生、福利待遇，她都使用具体的数字，如入学率、扫盲率、新生儿出生率、各类劳模数等。同时，她能把数字运用得相当自然，一点不死板，不生硬。

她善于描述细节。如详细列出了疗养院每个工人每天的伙食食谱：

早饭：1杯牛奶，2个鸡蛋和饺子（5两干面粉—注：老的计量单位16两制）

午饭：6两肉，2碗菜，一碗汤，6两米饭，一杯果汁或者两片水果。

点心：蛋糕，咖啡，可可茶和糖。

晚饭：6两鱼，（或者是海鲜食品），1碗汤，饺子（5两干面粉—注：老的计量单位16两制）。

至于疗养后的成果，宋庆龄这样表述：

一般而言，14天的疗养生活后，所有工人的体重都增加了，秋冬季来疗养的工人平均体重增加5斤左右，个别的增加了14斤，甚至15斤2两。而且，工人们在此期间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享受了如此待遇的工人们都非常感动，一个老工人说，“我们有如此舒适的享受，这在以前，就是做梦也绝不敢想。

她是这样描述到大连港港务副主任家作客的情景：

港务副主任克卢尼科夫是很有修养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家紧挨着玛塞维克家。因此，我们也去了他家。他妻子克拉乌卡·莎米诺娃每天在大连大学教3小时俄语。我们正好见她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打开着的那页，正好是孙中山的肖像。由此可见他们关心政治的热情。他72岁的老母亲也为我们准备了点心。尽管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临别时，我们依依不舍，我们为充满阶级友爱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深深感动，以至分别时挥泪相向。

《东北旅行印象记》与档案稿所选择的典型人物与事例是不同的。这说明文章关注与侧重的点不同。

档案稿中，体现出宋庆龄独特的视角。妇女和儿童始终是她着眼的重点。除了以充满赞许的口吻将两位农村女干部作为民和村情况的典型介绍外，她在每个点都从不同侧面关注了妇女和儿童。在永贵村她介绍了妇女代表的比例与地位的提高、儿童入学率、新生儿出生率和孕产妇享有的福利；在哈尔滨铁路修理厂提到了女职工所占的比例、托儿所与女工子女的入托；在疗养院，她关注到女职工入院所占的比例；在大连港，她注意到方便女旅客上船的措施和临时托儿所。

无论在农村还是工厂、码头的考察，她都非常重视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受教育情况，如扫盲班、技工学校、托儿所和医疗卫生状况、农民和工人的吃、穿、住、收入、物资供应等福利，她还特别重视人的

感受。比如农民的翻身感，工人的成就感，以及大家共有的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宋庆龄十分了解读者的心理。她知道读者最关心什么，最想了解什么。因此，她的描述真实、生动，有血有肉。

在描绘了考察所见所闻的典型实例之后，宋庆龄在信的结尾，发表了此行的四点感受：

1）苏联专家给予我们热忱的帮助和在东北建设方面的指导，加之，我们干部在技术和工厂管理方面的学习成果显著。例如，哈尔滨铁轨制造厂，车厢修理厂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苏联专家们，以及大连港的港务主任诺维果夫同志都以忘我的精神奉献着，帮助我们建设和解决面临的困难。我们的视察目睹了这一切。因此，我们更进一步地确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在东北地区起步了。

2）由大连港的码头工人自己重建的俱乐部，还有，中国劳动者联盟和苏联电力局共同出资在大连老虎滩建造的工人疗养院等等，都反映出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生活福利的极大改善。然而，对于上述这些事实，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派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就是刚刚被解放地区的工人阶级也难以置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些事实的宣传。

3）这次东北视察，一共走了4 260公里的铁路线，看了7个大中城市，其中包括鞍山和一些工业城市，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实是，所到之处，不论农村和城市，在东北地区的人群中再也找不到饥饿，挨冻和面黄肌瘦的人了。而且，所见农民的衣服有三新，这是见到的一个普遍和共同的现象：衣服外面布料新，中间衬垫新，里面衬里的布料新。而且，我们视察的4个村地处松花江和吉林省，但他们并不是在经济上提高最快的。我们上那儿的理由是，这些地方近交通线，便于我们去。这也证实了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4）在工农无产阶级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东北地区4年中在各项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成果。如果没有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现今朝鲜战场不可能出现这么快的逆转。终算让中朝人民的力量好好地教训了一下

这疯狂的美帝国主义。

在中国人民中形成抗美援朝的巨大力量绝不是偶然的。东北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使他们认识到，为了他们来之不易的幸福和成果，他们必须先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东北农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这是我们在视察的4个村亲眼目睹的事实。

因此，这次在3亿多人口的其余部分正在逐步展开的土地改革是我们目前的一项主要的政治工作，它将进一步证明土改和抗美援朝运动不可分割。

对比公开发表的《东北旅行印象记》一文中的结论，档案稿的内容也是不同的。特别是档案稿中对农民摆脱了贫穷的表述用衣服“普遍三新——衣服外面布料新，中间衬垫新，里面衬里的布料新”来概括，以及强调此次考察点的选择不是挑发展最快而是挑离铁路线最近、交通发达便于考察的点，以此标志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的表述，十分传神，是宋庆龄风格的体现。

宋庆龄是一位擅长宣传的人，她善于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文笔而言，显然档案稿的可读性更强。两相对比，明显看出，档案稿，反映了宋庆龄的行文特色，符合她独特的文笔、思路、关注点与一贯作风，应该出自宋庆龄之手。推测《东北旅行印象记》一文，大约是因为宋庆龄在信的结尾处向毛主席提出了要求：“我认为，有必要把我视察东北的事向国际公众宣布，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加强宣传我国农民土改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个要求获得毛主席批准。于是，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使之更符合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便在考察团集体的汇报稿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而成。

综上所述，中国福利会藏英文历史档案为宋庆龄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诸多珍贵信息。它是一座等待开采的宝库，在不断挖掘的过程中，将不断呈现惊喜。

（作者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档案翻译者甘庆元为中国福利会研究员）

台湾地区藏宋庆龄档案文献及其价值

朱玖琳

[内容提要]

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是台湾地区关于民国时期档案的三个最主要的典藏机构。宋庆龄档案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和党史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来往函电、会议记录、蒋介石日记、政府情报、人事档案、剪报，以及照片、影像等等，数量上以来往函电为最，内容上以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武汉政府时期的活动为主，时间跨度上从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始至其1981年逝世止，为研究宋庆龄在民国时期的活动及其人物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关键词]

宋庆龄　台湾　档案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按照《宋庆龄全集》编纂项目工作方案和计划，于2009年11月首次选派副研究馆员黄玉抒、文博馆员任冉冉，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孙娟娟等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赴台开展为期两周的孙中山、宋庆龄档案文献征集工作。在第一次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次年8月24日至9月8日，再派副研究馆员朱玖琳、文博馆员宋时娟，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文物资料部文博馆员宫洁菁一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景平参与指导下，组成联合工作组，赴台开展为期16天的孙中山、宋庆龄档案文献征集工作。

在台期间，联合工作组成员分别在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下简称“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从其所藏外交部档案、蒋中正文物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军事委员会侍从室

档案和五部档案、汉口档案、政治档案、会议记录等，以及吴稚晖、阎锡山等个人档案中，搜集了孙中山、宋庆龄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珍贵档案。

宋庆龄档案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和党史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来往函电、会议记录、蒋介石日记、政府情报、人事档案、剪报，以及照片、影像等等，数量上以来往函电为最，内容上以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武汉政府时期的活动为主，时间跨度上从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始至其1981年逝世止，为研究宋庆龄在民国时期的活动及其人物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一、台湾地区档案馆概况

“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是台湾地区关于民国时期档案的三个最主要的典藏机构。

“国史馆”属于台湾政府机关，是台湾“总统府”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修纂国家历史、整理史料、收集史料文物，管理历任“总统”、“副总统”文物。其所藏最珍贵的当属蒋介石专档。“蒋档”全称为“蒋中正总统文物”，包括蒋的函稿、电文、日记、信件、书籍、舆图、影像数据及文物等，由蒋介石的机要人员历年搜录整理形成。1949年蒋介石下野，随即下令将该批档案随中央银行黄金同舰运台，原暂存高雄，后再移转至大溪头寮宾馆，并于翌年成立“大溪档案室”存藏。因此，外界多以“大溪档案”称之。1950年后，大溪档案室继续搜罗及典藏蒋的相关档案数据，并进行档案整编分类，也为部分档案撰写重要事件始末。1953年8月，大溪档案室改隶“总统府”，由“总统府”机要室兼理该室业务，档案则仍藏于头寮宾馆。至1979年7月，始转至阳明山阳明书屋典藏。1995年2月，“国史馆”奉命接管该批档案，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

党史馆的前身是党史会，初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2年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2000年中

[1] 参见台湾数位典藏网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国史馆简介。

国国民党下台后，党史会的地位也由国民党中央的一级部门降格为二级部门，遂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人员与机构亦大幅缩减。党史馆的主要任务是编纂国民党党史史料及保管重要文献。其收藏总数在三百万件以上，依形式可分为文献、实物及图片三类；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一般档案、党务会议纪录、党务组织档案、特种档案等。其中一般档案分为两个部份，一是人物档案，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吴稚晖等党史重要人物的专档；二是国民党自创建以来的党史沿革档案，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5个时期。党务组织档案主要有上海环龙路档案（包括1914年至1925年间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内容大部分为孙中山与党员同志间，或党员同志之间往来函电，以及党本部相关文件）、汉口档（包括1924年至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特别委员会之各类档案）、五部档（为1924年至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中央各单位档案，其中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五部档案为主）、中央政治会议档案、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等。特种档案主要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及地方、海外党务档案。[1]

“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藏档内容主要集中在外交与经济两个方面。其外交档案是清末总理衙门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档案；经济档案是自清代商部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档案，包括该部到台湾后直至1980年间的档案。除此之外，1990年后，随着台湾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行政部门将各机关提供的有关“二二八事件”之史料，汇集于近代史所档案馆。

二、宋庆龄档案文献基本情况及其价值

三馆不同的职能决定了宋庆龄档案集中在“国史馆”和党史馆。

一）党史馆：

党史馆所藏与宋庆龄有关的档案量非常大，主要可分为五大类，

[1] 参见刘维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外交史料介绍》，http://archwebs.mh.sinica.edu.tw/digital/data/PDF/8-1-2-7.pdf

分别是宋庆龄往来函电、与宋庆龄相关的往来函电、国民党党务会议有关宋庆龄的档案、剪报、照片：

1. 宋庆龄往来函电。

党史馆藏宋庆龄往来函电中，有宋庆龄与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陈璧君、何香凝等重要人物的往来书信，这些信件分别归在一般档案和党务组织档案中的汉口专档、五部专档、吴稚晖专档，以及环龙路专档中。

这些信件内容涉及面甚广，其中大量是有关宋庆龄1925年与何香凝互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以及1927年宋庆龄在武汉时期与何香凝互让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的事情。这部分信件早已有人利用过，北京联合大学刘红教授曾撰写《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发表在2004年10月14日的《团结报》。

其他信件有孙中山函宋庆龄告来人到大元帅府装电话事；

有孙中山丧葬期间汪精卫等对宋庆龄的慰问，及为宋庆龄安排15万元抚恤金事；

有宋庆龄、何香凝1936年为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扩大总理三大政策案，争取吴稚晖签名支持的致吴稚晖函；

有蒋介石函宋庆龄告知已为她找人编辑孙中山文稿函，有蒋介石同宋美龄联名的致宋庆龄慰问函等等。在蒋介石致宋庆龄的信件中，有一封信既保留了正式件也保留了草拟件，正式件还进行了特别装裱，这封信的措辞非常激烈，没有年份，但根据信的内容，再结合蒋介石当时的行踪和其他一些相关材料，可以断定这封信写于1929年8月15日，是蒋介石对宋庆龄1929年8月1日致国际反帝大同盟电的回应。[1]

而宋庆龄致蒋介石函仅见1941年1月19日，宋庆龄何香凝等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法，因为属于党务性质，所以这封信归在“特种档案”专档中。

2. 与宋庆龄相关的往来函电。

这批信件大体归在党务组织档案的汉口专档和五部专档中，仍然

[1] 详见朱玖琳：《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13—114页。

都是关于1925年和1927年宋庆龄与何香凝互让妇女部部长及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职的事情，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机构之间的往来函电。

3. 国民党党务会议有关宋庆龄的档案。

党史馆藏与宋庆龄相关的党务会议档案均为原件，归在会议记录专档中。它们的内容相当重要，其中2件是宋庆龄等提交会议的提案。

提案一是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向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5次常务会议提交的。她同沈钧儒等人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述对于民权保障之主张及具体要求。提案由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代为转达会议，但根据案卷上的“不列案”的批示，该提案未被提交常务会议讨论。

提案二是1937年2月，宋庆龄等14人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这份原件的内容与1937年3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的“宋庆龄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内容略有不同，除了少数文字表述的差异外，党史馆藏提案增加了扩大三大政策的内容。正如冯玉祥日记所说的那样，其内容“如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如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如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1]

另外，在会议记录专档中既有1939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选任宋庆龄为国民政府委员的记录，也有1949年10月国民党中监会要求处分宋庆龄等的提案。

4. 剪报。

剪报的内容五花八门，事涉宋庆龄1929年回国参加奉安大典时与蒋介石特使戴季陶夫妇的谈话、1931年营救牛兰夫妇、1932年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记者招待会、1933年反对福建人民政府、1942年

[1] 详见《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8页。

在重庆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的热烈欢迎等等。由于报纸报道并非正规途径的档案文件，其内容真假有虚有实，所以这类资料须加以判断后方能利用。比如，有一份剪报称宋庆龄1929年在巴黎访问汪精卫夫妇，还有一份剪报称宋庆龄1931年12月准备充当宁粤调停人，不仅同陈铭枢、邹鲁会谈，还等候胡汉民由粤来沪后一同赴南京。对此，宋庆龄本人当时均曾辟谣。

剪报除少量出于一般档案外，绝大部分出于吴稚晖专档。初时笔者猜测也许因为吴稚晖是力主反共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所以他特别关注宋的行踪。但是，在向党史馆工作人员询问了吴档的情况后方知，吴喜欢保留一切资料，哪怕片纸只字都留着，至于剪报，他并非针对宋庆龄一个人收集。

5. 照片。

照片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档案载体，尤其在史实缺乏文字记载时，照片会向我们证实某些事的有或无，并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情景。党史馆藏宋庆龄照片有很多，但因为此行时间有限，我们连目录都未及抄录，所以在此无法详加介绍。

我们只是调看了几张我们极感兴趣的照片，笔者印象较深的一张是1942年1月宋庆龄与欢迎她的数十名国民党元老的合影，其中有林森、于右任、吴稚晖、王宠惠、戴季陶，也有孙科、孔祥熙，还有宋蔼龄、宋子文等。

二）“国史馆”：

相对于党史馆而言，“国史馆”的宋庆龄藏档要少得多，但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党史馆。这当然与“国史馆”的本身性质有关。

“国史馆”藏宋庆龄档案绝大部分源自蒋档，且集中于蒋介石的来往函电和日记，其余分别见于国民政府档案、外交部档案、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等等。

“国史馆”藏宋庆龄档案主要有五大类，分别是蒋介石与宋庆龄往来函电、蒋介石就宋庆龄事往来函电、蒋介石日记对宋庆龄的记述、台湾政府收集的有关宋庆龄的情报，以及其他一些零散文物。

1. 蒋介石与宋庆龄往来函电

蒋介石与宋庆龄往来函电大部分是蒋介石致宋庆龄电报，时间跨度从1926年11月到1934年7月，共16封，其中一半是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蒋发给宋的电报，其中内容分别是蒋介石领导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欢迎宋庆龄来赣；宋庆龄北上至鄂后，蒋数度争取宋来赣“赐教并襄助”；当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时，蒋一再争取宋离开武汉来南京或回上海。1926年12月的一封电报由蒋介石和陈洁如联署，这说明尽管蒋日后一再否认，但是陈洁如的确曾拥有“蒋夫人”的身份，甚至参与到蒋的政务活动中。

蒋在其他阶段致宋的电报内容分别是：1929年欢迎宋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并慰问宋身体安康；1931年8月欢迎宋回沪，并请宋“节哀珍重”；1931年11月邀宋赴南京谒中山陵；1934年回复宋正在调查宋所提之事“如无危害党国行动当再奉告”，其时宋正在沪积极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蒋此信或与此有关，他的态度相当耐人寻味。这部分信的署名者部分有宋美龄。

宋庆龄致蒋介石函电仅见一封，而且是联名信。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2月3日，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请其谨慎处理新四军问题。

2. 蒋介石就宋庆龄事往来函电

这类函电又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就宋庆龄事与亲友间的往来函电，一类是蒋介石就宋庆龄事与部下的往来函电。

与亲友间的往来函电主要是1926年和1927年间，蒋通过孔祥熙、宋蔼龄、宋子文作中间人，与宋联系，内容与蒋本人当时致宋的电报一致。另外有一封宋子文1928年12月致蒋介石的电报，是宋庆龄通过宋子文向蒋提出将孙中山灵榇的奉移日期推迟，“俾得躬亲其事”。

蒋介石就宋庆龄事与部下的往来函电，一是蒋叮嘱属下做好宋的保护和后勤服务工作，多在1929年奉安大典期间；一是蒋的属下就宋的问题向蒋作汇报，这部分函电史料价值极高，其中有1927年3月陈

铭枢告蒋宋庆龄和宋子文对蒋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一职“无异辞”[1]、1933年5月杨虎[2]告蒋宋庆龄在沪发起的国民御侮自救会是变相共党集团已派人驻会监视、1938年8月毛庆祥[3]告蒋陈友仁与宋庆龄有意赴俄商援、1939年8月甘介侯[4]向蒋报告与宋晤谈详情、1944年3月陈布雷告蒋宋将在孙中山逝世日对美发表广播讲话已“婉劝其勿违国情”、1944年11月戴笠呈蒋监视宋庆龄的报告、1947年12月1日顾维钧电蒋已托人劝阻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发表关于宋庆龄个人事专篇等等。这部分的函电除了“蒋档”中有，“国民政府”档案中也有。在“国民政府”档案的“顾维钧驻美外交情报”卷宗中，还有1946年7月顾维钧告蒋美国各报刊载美政府停止对中国协助以及宋庆龄同一论调的宣言等。

3. 蒋介石日记对宋庆龄的记述

“蒋档”文物图书中的“事略稿本”编纂于蒋介石生前，抄录了大量的蒋介石日记，蒋日记中对宋庆龄的记述并不多，时间跨度从1927年9月1日至1949年10月6日，大多很简单，唯1931年12月16日记宋庆龄与谈以牛兰交换蒋经国事较长。

4. 台湾政府收集的情报

这类档案出自“外交部”档案和“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

“外交部”档案记录了宋庆龄曾计划于1956年10月访泰，泰内阁会议本拟讨论招待欢迎，台湾方获知后“设法阻止”。

侍从室档案的人事档案因事涉个人隐私，“国史馆”原规定不开放，但后来还是将整卷“宋庆龄”人事档调给了我们。该档价值不大，基本上都是50年代的剪报，也有宋庆龄逝世事的剪报，内容泛泛，有不少是人身攻击。该档对宋庆龄的定性是“匪伪人物”，反映了台湾政府对宋庆龄的态度。

5. 其他零散文物

这类文物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国史馆”档案目录中看到在蒋

[1] 详见朱玖琳:《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108页。
[2] 杨虎（1889—1966），字啸天，安徽宁国人，时任上海保安处长。
[3] 毛庆祥（1898—1993），又名宗骧，浙江奉化溪口人，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组长。
[4] 甘介侯（1896—1984），上海彭浦乡人，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经国文物中存有宋庆龄赠蒋介石的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墨宝横轴，惜原件不能调出，我们只能从其缩微图中一睹大概。在告知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后，他去调出了原件，并从蒋介石日记中寻出了事情的原委，这是宋庆龄在1946年2月14日送给来靖江路寓所探望她的蒋介石的，蒋谓之“甚珍贵也”，并装裱成卷轴，传之子孙。[1]

三、在台查档感受和建议

台湾地区的档案普遍数字化，整体开放程度较大；但是不同机构开放程度不同；同一机构不同性质的档案开放程度也不同。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唯有“国史馆”需要台湾当地的学术机构开具介绍信，说明身份。其目录完全开放，档案大多数已经扫描成电子版，或制作成缩微胶卷，阅档者可以免费调阅这些电子文件或微卷，其他的则可调阅原件。其中，“国史馆”对事涉机密和隐私的档案不对外开放；所藏“总统档”只能手抄，不得复印；可复印部分理论上有比例限制。党史馆一概不得复印，全部档案甚至目录均需手抄。“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最高，其外交部档案已全部扫描，只要有登录号，在馆外都可以免费下载保存，即省时、省钱，还省力。而登录号是可以免费申请的。

根据我们在台查档经验，建议大家：

1）赴台前，在大陆事先做功课时，可以借助台湾的数位典藏网（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其中有一栏是“目录导览”，“国史馆”和“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所有档案目录均在其中。

2）要查“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档案需事先申请，获得登录号和密码后，可以在馆外下载保存。但是这项工作只能在台湾做，“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网站和“国史馆”网站一样，在大陆是打不开的。

3）在党史馆先抄录目录，掌握整体情况，再根据目录一一调阅。

4）检索词要尽量科学、广泛，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建国大纲”，当初笔者用这个检索词只是想找一找在台湾是否还有《建国大

[1] 详见邵铭煌：《另眼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关系》，《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49—52页。

纲》的原版真迹，结果居然查到了宋庆龄赠蒋介石的那一份。这份档案的藏品名称是“孙文建国大纲墨宝”，如果我们只用宋庆龄的名字做检索词是绝对搜不到的。同样，用“蒋中正”做检索词也办不到。所以，这么珍贵的文物，连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事先都不知情。

随着两岸交流日深，赴台查档将不再是大陆个别机构和个别学者所为，希冀本文能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台查档提供借鉴。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简介
——以孙中山、宋庆龄的日文史料为例

［日］徐小洁

［内容提要］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通过互联网，提供日本政府有关机构所保管的亚洲历史资料的电子数据中心。通过该网站我们可以搜寻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各种有关亚洲的资料。在该网站上可以搜索到的关于孙中山的资料有1万件以上，而有关宋庆龄的资料亦达2933件。该网站为我们更加深入广泛地进行近代史研究，还近代中日之间的历史原貌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孙中山　宋庆龄

众所周知，孙中山、宋庆龄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孙中山曾经到过日本多次，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前前后后有九年都是在日本度过的。众多日本人仰慕孙中山的为人，援助他的革命，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因此孙中山称日本为他的“第二故乡”。

宋庆龄的访日则与孙中山有着密切的关系。1913年8月29日，留美归国途中的宋庆龄因父亲宋耀如急召，中途转到日本，抵达横滨。次日，她在父亲陪伴下，到东京与她敬仰的孙中山见面。以后，她怀着高度的热情同父亲和姐姐宋蔼龄一起为孙中山工作，并于1914年9月宋蔼龄结婚后代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10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成婚，对之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日本，那么在日本保存着有关孙中山、宋庆龄的日文史料也是理所当然的。过去，研究学者们都必须前往现地寻求资料，而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有幸可以通过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站[1]一睹历史的原貌。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通过互联网，提供日本政府有关机构所保管的亚洲历史资料的电子数据中心，于2001年11月30日成立，由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运营管理。通过该网站我们可以搜寻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从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的各种有关亚洲的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数据化处理后，以原状供大家查看。据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该中心已公开了2 198万个图像[2]，而现在依然在不断地进行整理、添加工作。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成立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在日本大家都亲切地称该中心为“亚历”。

“亚历”成立的背景，源于日本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韩国之间发生的历史纠葛。正如资料中心负责人平野建一郎所述：“近年来，日本与近邻各国之间反复就‘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争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了探讨如何共同拥有双方都能接受的‘历史认识’，首先可能有必要对史实进行确认。我们认为必须确认有什么样的资料，共同拥有这些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如何解释这些史实的探讨。”[3]

在“亚历”网站上可以搜索到的关于孙中山的资料有1万件以上，而有关宋庆龄的资料亦达2 933件。这些资料当中包含有最为著名的史料——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共19卷，以下简称《雑纂》）。当时日本政府派暗探监视中国革命党人以及相关人物在日本各地的行踪与活动内容，《雑纂》即当时的记录。资料收录了从1897年起，直至孙中山最后一次访日的1924年间的报告。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曾经利用过这套史料来进行研究。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党时，首先仍然想到的就是这套资料。另一方面，在搜寻支持过孙中山、支持过中国革命的日本人物时，我们也主要依靠的是《雑纂》[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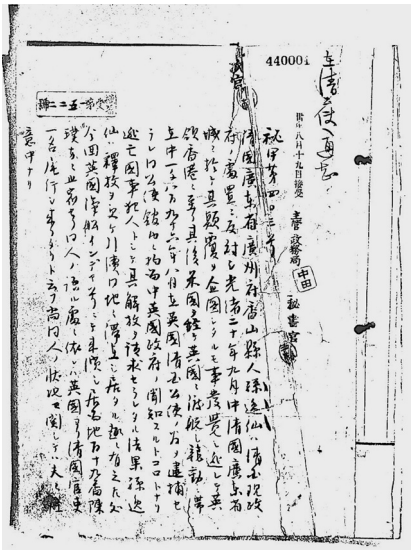
[1]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文网址：http://www.jacar.go.jp/chinese/index.html

[2] 平野健一郎「アジ歴は10周年を迎えます」、『アジ歴ニュースレター』（第1号）、2011.1。

[3] http://www.jacar.go.jp/chinese/aisatsu/aisatsu.html

[4] 日本神户孙文记念馆正在编辑的《孙文与日本有关的人名录》就是以《雑纂》为基础资料的。《人名录》预定在2011年11月出版。

在《雑纂》中的第一个有关孙中山的记录是1897年8月18日神奈川知事发给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机密电报：



機密受第一五二二号 秘甲第四〇三号 清国広東省広州府香山県人孫逸仙ハ清国現政府ノ処置ニ反対シ光緒二十年九月中清国広東省城ニ於テ其顛覆ヲ企図シタルモ事発覚シ逃レテ英領香港ニ至リ其後米国ヲ経テ英国ニ渡航シ龍動ニ滞在中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在英国清国公使ノ為メ逮捕セラレ同公使館内ニ拘留中英国政府ノ聞知スルトコロトナリ逃亡国 事犯人トシテ其解放ヲ請求セラレタル結果孫逸仙ハ釈放ヲ受ケ引続同地ニ滞在シ居タル趣ニ有之候処今回英国汽船インデヤ号ニテ来浜シ居留地百十九番陳璞家ニ止宿セリ 同人ノ語ル処ニ依レハ英国ヨリ清国官吏一名尾行シ来リタリト云フ 尚同人ノ状況ニ関シテハ夫々注意中ナリ 為及報告候也 明治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神奈川県知事 中野健明 外務大臣伯爵 大隈重信殿[1]

（机密受第一五二二号 秘甲第四〇三号 清国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孙逸仙因反对清国现政府执政，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在清国广东省城谋事起义企图颠覆清朝政府。失败后孙逸仙逃至英领香港，后经美国进入英国。在伦敦逗留期间被驻英清国公使捕获。此事被英国政府得知，既以逃亡英国的政治犯为由要求释放，孙逸仙得以解救并继续停留于英国。今孙逸仙乘坐英国汽船“印度皇后号”前来横滨并寄宿于居留地一百一十九号陈璞处。据孙逸仙所谈，自英国起既有一名清国官吏跟踪。此人的行踪亦需留意，特此报告。明治三十一年八

[1]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3050063900，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一巻。译文为著者译。

月十八号 神奈川县知事 中野健明 致 外务大臣伯爵 大隈重信阁下）

内容首先介绍了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经历，可见孙中山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也可以推断日本政府即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监视孙中山的活动的。

1925年以后的资料则包含了孙中山的遗嘱、奉安大典、国民政府资料、以及在日本展开的追悼、纪念孙中山的活动的报告书等。

至于关于宋庆龄的史料依然有待发掘。在这里笔者简单地介绍一下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伉俪时的资料。前述史料《雑纂》中，1915年10月25日的「孫文ノ動静」如下报告孙中山的行踪：

（昨廿四日）午後一時十分孫ハ自働車ニテ外出東京駅ニ行キ同一時五十分着上海ヨリ渡来シタル宋慶林外一名ノ支那婦人ヲ出迎ヘ自働車ニ同乗同二時三十分帰宅セリ[1]

（昨二十四日午后一点十分 孙乘坐汽车外出至东京站，迎接当天一点五十分自上海抵日的宋庆林［译者注:按原文］以及另一位中国妇人。并与其同乘汽车于两点三十分回府。）

[1]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 B03050082200，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ヲ含ム）第十七卷。译文为著者译。

1915年10月24日孙中山前往东京站迎接由上海来日的宋庆龄，并与宋庆龄一起乘车回到了自己的住宅。经日本学者久保田博子考证，因宋家反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事，故孙中山派使者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返日[1]。第二天10月25日的「孫文ノ動静」中则报告孙中山携宋庆龄前往和田瑞的住宅，二人就此结为夫妇。而之后的资料中梅屋庄吉夫妇屡次登场，宋庆龄多次外出购物，直至11月5日的「孫文ノ動静」中则提到孙、宋二人准备在11月10日举办结婚仪式，欲邀请数名朋友参加。一代伟人的婚姻在日本外务省文书当中有所记述，越发添加了传奇色彩。

以上笔者简单介绍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中的有关孙中山、宋庆龄的日文史料。下面介绍一下在“亚历”网站上搜索、以及利用资料时的注意事项。我们主要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具体内容请参看“亚历”网站: http://www.jacar.go.jp/。

1. 使用繁体字。比如说“孫中山”，因有很多日语字体与中文繁体字大致相同，在日语网页即可进行搜索。注意我们所用的简体字在“亚历”的网站无法认知。

2.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时需要有必要事先获得中心所长的同意。

3. 在报道文章、论文等文章中引用时，需要标明资料的出处。

中国近现代史与日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而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先驱者们更是与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资料令我们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增添了更多的视点，为我们更加深入广泛地进行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条件。最近在日本，一些人利用日本人曾经支援过中国革命的这段历史，无视历史事实，以“日中友好”为名，一味地强调日本于中国有恩。而国内对此了解不深，因此有时无法分辨这一现象。笔者望此文能对国内的历史学界有所帮助，还近代中日之间的历史原貌。

（作者为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主任研究员）

[1] 久保田博子「宋慶齢と孫文の出会いについて」(『中島敏先生古希記念論集』下巻、開明堂、1981.7)

我亲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

鲁平口述　沈海平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0年4月底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宣告诞生，宋庆龄在会上当选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自此，全国的救济工作统归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自1938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募集资金与物资，开展救援工作为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改组、调整工作范围与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宋庆龄在思考未来工作目标与重点时，希望加强自己擅长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成功向世界发布中国真实消息的工作经验基础上，着手成立国际宣传机构，突破西方敌对势力的新闻封锁，以非官方的渠道，将新中国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

为此，宋庆龄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并接连给周恩来写了多封信与正式报告，还委派专人前往北京汇报，急切地盼望得到他的意见。

1950年7月25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国福利会章程》，其中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

本会设国际宣传委员会。

（一）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推行关于中国人民建设的国际宣传工作。

（二）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席由本会主席兼任之，委员若干人由本会主席聘请之。

（三）国际宣传委员会以下各级组织另订之。

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章程中有的这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似乎从未开展过工作。而在宋庆龄当年与爱泼斯坦的往来信函中，却多次提及

这个机构，甚至欢迎并任命爱泼斯坦加入国际宣传部工作。

1952年初，宋庆龄创办的面向世界公开发行的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正式出版。当年香港时期的保卫中国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及主编《保盟通讯》的元老又成了《中国建设》的领导与核心。金仲华任编委会主任、社长。陈翰笙任编委会副主任，主管编辑部。爱泼斯坦任执行编辑。

宋庆龄作为杂志的主办人，对杂志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从选定办刊领导与骨干，以及确定刊名、编辑方针、内容、语种与封面设计、插图、版式，包括确定以至重要文章，她都亲历亲为。她曾先后为杂志撰写了30多篇文章，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以“林泰”的名字亲自将杂志寄给国外亲朋好友。可以说，创办《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和贡献。

我于1949年加入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参加了创办《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以下简称“中建社”）办公室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下放农村8年，“文革”后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参加了港澳办的筹建，离休前任港澳办主任。但我仍可以算是中建社的一位老同志。

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即将迎来60周年之际，中国福利会研究室的同志向我了解有关情况，包括中国福利会原准备设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与《中国建设》杂志之间有何联系、《中国建设》杂志与《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之间有何联系、创办《中国建设》是宋庆龄的想法还是周恩来的建议，等等问题。

中福会的同志希望我就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前前后后的一些细节作些介绍，下面是我所经历的《中国建设》创办始末。

《中国建设》杂志诞生的背景

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是宋庆龄一直有的设想。但那时如何开展这个工作，宋庆龄的想法似乎并不具体。

记得有一次，李云[1]对我谈了宋庆龄的这个设想，并让我参加这项工作的筹备。为了落实宋庆龄的这个计划，李云和张宗安[2]、邹尚录[3]等专门到我家开会，研究落实这项工作。后来还组建了一个办公室。当时，我与林德彬[4]就在即将成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负责人是金仲华。

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我会与美国的联系十分密切。我会一项重要援助项目——战灾儿童义养会项目，主要是由美国资助的。

战灾儿童义养会的总部设在纽约，始建于1937年，最初是为救助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大批流浪儿童建立的。当时，在澳大利亚、英国、美

---

[1] 李云（1915—　），原名祝修贞。浙江海宁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受中共地下组织指派，与宋庆龄联系。1937年12月护送宋庆龄从上海去香港。1938年由香港回沪后在情报部门工作。之后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华中局、华东局从事党的工作。1949年8月随解放军南下上海。1950年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至上海市商品检验局任接管委员、军代表。1952年6月，调至中国福利会，为第一任秘书长。1962年8月任党组书记。十年动乱中遭受迫害。1978年调至上海市政协任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83年离休。

[2] 张宗安（1923—1987），浙江定人。1945年就读于沪江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夕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10月，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在宋庆龄亲自领导下，先后任宋庆龄的秘书、保健科副科长和战灾儿童义养会副总干事，从事救济和贫苦儿童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做了大量资料文件和重要会议的翻译工作。她把能看到的中共文件译成英文给宋庆龄阅看，并综合进步报刊上有关消息写成英文文章交由J.W.鲍威尔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于1951—1955年任军委总政敌工部对敌宣传处助理，荣立三等功。1955—1979年，在外交部国际司任科长、处长。1979—198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1984年因病回国治疗，1987年病逝于北京。

[3] 邹尚录（1914—1986），辽宁辽阳人。诗人、外国文学翻译家。笔名邹绿芷、费雷等。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育才学校任教。1948年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49年1月任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教育组组长。1950年8月—1953年10月任中国福利会人事处副处长、处长。1953年10月—1962年历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儿童艺术剧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儿童时代社社长、主编，中国福利会业务室主任。1962年起任中国福利会党组副书记。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后，坚持业余创作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创作的诗和散文作品约有两三百篇。译著有狄更斯的《黄昏的故事》、惠特曼诗集《骑驰》、聂鲁达诗集《流亡者》等10多种。

[4] 林德彬（1921—2003），广东中山人。1949年4月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任战灾儿童义养会英文翻译兼总务，后任中国福利会秘书组长。1950年任上海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1951年起参加中国建设的筹办。1952年初，任中国建设杂志社业务秘书兼推广组长。1955—1956年，在上海期间，多次承担接待外宾的翻译工作，并随同宋庆龄出访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及随同宋庆龄在云南视察。1956年到北京，先后任中国建设杂志社办公室副主任兼推广发行组组长、总编室副主任等职。1978年9月—1980年4月，被借调到中国红十字会任国际联络部负责人，并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日内瓦、墨西哥国际红十字会议。1980年5月—1983年10月，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编委、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党组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及外文局机关党委委员。1983年10月，调任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主任。经过几年努力，使研究室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宋庆龄手迹、文稿、书信、文物、照片、资料等的基础档案，为研究宋庆龄打下基础。1986年离休后依然积极参加对外宣传文件的翻译、编辑与把关。

国分别成立了委员会，募集了一批捐款，在西班牙建立了流浪儿童收容站，负责流浪儿童的收容和教育，以后收容站被迫迁至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收容站从法国搬到英国，救助对象则扩大到波兰、比利时、荷兰、法国与英国的战灾儿童。这时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由该会在美国寻找一些同情战灾儿童的人士作认养人，按月出资15美元作为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受助孩子则每月定期用书信方式与认养人取得联系，直到孩子能独立生活。

1947年，战灾儿童义养会决定在中国开展工作，并聘请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为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总干事。我们把资助对象确定为包括解放区在内的一些进步学校的学生。当年9月，有200名中国儿童成为第一批义养生。到1949年4月，中国的义养儿童已经扩大到350人。

当时我就在这个项目中从事具体工作，负责中国受助孩子与美国养父母之间的通信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助儿童的信中，频频出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言词，而且越来越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孩子们的信里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后来几乎通篇都是痛斥美帝的话。起初，我在回信时注意做一些技术处理，后来就没办法回信了。到1950年11月，义养会纽约总会停止了对中国义养儿童的供给，该会中国分会随即宣布停止在中国的义养活动，并宣布结束。我会与美国长期保持的联系就此中断了。

本来，受助儿童与养父母的通信与联络，是中美两国民间交流、沟通、互通信息的一条渠道。这项工作中止后，中美之间信息的渠道几乎堵死了。但是宋庆龄依旧希望能把新中国真实的信息传到世界，特别是传到西方国家与美国。

于是，宋庆龄派谭宁邦、陈维博等带着中国福利会的改组方案与计划，专程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其中就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计划。只是因为工作目标与方向尚不明确，所以计划与方案只是一个框架。

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计划似乎没有被批准。因为这个机构只在章程里有，而实则并没有开展过工作。

1950年10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可以先办个对外的刊物。周恩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宋庆龄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

宋庆龄完全同意。于是195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且委托陈翰笙到上海与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刊物。同时，宋庆龄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和耿丽淑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办刊。她认为爱泼斯坦是最佳编辑人选，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与编辑《保盟通讯》的经历。耿丽淑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与推广经验。因此，让耿丽淑负责杂志的推广发行工作也是十分称职的。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的原意是“中国的重建”。之前，陈翰笙曾提议刊名为China In Reconstruction，意为“建设中的中国”。但是宋庆龄坚持用China Reconstructs。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中国建设》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爱泼斯坦、谭宁邦、吴耀宗、文幼章等，我与林德彬也参加了会议，同时负责具体落实会议决定。

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提出要成立一个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也是由宋庆龄提出的。主任金仲华，副主任陈翰笙。其他编委委员是：钱端升（政治学家）、李德全（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长）、刘鸿生（实业家）、吴贻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还提出，邀请耿丽淑到中国，从事杂志的推广发行。宋庆龄强调，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宋庆龄对编辑方针有明确的要求，她要求多写人民群众的努力和业绩，因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她还强调实事求是。根据宋庆龄的要求，编辑部作出具体规定：每期必须有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一篇论据扎实的文章，还要有一篇行文生动的文章。具体表现为，杂志按既定编辑方针，在筹划各期报道观点与内容时，强调：1. 写好每期首篇的《致读者》，结合各期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与提升，表明杂志对当前中外形势及重大事件的鲜明观点（宋庆龄曾亲自写过《致读者》）。2. 深度报道国内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多由本刊记者深入采写专稿，以主题文章或若干文章从各个角度透析主题）。3. 约请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撰写通俗而观点鲜明的重要文章（创刊初期宋庆龄、金仲华、陈翰笙及社会知名编委均亲自为杂志撰稿；以后也很重视约请各界专家学者撰稿或访谈）。甚至在“文革”动乱中，杂志仍坚持自己采写或约稿，故毛主席也曾肯定说《中国建设》还有自己的东西，以批评《北京周报》照抄照转国内报刊。

1952年《中国建设》第1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实际上，创刊号提前于1951年12月便正式印刷出版了。《中国建设》第1期印刷1万册，向国内外发行。

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

为害》等。

早期的中建社，在编委会下设立业务部和编辑部，共12人。分为北京与上海两摊。业务部在上海，地址是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本部，负责印刷出版及发行业务。编辑部设在北京大草厂16号，负责采编及翻译业务。

具体参加杂志筹建和创刊工作的人员，还有顾锦心和从美国回来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李伯悌。顾锦心那时受宋庆龄的委派，作为中国福利会的代表，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建社的办公室主任。中建社最早在北京，挂靠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下面，办公地点（北京大草厂16号）属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原是他们几位负责人的家属宿舍。

我的感觉是，宋庆龄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先创办一份对外宣传的刊物《中国建设》，但是并不等于放弃她已着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她筹办《中国建设》，仍然是在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而先办一份刊物，正是作为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一项工作的尝试。在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的信件中，明确地表达出这一观点。宋庆龄欢迎爱泼斯坦夫妇加入机构："欢迎你们成为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的正式成员……顺便通知你们已分别被任命为《中国建设》杂志的执行编辑和助理编辑"。爱泼斯坦在回信中说："我们很高兴受到您的委托，能参与这项工作，并期待与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进行合作"。

宋庆龄委托金仲华具体负责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任命金仲华担任《中国建设》的编委会主任和社长。我就是在金仲华直接领导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宋庆龄十分信任金仲华，她希望由金仲华负责杂志的全部工作。但是，当时金仲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担子已经很重，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杂志上。因此，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公室，实际也是替金仲华具体执行与落实他所分管的有关中国福利会机构内的工作。

杂志创办初期的困难

《中国建设》创办初期，困难很多。首先是人分两地办公。北京

一摊是编辑部，由陈翰笙与爱泼斯坦主管，负责采稿、编辑；上海一摊是业务部，由金仲华挂帅，分推广工作组与出版工作组，由我与林德彬分管，主要负责印刷、发行等。每次发稿前，北京的编辑带着稿子到上海，排版、拼版后交付印刷。印刷厂校样出来后，再赶来上海校对等。每出一期杂志，需要在北京与上海往返多次，很费时，也很不方便。杂志周期拖得很长，还经常出现拖期现象。而且不仅人很辛苦，在工作上，由于沟通不畅，还容易产生一些矛盾。

造成分两摊工作的原因主要是宋庆龄坚持对外宣传的刊物必须在首都，要紧靠中央，信息要灵通，既要把握中央的大政方针，又要了解国际信息。但是当时北京没有外文印刷厂，所以杂志社只能分两地办公。

杂志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编委会。作为编委会主任，金仲华在中国福利会成立了编委会办公室，我是主任，林德彬是副主任。金仲华的想法是由这个办公室来替他总管北京与上海两摊。对此，北京的陈翰笙有些想法。他认为由编委会办公室领导编辑部是不合适的。

宋庆龄一直在努力沟通、协调，并设法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这些在那一时期宋庆龄与金仲华、陈翰笙以及爱泼斯坦大量往来书信中都有反映。

第二是人手不够。杂志创办初期，领导与骨干的编制都不在社里。《中国建设》杂志真正编制内的人很少。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顾锦心等的编制都不在中国福利会。爱泼斯坦夫妇初到北京时期编制也在《人民中国》，且主要工作精力也放在那里。由于《中国建设》开始是双月刊，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尊棋不肯放爱泼斯坦到《中国建设》来。而要求爱泼斯坦夫妇兼做《中国建设》的工作，每周到中建社来3天，后来同意放邱茉莉到《中国建设》做全职工作。

以后，领导决定把原来上海英文《大陆报》的印刷厂迁往北京，于是北京有了外文印刷厂。1953年5月，我们杂志社就把出版发行工作搬到了北京。

但是1953年时，上海一摊并没有全部搬到北京。当时有一部分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同时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困难，于是林德彬、陈

修征以及耿丽淑、王安娜等负责的推广部门仍然留在上海，我带着出版、发行部门先到北京。直到1955年才全部搬到北京。

建社初期，经费倒不缺，主要是缺人、缺房。

记得我们初到北京，就是找房子。作为一个单位，办公、住宿必须有房子才能安顿下来。

初期的编辑部只有10来人，打字、校对等挤在一间大屋子里办公。办公室是另一间大屋子，也是10来人，总共20来人。

干部的来源，初期都从上海调，但是上海干部不愿到北京来，同时我们要为他们解决住房等也很困难。后来我们就与高教部联系，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招聘。那时，佼佼者首先都被外交部、外经贸委以及其它对外单位挑走了。分配给我们的多半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所谓“只专不红”的。这一点，到了“文革”中，成了我“招降纳叛”的一大罪状。

杂志从创建初期就陆续聘请外国专家，是聘用制，不占编制，前前后后共计有93人，其中英文26人、法文20人、西班牙文19人、阿拉伯文12人、德文12人、葡萄牙文4人。这些外籍专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都是通过外国专家局聘请的。他们在各文版从事外文编译改稿工作，有时也为杂志撰写介绍中国的文章。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名义上虽说是我们的上级，但帮不上忙。我们开始办公的地方大草厂16号就是救总的宿舍，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前院让给我们了，再没有其他地方了。

建国初期，国家各大部委都开始在北京筹建，都需要房子。所以当初找房子很困难。几经周折，我们找到外交部街，买下了一个四合院，即外交部街52号，还零零碎碎找了几处家属宿舍。但后来上海那摊搬来了，房子又不够用了，就不得不求助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很照顾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后，给了我们皇城根的房子（东皇城根官房胡同40号）。直到1958年6月，我们才搬出东皇城根官房胡同40号，迁往阜城门外百万庄路24号外文局办公大楼。

1953年我到北京后成立了办公室，管行政、人事、出版与发行。此外，杂志社还有编辑室，专管编辑，由陈翰笙负责。当时陈翰笙的身

份是外交部顾问，编制在外交部，他每天上午来上半天班。

我们的上级单位，名义上是救济总会。但当时我们的编制还在上海，所以不但在业务上，即使在行政上，他们对我们也往往爱莫能助。而中国福利会远在上海，许多具体问题帮不上我们。我们就像个流浪儿，没有办法，只能孤军作战。

就说组织关系吧，我一到北京就去转党的组织关系，但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转。一个人闯到中南海中央组织部，中组部也不知道怎么办，让我把介绍信先放在我口袋里，等他们研究后再说。过了很久才通知让我转到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总支。那时社里除了我就李伯悌一个党员，连支部也成立不起来。但总算党的关系解决了。

那时候，政治运动很多，整天组织学习等。记得那时，每次参加党组织活动，我们总是与来自救济总会的残疾人一起开会，彼此都感觉怪怪的。

在北京工作的我们，与远在上海的中福会机关的上下级领导渠道也非常不顺。中福会机关管理我们的经费、干部任命、为我们定工资级别……但是又完全不了解我们的业务工作，也不理解我们所处地位的尴尬，更无法解决我们在北京遇到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往往拿上海的一套办法来管我们。譬如工资问题，我们是按照救总的统一布置，根据北京的标准来评定的，救总领导批准了，但中福会不认可，要按照上海的标准推倒重来。

比较熟悉我们又同在北京工作的顾锦心，是我们名义上的联系人。那时，宋庆龄委任她为中国福利会驻北京代表，要求她经常联系我们。但中福会机关不太同意，认为她是救济总会的副秘书长，与我们已不属于同一个单位。可中福会又管不了我们。再以后，顾锦心被调到宁夏红十字会去了，中福会就派来邹尚录接替顾锦心来担任中建社办公室的主任。但是交叉领导，总还是显得不顺。没多久，邹尚录就回上海去了。接着任命我为中建社办公室代主任，林德彬为办公室的副主任。

杂志社长期以来在业务上一直没明确由哪一个上级部门具体分管。那时，我们信息很闭塞，对政策不了解。每次发稿前，我都紧张、

担心，千万不要在政治上出什么差错。我们是宋庆龄创办的刊物，封面上印着主办人——宋庆龄。我们必须为她负责，要对得起她的名字，不能给她抹黑。

对外刊发的文章中，有些稿件很重要。我认为每一期交付印刷前，需要上级领导帮忙审核一下，特别是对外宣传的政策口径上，需要有人出面把把关。可是在北京，这事没人管。因为我们是属于宋庆龄的单位，谁也不敢插手。为这，我没少动脑筋，到处找部门，请求领导。

我找到中宣部，中宣部说，宋庆龄办的刊物，我们要尊重她的领导，我们是党的机关，不便出面干预审你们的稿子。可是我还是担心，就再次找到中宣部宣传处，说明我们的困难与审稿的重要性。去的次数多了，中宣部宣传处的同志看我是真心诚意，就说，这样吧，凡是你拿不定的稿子，就以个人名义送给我们看，我们也以个人意见告诉你。我们把意见告诉你后，你把我们的意见以你个人的名义提出来，不要说是中宣部的意见。我便如此操作，彼此心照不宣，不声张，悄悄地，感觉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

负责编辑部的陈翰笙对审查稿件一事很有意见。他虽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党员，也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新闻家，但因长期生活在国外，思想方式与行事风格已经洋化了，很随意，很自由。他完全不适应当时国内一套，特别是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他对涉及政策以及敏感问题的视角与尺度等不太能掌握。虽然有了中宣部宣传处同意替我以个人意见把关，但是当我以个人意见向编辑部提出后，不具有权威，说了不算。陈翰笙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有一段时间，为了稿件的审核意见，我们的关系弄得很紧张。

过了一段时间，中宣部也不愿意参与稿件的审核。我只好再继续另找上级领导。我找到了中联部。那时，王力是宣传处长，熊复是副秘书长。我有问题也直接去找他们，他们倒也给予我很多意见。但也是私下里，悄悄地进行。

总之，当时的感觉就是做地下工作，难度很大。

由于救济总会的工作性质和我们完全不同，后来我就争取把行政和党的关系转到文化部的出版局下面，我们经历的反右运动就是文化

部领导的。后来成立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于是又转到对外文委。可是，在对外文委，我们只是个挂靠单位，很多问题依旧解决不了。比如：办公的地方，职工宿舍……诸如此类。

为了找一个性质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娘家，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杂志社归口到外文出版局，这样工作比较顺。以上情况我都对宋庆龄反映过，多次诉过苦，宋庆龄同意了。于是我去与外文局谈。结果全部解决了。行政、党的关系都转过去了、宿舍也交换了。不过，外文局对我们也不是全管，他们不管我们的业务。当时国务院外办有个宣传组，我们争取到业务上由他们给予指导。具体联系我们的是组长辛冠杰与副组长王楚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就由我请示他们，有些稿子我们没有把握的，也送他们审。那时陈翰笙已经不管我们了，因为在反右斗争中外交部要把他打成右派，周总理就把我和李云找去，要听听我们的意见。记得周总理说，就把他当作一个半洋人对待吧，右派的帽子就不要给他带了，但是《中国建设》他就不要管了。

后来，上面派来了唐明照接替陈翰笙。唐明照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某局局长，编制在中联部。他在美国工作时与艾培很熟。他到任后，担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各方面关系处理的都不错。唐明照来后，我调到了编辑部，先任总编室主任，李伯悌为副主任，陈麟瑞为副总编，唐明照为总编。后来，我和李伯悌又被任命为副总编。这样，一切工作逐渐开始理顺，杂志工作也越来越发展。

唐明照不是天天来，而是有空来。日程工作基本上由我具体负责。特别是送审与定稿。外文局长是罗俊，他兼任外文局党委书记，我是党委委员。杂志社的干部主要由我们在北京当地找，通过高教部，招大学毕业生，改变了建社初期干部全从上海找的方式了。这主要也是从实际出发考虑，主要是方便，其次也免除了为职工解决住房、分居以及生活习惯不适应等麻烦。

我们的业务靠在外办还有一个好处，在于信息灵通。当时外办宣传组组织港澳报刊如大公报等老总定期开会，吹吹风、沟通一下信息等。每次开会时，也通知我去听听。廖承志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张彦经

常出席会议并主讲，有时陈毅也讲。外办召开宣传方面的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在业务上碰到问题，就直接去找宣传组，甚至直接请求廖承志帮助。

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宋庆龄十分重视杂志的推广与发行。首先，宋庆龄推举耿丽淑返回中国，专门从事推广与发行工作。其次，宋庆龄坚持主张走自己独立发行的道路。当时，所有对外的刊物、书籍皆依靠国际书店，而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与高效率，要求自己发行，以区别于官方渠道。第三，宋庆龄坚持亲自为杂志写文章，向知名人士约稿，以林泰的名字向国外友人邮寄每期杂志，带头做推广发行工作。

《中国建设》创办初期，发行与推广工作在上海进行。谭宁邦与耿丽淑都亲自做这方面工作，王安娜也被安排在推广发行部。我们通过国外的代销书店开展杂志的销售和征订工作。杂志重点发展订阅者，这些是我们的基本读者。他们经常来信，反映对杂志的评论、看法与要求。

自己发行的好处在于：一、与读者直接发生联系。针对读者来信，我们及时了解到读者的愿望与口味，帮助编辑调整采稿的方向与内容。二、我们对来信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规定回信不能超过两周。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代购物品等，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三、使发行与推广更加深入。我们坚持自己负责发行工作，可以根据杂志的特点策划推广发行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当时，全社上下都重视发行与推广工作，记得我们曾主动到各国际会议的会场去现场设摊，宣传推广我们的杂志。

事实证明，宋庆龄的决定是对的。《中国建设》的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其他中国的英文报刊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这一点也取决于《中国建设》杂志的性质——民间机构主办，不是官方的，读者对象锁定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是宋庆龄特别强调的。

周恩来总理多次对我们强调坚持非官方这个问题，告诫我们，一

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办的杂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颜色不要红，西方才能接受。周总理还告诫我们要内外有别，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区别，要和《北京周报》有个分工，这样读者才能接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周总理反复叮嘱，陈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强调，要求我们报道新中国各方面真实的信息，反映经济、文化、教育成就等等就行了，调子千万不要高。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陈毅曾给杂志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讲话。

记得在《中国建设》创办10周年时，也就是1962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的是我们杂志历年来每期的封面，要求参观者投票评选最佳封面。周总理、陈毅和廖承志都来看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正在批判复古思想；对外宣传口径也很谨慎。我们展出的杂志封面里，有一张是中国古钱。这是一张50年代的杂志封面，如果是在60年代，我们决不会选作封面。但是，廖承志偏偏投了这张封面一票，选它为最佳封面！我在一旁十分感动。我明白他的用意，他并非真正认为这张封面多么好，他的思想一向非常解放，一点不教条。他是以这个举动，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宋庆龄当年为杂志确定名字《中国建设》，英文Re就是新的、重建之意。能具体反映新中国各方面成就，这就是办刊的宗旨。这一点我们思想上一直很明确。

宋庆龄对杂志的关心

记得早期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还不多的时候，宋庆龄经常到办公室来，跟大家聚一聚，在花园里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亲切，就像慈母一样。

宋庆龄喜欢以英文写作，有时她为杂志写了文章，让我帮她提提意见。我也曾就一些史实上的问题对她的文章提出一些意见。她很谦虚，总能够接受。她的文风非常好，一点不八股，一点不教条。她的文章就像她本人，和蔼可亲，娓娓动听。她写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

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可以说是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

每期杂志我们都送给宋庆龄看，并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看后会及时提出她的意见，并且提的意见还很具体。有时她会主动提出增加内容等要求。

有一次，她提出批评，说杂志拖期太厉害。如果杂志不按期出版，到了美国就成了旧闻。她批评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新闻不新和拖期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杂志是月刊，一本杂志的出版有一个周期。比如8月号杂志，美国读者要如期收到，我们必须7月1日寄出。选题则从4月份就得开始，接着找人写稿，编排需2个月，当中如果需要将重要稿件向上送审，我们不能去催，何时答复我们无法掌控。印刷环节如果再出麻烦，杂志就会拖期。准备工作再提前，几个月前的新闻，等到读者拿到手时，已是昔日黄花，早已没有新鲜感了。

杂志早先是直接用英文写稿、定稿，费时很少。从1960年起，陆续增加了新的版本：西班牙文版（1960年1月创刊）、法文版（1963年4月创刊）、阿拉伯文版（1964年3月创刊）、俄文版（1966年1月创刊。1978年12月停刊）。版本多了，就以中文稿为母版，各语种从中文版翻译过去，不仅增加了工作量，经过层层翻译，文章的意思与文采也大打折扣，校对更是问题。我们对中、英文版本比较有把握，而对小语种，一一校对把关就力不从心了。比如阿拉伯语，我们当时曾开玩笑地说，阿拉伯语怎么样，只有“阿拉”知道。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与要求，我们积极整改，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个环节都采取了措施，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定了“死期”。在走廊里竖了一块大板，每篇稿子进行到哪一个环节了，一目了然。我们专门设了一个“催稿人”，每天检查，哪一个环节过了“死期”，就要去催。虽然此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但毕竟解决了按时出版问题。

宋庆龄对杂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印刷质量问题，责成我们要设法改进。我们和外文印刷厂商量，决定全部都用进口铜版纸。财政部很支持，为我们专门拨了一笔外汇从芬兰进口了一批铜版纸。后来由于外

汇紧张，只能改用国产的，但是印刷质量明显下降。我们为此又跑去山东的造纸厂和他们研究如何改进纸的质量。他们说主要是原材料中缺了一种从牛奶里提炼出来的干酪素，因而一上印刷机就要掉粉。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期间，哪里去弄干酪素？于是只能去求商业部。他们听说杂志是宋庆龄办的，很重视，千方百计为我们调了一些干酪素，总算解决了印刷质量问题。

宋庆龄始终关心杂志的编辑方针并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她前后共为杂志写了30多篇文章，题材广泛，包括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开展儿童妇女社会福利工作、保卫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合作与友谊，纪念孙中山、周恩来以及国际友人等。

她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她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她的意见与想法告诉我们。1961年1月，为纪念杂志创办10周年，她撰写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阐述了杂志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强调指出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就是继承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她有时把我们找去当面提意见，但大多数时间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对如何办杂志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宣传报道，她很在行，意见很具体，很明确。比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她要求我们的杂志必须刊登有别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文章。在爱泼斯坦要求她写有关于“三反”运动和细菌战方面的文章时，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这样的文章不适合由她来写。我们很尊重她的意见，一定遵照她的意见努力去做。

很多时候，宋庆龄是通过金仲华来关心指导杂志社工作的。宋庆龄与金仲华很熟，也很信任他。她常常通过金仲华来找我谈话，转达她对杂志的想法与意见。金仲华也很关心杂志，他从保盟时就参加《保盟通讯》中文版的编辑，一直担任机构的领导。因此，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况，也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困难。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抽空到杂志社来，及时转达宋庆龄的意见。

《中国建设》在出版5周年和10周年时分别办了两个展览会，宋庆龄特地邀请了周总理夫妇、陈毅、廖承志等领导人一起来参观，并接

见了全体工作人员，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说明她对《中国建设》的确是引以为傲的。“文革”中，宋庆龄对杂志不能正常编辑出版十分痛心，她在给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此。

而我则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就因为写的一篇《如何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强调要内外有别，有的放矢，不要照搬国内报章上的文章而受到冲击，被打倒并下放到农村，长达8年之久。在杂志社造反闹得最凶的，正是我们为了加强杂志队伍建设，强调走又红又专路线，专门招来并且花精力重点培养的一批年青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转眼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已经60周年了。当年在她领导下工作的一切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很自豪，能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曾参与了《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办与发展，亲聆她的教诲，亲身感受她作为一位伟大女性的永恒魅力和崇高精神。

宋庆龄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口述者鲁平为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整理者沈海平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见微知著：回忆宋庆龄二三事

章开沅

月明星稀，灯火阑珊，上海仿佛仍在沉睡。我独自伫立阳台，微风习习，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从小就是宋庆龄的“粉丝”。抗战前在芜湖读小学，抗日救亡激情弥漫于课堂内外，连家中不问政治的老祖父，也要我们阅读“上海大报”，关心时局发展。“七君子”被捕，孙夫人大义凛然，率众前往苏州探监，并且主动要求入狱以示抗议。消息传来，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感应。从这时起，我们幼小的心灵就沐浴在她的圣洁光辉中。

抗战爆发，逃难到四川江津乡下，进入为安徽流亡学生创办的国立九中。初中阶段，根本没有什么党派意识，但在学生中已经略显不同政治趋向。我们多数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破衣烂衫，形容贫寒。但同学中却有少数是难童保育院送来的，他们虽然也与家庭隔绝，却有公家发的整齐制服与洁白被褥，自然要引起我们的羡慕乃至忌妒。我们常常倚小卖小，怪腔怪调地模仿他们唱歌：“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我们的妈妈宋美龄。”那时大家都知道“宋家三姐妹”，其中蔼龄口碑最差，因为丈夫贪污、儿女骄纵。美龄虽然能干，但爱出风头，相当傲慢，也不讨人喜欢。我们这些弱小者，仇恨权势，向往正义，只有庆龄最符合青年叛逆期的偶像标准。

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并投入革命洪流，逐渐增加了对宋庆龄的理解与尊敬，但是从未奢望与她有任何接触。

直到1966年春节，我校老校长杨东莼以“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备委员会”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总算有了与孙夫人工作联系的机缘。我当时正处于困境，1964年10月因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除整天反省检讨还须随时接受无止无尽的群众批判。老校长一直同情我的不幸遭遇，所谓“借调”实乃变相救援，让我多少能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廖承志是综揽全局的秘书长，杨东莼任副秘书长负责学术筹备事宜。我的任务属打杂性质，除协助东老审阅几种重要书稿外，还要为廖公处理相关人民来信并代为回复。筹委会没有正式办公地点，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会议室楼上，里面摆满各地捐赠的重要历史文献，最重要的就是李根源家属送来的两大箱书籍和手稿，由我清理分类保管。当然，我的主要任务还是保证《孙中山选集》（两卷本增订版）与《宋庆龄文集》的终审与及时出版。但实际上也无非是代替两位秘书长仔细校阅出版社送审清样而已。由于前期工作非常扎实，我的事务并非那么繁重，不过也不敢有任何失误，因为东老嘱咐最后必须经过宋庆龄先生审阅。全国政协的年长同事谆谆告诫："孙夫人工作上要求严格，有时批评起来火气很大。"这些话使我颇为紧张，加以又是"戴罪之身"，始终未敢前往拜谒这位"脾气很大的老太太"。几部书稿最终定稿以后，只有恳求秘书处一并转呈。

整整有几天我都忐忑不安，难以估量"老太太"将有如何反应。幸好她很快就委托秘书转告，夫人已看过书稿，非常满意，可以送出版社付印。直到此时我才如释重负，总算圆满交差。不过，她也郑重吩咐，《孙中山年表》关于她与孙中山结婚的日期表述，应以正式婚礼为准，因为结婚证书是提前办理的。话虽不多，但我深深理解她对孙先生爱情的真挚，尽管出生入死、磨难困厄，毕竟是她终身难忘的最幸福的岁月啊！

我对她的畏惧心理荡然无存，她在我的心目中重新转变成为慈祥的老太太。不过这时北京风云突变，"文革"风暴突起，我被学校紧急调回武汉，接受新一轮更为严酷的批斗，离开北京的时候连向东老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如果没有"文革"，我仍留在北京参与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工作，说不准真会在某一天鼓足勇气去拜谒这位心仪已久的伟大女性。

"文革"结束，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又一次获得解放。苦心经营多年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付印。究竟请何人题写书名为好？编写组同仁一致主张恭请孙夫人，因为没有人比她更合适。于是由我以个人名义循既往惯例给她写信，除介绍集

体编撰的艰苦历程，还着重说明由她题写书名的特殊意义。不知为什么，信发出以后，我竟没有任何忐忑不安的感觉，相信她一定会欣然挥毫。果然，不过一个星期她就寄来题字，横竖两式，各写二张。秘书附言：夫人情绪很好，亲自写了好多张，最后选出这四张供你们采用。编写组同仁皆大欢喜，因为没想到夫人这样重视我们普通教师的唐突请求，而她的题字必将为此书出版大添光采。稍后，武昌起义纪念馆也委托我写信请她题写馆名，她慨然允诺并且很快把亲笔题字寄来，这更是对我们武汉辛亥革命研究者的亲切关怀与有力鼓舞。我们多么希望，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她能够前来看看她亲自题写馆名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即当年的湖北军政府遗址，是孙中山曾来过的地方）啊！

不料，此后不久，宋庆龄先生的病危消息正式发布，每天报纸上都有她高温不退的报道。我们与全国民众一样，痛苦如感身受，但也只能每天为她祈福。1981年5月29日，全国人民最为敬爱的当代伟大女性终于离开人间。这年10月中旬，我们在武汉隆重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由她题写书名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赢得与会海内外学者一致的好评，可惜她已经来不及看到我们寄给她的精美样书。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特地前往武昌起义纪念馆，纷纷在她亲题馆名前摄影留念，共同缅怀她这份永远不会磨灭的遗爱。

我与宋庆龄直接联系甚少，记忆所及也只有几件琐碎小事。但我仍然极为珍惜这些记忆，因为不仅显示出她对辛亥革命的一贯重视，而且蕴含着她对孙中山先生刻骨铭心的大爱。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她立即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1913年“二次革命”失利，她又挺身而出，前往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并肩战斗，共同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1915年10月在日本与孙先生结婚以后，“护国”、“护法”乃至北上和谈，始终伴随在孙先生的身边，成为他最为忠诚可靠的战斗伴侣。可以想见，孙先生在晚年的岁月，从她那里获取多少慰藉、关爱、理解与支持啊！

1984年春天，孙中山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故居邀请若干外地学者参观。当时孙夫人身边工作老人大多健在，他们亲自陪

同并详细讲解。卧室陈设如旧，床头框瓶中康乃馨仿佛仍带露水，那是新加坡友人新近所捐赠。我们循着她日常散步的路线，在鸽棚下与鱼塘边追寻伟人生活的踪迹，中午还品尝老厨师亲自制作的她平时喜爱的菜肴……我们留连往返，不忍遽离，但总觉得这里缺少一点什么，而又一时说不清楚。所以1993年在东京接受NHK《宋庆龄》历史记录片编导访问时，我脱口而出："夫人晚年似乎有点寂寞。"日本友人觉得有点突兀，惊讶说：好像只有你持这种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种感觉有点怪异，但却又长期挥之不去。

直到今年4月28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资深工作人员留我作半日盘桓，仔细瞻仰了陵墓、故居与纪念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那种"怪异"感觉其实并不怪异。因为北京什刹海故居实乃一处官邸，而上海两处故居才是真正的家。北京故居缺少的正是上海故居所独有的家庭温馨。官邸固然富丽堂皇，然而却与民众的市井相距甚远，深宅大院与警戒森严隔断了宋庆龄与民众、与社会，特别是与她所最爱的儿童的联系。所以我才替她感觉寂寞。上海故居保留着孙宋两人世界的浓情蜜意，保留着他们虽只10多年而已化为永恒的爱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仍然向来访的客人娓娓叙述着男女主人的生活细节。这里才是宋庆龄真正的家，她永远属于这个家，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并且安息在最疼爱她的父母旁边。我向陵墓献花，向宋庆龄的塑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默默地为她祈求冥福。

天人相隔，往事如烟。谨以心香一瓣，思念万千，纪念这位世界敬仰的伟大女性逝世30周年。

（作者原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历史系教授）

怀念宋庆龄

邓广殷

宋庆龄逝世至今已经整整30年。每当我想起我与老人家生命中最后十年的通信和交往的往事，不由自主地怀念、崇敬宋庆龄她老人家。我与宋庆龄的书信来往始于1971年，当时宋庆龄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去世，给我父亲写信，还寄来贺卡问候我们全家。我母亲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写信告诉宋庆龄后，她立刻来信安慰我们。而给宋庆龄的回信是由我写的，之后我们开始了书信来往，持续了近十年时间，直至她去世前几个月。这些书信我一直都精心地保存着。

而今，在她去世30年之后，为了能让世人更了解这位举世瞩目的伟大女性，我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将书信的内容公之于世，委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先以原件影印的形式，然后以中文版将书信辑集出版，并将书信原件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将书信原件捐赠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因为这样做是最尊重宋庆龄的意愿的。我作为宋庆龄的第三代友人，与她通信长达十年之久，对她有深深厚的敬意与感情。在她早年给我的信中，她这样写道："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你亲爱的父亲经常提到你为我们大家做这做那，让我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在1975年7月23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把你的家视作我唯一的对我如此之好，帮助如此之大的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好。" 因此，宋庆龄对我非常亲切和信任，视我如同家人，常在信中表达她内心的真实感受，谈她如何饱受病痛折磨，谈她对友情的珍惜，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朋友的关怀和祝福，对朋友的善意和友好所表达的感激，在她的来信中真切地表达了她对上海、对上海寓所的无限眷恋之情。

从宋庆龄的信中，我能感受到，在她的心里，北京是工作地，是"官邸"，上海才是她真正的家。我能够体会到，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在北京病逝的，从宋庆龄的内心而言，北京是一个易让她"伤心的地方"，

宋庆龄在信中还经常表露出不习惯北京的气候，觉得北京的寓所太大，没有“家的感觉”。如1972年12月1日的信中提到：“北京的天气零下8度，还刮风。我从来不喜欢大房子……没有家的感觉。我在给工厂节煤这一事实足以让我有理由在南方过冬。”1972年11月她一回到上海，就给我写信说：“我刚刚到家，发现气候清爽，我很喜欢。没有讨厌的刮风！我的小花园很怡人，有高大香樟树，鸟儿在上面筑巢，清晨鸟儿歌唱。我的管家说它们似乎知道我回家了，一直在歌唱！”

她在给我或其他友人的信中提到上海寓所的时候都称之为“我的家”，回上海寓所就是“回家”，信中还经常在home下面做下划线，着重强调了家的意义。这些都表明宋庆龄对上海的家有无限的依恋。

上海是宋庆龄出生的地方，她生前也多次表示去世后也要安葬在上海她父母的身边。宋庆龄逝世后，我每次到上海，都会去她的墓前祭拜，都会到她的家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去看一看。在她的家中，我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她生前的原样，所有的文物都得到细致的维护和保养，宋庆龄遗赠给我，而我捐赠给国家的书籍在这里得到了精心妥善的保管；我也看到宋庆龄生前常与我提及的“藏酒”，在上海的故居经过特殊处理，保存得非常妥当，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萌生了将宋庆龄给我的英文信件放在上海故居保存的想法。

作为宋庆龄非常信任的晚辈和友人，在与她多年的通信与交往中，我能深刻体会到她对上海以及上海寓所的这种特殊的感情，相信她也希望自己的遗物最终能放在自己最眷恋的家里。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多年来在文物保护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纪念馆全体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将她给我的英文亲笔信放到上海她的故居保存，既是尊重她的意愿，也寄托了我对她的崇敬和怀念。相信这些珍贵的资料在这里会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史料研究的价值。

再者，北京官邸也是我伤心之地。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五月十四日晚，突发寒颤高热，热度达40.2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

5月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做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叔婆Grand Aunty您觉得怎样？" 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为Grand Aunty 的专用语。当廖承志与宋庆龄交谈时，她强睁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她说话时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 宋庆龄指的是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弥留之际的宋庆龄喘得很厉害，要说一句完整的话极为吃力，廖承志很紧张地俯身侧耳去听。他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话了，说道："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烧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容，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向人们解释道："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画了简单图样。"

她昏迷后，我突然接到北京有关方面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潘静

安先生的紧急通知和送来的机票，让我即刻赶往北京。5月26日，我买了一束宋庆龄喜欢的花飞往北京，一到北京立即被她的警卫秘书杜述周领到老人家病榻前，我说“太婆Grand Aunty，我看您来了”。据杜先生说老人家睁了一下眼。杜说这是她生前最后睁眼。

我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宋庆龄病榻一侧的人。于是，我每天去探视，直到宋庆龄逝世。老人家逝世后，遗体被移到官邸的大厅安放。人民日报第二天详细报道这一场面的仪式，并登有家属排队守灵的图片。图片登了每个人的名字，包括“邓广殷”。但图片附注还说明每个人的身份，唯独没有本人的说明?!

老人家遗体被专机送到上海下葬，丧礼的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当年宋庆龄让我勿将她给我的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我只字不提遗嘱。葬礼完毕，奔丧队伍飞回北京，到京后就解散了，我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我不要走，在北京饭店再多住些日子，也没有说明原因!

我在北京饭店没事天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吃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皇粮。有时，我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有一天我母亲向廖承志要人，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香港？于是，廖承志把我叫到他家，关上门，问我，有无宋庆龄的遗嘱？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我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我答，有的。但我未带在身上，事实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廖承志问我怎么办？本能告诉我，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我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由于我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我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廖承志要求我依葫芦画瓢，我马上照抄一遍，并签上我的名字。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我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我可以返回香港了。

多年后，在邓颖超的催促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简单的捐赠仪式，北京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康克清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

2010年5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馆长的安排下，我在上海嘉定古猗园很高兴与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之一，如今唯一健在的81岁高龄的李家炽先生见面长谈。他在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上海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深得宋庆龄的信任，现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顾问。2008年3月17日《世纪》杂志刊登了他的回忆，向世人披露了当年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我向他求证当时他们有没有见过宋庆龄给我的遗嘱。李家炽先生回忆，宋庆龄把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钥匙交给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在宋庆龄去世后，钟兴宝就把钥匙交给了中央派来的同志。那天八人临时小组开会时，让大家传阅宋庆龄从1979年2月起写的几份遗嘱。在他的印象中，遗嘱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遗嘱都很简短。但是，他没有见到宋庆龄单独写给我的遗嘱。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中，即她处置自己遗产中提到赠书一事。李家炽至今保存着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办法》共有六点内容。其中第五点是：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我至今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我的藏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2010年4月，我和我的儿子、幼女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馆长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上海档案馆租下的库房看到了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我仔细地看了这些藏书，很珍贵，保管得很好，我感到很欣慰。

宋庆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1975年2月，北京一带传闻有地震，宋庆龄于是立遗嘱，嘱在其身后将所藏书籍赠我。在接到宋庆龄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时，我十分紧张，也十分感动！我被深深地震撼！不是为得到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为宋庆龄在北京即将发生地震这一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展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体现出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我十分钦佩，难以忘怀。

至于宋庆龄给我的那份遗嘱，我认为体现了宋庆龄对我的情谊和她的一贯为人，即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小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宋庆龄婆婆我永远敬爱您！

（作者为宋庆龄友人邓文钊之子）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宋庆龄英文档案选译

李玉贞 译注

译者按:

下译第一部分宋庆龄致鲍罗庭的7封信中译文曾经发表于《档案与历史》杂志2004年第1期,其依据是2003年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问题》杂志第3期上的俄译文。译者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觅得原件后,认为有必要依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和注释。另补孙中山1924年10月12日致鲍罗庭短信,附于宋庆龄1924年10月12日致鲍罗庭函之后。

下译第二部分宋庆龄1927年11月在莫斯科的讲话,曾在盛永华女士主编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383页)中提及,今同样据原文全部翻译,以飨读者。

第一部分:宋庆龄致鲍罗庭[1]函

1. 1923年10月28日,广州

亲爱的鲍罗庭:

[1] M. M. 鲍罗庭,全名米哈伊尔. 马尔科维奇. 鲍罗庭(Бородин 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1884—1951),原姓格卢津贝格,苏联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曾获得红旗勋章。20世纪初长期旅居瑞士和美国,并在那里开展革命运动,参与美国社会党的建立,其左翼后来发展成美国共产党。1919年开始从事共产国际工作,是其重要的情报人员。1923年到中国,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7月回国后担任副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副社长。1932年起为《莫斯科新闻》主编,其间(1934—1949)兼任苏联情报局总编辑,因斯大林开始排斥犹太人,鲍离开情报局职位,再后《莫斯科新闻》被关闭,鲍罗庭遭枪杀。死后恢复名誉。

烦请替我们将信中所附电报[1]转交越飞[2]先生。我们为他患病甚感不安。

十分感谢。

孙宋庆龄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27页。英文手稿。

2. 1924年5月14日，广州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孙博士嘱我写信给您并催促您尽快回广州，因他有许多事情要同您商量。他说，您和加拉罕[3]先生再在北京待下去毫无用处，因为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4]

孙博士因工作劳累有几天身体不适。虽然他现在感觉好一些，医生也还是嘱咐他不要履行公务和接见客人。他生性是个闲不住的人，让他闲下来很不容易!

我十分高兴在上海见到鲍夫人，希望她不久能陪伴您来华南。

盼望尽快见到你们二位，并致衷心问候。

孙宋庆龄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111，案卷26,，第17、11页。英文手稿。

---

[1] 档案中未见电报。

[2] 越飞（A.A. Иоффе，1883—1927），苏俄外交家，很受列宁重视。1918年参加苏德布列斯特谈判。1922年8月到北京，担任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在北京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两国复交问题。1923年1月中旬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数次，1923年1月27日在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是月底离华。1927年因不堪苏共党内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激烈斗争而自杀。

[3] M. M. 鲍罗庭是作为加拉罕的助手于1923年来中国的，加拉罕驻北京，是正式外交代表，鲍罗庭的使命是同国民党联络。加拉罕（Л.М. Карахан，1889—1937），1923年9月担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代表，1918—1920年、1927—1934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24年7月31日起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年9月回苏联。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杀。

[4] 此时加拉罕正与北京政府谈判两国复交。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领导人不愿意看到苏联与北京政府达成某种协定，但1924年5月31日苏联还是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3. 1924年9月9日，广州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孙博士想知道，您是否认为基尔博[1]的《列宁生平》是一本好书，因他想尽快将其出一个中文版。

孙宋庆龄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24页。英文手稿。

4. 1924年9月26日，韶关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孙博士嘱我告诉您，他不能按先前决定于本月28日回城，[2]主要原因是，第一，10月1日这里要举行支持北伐的群众游行，孙博士要当众发表演说。第二，这是对付张作霖和卢永祥的关键时刻，孙博士若离开军队集结地，会挫伤士气，使官兵失望。所以他回广州的时间应当予以推迟，静待事态发展。

再者，孙博士相信，我们首先在此地开展民众工作肯定会好一些，因为人民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在这里取得的成果，也将对广州产生良好影响。由于我们近期的宣传，广州人民对我们有敌意，对我们来说，明智的做法是等待他们的不满情绪消退后再行动。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怕他们。

祝万事顺遂！

孙宋庆龄9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10、18、19页。英文手稿

5. 1924年9月26日，韶关[3]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

[1] 安利·基尔博(1885—1938)，法国左翼诗人，与加香一起创建法国共产党，著名记者，长于写时论。

[2] 指广州市，当时鲍罗庭在那里。

[3] 原件未写日期，据“孙博士想让我告诉你，他还不能回广州”一句判断，此信与第4号文件可能写于同一天。

孙博士要我告诉你，他还不能回广州，因为这里的形势千变万化。一些部队相继前来参加北伐。今天早晨我们写了一封信，请宋子文[1]转交，信中解释了何以必须推迟行期，想您已经收到。

祝万事顺遂!

孙宋庆龄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20页。英文手稿。

6. 1924年10月12日，韶关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孙逸仙博士嘱我写信将以下两事相告，第一，为保住广州，他只能对那里的事态装聋作哑。因为商团军占上风，而且能够左右局势。如果把争议激化为危机，那么迄今为止还对我们友好的分子也会转而反对我们。范石生[2]、廖行超[3]、杨希闵[4]和李福林[5]辈会立即站到他们一边，反对我们。很清楚，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战胜他们。

目前，我们的威信也将受到损害。明知是苦果，我们也要吞下。但是，如果罢市再持续一段时间，那就非取严厉措施对付他们不可了。

第二，关于关税问题，[6]孙博士主意已定，要把事情推至极限，[7]

---

[1] 宋庆龄胞弟宋子文当时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

[2] 范石生（1887—1939），时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

[3] 廖行超（1895—1972），时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师长。

[4] 李福林（1874—1952），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1924年3月由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为东莞、番禺、顺德剿匪司令。9月，受命督办各省民团，又被任命为广州市市长兼警备处处长。

[5] 杨希闵（1886—1967），1924年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任建国滇军第一军军长。

[6]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关税权落于帝国主义手中，不仅税率由外国人掌握，海关也在外国人手中，总税务司赫德和安格联均为英国人。1920年11月孙中山第二次回广州后，粤海关即拒不拨付，藉口是岑春煊于是年10月24日通电声明南北统一，广东军政府取消，故关余应拨交北京政府。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回广州时，原按关余13%应分得的383万元却没有划拨广州政府。孙中山令外交部长伍朝枢向海关交涉，并照会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指出务必支付此款。孙中山写此信时正值伍朝枢同有关方面交涉中。

[7] “极限”指伍朝枢传达孙中山意图，若公使团执意不按规定交付广州政府应得的13%关余，则采取强硬手段，派员接收海关。得悉孙中山的强硬表态后，列强先是派军舰至广州水域以示威胁，后答应照付，为了面子，称此款乃作为整治广东西江河道之用。

如果不致诱发危机，那么我们肯定就能保住广州了。

孙宋庆龄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25、14页，英文手稿.

附录：孙中山致鲍罗庭函（1924年10月12日）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许[1]将军同意我的新计划，我将改变原拟调拨武器至韶关的计划。廖仲恺会向您介绍我的新计划。我想这是应付当前危机的最佳办法。

孙逸仙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12—13页。英文手稿

7. 1924年10月13日，韶关

亲爱的鲍罗庭先生，

孙博士嘱我写信告诉您，廖仲恺先生昨天给他的报告让他感到，对广州当前的种种事态装聋作哑并不能保住广州，只有靠制造恐惧和恐怖管治才行。

鉴于这种形势，孙博士决定立即行动。昨夜他已经派吴铁城将军的部队回广州。官兵将枕戈待旦，听候委员会[2]的调遣，但是他们需要接受更多的街垒战训练，所以孙博士希望您派遣贵国专家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最近到的一批武器和装备，[3]按先前决定，不必转运到韶关，也不会用于补充许崇智将军所部的装备，除非他答应立即出兵参战并执行

---

[1] 即许崇智(1886—1965)，广州市人。辛亥革命期间参与福州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后随孙中山处理军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3月，任建国粤军总司令。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1939年，迁居香港。1965年1月25日病逝香港。

[2] 指的是在商团与广州政府冲突炽烈时，孙中山决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谭平山。孙中山本人为会长。10月11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庭为该委员会委员，并赋予其在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

[3] 指1924年10月8日由苏联“沃罗夫斯基号”运输船送到广州的一批苏联给国民党的武器。

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命令。此战目的在击败叛军和绥靖商团。

孙宋庆龄敬上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1111，第15—16页。英文手稿。

第二部分：宋庆龄1927年11月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
孙逸仙夫人在东方国家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孙逸仙夫人：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聚会，不仅仅是欢庆这个伟大国家十月革命胜利的十周年，而且要考虑我们同它的关系。

苏俄革命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说十月革命是历史上最辉煌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其国内和国际的意义。就国内而言，它使俄国人民摆脱了沙皇和俄国资本家的桎梏，也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桎梏，就像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帝国主义也开始在俄国颐指气使。革命给工农群众，给落后民族，给妇女带来了新生活。我途经高加索的时候亲眼见到，十多年前还目不识丁的妇女，如今已经大量进入政府和国家机关任职。我见到十年前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工人和农民，今天正在建设新生活，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国家。是的，他们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他们有母婴保健，有社会保险，村子里的图书室，工厂里的工人俱乐部，这一切使边远不开化地区的孩子们得到了接触最新技术、文化、科学和艺术的机会。

就其对于生活在苏联的人而言，十月革命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更加明显，它给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带来了希望，世界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一度步步紧逼，把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十月革命首次令其止步。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那些往往盲目而无望地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看到了，像自己一样落后，备受压迫，食不裹腹，生活无着的俄国工农，面对

[1] 为迎接十月革命十周年，苏联组织大型纪念活动并邀请许多国家代表前来参加。这是宋庆龄在东方国家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件未标示日期。

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是只能招架而无回手之力的。

所以，我们还怀有希望，我们开始相信，这个迄今横行于世的庞然大物是可能被打倒的。我们自问，应该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利用哪些力量的联合才能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我们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甚至大于其国内意义。

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要让中国人民摆脱本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意也是求中国未来的发展，并非要使我国私人资本先达到西方国家的高度，由其控制国家和压迫人民。相反，从一开始就要把所有重大的企业与公共事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使广大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受到教育，最后由他们当家作主，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并监督之。对于我们在中国的革命斗争，苏俄做出了历史性的承诺，首先是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归还沙皇侵占的土地；第二，是给予中国谋求自由解放的革命者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协助。苏俄这样做并非出于利己主义动因。它为此是真正做出了牺牲的。它将此视为其帮助世界被压迫人民为自由而战的神圣历史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代表，我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为此我们应该团结协作，全力推翻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我们还应在世界范围内互相理解，借鉴彼此的经验教训，同甘共苦，这样我们才能最后达到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是首次取得辉煌胜利，它首次向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亮出战牌，首次点亮了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之光。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以下决议。[1]

译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9，第3—5页。英文打印件。

（译注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未见决议。

附录

Part One：Letters from Soong Ching Ling to Mikhail Borodin

1. 28th Oct. 1923, Canton

28 Oct. 1923

My dear Mr. Borodin:

Will you please be so kind as to dispatch the enclosed telegram to Mr. Joffe for us, as we are quite anxious over his illness!

With many thanks,

Yours sincerely,
R.S. Sun
Mrs. Y. S. Sun

РГАСПИ, ф.514,оп.1, д.26., л.27

2. 14th May 1924, Canton

14 May 1924

My dear Mr. Borodin,

Dr. Sun asks me to write & urge you to return to Canton soon for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upon which he wants to consult with you. He says it is hopeless for you & Mr. Karahan to prolong your stay in Peking for nothing good will result from it.

Dr. Sun has been sick for several days according to strenuous work. Although he is feeling much better now, still the doctor orders him to refrain from attending to his usual duties & seeing callers. With such an active nature as he possesses, it has not been without difficulties to keep him dorm!

I had the great pleasure of meeting Mrs. Borodin at Shanghai and hope that she will accompany you down so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leasure of seeing you both soon & with kindest regards from us.

I am,

Yours sincerely,

Rosamonde Sun

Ф. 514, оп.. 1111, д. 26, л. 17, 11.

3. 9th Sep. 1924, Canton

9 Sept.1924, Canton

My dear Mr. Borodin:

Will you please let Dr. Sun know whether you think Guelbean's "Life of Lenin"

is a good account, for he wishes to have it published in to Chinese soon ?

Very sincerely yours,

R. S. Sun

РГАСПИ, ф.514, оп.1, д.1111,л.24

4. 26th Sep. 1924, Shiu Kwan

Shiu Kwan,

26 Sept. 1924

My dear Mr. Borodin,

Dr. Sun asks me to inform you that he can not return to the city on the 28th inst, as first decided upon,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the popular demonstration fo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ill take place here on the 1st of October, when Dr. Sun must be present & address the masses. (2) As this is a critical time with Chang Tso-lin & Lu Yung-hsiang, Dr. Sun's departure from the concentration campaigns, at this time, demoralize their troops & discourage them. So his return will have to be postponed until events develop further.

Furthermore, Dr. Sun believes it will be better for us to start working among the people here first. It will certainly be easier, for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towards us, the good results we get from here will be later reflected in Canton. As the people in Canton, are hostile towards us, due to recent events and agitations, it would perhaps be easier for us to wait until their antipathy subsides. As it is, they might suspect us of weakness & fear of them.

With our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R. S. Sun

РГАСПИ, ф.514, оп.1, д.1111,л.10、18、19

5. 26th Sep. 1924, Shiu Kwan

Shiu Kwan

Dear Mr. Borodin:

Dr. Sun desires me to inform you that he can not return to Canton yet, as the circumstances here are developing so rapidly. More troops are coming up to join the expedition.

We sent you a letter in care of Soong Tse Veng this morning, explaining reasons for the necessary postponement which we hope has already reached you.

Our best regards,

Your Sincerely,

R. S. Sun

Ф. 514, оп. 1, д. 1111, л. 20.

6. 12th Oct. 1924, Shiu Kwan

Shiu Kwan
12 Oct. 1924

My dear Mr. Borodin:

There are two matters about which Dr. Sun asks me to write you: (1) that the only way to save Canton is for him to remain deaf and blind to all the acts there. For the merchant volunteers have the upper hand and hold the key to the situation. If by provoking the issue to a crisis, some hitherto friendly elements will turn against us. Men like Fan Shek sang, Liao Hengcho, Yang Shiming & Li Fuk Ling will at once side with them against this combination, it is evident we have not the least chance for success.

For the time being, our prestige will suffer. We have to bear that, although bitter. But if the strike should be continued after the time limit, chastise measures must and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m.

(2)Reporting the Customs question, Dr. Sun has decided to push the matter to the extreme and if that does not provoke a crisis, then we can be sure of holding Canton secure in our hands.

Your sincerely,
Rosamonde S. Sun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1111, л. 25, 14.

Appendix: Sun Yat-sen to Mikhail Borodin (12th Oct.1924)

Oct. 12, 24

My dear friend,

If general Hsu agree[sic] with my new plan. I will change my former plan of transporting arms to Shiu Kwan. Mr. Liao will tell you what my new plan is. I think it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crisis.

Very truly yours
Sun Yat-sen

РГАСПИ, ф. 514, оп. 1, д. 1111, л. 12、13.

7. 13th Oct. 1924, Shiu Kwan

Shiu Kwan,
13 Oct. 1924

My dear Mr. Borodin:

Dr. Sun asks me to write you that certain reports which Mr. Liao Chungkai gave him yesterday caused him to think that been keeping himself blind and deaf to all the acts going on in Canton cannot save Canton, but only fear and a reign of terror can.

In this connection. Dr. Sun has decided to act at once. Last night he sent back General Wu Techen's troops to Canton. These men will receive orders from the Committee, but they need more training in streets fights, so Dr. Sun hopes you will put your experts to give them some training in this respect.

The recent batch of arms & ammunitions will not be removed to Shiukwan, according to former decision, not will be employed in rearming General Hsu Chung Chi's troops, and the condition that Gen. Hsu fights at once, and carries on whatever measures the Committee decides upon. The object of this fight is to crush the traitorous army and the rebellious merchant volunteers.

Yours sincerely,

R. S. Sun

РГАСПИ,Ф. 514, оп. 1, д. 1111, л. 15-16.

Part Two: Address of Soong Ching Ling to Commemo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Nov. 1927

Address of Comrade Madam Sun-Yat-Sen to the Conference of Eastern Delegates

MADAM SUN-YAT-SEN:

Comrade and friends, we are meeting on this tenth anniversary not only to join in friendly celeb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chieved by a great nation, but also to consider our own relation to it.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Why i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most glorious in history? It has an internal and also an external significance. Internally, it freed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Russia from the yoke of their own tzardom and their own capitalists and also from the yoke of foreign imperialism which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penetrate and dominate Russia as it has dominated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It brought new life and hope to workers, to peasants, to the backward nationalities, and to women. I have myself seen in my trip through the Gaucasus, how women who a decade ago could not read and write, are today participating in large number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nd. I have seen how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Russia, who ten years ago were the most backward in Europe, are building a new life for themselves which socially is far in advance of the life of other nations. Yes, they have already built much of, with their care of motherhood, their social insurance, the reading huts in the villages, and workers' clubs in the factories, which give to the children in the darkest distant spots of the land the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o the latest technique and culture known to science and art.

But this internal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great as it is and glorious for those who live in the Soviet Union, is perhaps less great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an the external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hich gave new hope to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The dominance of world capital and world imperialism which had advanced step by step until it had brought under its oppression the lands of Asia and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as first check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is became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 history. The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had been struggling blindly and often without hope for some measure of freedom, saw how year by year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Russia, backward also like themselves, oppressed like themselves, hungry and without sufficient means like themselves, were none the less able to beat back the combined forces of world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So we also took hope, we also began to believe that this hitherto unbeaten colossus might be beaten. We began to ask ourselves by what form of organization and what combination of forces it was possible to achieve our freedom as the Russians had achieved it. We began to wish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more glorious for world history than even the internal benefits it gained for the people of Russia.

The purpo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also to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also to free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their own capitalism and militarism. The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is forecas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do not contemplate that our land shall allow even our own private capitalism to attain those heights which in western lands have enabled it to control the state and oppress the people, but rather that all important enterprises and public utilities shall from the beginning be state-owned and that the great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shall be rapidly organised and educated, to the end that they may themselves decide and control the future form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our struggle for our revolution in China, Soviet Russia has accepted and proved its historic mission, first, by cancelling 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returning the lands taken by stardom, and secondly, through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ooperation given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ists in our attempts to free ourselves from our many yokes. Soviet Russia has not done this for selfish reasons; she has indeed mad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do it. She has done it as an inevitable part of her sacred and historic mission in helping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The present important work of the oppressed nations, in which we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are interested, is the attainment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For this we must cooperate, one with the other, in our efforts to overthrow foreign imperialism, which is world-wide in its power. We also must be world-wid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struggles, the reasons for each other's failures or successes, to the end that by such cooperation we may attain the freedom of all the oppressed people. We must recognise our own revolutions not as isolated, but

as parts of a world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the first and glorious achievement, the first check to hitherto victiorious imperialism, the first light of hope to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I therefore have the honour to introduce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

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档案资料选译

宋时娟 王志鲜 译注

【编译者按】杜克大学宋耀如档案资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该校档案馆所收藏的宋耀如文献资料，即“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参考资料”，共有4个文件夹，由档案馆工作人员向各方征集所得，共230件，时间跨度从1882年到1995年，内容有宋耀如在1880年代写给美国朋友的信和1915年写给宋子文的两封家信，其他的资料多是关于宋耀如直接或相关的出版品、报刊文章和剪报，最早的是1904年宋耀如将偕女宋蔼龄赴美访问的一篇报道，最晚的是1995年教会内有关人士撰写的宋耀如皈依基督教事实的考证文章，其中较多内容是1940年代以宋耀如或宋氏家族为中心的报道、回忆文章等，刊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地方报刊如《达勒姆每日太阳报》、《达勒姆晨报》、《基督教倡导者》等。二是杜克大学珍稀图书、手稿和特殊收藏图书馆中的宋耀如文件，这部分内容较少，多是宋耀如早年书信，应为杜克大学原有馆藏。杜克大学收藏的宋耀如的8封书信已经刊发在《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此次选译的6篇关于宋耀如的报道文章和3封书信，均来自“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参考资料”，文末附上“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参考资料目录”（网上下载），以供读者参考。文稿中的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苟同，但为了反映出资料的全貌，我们没有进行删改。

文稿由宋时娟、王志鲜翻译，宋时娟校注。

第一部分：报道文章

1.《据可靠消息称：查理·J·宋牧师将偕女爱丽丝小姐访问本市》

几年前，圣三一监理公会[1]主日学校曾经负责宋查理的教育，他

[1] 监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简称“监理会”，美国基督教新教循道宗（又称“卫斯理宗”）的南部教会，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1939年与美以美会、美普会合并，称“卫理公会”。1941年上述在华三会亦合并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是由威明顿的T·佩奇·里考德牧师带来并介绍入校的。该校及友人们资助查理上学，并连续几年供其所需。他们送他进了圣三一（学院）和范德比尔特（大学），随后他返回中国。在中国，他曾是一名对我们教会和传教士颇为有益的人士，曾经为基督教而辛勤工作。两年前，在中国担任传教士近30年的里德博士从中国来到这里，盛赞查理以及他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本周收到查理来信的朋友们，得知他要送他的大女儿爱丽丝，到乔治亚州梅肯市南部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接受全面教育。在威斯里安接受良好教育后，她会选修医学课程，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在中国妇女儿童中间充任医学传教士。她是一位聪明的女孩，会在美国接受系统教育，为医学博士学位做好准备，再回到中国去。宋查理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他依然是教内的好朋友，大力投身于推动基督教事业的发展。目前，他担任李鸿章侄子的私人秘书，李鸿章也许是中国最显赫的人物。查理懂得经世致用，站得高，是有用之才，能力很强。他的女儿爱丽丝很有可能会在明年夏天或者期间一段时间，来拜访达勒姆的朋友们。查理非常好，还记得朋友们，并向他所有的朋友，包括圣三一堂和圣三一主日学校的朋友们问好。

（原载《达勒姆每日太阳报》1904年7月20日）

2.《宋查理的传奇》

在东方近代历史上，也许没有哪个家族比中国的宋氏家族更为出名或影响更为深远的了。这个家族现在常被称作“宋家王朝”，要迅速理解它的强大，就得记住：它的创始人，是孙逸仙创立中华民国的得力助手；他的妻子，曾经的倪小姐，是一位极具伟大人格的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的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和宋子良多年占据国家要职；他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接受美国教育后，分别嫁给中华民国的两位总统——孙中山和蒋介石；另外一个女儿蔼龄，嫁给了孔祥熙——富有的孔子后裔，现在是中华民国一名内阁成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描述一些鲜为美国人民所知的宋查理的生平往事。

在美国，最先真实描述宋查理早期生平的是一本名为《新闻是我

的职业》的书，由埃德娜·李布克撰写，麦克米伦出版社1940年发行。根据这本权威之作，宋嘉树（宋查理回到中国后，“soon”后面加了字母“g”）出生于中国广东南部沿海的海南岛葵山村（village of Kuisan），是家里三个兄弟中最年幼的一位。他过继给一位无后的舅舅，养父——舅舅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买卖兴隆的丝茶生意。舅舅把年幼的他带到美国，以教他进口丝茶到波士顿港口的业务。很显然，他的心思并不在舅舅的生意上。1880年夏天的某一天，查理漫步于波士顿码头，看到美国“斯凯勒·科尔法克斯”缉私艇停泊在码头里。他偷偷上了船，和查理·琼斯船长攀谈起来。查理·琼斯船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次只要“科尔法克斯”号停泊在威明顿海港，他都会参加威明顿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的祷告仪式。琼斯船长对这个聪明的中国男孩产生了兴趣，当“科尔法克斯”号向威明顿港出发时，他便带上年少的宋嘉树到船上做客舱服务员。

在“科尔法克斯”号船上，宋嘉树向海员们学习如何制作吊床。后来他主要通过制作吊床并把它们卖给美国南部诸州的居民，来维持生计。然而在“科尔法克斯”号上的经历，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和琼斯船长的交往，琼斯船长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当地人，监理公会教派的一名成员，深切关心自己门徒精神世界的幸福。在神的手中，仁慈的琼斯船长在威明顿带领这个小男孩接受了某种影响，导致他后来在1880年夏末或初秋皈依基督教。

依据现有资料记载，宋查理大概于1880年11月1日，或许更早几周，乘坐“科尔法克斯”号抵达威明顿港。最初的报道刊登在《威明顿星报》上，报道称，宋查理在1880年11月17日星期日这天接受洗礼并入了教。毫无疑问，这件事发生在复兴运动结束之际，他抵达威明顿时，运动正在进行中。当时年仅18岁的玛丽·查德威客太太，结婚前名为玛丽·波特，现在依旧记得，查理到达的那个晚上，自己在汤姆·拉姆齐太太家见到了他。入教仪式结束后，宋查理陪同琼斯船长一起来到汤姆·拉姆齐太太家。玛丽·查德威客太太还记得这个中国男孩如何和在场的每个人握手，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找到救世主的，如何想回到中国去传播耶稣基督的救赎。

住在威明顿第五街和伍斯特街的交界处的伊丽莎白·豪威尔太太，作为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的一名成员，那晚也参加了宋查理的入教仪式。当他从圣坛起身时，其他受洗者还跪着，他看上去相当开心，容光焕发。

豪威尔太太想起了查理在几天后的一个周日下午教堂集会上所发表的一番激动人心的誓词。在誓词中，他向教会成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对一名来自异国的年轻人如此关切；他表示要获得教育，以便能以传教士身份回到自己的祖国。乔西·豪威尔太太也是第五街教堂的成员，回忆起查理在教堂主日学校当学生并定期参加教堂礼拜时，她常常会见到他。她和查德威克太太记得，查理从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来到威明顿市，第五街教堂会员们还赠给他一本圣经。不久，1885年夏天，宋查理便踏上回国的征程。

1931年1月29日刊登在《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上的一篇文章说，“1880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身兼牧师和圣三一学院院长的克雷文博士带着宋查理来到监理公会教堂。当地一些年长的居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监理公会多年使用的学院古老小教堂里举行的这个仪式，甚至对克雷文博士的布道内容‘你们应该把福音传给世界上所有的生灵’记忆犹新。”圣三一教堂是圣三一学院最初的校址，靠近海波因特。该文发自那里，但不够准确，原因有以下几点，

1. 1881年6月9日，圣三一学院院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博士在给学院董事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在威明顿召开的上一届会议上，佩奇·里考德先生建议我接收一名中国男孩。最后经过充分准备，宋查理大概在两个月前来到了这里。……达勒姆主日学校负责他的食宿，我们学院就负责其余的部分。”根据这份官方报告，宋查理大约在1881年4月1日进入圣三一学院。因此，不可能是“1880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被带到监理公会教堂。

2. 1880年11月7日《威明顿星报》这样报道，“该教堂上午将举行一场庄严的洗礼仪式。接受洗礼的教徒中有一位中国人，这可能是在北卡罗莱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名天朝人。”

1880年11月9日星期二，该报刊文说：“上周日上午在第五街监

理公会教堂举行的洗礼仪式，也就是本报上次报道过的有一名中国教徒接受洗礼的仪式，据说异常感人。这名年轻人的中国姓是‘宋’，教名查理·琼斯。”（宋沿用了其捐助人“科尔法克斯”船长查理·琼斯的名字）

1881年4月，宋查理进入圣三一学院。也许在圣三一学院举行的入教仪式和宋查理从第五街教会转会至圣三一学院教会相关联。

我们有理由相信，宋入教时，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在1880到1881的冬天担任了他的引路人；并在里考德牧师的帮助下，得到圣三一学院和达勒姆圣三一堂主日学校当局的配合，以及后来显赫的资本家、监理公会教徒朱利安·卡尔将军对查理教育的资助。圣三一学院1880至1881年的学生名册上，“特别预备生”一栏显示有如下信息“查理·琼斯·宋，文昌，中国。”在校期间，宋查理虽住在W·T·江恩威教授家里，却多在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博士家中做作业，克雷文太太不仅是他最忠实的朋友，还是个称职的老师。

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院长乔治·温顿博士在《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撰文说，“宋（松）于1882至1885年在此学习。”这样看来，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待了不到一年就在1882年秋季考入了范德比尔特大学。要知道他来北卡罗莱纳州之前受过多少专业训练，这想必非常有趣。不过，在圣三一学院学习的第二个学期，宋查理大概学了不少知识。因为经过3年的学习，宋查理圆满完成学业，获得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颁发的证书。几年以前，约翰·奥尔牧师在《世界展望》上撰文介绍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与宋查理的交往情况。他这样写道：“他认真准备功课，顺利通过各科考试，在神学四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奥尔博士记起在范德堡大学期间，宋查理的一次触人心玄的往事。“几个男孩经常会在周日上午早餐前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宗教经验。有一天早晨，宋起床后安静地站立了片刻，然后他嘴角微微颤抖，说：‘我感觉自己好渺小，很孤独。距离我的祖国同胞多么遥远，在异国待了这么久。自己就像一块碎片，漂浮在密西西比河上。然而，我知道耶稣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慰藉，是我的救赎主。’”

查理在“科尔法克斯”号上学过编制吊床，因此在学校放假期间，他卖吊床，同时协助田纳西州和其他州的几位牧师做些复兴的事工，间或拜访北卡罗莱纳州的朱利安·卡尔将军和其他朋友们。查理那个夏天写的几封书信展现了他性格中的浪漫色彩。他在写给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的安妮·索斯盖特小姐的信中说：“在华盛顿我过得非常开心，尽管我只认得几个女孩。据说在华盛顿女孩和男孩的比例是七比一，其中有几个女孩很漂亮，我爱上了贝尔小姐。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

就在查理返回中国前夕，W·T·蒂利特院长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礼拜堂里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上，听了蒂利特院长对他的赞扬，查理说：“一直以来，我都在传道，并在传播福音中体会到喜乐。等回到祖国后，我会向中国同胞传播福音，在他们中间使基督复活。”1885年北卡罗莱纳州年议会在夏洛特市举行，宋查理应霍兰·马克蒂耶主教之特别请求而获准与会。马克蒂耶主教想要派遣查理去中国传教。在此次会议上，查理被约翰·基纳[1]主教任命为副牧。那次年议会会议记录的第53页上，在达勒姆区任命职务一栏里记录着：“派去中国的传教士——查理·琼斯·宋。”

1885至1886年冬天，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便马上开始了他作为监理公会传教士的工作。他在吴淞、苏州、昆山和上海进行传教，至1892年，传教工作终止。

杜克大学女子学院历史系诺拉·查芬小姐查找了《罗利基督教倡导者》报里的文档，并将宋查理写的有关自己在中国传教工作的信件予以整理。从这些寄给北卡罗莱纳州朋友的信中，感受到他使徒的狂热和对中国基督布道团所取得成功的深切关注。

在1887年2月4日从昆山寄出的一封信里，宋向索斯盖特先生表达了对安妮·索斯盖特小姐逝世的深切同情，他说：“安妮小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作为基督徒的榜样值得人们重视。在我离开美国时，万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这么早发生，万没有想到我们不能再相见

[1] 基纳（John Christian Keener，1819—1906），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870年当选为美国监理会主教，直至1898年退休。

于约旦河的此岸。噢，想到这里就非常难过。上帝把最甜美的花朵摘下，并从我们身边拿走；但是，这朵花正盛开在主的天国花园里。”他继续写道：

“我已经开始用本地方言布道，尽管方言讲得没有我想要的那样流利……昆山是个有着4英里围墙的城市。包括城郊，人口有300 000。当前，除了各种各样不信上帝的宗教外，我们这里有三种不同教派代表。这里的各种教派和宗教包括：我们监理公会、南方浸信会、法国天主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请为我和我的工作祷告，愿上帝让我们来年取得更多的成就，更加深切地体会他的爱。”

1887年12月21日，查理在写给《罗利基督教倡导者》报的信里，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工作：“工作前景非常乐观，主的灵迅速走向蒙昧的人们的心中……中国布道团已完成使命……我回到昆山已有一年。在主的慈爱和帮助下，我希望为主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我们在苏州的女子医院业已建成，在上海英租界的新建的砖砌教堂处于收尾阶段。”

在选择妻子这件事上，宋查理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在给索斯盖特先生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快乐的婚姻生活，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好了，在搁笔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件事，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婚礼由我们布道团的C·R·里德牧师主持。” 据说，宋夫人倪小姐出身于中国江苏一个富裕家庭，常常被认为是浸礼会成员。然而，珍妮特·阿彻·尼尔小姐在罗利发行的《国家》上撰文认为，受家庭女英语教师的影响，倪小姐皈依了基督教，并且是圣公会的一名成员。到她结婚时，才转会进入监斯理公会。

在其中一封写于1886年7月7日、署名“查理·J·宋”的信中，这样写着：“苏州最终将成为我们教会在本省的福音传道中心。祈求上帝，让我们尽快把这里的善男信女派遣到中国各地去传播福音。”

关于宋查理辞去专职传教士职务的原因有很多。小麦克·布拉德肖在1936年6月28日的《罗利新闻与观察》上，有篇长文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实际情况是，佐治亚州有名的传教士杨·艾伦（即林乐知——译者）领导下的中国布道团的武断专横激怒了宋。在给索斯盖

特先生的一封信中，宋指出，他回到中国时，与亲人已经分别了5年，艾伦不允许他回海南岛看望自己的父母。艾伦博士说他可以在6个月后的新年里回去探亲。宋是这样写的：

“对这种发号施令，我很不满，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们，尤其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我对监理会不忠诚，破坏了规矩，所以我就像老鼠那样，始终保持沉默。可是一旦时机成熟，我将不顾他的反对、高高在上的权威和对本地传教士的憎恶，来摆脱目前监管人所有傲慢的发号施令……我不喜欢在他的带领下工作——想申请去日本。”

毫无疑问，1886年回到中国后，当被拒绝回家探亲时，宋在内心深处受到重创。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回家的请求被拒绝后，他至少认真忠诚地进行了6年的传教工作。有趣的是，宋在1892年10月19日写给《基督教倡导者》报的一封信中，说明了离开布道团的真正原因。

“之所以离开布道团，是因为每月15美元左右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我和妻小的生活。但是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传道的终止，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朋友们能明白。现在我在为美国圣经会工作，但是依旧做着和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希尔和邦尼尔兄弟可以作证。因此，离开布道团仅仅意味着我只是监理会布道团里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不依靠本地教会的支持而为布道团竭尽所能。”

“我现在掌管着监理会新教堂，该教堂由美国堪萨斯城的摩尔兄所捐赠，是本市最漂亮的教堂。该教堂主日学校规模很大，学校教师都很优秀。我给上课的班级里，学生老幼均有。”

书信以这样的要求结尾：“首先，为我自己祈祷，希望能够帮助耶稣拯救更多的灵魂。其次，为我在这个黑暗世界所做的传教工作祈祷。第三，向上帝祈祷，祈望主能够派遣更多信徒来这里，最终收获传教成果。”

辞去传教士工作后，宋成立了一家商业印刷公司，专门从事中文版《圣经》的印刷。后来，一户富裕的中国家庭开了一家面粉厂，他们请宋查理担任经理，从19世纪90年代末直到1918年他去世。宋查理

变得相当富有，把六个孩子都送到美国念书。在创建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孙逸仙，并数次同这位伟大领袖一起流亡到日本，过着隐居的生活。

他依旧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热心服务于监理公会，直到逝世。查理的妻子1887年与他结婚，是一名出色而忠诚的基督徒。这对虔诚的夫妇所组建的家庭成为影响整个中国的精神家园。他给女儿选择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念书，显示出其对监理公会的忠诚。大女儿和二女儿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美龄，即现在的蒋夫人，10岁来美国，一度住在W·N·安斯沃斯[1]主教家，玛吉·伯克斯小姐和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担任英语教授的母亲伯克斯太太，曾耐心指导美龄在基础阶段的学习。美龄没有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因为她想和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子文离得近一点，后进入威尔斯利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

1880年秋，宋查理在威明顿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受洗皈依，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这样说毫无夸大之辞。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那晚冲洗他的灵魂，没有教堂所有神职人员为其施洗入教，他可能会一直过着一名普通水手的生活。在生命的黄金时段，宋查理决定敞开心扉迎接圣主耶稣，生活中的一切都已改变，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原载《杜克神学校公报》1942年1月，作者佛瑞德·巴奈特）

3.《查理·琼斯·宋纪念大楼命名仪式》

11月1日星期天晚8时，克莱尔·普赛尔主教主持将北卡罗莱纳州威明顿第五大道卫理公会教堂[2]的教学大楼正式命名为“查理·琼斯·宋纪念大楼”。

历史上具有最深远影响的皈依之一，就发生于北卡罗莱纳州威明顿古老的第五大道卫理公会教堂。通过这一皈依，该教堂依照天意对确定伟大的中华民国现代生活前途的发展模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1] 安斯沃斯（W. N. Ainsworth），时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长。
[2] 旧称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

这个中国宋姓年轻人受洗的故事，是基督教差会史册中最有意义和引人入胜的事件之一。这可能是自使徒时代以来，福音大能的恩典和传奇最为忠诚和最有成果的见证。

因不愿意被富有的舅舅收养，宋从中国的家中出走，成为美国海岸警卫队“考尔法克斯”号巡逻艇上的一名船工。最终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威明顿港登陆后，年轻的宋受邀在古老的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参加宗教礼仪。该教堂就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一场基督教复兴的仪式正在举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即1880年11月7日，当时担任牧师的T·佩奇·里考德博士，在教堂里为宋施洗，他真心皈依了基督教。随后，宋进入了当时位于兰道夫县的古老的圣三一学院，然后进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秋天，在夏洛特市举行的北卡罗莱纳州的年度会议上，J· C·基纳主教任命他为基督教牧师职位，派他去中国布道区宣传他在美国找到的基督。他同一名有教养的、受基督教布道团影响而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姑娘结了婚，婚后育有三男三女。除宗教活动外，他也做了一些幸运的投资生意。他把六个孩子都送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三个儿子，子文、子良、子安，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专攻经济学。三个女儿，蔼龄、庆龄、美龄进入监理公会创办的位于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美龄还进入了威尔斯利学院。子文现担任外交部长，派驻美国，此前有好几年担任中国财政部长。蔼龄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来自最古老的孔氏家族，是孔子第78代孙。庆龄嫁给了“中国的华盛顿”孙逸仙博士。姐妹中最小的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将军，中华民国总统，现在又是军队的委员长。[1]

在G·斯坦利·弗雷泽博士担任牧师任期内，宽敞的教学大楼1921年立了起来，并且最近了断了所有债务。该教学大楼在很长的时间内都

[1] 误。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8月被迫下野，12月1日与宋美龄结婚，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3年9月，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而且还是国民党总裁。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能够满足日益壮大的教堂的教学和社会需求。而这座教堂就位于威明顿市联邦住房社区几个街区内，该市最近两年人口增长了2.5倍。

以一座重要建筑来纪念一位东方人，这可能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历史上的首次。这座大楼被奉为纪念“天朝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喜乐与此教堂相连，是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实践见证的一个表现。在此，我们将聆听基督的教诲，并以基督的圣名分享到满满的福音，他和蔼的双唇形成祷告语“我们的父”，他仁慈的目中没有种族之分。

“在基督那里
没有东西之分
没有南北之别
只有伟大的兄弟之爱
遍布广阔的大地。

现在基督那里
东西相聚
南北会合
圣徒的心灵在主里合一
遍布广阔的大地。”

（原载《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1942年12月5日）

4.《宋氏家族专刊》

“今天的我已不再沮丧和绝望。因为我信仰着‘主’，他无所不能，甚至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没有要求的，他都能做到。在写此文的时刻，我同我的丈夫在一起，身处匪域中心。尽管时时面临危险，但我不惧怕。我知道在我们的事业未竟之前，我和将军一定会安然无恙。” ——蒋夫人

x x x

当蒋介石夫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面对一万七千人发表演讲[1]之

[1] 指宋美龄1943年3月2日在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发表演讲。

前，温德尔·威尔基[1]介绍时称她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一个复仇的天使，一名为正义而战的无所畏惧的战士”。蒋夫人说：“各同盟国成员应当采取迅捷、强有力的行动，去争取世界的正义与自由。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必须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最强国应当帮助弱小国家。剥削必须被阻止，而且彼此之间不应存在仇恨。”她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前车之鉴”，告诫各国避免重蹈覆辙。

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一期的宋氏家族专刊是本报刊登过的最引人注目的传教故事。如果给北卡罗莱纳州每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家中都放一份该专刊，新的一天会降临在我们的很多卫理公会教堂。这期专刊说明了中国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

x x x

被誉为“亚洲风云女性”、“提灯女神”[2]、“世界最有魅力女性”、“世界第一公民”、“联合国家发言人”以及其他头衔的蒋介石夫人值得所有宗教媒体以及非宗教媒体给予头版位置的关注。仅仅几周前，蒋夫人来美做了一项手术，现在身体正逐渐恢复。来美国时微弱的她，离开时将充满力量；不是身体上的力量，而是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力量源于她对信仰的忠实呈现，源于那些和她拥有同样信仰的人们对她虔诚的支持，也源于她一再重申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x x x

1880年11月7日星期日的《威明顿星报》曾在《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的标题下注明：“本教堂今天上午将举行一场基督徒洗礼仪式。接受这场庄严洗礼的教徒中有一位中国皈依徒，他可能是在北卡罗莱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名‘天朝人’。仪式由T·佩奇·里考德牧师主

[1] 温德尔·威尔基（1892—1944），美国政治活动家。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服役。战后开业为律师。曾代表共和党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与民主党的罗斯福竞争美国总统，最后失败。对罗斯福政府的国内政策多有批评，然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合作态度，鼓吹“天下一家”的国际合作思想，反对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1942年9—10月受罗斯福总统之托历访非洲、中东、苏联和中国等地。在中国期间，曾建议宋美龄访问美国以获得援助。翌年将见闻写成《天下一家》，呼吁战后合作，甚有影响。1944年因心脏病病逝。

[2] 提灯女神，是1854年英国奋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将士们，赠给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员的护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的誉词。

持。”同一家报纸11月9日星期二报道说：“上周日上午在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举行的洗礼仪式，也就是本报上次提到过的有一名中国年轻人也接受洗礼的仪式，据说异常感人。这名年轻人的中国姓是‘宋’，洗礼后开始使用基督教名查理·琼斯。”

蒋介石夫人，基督教传教士

如果有哪一位国家领袖有理由发表尖锐言论或者做出过激行为，那就是蒋介石夫人。她的人民经受了太久的磨难。她对其悲惨境况感同身受，并为之不辞辛劳。她的重压既是她个人主动承担的，也是她的官方职责所在。尽管如此，她在我们国家访问期间却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尊贵与沉稳。她的公开演讲以至高的政治家风范而著称，这种政治家的风范，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基督徒精神。蒋夫人以其人、其行为向我们展示了她个人宗教活动的成果。对我们来说，她是无比重要的亚洲差会最优秀的传教士之一。——联邦委员会通讯

宋查理专版

本报的宋查理专版加印了6 000份——大部分都已分发出去，所剩不多的这些会发给最先预订的读者—— “先来先得”。

6 000个额外家庭得到这份专版，对于我们《倡导者》这个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份莫大的快乐。名声显赫的宋氏家族创造了一个传奇。

蒋介石夫人阁下秘书处

1943年3月12日

C·D·巴克利夫特牧师[1]

北卡罗莱纳州威明顿

第五大道卫理公会教堂

尊敬的巴克利夫特牧师：

夫人希望我转告您，她已收到您2月23日的来函。对于您在信中

[1] 巴克利夫特（C. D. Barclift），威明顿第五大道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曾任美国卫理公会北卡罗莱纳州年议会达勒姆教区的会督。

所表达的良好祝愿和基督徒的情感，夫人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的是您对贵教堂将一座教学大楼命名为“查理·琼斯·宋纪念大楼”的说明。这是对她父亲的称颂与褒奖，夫人将会永远珍惜。

夫人还希望感谢您对她的盛情邀请，如能拜访贵教堂并会晤父亲的众多老友，她一定会非常高兴，但是夫人的主治医生坚持要她尽量减少会晤次数。对此无奈之决定，我相信会得到您和贵教堂成员的理解。

夫人谨向您和她父亲所有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您真诚的

蒋夫人阁下秘书长孔令侃[1]

1942年11月1日在威明顿第五大道卫理公会教堂查理·琼斯·宋纪念大楼命名仪式上的演讲

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刘廷芳[2]牧师

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谨代表魏道明[3]博士大使以及刘锴[4]博士部长表达他们因事先有约不能前来出席该仪式的遗憾之情，并向你们送上他们的诚挚问候。

如果本次活动在一个月以前举行，你们会见到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阁下或者他的弟弟中国银行行长宋子良先生。他们当中任何一位都是当今中国政府以及你们今天所称颂的宋氏家族的最合适代表。他们两兄弟几天前刚刚返回中国[5]。就在今天，宋部长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出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党国会议[6]。

---

[1] 孔令侃（1916—1992），宋蔼龄和孔祥熙的长子。1943年宋美龄在美访问，担任秘书。

[2] 刘廷芳（1891—1947），字亶生，祖籍浙江永嘉。1891年12月28日（清光绪十七年冬月二十八）生于温州。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学习教育和儿童心理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受牧师称号。1920年回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任燕京大学神学系主任。1936年12月5日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美国就医，旋居美国，于剑桥、牛津大学讲学。后因病复发，赴美医治，于1947年8月2日逝世。著有《中国教育问题》、《教育测定法》、《中国文明之方向》等。

[3] 魏道明（1901—1978），字伯聪，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时任中国驻美大使。

[4] 刘锴（1906—1991），别号亦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肄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公使参赞。

[5] 1942年10月25日下午，宋子文自印度乘专机抵达重庆。

[6] 1942年10月14日，宋子文离美赴重庆前向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士辞行，称将参加下个月

我很荣幸受大使之托代表中国前来参加此次难忘的活动。我将首先以一名中国公民的身份，其次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第三作为一位朋友，第四作为我国政府的谦卑公务人员，最后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来讲话。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在任何地方，南方或北方，或东部沿海省份，或西北大漠旷野，或西南山麓省份，每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都学会尊重、敬仰、珍惜你们今天在此称颂的“宋”这个姓氏。人们尊崇宋氏家族，是因为这个家族卓越显赫、非同寻常而又独一无二。当我们想到中国的家庭，我们不仅会想到这个家庭的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儿女，我们也会想到他们的女婿；父亲是一家之主，母亲实际掌管家事——丈夫死后尤其如此，而按照中国传统，女婿是他们的“半个儿子”。一个家庭能够获得世人尊重，不仅仅因为它赢得了连世袭都难以赋予的显赫，也因为这个家庭的同辈中出现了在任何国家都极为罕见的人才荟萃。

当一个家族在儿女、女婿中产生了一位统帅数百万人民的政治领袖，这个家族值得民众尊重。当一个家族产生了一位改变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要运动开创者，这个家族值得民众尊重。当一个家族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培养出一位称职的部长级的公务人员，这个家族值得民众尊重。当一个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受到国家的召唤担任他们的首脑，这个家族值得民众尊重。但是当一个家庭产生了不仅一位政治领袖，而是更多位，不仅一位重要的国民运动奠基者，而是更多位，不仅一位政府部长而是若干位，不仅一位政府首脑而是两位，那这是怎样的星河灿烂！中华民国未曾有哪一个家庭的同辈儿子和女婿位居如此显赫的位置，未曾有哪一个家庭的每一位女儿为维持这份显赫，各自发挥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就此而言，有谁能在当代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找到一个能与之媲美的家族？

一般的中国公民不仅因为宋氏家族的显赫而尊重它，而且已经学

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回到重庆后，他于10月29日下午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10月30日上午到外交部接见各高级官员，11月1日向蒋介石呈报外交部对于英国方面所提出的中英平等新约草案的审阅意见，11月2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宣誓就任外交部长。

会了敬仰它。我使用“学会”这个词是经过考虑的。当一位政治领袖崛起于皇帝统治下的卑微环境，为推翻帝制而倡导共和观念，我们就必须学会敬仰他。当一位领导人坚持贯彻已故领袖的为民学说，反对势力强大的军阀和分裂集团，我们就必须学会敬仰他。当国民运动的奠基者们号召意义深远的国家政府改革和社会制度修正，并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生活中的旧有恶习，我们就必须学会敬仰他们。当一个家庭不仅仅通过做报告还在实际行动上不辞辛劳倡导男女平等，我们就必须学会敬仰这个家庭。一般的中国公民已经学会了敬仰宋氏家族，几百万其他的民众也在学习的过程中。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字面意思是“盖上棺材，完成结论”。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棺材被盖好并且钉上钉子之前，我们不应该对他的功绩和价值进行最后的判定。换句话说，对于一位显赫政要，我们要等到他死后才可以对他进行最后的评价。历史学家告诫我们，通过耀眼的显赫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是危险的。如美国这样的现代共和国的政治历程告诉我们，通过阅读政治竞选活动经纪人的演讲和评论，尤其是对抗中的候选人的演讲和评论，来判定政治领域里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价值也是危险的！

政治领袖、社会变革运动的领导者、政府部长以及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们，如同山巅之城，他们任何微小的举动、特性以及品德都会被放大。过这样的生活并非易事，而且他们同时代的人对他们总是有冷静、客观和科学精准的评价也并非易事。

不过，不论人们的身份背景是如何的不同，普通中国公民不仅仅因为宋氏家族声名显赫而去尊敬它，而且已经学会去敬仰它，我相信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道出了数百万民众的心声。但是不仅限于此，他们珍惜并景仰这个家族还因其为中国做出了诸多具体的贡献。孙逸仙博士在中国历史上创造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独特地位，他是“共和国之父”，是国民党的创立者，是发起现代伟大政治革命之一的众望所归和不同党派首领公认的领袖。我们这样说，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异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博士所创立的事业越发突显出深远意义，中

国人民的珍惜之情也愈见深厚。可是，但凡了解孙博士生活的人，无论亲疏，都无法不赞赏孙夫人宋庆龄对孙博士的贡献，尤其是在他忠诚服务于伟大事业的最后几年生命中。正是在这几年，孙博士的经验化为成熟的思想结晶；其政治见解和先知愿景形成著作文字；他着手选拔接班人和合作者以完成他所称的“革命未竟之业”。也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民主国家的冷眼旁观和一些不肖追随者的背叛令孙博士屡屡失望；面临疾病的威胁，并最终因此中断伟业。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从孙夫人宋庆龄的陪伴和忠诚奉献中得到了宝贵的帮助。

孙博士憾然“渡过沙洲”[1]后，孙夫人宋庆龄成为国民党内少数几位重要女性党员之一。面对所有悲伤、困难和政治危险，她以大无畏的精神试图贯彻孙博士的革命原则，从未退缩过。孙夫人生活严谨、简朴，拒绝荣誉与权力，面对国民党政治上的成功，她选择站在幕后，但她全力践行并成为孙博士制定的革命纲领更深远意义的捍卫者。在过去这十年里，每个政党或集团，不论大小，不论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为了捍卫个体政要或政治群体的权利和自由事业，通常都会到孙夫人门前寻求支持和帮助。夫人总是有求必应。要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她没有作出回应，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名字才会在万众瞩目中在全国闪现。正因为如此，一般民众珍惜宋家，因为孙夫人对中国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在今天的中国，蒋介石委员长居于独特地位，这也是全民公认的。自从袁世凯死后，拥有极大权势的军阀们，最终都一个个向他缴械投降。经过10年艰苦而成功的奋战之后，军阀们相信这是一位正试图忠实地贯彻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领袖，而且他的廉政是可信的。也是这位领袖得到中国各党各派的敬仰，他们都可以在统一战线中跟随他对付共同的国家敌人。也是这位领袖，广大劳苦大众期待他给他们给予指导和方向来用鲜血、泪水和汗珠来克服抗战的巨大艰辛。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在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还是在

[1] “渡过沙洲”（crossing over the bar），引自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作者把预感死的来临比喻为在暮色苍茫的退潮中驾小舟越过沙洲，以恬静的心情面对他的领航人（上帝）。在此代指孙中山去世。

自由的中国，面对敌人轰炸机中队每日轰炸的威胁，不管是否是国民党党员，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把信任投向了蒋委员长。

中国人想到蒋将军，就会联想到蒋夫人宋美龄。她对国家领袖的成功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她是一位坚贞的伴侣，风雨同舟，她正经历的种种危险情况是没有几个国家领袖的妻子经历过或者能够承受的。蒋委员长的突出优点之一就是他在自己周围聚集起各种博学远见的能干之士的能力，而所有顾问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夫人。普通中国公民只是点点滴滴从新闻报道、媒体社评以及口头传说中得知她是怎样在丈夫遇到国内和国际困难时，经常是紧急关头，辅佐丈夫制定重大决策，或得知外国访问者怎样毫无例外地折服于夫人的谦谦有礼、热情好客、高贵亲和、睿智犀利、远见灼知、率真无畏以及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

了解她生活内情和她过去几年里经历的诸多事件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在发生1936年西安事变这样的情况下，蒋夫人以其冷静的头脑、明智的决断、全力的付出以及颇有政治家风范的毅力为中国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她和兄长宋子文博士一起确保了蒋委员长的安全并保护了蒋委员长的生命。那个事件发生时，举国上下一致赞扬蒋委员长的领导。蒋委员长在西安集团手中的那几个星期中，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望我们，哭着承认说，尽管几年来他写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参加反对领袖的行动，但是在一天中他充分认识到蒋委员长的领导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多么特殊，而蒋委员长所处的困境使他决定改变立场，他说今后他将全力支持蒋委员长，成为他忠实的跟随者。我们看到很多平时对政治不甚关心的智慧博学之士都顿觉遭遇重创，开始担心蒋委员长的安全。那个时候，正是宋子文博士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巧妙周旋，才使得一场险些酿成巨大灾难的民族危机转变为中国的国家生命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并最终促成团结统一。这种统一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坚持抗战5年半之久并战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现代武器装备的残暴敌人。

随着抗战的进行，中国几千英里海岸线上的港口城市已经沦陷，沿海富裕省份已被占领并遭遇有计划的掠夺，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

侵略者所到之处遭到无数次的破坏。在侵略者实施令人心碎的焦土政策的土地上，游击队以坚强的决心同入侵军队格斗，农场、村庄和城市就如同跷跷板，被敌军和游击队轮番占领，民众财产成为废墟，国库当然也面临史无前例的压力。面对所有这些破坏和打击的普通中国民众，尤其是那些在敌军压迫下残喘生活的人们，现在终于明白，在宋子文博士任财政部长期间所施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以及收支平衡措施是多么重要。很多从前批评宋博士的人现在都成了他的尊崇者。

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这样的财政压力，没有放弃抗日努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宋子文博士及其继任者，他的姐夫孔祥熙博士，推行的金融措施。孔博士担任工业部长时开始制定的工业改革方案，后由他的继任者经扩充、详细规划之后付诸执行。接任宋子文博士的财政职位时，孔博士兼任行政院副院长。

开战以来，孔夫人宋蔼龄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赏识；她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大姐，也是宋家所有孩子中最年长者。她首先是一位妻子和母亲，并且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像其他两位女婿一样，孔祥熙博士在公共生活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贤妻的帮助。孔夫人很少在政治事务中谏言，但是抗战以来，受形势驱使，她开始出现在公众视线，并积极参与众多对于战争胜利至关重要的公共活动。只是她将自己在全国的知名度都用在了各种形式的救济工作中。她毫不吝啬地贡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也成功引导其他人将财富捐献给社会服务领域和慈善救济事业，这样的能力非比寻常。今天，全中国有数十万的难民、伤兵和战时孤儿，他们提起孔夫人的名字都会心生敬意。

宋子文博士甚至在结束财政部长任期之后也没有停止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努力。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到华盛顿任职，随后以外交部长身份长驻华盛顿。这都是对宋博士能力和正直的认可及赏识。

宋家尚有其他仍比较年轻的成员，正在成长。宋子良先生在饱受战乱折磨的中国的财政建设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拥有才华和能力的宋子良及其他年轻的家庭成员毋庸置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们过得并不容易，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想：他们究竟要做到何等

程度才不会愧对他们的家族呢?

因此,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我们尊重、学会敬仰并开始感激你们今天所敬仰的宋家。

二

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很高兴地说宋家在中国以基督教家庭著称这个事实让我们感到自豪。中国有一些在政治上显赫的家庭都曾信奉基督教,但是当他们出名之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了,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不方便让人知道,有时候也是他们为了权宜之计或者其他原因而选择不露锋芒。而宋家已经、并一直继续以基督教家庭著称于中国,因为宋家任何成员从未因为个人私利而试图掩盖他们与基督教的关联。正如你们所知,作一名基督徒并非易事。而作一名政治名人基督徒极其困难,尤其是在一个基督教为少数宗教的国家,少到只占百分之一,因为在4亿总人口中,新教教徒仅占50万。

在政治生活领域,政治人物私生活的何种行为不被无赖和对立的批评者为着特别的目的而故意曲解、歪曲呢?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教育界和政治界盛行一股反宗教之风,尤其是反基督教之风,这种倾向并不起源于中国,但是却由一些在海外受过训练的中国人引入国内,致使有一段时间,这种倾向在中国国家政体内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要想在一片反对和批评声中坚持基督教信仰并生存下去,就要求一个人对基督教持有坚强的信念和忠诚之心。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当一位政治人物不仅拒绝掩藏自己的基督教徒身份,相反却毫无犹豫地在各种重要时刻通过各种抉择向人们广而告知自己的基督信仰,就单凭这一点,不论这个人的其他行为,他就有权利得到其他基督教伙伴的认可与尊敬。如若最真实地反映普通中国民众对宋家的态度,我可以讲几件具体的事情,或许这样能更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

我要提的第一件事发生在1925年孙博士在北京逝世之时。他的过早离世对他政党的气概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那是人们最需要他领导的时刻,那是反宗教之风在中国国家政体内达到顶峰的时刻。追思仪式持续了数周,因为所有的政党派系都希望向孙博士表达他们的敬意。宋家以及孙博士优秀的儿子孙科先生决定为孙博士举办一场基

督教追思礼，但是遭到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声称，如果举办基督教追思礼，就会冒着降低孙博士人格和仅把他当作一名基督徒来看待的风险。他们声称，孙博士属于整个国家，属于所有宗教派系。他们说，如果举办了基督教追思礼，那么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有权要求举行属于他们各自宗教的仪式。孙博士本人是基督徒并应该会希望为自己举行基督教追思礼的事实，并没有为反对者们心悦诚服接受。然而宋家以及孙科博士坚持认为应该有一场基督教仪式。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可以在孙博士去世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礼拜堂里为其举办基督教追思礼，这个基督教追思礼虽然公开进行但被冠以“私人葬礼”，以区别于外界各民众团体轮流举行的公祭。公祭仅在北京就持续了三个星期。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也举办了各种悼念活动。我受邀制订基督教追思礼方案，并以主持牧师的身份负责实施。方案呈交小组讨论，成员包括中国政府现任主席林森博士、孙博士之子孙科博士、孔祥熙博士、宋子文博士以及孙夫人宋庆龄。孙夫人对悼念仪式非常用心，提出了几首要在仪式上演唱的赞美诗，主要是卫斯理的《耶稣啊，你是我灵的挚友》、丁尼生的《渡歌》、以及那首许多基督徒所熟悉的卫理公会赞美诗《生命美满之誓言》。孙夫人还告诉我在仪式队伍中，一定要有身穿礼仪服装的唱诗班，因为孙博士在孩童时代曾在一个唱诗班唱歌。

尽管安排我担任主持追思礼的牧师，孙夫人还是告诉我一定要邀请一名主教在场。我很幸运地邀请到不仅一位，而是两位卫理公会的大主教光临仪式。此外，我还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礼拜堂的牧师朱友渔[1]博士担任仪式的助理主持。朱友渔博士当时是圣公会的牧师，16年后他专任中华圣公会主教。举办追思礼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得知在仪式举办前一晚，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是否允许举行基督教仪式，进行了彻夜讨论。仪式开始前两个小时，孔博士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

[1] 朱友渔（Andrew Yu-yue Tsu，1886—1986），上海人，社会学家、基督徒。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神科，191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发表《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1947年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成立，担任首任主教。又任中华圣公会中央办事处（虹口闵行路152号）总干事，常驻上海。1950年7月定居美国。

愿意主持仪式，因为有传言称那些反宗教之人，尤其是反对基督教的人，正计划用石子攻击主持追思礼的牧师以及所有出席仪式的人。我告诉他我愿意冒任何个人危险，因为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想知道宋家的态度，他们是否坚信孙博士必须要有一个基督教追思礼拜，因为这可能为孙博士在全国范围内贴上一个基督教标签，尽管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在一连串反基督教运动的喧哗声中，这样一个事实很容易被掩盖，真相一直扑朔迷离；但是一旦举行基督教追思仪式，那么就等于向全国正式宣告：孙先生是一名基督徒，直到离世一直是一名基督徒，他的儿子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亲戚们，宋孔两家成员都是基督徒。半个小时后，从孔博士处传来电话通知说，宋家已经决定举行基督教追思仪式。我特意在仪式队伍前面安排了一个大型的身穿礼仪服装的唱诗班，由我的学生构成；他们在数千民众的注目下缓慢地走过协和医学院的校园和街道，人群中就包括那些曾威胁向我们投掷石子的人。目击者告诉我，实际上一些激进分子在旁观看时手中的确握有砖头。护送灵柩的人都是中国的风云人物，他们和孙家、宋家、孔家成员一起跟着唱诗班走入礼拜堂。

悼念仪式不应该被基督教徒尤其是传教士利用来做宗教宣扬，而应当被视作一名基督徒生命中之例行事务，这是宋子文先生的睿智之见。我由衷赞成这样的立场。当天的很多报纸都对仪式进行了全面报道，但是笔调都是充满敬意与爱戴的，没有歪曲之意，没有反宗教的敌意或反基督教的狂热嫉恨。基督教会也明智地听从了宋子文博士的建议，只简单地报道事件。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角度来讲都是明智的。

中国的第一位总统是一名基督徒，直到去世都是一名基督徒，举行的是一名基督徒的追思礼并以教会的名义由主的奴仆主持，这样做是因为孙宋两家希望如此。跟当时相关人员的安静态度相比，这场仪式的影响力要更加深远。几年以后，在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反宗教分子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基督教会的暴力运动，有人出示了这次仪式的报道以及一张仪式上孙家人和宋家人在第一排的照片。结果聚会没有发生任何争执而解散。

我想要讲的第二件事是关于蒋夫人宋美龄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婚事。对于身居其位的蒋委员长来说，是不能不经过权衡所有严重后果而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他们本可以举办一场不带任何宗教意义的世俗婚礼，如同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婚礼一样。但是，宋家要举办一场鲜明的基督教仪式的愿望再次被接受。婚礼进行的时候我正在国外。一个月后我收到来自中国的各种报纸，载有不同记者对婚礼的报道。其中一些报道代表的是反对派和反基督教的立场，对婚礼进行了最尖刻的嘲弄，并对仪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主要就是因为这是一场具有基督教含义和寓意的礼仪。这样的评论能够被广泛散播，恰恰说明这个决定代表的立场多么的勇敢。

我要讲的第三件来说明宋家对基督教采取的公开立场的事情，就是西安事变。当该事变在顾问当中引起无法想象的焦虑和茫然时，蒋夫人宋美龄首先要求的是基督教徒的祈祷，对象不仅包括首都著名的基督教徒圈，也包括教会内的其他人，一时间整个教会掀起了一股为委员长诚挚祝愿的热潮。你们当中读过蒋夫人记录那段经历和其他事件著作的人，都会记得三个重要的事实：

（1）蒋委员长是多么坚决地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危之上；（2）在那段危险迫在眉睫的日子里，他专心阅读《圣经》对他来说意义是多么重大；（3）在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国家的命运都飘忽不定的时刻，他和她是如何在那段日子通过信仰的支撑最终使整个难题得到解决。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婚姻以及生死抉择的情况是披露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时刻。宋家成员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向世人昭示的是，不论他们外部的表露是否给人以相反的印象，还是按照严格的外在主义者[1]的判断，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是无可置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通过追求基督团契并探索精神资源来满足他们最高的需求和愉悦的。

三

现在，我以朋友的身份说几句，因为在这样一个场合，当我们走到一起来纪念一位熟知数年的人时，实在忍不住想要多说很多话。但是

[1] 哲学上的概念，指过分关注外部环境和现象的人。

我会约束自己只讲三点自然而然进入我们脑海的问题——那就是，是什么影响力使这个家族保持了基督教生活？

我很荣幸我是宋子文博士在中国的圣约翰中学和这个国家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我也很荣幸我的妻子曾和宋氏姐妹其一的同窗在中国的中西女塾学习。我们俩（我和妻子）与宋家三姐妹是同一时期在佐治亚州学习的中国学生，其时是我们在美求学初期。因为是同学，所以我们经常有机会目睹这些杰出人物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我认为，有三个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并展现了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命，我这样说是不会偏离事实太远的。

第一个就是宋家母亲对儿女们的影响——父亲对儿女们也有如此影响。宋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信徒，甚至孩子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取得耀眼的显赫之后，她依然是一名朴素而虔诚的女基督徒。她没有间断同卫理公会的联系，她一直积极参加主日礼拜以及其他宗教活动，她还积极参与基督教慈善活动，这一切都成为上海卫理公会教徒心中一份珍贵的回忆。宋母的信仰简单、朴素，没有知识分子的矫饰，也未受世俗成功的腐化，她一直没有间断同一所基督教堂教友之间的团契——无论他们是富裕还是贫穷、是知识分子还是未受过教育者、是声名显赫者还是默默无名者，这一切使得宋母在上海基督教区颇受爱戴。她对儿女们多年的影响一直是各种影响力中第一位而且最重要的因素，直至她离开人世。

其次我必须提及是他们在中国和美国就读的教会中学和大学带来的影响，形成并塑造了宋家的成长期，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教会学校的影响力在其他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但的确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影响他们思维和行为的永久因素。

第三，我必须要提到的是迪克西[1]，即美国南部各州的影响力。作为一名在南部学习了3年的学生，我能看到并了解到南部的氛围是怎样影响宋家这些成员的生活的。你们众所周知的热情好客所代表的高尚，你们的彬彬有礼，都构成了年轻人自然的行为准则；点缀你们

[1] 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

生活哲学的安详宁静——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因素都和我国的文化传统如此相近，所以我相信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的南方大学，尤其是教会机构，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那些曾有机会和南部的基督教女士们、先生们接触的中国人，会发现他们在南部的经历使他们更加贴近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些的确在我们的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想这三股影响力之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那个总被那些有幸接触宋氏姐妹的人挂在嘴边的问题。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借助这次令人难忘的机会为这个答案作出我的贡献。

四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演讲的最后一部分。

鄙人身为国家的一名公务人员以及立法院的一名成员——该职务曾由蒋夫人宋美龄担当，（正如各位所知，立法院院长不是别人，正是孙逸仙博士的儿子孙科博士）——能够应大使和驻华盛顿部长之托，代表政府在今天的场合向你们致辞，甚感荣幸。

今天你们命名这座建筑来纪念宋氏家族，尤其以此纪念这样显著的儿女大家庭的创立者，我想我是在代表我国政府讲话，说明这座建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它比在南方任何时期建造的任何其他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建筑都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我们把它视作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的象征——这种友谊植根于我们两个民族天生的性格之中——节俭、勤劳、不屈、无畏、谦恭、开放、自然，还有些大胆的冒险精神，外加纯真的仁慈和对和平的热爱——这些都是构成个人间和国家间真诚和持久友谊的基本要素。而这些又都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两国交往的历史中，我们感觉很容易同你们交朋友，而且你们也感觉很容易同我们交朋友。

我们的友谊经历了贵国政治家的培养，从约翰·海到当今的国务卿——一位南方绅士，他珍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并致力于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维持和发展这份友谊。我们的友谊能够这么多年长期开花，还得益于你们教堂虔诚神职人员的灌溉与滋养，他们积极

参与中国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这份友谊也由于我国政治家而得到加强，他们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付出他们生命中多年的时间在贵国接受教育。

这座建筑将作为总结过去半个世纪友谊之象征而永远屹立。

其次，我们把这座建筑视为两种文化融合的象征——一种文化来自于一个充满旺盛，年轻的勇气和力量的崭新国家，它总是将目光投向前方，不断改革进取，带来人类生活的新机遇、新发现，与此同时，它又总是不断传承和保护那些涌入美国大熔炉的不同民族之精髓；另一种就是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属于一个古老的国度，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也曾一度是远东地区许多民族的大熔炉。这是一个化继承了40个世纪绵延不绝文明的文化，又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重新焕发出活力，而成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年轻的共和国之一，正在奋力明辨未来的命运，并向这个伟大的世界大家庭中的其他青年成员汲取理念和愿景。

美国和中国两国文化的融合不是仅仅理性的想象或者纸上谈兵，而是通过活跃的个人形成的一股强大力量。

宋氏家族就是两国文化这种融合的生动体现，这一点从宋家成员的个人生活以及他们发起的各种运动就可见一斑；例如，国民革命运动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政府，再比如，新生活运动正在转化人民的生活。

这场融合已经持续了数载，并一直在积蓄势头。我们子孙后代会将你们今天揭幕的这座建筑视为这个伟大的世界文化运动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直接影响不少于6亿、超过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两国人民。

第三，我们将这座建筑视为我们创建世界新秩序共同事业的象征。如今的中美两国第二次在一场全球战争中结为官方同盟。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根除一些国家所代表的让人无法容忍的专制及政治思想和行为。这些国家推崇暴力，并以施暴为乐；这些国家自恃他们的民族高于所有其他民族，令自身沉湎于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疯狂状态；这些国家完全无视人类性格，残酷粉碎个性；这些国家为了纯粹的一己私利完全以其他民族为代价，强行奴役别国；这些国家企图建立

一个条约和庄严义务可以一经缔结就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甚至连伪善之举也不屑采取来掩盖羞耻；这些国家为了党派利益唆使孩子们背叛父母；这些国家视人类生命价值不如炮灰，是煽动者政治游戏中的卒子。在这场伟大的事业中，美国和中国已经立誓为盟。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已经结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为消灭这些政治和国际的恶魔而进行战斗。这是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期待，而且在过去这长达五年半的浴血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一直渴望的战友情谊。终于，珍珠港事件惊醒了整个美国，认识到中国为自身的生存而开展的战争，也是她在为美国而进行的战争。

而今，作为这场战争中的盟友，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也必须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赢取和平，因为我们开展战争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维持亟待改变的现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远远超越我们梦想的世界秩序。

在联合国家事业最黑暗的时刻，你们今天命名的这座建筑应该是我们这两国目标统一的象征——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于这场大屠杀中创造新的世界秩序。这应该是勇气与坚毅的象征，因为它提醒我们要达到那国际，跨种族的友谊的可能性，无论两国人民生命的许多历程是多么不同，也无论两个国家的距离是如何遥远。这座建筑应该永远是对于任何对世界团结和友谊信心不足的人的斥责。

基于以上三方面，我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座建筑难忘的命名仪式上衷心祝贺你们。

五

结束语。作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我想在演讲末尾说明我个人的职责。我相信，承蒙你们的盛情，我在参加一座有先兆意义的大楼的命名仪式。因为这是一座宗教大楼，一座奉献给上帝荣耀以及纪念一个家族男男女女的大楼。这座大楼蕴含着一个宗教目的，那就是成就基督信仰的永生。我个人坚信是基督信仰使今天的仪式成为可能。既然一名牧师必须要有一段经文，我今天上午的经文来自于约翰福音第2章第50节："你将看到比这更大的事。"

那些见证今天事件发生的人们是有福的，但那些信仰基督福音书

所倡导的爱的人们更有福。我们刚刚开始懂得我们的基督信仰在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所具有的更深层意义，也开始懂得基督之爱的所有内涵以及它给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上帝保佑那些会来此学习这座大楼的外国名字并深思其重要意义的人们；这些人离开时会有一个全新的视野，这视野中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基督所倡导的爱至高无上；这些人不但理解上帝之爱的世界，也会努力实践上帝的旨意，尤其是福音书所倡导的这些方面；这些人也会为推动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关系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将看到比这些更大的事，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允诺。

查理·琼斯·宋五年美国生活概述

查理·琼斯·宋于1880年初夏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科尔法克斯”号船来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威明顿；这是一艘二等舷侧明轮船，由船长查理·琼斯指挥。年轻的宋从波士顿而来，仅十几岁，之前在波士顿做学徒伙计。据一份报道称，宋在波士顿是在舅舅手下做学徒，后来他离开了舅舅，并逃票搭上了“科尔法克斯”号船。船长琼斯很快就喜欢上这个风趣而可爱的年轻人，把他安排在船上做服务员。到达威明顿后，琼斯船长将宋转交给他的几个朋友。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前途，应该留在岸上并给予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第五街（现称第五大道）监理公会教堂，由牧师T·佩奇·里考德主持，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被赋予教名查理·琼斯，以向他的朋友兼恩人查理·琼斯表示尊敬。从此他成为查理·琼斯·宋，但在美国他大多以宋查理这个名字为人们所知。

1880年夏天，J·S·卡尔将军把宋查理带到他位于达勒姆的家中。同年深秋，卡尔将军把查理送至圣三一学院，在那里，宋得到了院长布莱克斯顿·克雷文和妻子克雷文夫人的特别照顾。克雷文夫人给了宋查理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在自家客厅帮助他学习。

1882年之后，宋查理在范德比尔特生活了3年，1885年离开。所以，宋查理在美国5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三一学院和范德比尔特度过的。

离开范德比尔特那年的夏天，6月份他在威明顿呆了一段时间，在第五街教堂布道。同年秋，在夏洛特市举行的北卡罗莱纳州联盟会议上，宋查理被J·C·基纳主教授以神职。之后，基纳主教任命宋查理为北卡罗莱纳州联盟代表到中国工作。也就是说查理成为了一名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他回国第一年在上海附近作教师和传教士。

查理·琼斯·宋一生都在为基督教事业做贡献，他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忠实支持者；当时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在中国还很薄弱，正处于苦苦挣扎阶段，宋查理无疑是这份事业的中流砥柱。他靠印刷业致富，但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投给了他所信奉的事业。孙逸仙博士致力于在古老帝国进行改革运动时，宋查理又成为他的一个强大支持者。在华30多年的巴乐满博士[1]对查理·琼斯·宋的评价非常高，直到宋去世，宋都是他交往最密切的人。

学生时代的宋美龄

文 / W·N·安斯沃斯夫人[2]

我第一次欢迎宋美龄来到我们家时，她还是个11岁的女学生，个子小小的，但是胖乎乎的。我的丈夫时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院长，我们的女儿埃洛伊塞比美龄小两岁；因为有了一位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玩伴而异常兴奋。自两人见面的第一刻起，埃洛伊塞就主动开始保护和帮助这位从中国来的小朋友。

然而美龄非常独立，而且已经被美国化，因为此前一年她在佐治亚州德莫雷斯特的皮德蒙特中学八年级学习。美龄的大姐蔼龄（现在的孔祥熙夫人）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二姐庆龄（后来的孙中山夫人）当时正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庆龄希望妹妹能跟她一起住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但是学院规定只有本校学生才可以住在校园里，所以美龄留在了德莫雷斯特。但是当我的丈夫得知她们两姐妹被分开时，他改变了这一规定，于是美龄得以住在威斯里安（女

[1] 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1867—1944），美国人。1898年来华，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干事，1935年著有《我发现东方》（I discover the Orient）一书。

[2] 即宋美龄就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时的院长夫人。

子）学院的宿舍里。

美龄由玛吉·伯克斯小姐和露西·莱斯特小姐辅导了两年，然后参加了预科以及大学一年级课程的学习。这位宋家三姐妹中最年轻的孩子从不用特意专注于功课就能得到高分。她的天赋让她不需太多努力就能轻松通过考试。

从一开始美龄和我们就不见外，因为大部分业余时间她都和埃洛伊塞在一起。一天，两个人闹别扭，美龄撅着嘴生气。两个人已经达成和解，可美龄还是撅着嘴。因为埃洛伊塞实在害怕她的朋友伤心，我决定跟美龄讲讲宽恕之美。我问她，表现出这样难看的情绪，难道就不感到羞愧吗；但是她马上回答道："为什么？不！恩斯沃斯夫人。我很喜欢这样。"说着，还微微眨了一下眼睛。

这两个小女孩之间的感情很深厚，她们天天呆在一起，彼此分享秘密。一天上午，埃洛伊塞生病了，我告诉她呆在床上。但是当我回到她的房间时发现她刚刚爬回床上。我质问她，她说："妈妈，美龄刚来过，她很担心，因为今天她要参加进入大学以来的第一次考试，所以我们跪下来向上帝祷告，保佑她通过考试。"

两个孩子经常到厨房去做糖果——通常都是在星期天，而这是不被允许的。一天，家里有人听到厨房有动静，当她进房查看时发现美龄和埃洛伊塞正在看书，很无辜的样子，而且见到她表现得非常高兴。几天后，两个孩子向我坦白说，那天她们听到大厅里有脚步声，就把盛着糖果的火锅放到了壁橱里。

美龄非常富有进取心。开始学习拉丁语后，她自发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起名叫"三个女孩"[1]，成员包括她自己、埃洛伊塞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

"三个女孩"纪律非常严格。在开事务会议时，每一个成员必须嚼口香糖，而且会议内容除了吃也没别的了。她们收纳了营养师做荣誉会员，因为她能提供免费的小吃。"三个女孩"甚至出版了一份轻松小报，刊登关于年长学院女生们的零零碎碎的闲话，她们用孩子般的崇

[1] "Tri-Puellates"是拉丁语，译为"三个女孩"。

拜来看待这些年长女生。每份报纸卖一美分。

我的儿子威廉姆和马尔科姆，经常在学院长长的户外走廊用独轮手推车来回推着这两个小女孩玩耍。每当这时，美龄那黑色的发辫就会随微风飘扬起来。当男孩们拉她的发辫时，她表现得很温顺。尽管她留着长长的辫子，她的衣着和其他美国女学生没有区别，而且她很快就学会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美龄从不胆怯，人们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对她表现出兴趣，但她并不为此感到尴尬。学生会找她的麻烦时，她的回应总是很快，并且回答中使用了最好的美国俚语。实际上，美龄天性活泼，时而爱搞点恶作剧，但她的聪慧和伶牙俐齿，总能让她顺利脱身。

两个小女孩特别喜欢透过会客室的窗帘偷看学院女学生们约会。她们会咯咯地笑，然后跑回来告诉我她们都看到了什么。再也没有比她们两个更浪漫的小孩子了，每当有女孩订婚，她们两个跟其他人一样兴奋。

美龄成为正式的大学生之后，就开始参加各种舞会和郊游，她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受人欢迎。即使当时她年纪还那样小，我们也能看出这位年轻朋友有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位魅力女性的潜质。

当美龄进入大学一年级时，美龄当选为守卫官；扛校旗，带领拉拉队——这非常适合这个小女孩，因为她长大成年后成为了中国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

当我丈夫担任主教到东方进行传教时，美龄邀请我和丈夫到她南京的家中作客。她和大元帅派出他们的私人专列到上海，以便让我们拥有最愉快的旅程。

美龄的家很可爱，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但是，我丈夫说我们从没得到过那么多的保护，因为整个晚上我们都能听到官邸外面警卫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在那里，我们和中国的第一夫人，谈起了她和我们在威斯里安度过的大一学生生活，谈起了埃洛伊塞，她去了一个更美丽的国度，谈到了威廉姆、马尔科姆以及乘手推车的日子，还谈到逝去的朋友和依然健在的朋友们。

当我们在中国那座古老的城市谈话时，我依稀感受到了佐治亚州的气息。我发现身为成年女性的美龄仍然像孩童时代一样聪颖、迷人、可爱。她在我的心中永远占有珍贵的位置。

（原载《北卡罗莱纳基督教倡导者》1943年5月6日）

5.《泽被一个民族的礼物：卡尔将军和宋查理的故事》

他对任何一项事业所作的馈赠都无法与他对一位漂泊的中国男孩所展现的仁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远期结果相媲美。

由于他的善行，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也使他成为一个福泽远东的基督教捐助人。卡尔将军是中国享有盛名的宋氏家族之父宋查理的美国朋友和资助人，也因此被载入近代差会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

话 说 从 头

这是一个被不断讲述的故事。刚过13岁的男孩宋查理受雇于“科尔法克斯”号轮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宋查理受到查理船长的影响和教诲。1880年秋，宋查理来到北卡罗莱纳的威明顿港。不久，他皈依了基督教，从属于佩奇·里考德牧师，后进入威明顿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男孩的中文名字叫宋耀如，受洗时得教名查理·琼斯·宋，这教名来自那位船长，唯因是他引领男孩皈依了基督。年轻的宋有志接受美国的教育。皈依基督教后，宋查理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向往——他希望作为教会的传教士回到他自己的同胞中去。里考德先生对宋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辅导，并为宋入读圣三一学院（后来的杜克大学）奔走。但是里考德先生碰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凡人常为金钱苦恼”。

寻 找 朋 友

里考德先生代宋查理向好友卡尔将军求助。将军的回应使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受益人。“送他去吧，”将军说道，“我们要让他接受教育”。

笔者在就读大学时曾经作过一段时间将军的秘书，后来成为他的牧师。他曾多次听将军讲起这个故事，主要内容是：“我听说有个基督

徒男孩，搭船来到威明顿，他聪明而有抱负，希望接受教育，但他碰到了问题，没法进入学校。我答应给他以帮助。他来到我家，作为我的一个家庭成员住下来，我资助他就读圣三一学院和范特比尔特大学直到他完成学业。他就是宋查理，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里考德先生带着宋查理来到了达勒姆，成为卡尔家的客人。这是卡尔将军和宋查理的第一次会面，而男孩的聪颖立刻给将军留下印象，认为这是个可造之才。在一封旧时的信件中卡尔将军这样谈到里考德先生：“一个圣徒似的人”，“他来到我家，只是为了将我收养的那个中国男孩带给我。”在那个夜晚，将军的小房间里两个男人促膝相谈的话题无疑是关于宋查理的。将军通常用这个小房间来款待客人，而此时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对一个陷入困境的男孩的帮助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在60年后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上帝用一名船长、一名牧师和一名商人助宋查理踏上了命运之途。

一个家和一种教育

从一开始，宋就被视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不是作为雇员而是作为一个儿子被接纳的”，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如是说。宋在1881年6月25日从卡尔家写给远在中国的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急切地希望完成我的学业，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中国，向您诉说达勒姆的朋友所展现的仁慈以及上帝的恩典……卡尔夫妇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在我和他们相识之前，他们就对我抱持仁慈之心。”

这个家庭的新成员不久就在卡尔的影响下，受到极大欢迎。这位男孩称卡尔为“卡尔爸爸”。宋查理不仅得到卡尔在经济上对其学业的资助，而且更使他拥有了一个家，并且获得了一个基督徒家庭儿子的身份。人们从未估量过那个基督徒家庭对这个人物的人格塑造方面施予了多么大的影响，而这个人将通过他的家族对东方乃至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当宋的第一个女儿（如今的孔祥熙夫人）降生时，他为她取了一个与其中文名相对等的英文名“南希”。而“南希”正是卡尔夫人的名字。在卡尔家里，将军作为监护人和资助人为宋查理的

学业做好了规划。1881年，宋进入圣三一学院就读，在这里他度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882年，他进入范得比尔特大学，三年后他获得神学毕业文凭。

在宋的整个求学期间，卡尔将军始终是他的朋友和资助人，而卡尔的家也一直就是查理的家。假期来临，他总会想到在达勒姆的家。在范得比尔特的学业临近结束的时候，宋查理曾经强烈地希望学习医学，为他在中国的工作作进一步的准备。卡尔将军对查理的想法也表达了愿意继续资助的意愿，但是教会当局作出了不同的决定。范得比尔特校长、马克蒂耶主教在给身在中国的林乐知博士的信中专门提到了宋查理的“慷慨的资助人，朱利安·卡尔先生。”

在这封信中主教提出了最重要的预言，他期望：“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派遣宋去你那里……许多人的命运将与他密切相关。”

1885年秋天，宋查理被派遣作为传教士回到中国。

影响的延伸

旧日的联系依然在将军和宋查理之间延续着。卡尔将军帮助过许多男孩和女孩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像宋那样受到卡尔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影响。在言谈中卡尔总喜欢说：“那个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我家生活的中国男孩。”

回到中国后，宋成为一名监理公会差会的牧师。几年后，他辞去教职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事业，从事圣经的印刷。除了印刷业务外，他还于晚些时候成为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经理。宋查理发达了，他拥有了可观的财富，但他对教会的忠诚并没有减退。宋查理最终成为中国的一位伟大的监理公会派教徒。在商业经营和履行教职方面，他都循着他的美国朋友和资助人所走过的道路前行。

1916年卡尔将军前往中国看望他的门生，宋在上海的码头上迎接他并将卡尔接到宋家。将军对宋查理所付出的爱促使他在自己晚年时跨越了半个地球。老朋友的再次相会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况之下，格局有了变化，查理·琼斯·宋现在是作为主人招待他的美国朋友。

在可以和卡尔在达勒姆的家相媲美的环境里，将军与正决定着东

方世界命运的要人们相会。宋查理迎娶了一位具有优秀人品的基督徒女士，他们的家庭是个基督教家庭。他们的孩子在中国教会学校里接受教育。然后被送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一个女儿嫁给了孙逸仙博士，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大女儿嫁给了孔祥熙博士，他是伟大的孔子的直系后人，即将成为财政部长，是国家的优秀领导者之一。另一个女儿注定了成为蒋介石委员长的夫人，蒋介石是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查理的一个儿子叫宋子文，他将要成长为国际大金融家，登上他的妹夫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政府中的外交部长的高位。

全中国都轰动了，宋氏家族成为了具有国家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家族。卡尔将军受到宋氏家族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热情款待，中国政府向他赠送了三个精致的瓷花瓶，这些精心设计和题词的花瓶是为表彰将军对中国所作的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的纪念品。

一个监理公会的普通教徒目睹了他的善举所结出的果实，是他以宽厚和慷慨之心为一个中国男孩的教育进行了朴实的资助，这也象征着美国对中华民国人民所展现的良好祝愿。卡尔将军作为“特别传教士”正在得到回报。

1918年5月3日，宋查理在上海去世，时值壮年，而卡尔将军也于1924年辞世。当宋家得到卡尔将军去世的消息时，孙逸仙夫人用最精当的英文写道：“他是我们伟大的好朋友。”这段话比任何其他的言词都更突出地表达了她的伤感同时又是甜蜜的情感。

尚未结束的故事

这个关于监理公会的普通教徒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馈赠的故事尚未结束，没有谁能够预见它最终的结果。宋氏家族处在了权力的中心，而这种权力将决定远东的未来。由于宋查理结识一位灵魂高尚的教徒作为他的朋友和资助人，中国开启了她新的时代，而基督教在东方国家的生活中具有了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由于宋查理的子女和他本人的作用，产生了目前远东国家的领导力量。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宋查理和宋氏家族，如今的中国就不会成为人类自由事业的同盟国。

区区几百元的投入，就亲眼看到了结果！主通过人们意料之外的方法成就了伟大奇迹。一个具有伟大心灵的普通教徒播撒下种子，收获的却是千万倍的回报。卡尔将军和宋查理的故事是基督教传教运动力量的典范，同时证明，一个人尽自己的努力进行持久的投入就是通往神国之举。由于他对这崇高事业的馈赠，一个普通教徒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前进方向。

（系卫理公会出版的小册子，作者为科斯坦·哈勒尔会督）

第二部分：相关书信

1. 菲利普斯夫人[1]致索斯盖特·琼斯(1940年6月19日)

1940年6月19日

索斯盖特·琼斯先生
北卡罗莱纳联合股份达勒姆地产银行董事长

先生：

大使正准备离开纽约去参加几个学位授予典礼并发表讲话，他请我代为致谢您6月12日来函，并要我把宋查理的信息发给您。

您非常真诚的
菲利普斯夫人
（大使）私人秘书

附件：

宋查理：

监理公会传教士和牧师。

人们都知道他在上海附近的小城市川沙传过教并居住过。

似乎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教士职位和传教生涯。

[1] E·W·菲利普斯夫人（Mrs. E. W. Phillips），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的私人秘书。

他在很多学校教授英语并在上海发迹。

他是位不错的英语老师，据说有3000多个学生。

他当过上海阜丰面粉厂（1906–1910）的英文秘书，同时在不同学校教英语（包括1907–1908在“中国公学”执教，当时我是一名学生）。

显然他是孙逸仙博士建立的革命团体的最早成员之一，孙是中华民国之父，娶了宋的第二个女儿，根据孙逸仙的自传，宋先生早在1894年就是重要的一员。

2. 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宋子文（1942年6月23日）

1942年6月23日

亲爱的子文：

所附信函来自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一位名叫哈里斯的先生，我想你会有兴趣一读此信并会觉得很有趣的。请把信件寄还给我，因为我尚未复信。

你永远真诚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华盛顿特区
西北区第五大街1601号
中国外交部长
尊敬的宋子文先生阁下

附件：

北卡达勒姆阿瑟·M·哈里斯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2年6月18日）

1942年6月18日

华盛顿特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尊敬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是我个人对您提出的请求，是为了使中国能够得到及时而充分的援助，尤其恳求您在飞机（战斗机）、轰炸机和驱逐机的供应方面予以较好的平衡。

我的家庭对中国和她的人民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切。

正是我舅舅（我母亲的兄弟）、本市已故朱利安·卡尔将军，于大约1883年，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威明顿把宋查理从码头上领回，然后带着他去了达勒姆，安置在自己家里，后来送他进了圣三一学院，这是一所坐落在北卡罗莱纳州兰道夫县的监理公会大学；然后又送他进入了另一所监理公会大学，就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宋查理毕业于该校。毕业后，他又去了达勒姆，大约一年后返回了中国。在中国，他以颇具影响的著名宋氏家族的家长而著称。我在达勒姆有一位朋友，他的母亲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吊床，是宋查理亲手制作送给她的，以感谢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兰道夫县大学求学时，这位母亲给予他很多亲切的关照。

当然，您认识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先生，即中国的外交部长，他是宋查理的儿子；您也知道蒋介石夫人，即蒋介石委员长的妻子；孔祥熙夫人，即中国财政部长的妻子，是宋查理的女儿。她俩都在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大学读了两年，然后进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并于1919年毕业于该校[1]。宋查理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颇具影响的著名中国人。

中国为了摆脱日本侵略者屠杀、强奸、掠夺和斩首的奴役，以及军国主义的各种残酷行径，进行了浴血奋战，已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为此而牺牲。他们需要帮助，尽快地得到帮助，这个国家善良的人们希望他们得到这样的帮助。假使援助被立即送达，飞机开始摧毁日军和他们的飞机，那么赢得胜算的机会比做其他任何努力都来得更加迅速。当一个民族被激发起来时，他们就能创造奇迹。有了我们的援助，中国就更加能激发起斗志，创造出比她曾经创造的更多的奇迹。

[1] 误。宋蔼龄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这必定是赢得战争最快的方法。总统先生，您在华盛顿的一些专家也许会不赞同，可是您知道何为专家呢？通常来说，专家只知道“故弄玄虚”。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将是尽人皆知，所以立刻运飞机去中国吧。我希望您能采纳“一位普通人”的看法，即普通、善良、传统的美国人，正是他们常常肩负起最沉重负担。

这是我给我亲爱的伟大国家的总统写的第二封信。伍罗德·威尔逊总统的妻子去世时，我曾经给他写信致哀。他回了信，我现在仍然保存着，视为珍宝。信是他亲笔签署的。

此刻，在我写信时，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4月18日以来，我们没有轰炸东京，这到底是为什么？吉米·杜立特尔[1]战绩辉煌。让我们快以更猛烈的方式再续辉煌吧。毋庸置疑，对这样的轰炸，人们肯定会赞同！

根据租借法案，为什么我们不能交换或者出借“珀金斯老太[2]”给英国的安东尼·艾登[3]，把哈罗德·伊克斯[4]或者吉西·琼斯[5]借给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为达成贸易条款，南方的北卡人愿意像“我们的鲍勃·雷博尔德[6]”一样有好的行动。我注意到丘吉尔先生现在美国，我们要留下他，换之以伊克斯先生和琼斯先生。

我很细心地写了这封信，但愿您能接受它，并且在您看完信后，认为值得回复，我将不胜感激。

与此同时，总统先生，谨向您致敬，并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阿瑟·M·巴里斯敬上

北卡州达勒姆市北迪拉德大街115号（835信箱）

---

[1] 吉米·杜立特尔（James Harold，1896—1993），美国航空先驱。二战期间历任美空军准将、少将和中将，担任陆军中将时，身为“杜立特尔空袭”的指挥官，因其英勇和领导而获得荣誉奖章。

[2] 即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1882—1965），美国政府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时任美国劳工部长。

[3] 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195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

[4] 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L. Ickes，1874—1952），时任美国内务部长。

[5] 吉西·琼斯（Jesse Holman Jones，1874—1956），时任美国商业部长。

[6] 鲍勃·雷博尔德（Robert Rice Reynolds，1884—1963），是1932—1945年来自美国北卡州的民主党派参议员，被家乡的支持者称为“我们的鲍勃”。

3. 宋子文致罗斯福（1942年6月25日）

1942年6月25日

亲爱的总统先生：

感谢所示附件。我常常被许多声称认识我或是我的家庭其他成员的人们弄得既困惑又好笑。

在这个国家里，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遇到一些人告诉我，说他们有个远房亲戚去过中国，因此急于看到给予中国的全力帮助。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令人惊异地广为流传。恰如最近我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公共发言人在耶鲁大学所言，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周边，美国人对之最有感情的国家就是中国，这并非无稽之谈。

您非常真诚的

（宋子文）

附件

总统
白宫

4. 埃利斯·里德-希尔致施思明博士[1]（1943年4月16日）

1943年4月16日

华盛顿特区
西北区第五大街1601号
外交部长办公室
施思明博士

尊敬的施博士：

非常感谢您1943年4月13日的来函。得知宋先生喜爱我留给您的那些照片，甚感荣幸。

[1] 施思明，施肇基长子，时任宋子文在华盛顿的秘书。

宋先生认为可以就他父亲和我们海岸警卫队的渊源发表一篇文章，我们非常感激，当然也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在就此问题做出最终决策之前，我突然想到他也许愿意看看这篇建议发表的文章。因此，我冒昧寄了这封信并附上这篇文章。

我们认为，关于查理·琼斯·宋和我们海岸警卫队这个话题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任何一篇阐述这方面事实的文章都应当配得上这份尊重，这样的文章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一些严重歪曲事实的说法；这些说法混淆视听而且含有不恰当的暗示，比如说戴尔·卡内基于1943年2月23日在蓝色网络广播发表的演说，还有那些美国某些宗教团体广为散播的消息。

毋庸讳言，宋先生对这篇文章提出的任何看法，我们都会接受，并十分感激；先生对此时发表这篇文章最后的愿望，我们也会予以尊重。

此致

您真诚的

埃利斯·里德-希尔

美国海岸警卫队队长

公共关系干事

附件：

查理·琼斯·宋和埃里克船长：给世界历史的脚注

半个多世纪前，在波士顿港，一个拥有无限重要意义的组织诞生了。就是在那里，中国一著名家庭之父查理·琼斯·宋开始服务于这支美国部队。他选择的是原“缉私船服务”组织，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海岸警卫队。

宋当时的中国名字是宋嘉树，他在波士顿登上了美国“加勒廷”号缉私快艇。船长兼指挥官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将这个16岁的男孩纳入了缉私队。在点名册上，宋的名字是“Sun”，据描述，当时的他有5英尺高。年轻的宋显现出卓越的才华和十足的干劲，此前他跟随舅舅在波士顿从事进口生意。这是一位生性爱冒险的少年，性情不凡，深得所有人的喜爱，而且他前往海上明显是想逃

脱之前生活对他的种种限制，做生意的日子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1879年1月，他走向码头，登上了“加勒廷”号；此时该船正在港口进行日常停靠。1879年1月8日，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点名册上。

“加勒廷”号的固定巡航路线是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到马萨诸塞州的埃德加敦——这是大西洋沿岸最艰险的一段航线。“加勒廷”号是一艘迅捷、灵敏的横帆快艇，埃德加敦是其最南端的船籍港，那里的船员都以“加勒廷”为傲。她有137英尺长，250吨重，额定载员为28名船员加7名官员。船长加布里尔森生于与挪威的斯塔万格，家住埃德加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他曾于美国内战期间服役于北方联邦军，战争结束后不久定居于埃德加敦。1867年11月17日，加布里尔森同利特尔顿·温佩尼的女儿结婚；利特尔顿是当时马萨诸塞州最有名的航海人物之一。

加布里尔森船长是一个安静的人，擅长海上活动。他对宋查理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宋查理又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埃德加敦的一些老居民依然记得这位船长，谈起他都带着一种近乎奉神一般的崇敬。对于任何一个像加布里尔森这样的陌生人来说，想要融入埃德加敦这样一个注重传统的小镇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必须像当地最好的船员一样擅长定期乘船旅行；作为海运中心的埃德加敦已经成为新英格兰黄金时代的一个象征，任何一个得到她如同自己亲生儿女般对待的人的确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称赞。第二，想要被接受，一个人就必须学会何时保持沉默。作为挪威造船工人的后代，加布里尔森像他的先人一样默默无闻，足以让人信赖，另一方面，他又很合群，当船靠岸时，他会去参加镇上的一些活动。第三，在埃德加敦，人们认为一个人应该住在低廉但却体面的房子里。埃德加敦的海员们都住在不是很奢华、但却宏伟尊贵的房子里，构造简单、但却带着改装的古典风格，这是新英格兰人性情的外在体现。27岁的加布里尔森在迎娶他的新娘时，就是按照埃德加敦最正统的风俗，给了新娘一座体面的房子——以配得上小镇法官扎德·皮斯的侄女。

就宋查理的未来而言，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加布里尔森船长加入了埃德加敦的监理公会，对教会的各种事务产生了兴趣。

像所有海滨小镇一样，埃德加敦的人们习惯于将男性和他们的船联系在一起。追忆一名男性，就等于回忆他的船，这几乎是无意识的。对船员亦如此；一艘好船上的船员也会是好人，无论他地位多低。这种三重式的联想使得埃德加敦的人们会将加布里尔森船长和他的“加勒廷”号以及他的船员都联系在一起——就好像这三者中的每一分子都像整个集体一样可歌可敬。他们尊敬船员加布里尔森和船“加勒廷”（谈起“加勒廷”，老居民们会专注地看着听者的眼睛说：“她灵巧得像子弹一样，呼啸而过。”），他们也就会尊敬“加勒廷”的船员。

居民们的表现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埃德加敦，就算有人不曾受益于“加勒廷”号的适航性或者船员的航海技能，那么他们必定有某个亲戚曾得益于此。“加勒廷”的航海日程上总是排满一连串营救活动，尤其是在冬天，主要是沿着马萨诸塞州崎岖的海岸搜救各种船只。在宋查理加入营救队的两个月后，“加勒廷”迎来了她生命中最不同凡响的一天。还是新手的宋查理，毫无疑问也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忙碌的一天，而且大获成功。而在加布里尔森船长看来，评价“加勒廷”号是否成功的最权威的标准就是她的每一位船员的成功与否。

这大获成功的一天出现在1879年3月一个狂风肆虐的天气里。那天，新英格兰海岸的每一艘船都遭遇了强风和高浪的不断冲击，并被掀翻，只有“加勒廷”号还在营救散在海面上的船只，至少有5艘。她没有等待遇难信号，而是直接去海上搜寻，因为加布里尔森船长知道肯定会有船只遇上麻烦。“加勒廷”奋力前进，一刻也没有停留，接连营救了“艾玛·L·格列高里”、“S·J·林赛”、“海王星之荣耀”以及“奥尔斯顿”。因为她无所不在的高效能，没有一个生命遇难。当时有一艘从加莱前往布里奇波特的满载木材的大型纵帆船“利古里亚”在几处浅水之间遇到了麻烦。她已经经历了一整天暴风雨的洗礼，成功战胜了新英格兰所体验过的最猛烈的大风和最汹涌的海浪。但是

当夜晚临近时，过度劳累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她开始体力不支。一整天她都经受着海浪的大扫荡。尽管水泵一整天都在工作，但是晚上船开始进水。最后，船身成90度侧翻在浅水里。

狂风仍在继续，“加勒廷”仍带着四艘营救船在夜晚的黑暗中奋力搜寻遇难船只。但是不知为何，她没有发现“利古里亚”号。“加勒廷”的船员都已精疲力竭，但是她仍没有停止搜寻，每一名船员都时刻高度戒备。直到天亮之后一段时间，她才发现“利古里亚”。

此时“利古里亚”已自动扶正，但是海浪仍很猛烈，“加勒廷”费了很大劲才将一艘小船送至受损的“利古里亚”旁边。“加勒廷”船员们得知“利古里亚”的桅杆已被吹断，船员们一整晚就躲在几艘小船里，靠侧翻的大船遮风。“利古里亚”的大副不堪长时间暴露于恶劣天气，已在夜里死去。

天亮时“利古里亚”扶正之后，船员们再次上了船，但是这只失事的船体正在慢慢下沉，“加勒廷”船员们用他们派去的小船将“利古里亚”上的人还有死去的大副都接了出来。但是由于海浪太过强大，小船还未被挂在“加勒廷”的吊艇柱上就被撞碎了，最后不得不将船员们硬拽上“加勒廷”。

这样一场历时24小时的营救在加布里尔森船长和他的船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彼此忠诚的亲密关系。这样一种亲密尤其存在于船长和宋查理之间，船长是第一个招募他的人。

后来，在加布里尔森船长手下服务满一年之后，宋的服役期满；他很快又续期。1880年7月，在第二期服役六个月后，宋请求退役。他此时仍在“加勒廷”船上，但是要求离开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加布里尔森船长已于两个月前被调往“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其基地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威明顿。

如果不是对加布里尔森船长十分忠诚，宋查理很可能就此结束他在海岸警卫队的生涯。但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前往北卡州，去威明顿；在离开“加勒廷”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内，即8月1日，他再一次成为加布里尔森船长的手下，登上了“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这是一艘重350吨的舷侧明轮船。

回忆起加布里尔森船长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一名严厉的监工和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但是他还是被宋查理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深深打动。于是，这个男孩成为他特别关注的对象；宋查理选择靠自己的力量开创生活，而不是继承舅舅的生意，船长相信这样一个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少年很有潜力走入上层社会。在船长看来，宋查理凭借他的卓越才智和优良品格注定会成就一份非凡的事业。因此，加布里尔森船长决心帮助这个男孩前进。在他的安排下，宋查理在“科尔法克斯”上服役大约8个月后光荣退役，而且他给财政部长写了一封信，向其推荐宋查理并建议给宋安排一个工作以期提高他自己。

除了安排宋查理退役之外，身为宗教人士的加布里尔森船长还将这位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介绍给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旧称）的T·佩奇·里考德先生。里考德先生同加布里尔森还有宋在一起交谈了数小时，宋最终决定在里考德先生的教堂皈依基督教。他用查理·琼斯作为自己的教名，相当于他的中文名字“嘉树”。

离开加布里尔森船长和“科尔法克斯”号之后，宋查理去了圣三一学院；该学院当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兰道夫县，就是现在位于达勒姆的杜克大学。1882年宋离开圣三一学院前往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后从该校毕业。

是加布里尔森船长敏锐地发现了年轻的宋的非凡事业心和卓越才华，并引领这位少年踏上正确的道路，进而使宋发挥出最大的潜力；但是加布里尔森船长在世时没能看到宋查理对世界近代史所产生的影响。后来返回中国的宋查理创建了一份巨额家业，并成为出了最杰出一代人的中国家庭的父亲，这在中国悠久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近代史上都是领军人物。

宋美龄，本身是一位世界领袖，同时以第一夫人即蒋介石委员长妻子的身份，为中国效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女性比她更广为人知，也没有哪一位女性就世界问题发表的言论能像她的那样，让人更为期待、更为赞同。

宋庆龄，已故孙逸仙博士的遗孀；孙博士曾创立中华民国，并任首届总统。

宋蔼龄，孔祥熙先生的妻子；孔先生任中国财政部长，也是孔子的后代。

宋子文，中国外交部长；他创立了中国银行，是世界财政领域的杰出领袖。

宋子良，政府财政专员。

宋子安，中国税收官员；是宋家最小的孩子。

附录

杜克大学档案馆藏查理·琼斯·宋(宋耀如)参考资料目录

第一盒

文件1:冯英翰(宋子文外孙、宋查理曾外孙)给威廉姆·金(杜克大学档案保管员)的资料,1984年10月5日(带信封函)。

书信:

1915年5月3日宋查理致宋子文(子)函(原件影印件和打印稿)

1915年8月6日宋查理致宋子文(子)函(原件影印件和打印稿)

1942年6月23日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宋子文函,包括1942年6月18日北卡达勒姆的阿瑟·M·哈里斯致罗斯福函,讲述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的日子;1942年6月25日宋子文复罗斯福函(全部为原件影印件)

报道:

"查理·琼斯·宋和埃里克船长:给世界历史的脚注",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没有日期,共10页。附带信封函:美国海岸警卫队队长埃利斯·里德-希尔致外交部官员施思明,时间是1943年4月16日,内容是宋1879-1880年(进圣三一学院前)在海岸警卫队服役的详情。

打印稿:

"名人蒋夫人的零星事实",作者戴尔·卡内基。中国中央通讯社报道,1943年2月23日,5页。包括带信封的函:1943年5月10日中国中央社的David Lu写给施思明。

"宋家父母",路易斯·罗伯特夫人,可能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广播,没有日期,4页。带信封函,1942年6月26日厄普顿·卡洛塞先生的秘书吉尔姆·邦德森,写给宋子文的。(影印件)

文章:

关于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5

年）出版的评论、新闻稿和各类文章。

文件2：原有馆藏（均为圣三一联合卫理公会原件的影印件）

书信：

1882年3月31日查理·琼斯·宋致马蒂也小姐函，谈到达勒姆天气、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以及学习等。包括打印稿。

1886年10月7日查理·琼斯·宋致索斯盖特函，信从中国苏州写来，谈到布道的努力和辛苦。

标签，“宋查理制作的吊床”，描述了1883年制作的吊床。

会议记录：

监理公会北卡罗莱纳会议，1882–1884年希斯堡区会议记录，1885–1895年达勒姆区会议记录。第F–2749卷，共4页。3至4页的内容是关于宋来到北卡、皈依基督教，然后去达勒姆。

文件3：出版物，按时间编排。

“据可靠消息称：查理·J·宋牧师将偕女爱丽丝小姐访问本市”，《达勒姆每日太阳报》1904年7月20日

“宋查理的传奇”，《杜克神学校公报》1942年1月（第6卷第4号），第73–81页。

《中国蒋家》，埃尔默·T克拉克（纽约–纳什维尔：阿宾登–科克伯里出版社，1943年），影印复制了前两章，“查理·琼斯·宋在美国”，“查理·琼斯·宋在中国”

“查理·琼斯·宋纪念大楼命名仪式”，《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1942年第5号，第8页。

“宋氏家族专刊”，《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1943年5月6日（第88卷第18号），第1–20页。

《中华民国人物传略辞典》，奥瓦尔·布尔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1971年），第三卷，第137–153页。

《世界时间出版公司：一个出版企业的秘史》，第2卷，1941–1960年，罗伯特·埃尔森（纽约：图书馆出版公司，1973年），第121–122

页。

“达勒姆在海边”,《达勒姆先驱晨报》1976年1月30日。

“孙逸仙遗孀获得荣誉”,《达勒姆晨报》1981年5月17日。

《宋家王朝》,斯特林·西格雷夫,序言、前两章,第1–69页,465–473页。包括家族树一节。

“蒋夫人获得荣誉”,《罗利新闻和观察》1995年7月27日,第10页。

“中国一则:关于宋查理在北卡皈依史实的考证”,《北卡罗莱纳州基督教倡导者》1995年12月19日,第3页,致编者函。

“泽被一个民族的馈赠:卡尔将军和宋查理的故事”,科斯泰·J·哈勒尔主教,卫理公会印刷的小册子,没有日期。

北卡波弗特安大街卫理公会史,小册子,没有日期。

文件4:剪报、文章片段、笔记、其他馆藏目录。(目录中没有显示,以下内容根据资料整理)

“蒋夫人的父亲追求过达勒姆女孩”,《达勒姆晨报》1986年4月6日。

“宋是近代中国最……家族的创立者”,没有出处。

1997年7月29日杜克大学新闻,主题是:欧柏林大学收到六百万捐赠——无名捐赠者为纪念欧柏林1906年的中国毕业生。

参考文献,杜克大学珀金斯图书馆关于20世纪中国的学习参考英文资料。

(译注者宋时娟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文博馆员,译者王志鲜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研究员)

(英文录入件待续)

孙中山和宋庆龄：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爱泼斯坦1986年11月在日本东京和神户的演讲

孟胜德 译

你们（日本宋庆龄基金会）所选的题目很好，很合时宜。这个选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未能做到的。我本打算利用一段时间专门从事有关背景材料的研究，以讲好这个题目，不幸这一工作因病而中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只能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实，以及自己一点肤浅的看法，也许能供作参考。

现在，让我们就这一题目，提纲挈领地谈一谈关于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有关事实，以及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吧。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逝世于1925年。也就是说，他的一生跨越了19世纪的后半部分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

孙中山出生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国2 000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由于1840年至1842年和1850年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当时西方列强在工业和军事方面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仍处于中世纪水平。列强通过这些战争，把一个独立的、在本地区占优势的中国，强行推向了殖民主义奴隶制的深渊。

孙中山逝世时，主要是由于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斗争的结果，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制国家，并且已经过了差不多15个年头。然而这一政治变革并没有像其倡导者所希冀的那样发展，它既没有恢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地位，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现代经济的发展。相反，外国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渗透和经济上的钳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而封建关系——地主阶级对土地和对全国政治的权力——实质上原封未动。

因此，孙中山临终前在中国从事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革命。这

不仅仅限于政治形式上的不同，而是触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彻底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在争取进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障碍。这是孙中山以及一切真正爱国者的愿望。

孙中山去世于1925年，未能活着看到这场革命曲折的但却是不可遏止的发展，也未能看到直至四分之一世纪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所取得的最后胜利。然而他的持久的历史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胜利的曙光并为之欢呼，他不仅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坚定和乐观，并且能够勇往直前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即使在进入老年，仍以富于青春的活力帮助中国历史走上新的道路。在这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重大变革强烈地激励着他。

国外的一个重大变革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包围和瓜分中国的企图，使中国的革命免于国际上的孤立，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前景。另外两个国内的重大事件是1919年遍及全国的五四反帝运动风暴和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的成立。孙中山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联盟中的盟友，并欢迎他们去唤起和组织已成为一股新的巨大力量的工农大众，使政治和军事斗争增添前所未有的威力。

在中国，现代化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讨论的题目是现代化，但却讲了一大通革命，一场持续深入几十年的革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在于：中国只有首先实行革命化，然后才能实现现代化。

一些国家的情形并非如此。例如，19世纪后期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或者更早些时候，18世纪的彼得一世时代的俄国或腓特烈三世时代的普鲁士。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上层的改良，而不是通过人民革命来实现的。以上所有这些范例，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它从年代和地理位置上离我们是那样近）受到了中国早年现代化倡导者的羡慕、研究，甚至嫉妒。其中有些人是清朝政府中的保守派官吏，如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曾国藩、左宗棠

和李鸿章。他们的兴趣主要在军火工业，无意于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及观念。还有一些时运不佳的自由君主立宪改良派——1898年推行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他们的改革计划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并且说服了年轻的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在全国推行他们的变法主张。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尝试的失败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外国，而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实例正是当时中国改良派想要仿效的。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政治方面，当时中国已经失去了许多主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已经开始。几十年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去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反而大肆出卖民族利益。

在经济方面，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在现代化前所具备的工业乃至商业的资本主义增长，也没有一个相应发达的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正处于对外扩张的鼎盛时期，它们急需寻求像中国这样巨大肥美的可以进行剥削的地盘，于是它们用枪炮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人民，爱国的人民，具有创造性的人民。这一点早已为他们的行动反复证明。但上述种种障碍像大山一样挡住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形成的，更不要说把中国建成资本主义国家了。

那些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祖国的中国人在这两座大山前碰了壁。于是，在19世纪末他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路，而只能走乔治·华盛顿式的共和革命之路。历史发展到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人们又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另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必须从乔治·华盛顿的观点和模式转向马克思和列宁的。

孙中山在其早年做了第一次转变，在其晚年又转向后一种结论。做出这两次选择并非由于他反复无常，而是由于他从中国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吸取了教训。他是一个不屈不挠脚踏实地的革命者，不断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之路。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是现代化的倡导者。推本溯源，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其个人根源在哪里呢？

孙中山出身于中国南部广东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继承了当地人民长期以来反对满清统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当地各个阶级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出身贫寒，他还特别痛恨地主、财主对穷人的压迫。一个曾经参加过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老年亲戚经常给他讲起当年暴动的情景。这次革命不但几乎推翻了满清皇帝，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等政治纲领。

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梦想而已。实际情形是：在沿海的广东省，由于异族的侵略和国内的腐败统治，孙家的几个儿子和当地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既缺土地，又无职业，只得出洋谋生。孙中山的哥哥去了夏威夷。在那里，他先是做苦工，后来自己经营了一爿小店，再后来发展成一个大牧场主，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员。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生的阶级。孙中山是在夏威夷，后来又到香港，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从那时起，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吸取了三个方面的东西：

其一是他永远忘不了自己苦难的农民出身。

其二是对出洋谋生的中国移民，即所谓“华侨”的景仰。在国外较为先进的环境中，一些华侨脱离了贫穷和苦役般的劳作，逐渐在经济上发达起来。然而由于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且在国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所有的华侨在国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凌辱。因此，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祖国做后盾。这不仅为了故乡和亲人，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孙中山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当时留学生的思想。他们中许多人都具有一些文化背景和经济能力。他们出国是为了学习。在国外，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先进世界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是落后了。他们渴望学成归国，服务于中国的振兴和现代化事业。许多归国留学生还意识到，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们所向往的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

集这三方面的渴望与感情于一身，作为历史的代表，勤于思考和英勇无畏的年轻人孙中山决心变思想为行动。他动员并组织了一切可以联合的人投入了改革的行动。这三方面力量的融合，为中国的改革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当时几种历史潮流的结合体。

年轻的孙中山接触了西方现代的东西，这使他冥思苦想，如何才能把这些先进的东西带回中国去，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那时他还不到20岁。他之所以选择了学医正体现了这一点。当他还是个学生时，就曾向家乡所在的县政府建议实行新的耕作和养蚕方法以造福桑梓。1894年，在他获得医学学位两年之后，他还为他的主张长途跋涉，从地方到中央，到达华北去见李鸿章，这个曾提倡建立国防以及其他工业的一品朝官。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现代的农业技术。他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全面缩小中国与外国之间差距的先导。正是这一差距使中国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堪一击。

然而他的爱国主张被置之不理。孙中山从此看透了清政府的本质。它不可能实行任何改革与进步，只能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自那以后，他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彻底推翻清政府的斗争。

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一目标终于在1911年实现了。以后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然而不久就让位给军阀兼政客袁世凯。他放弃了总统位置，希望此举能稳定局势，避免内战。他认为献身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刻已经到来，因而欣然接受了铁路督办的职务。在当时，铁路的扩建是当务之急。他极其自豪地视察了第一条全部由中国自建的铁路——从北京通往张家口（时以卡尔干名闻名于世）。该铁路通过地势险峻的群山，为“中国铁路建设之父”——工程师和发明家詹天佑所建。他还东渡赴日考察日本铁路的发展。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背叛了民国，使孙中山对他大失所望。无所畏惧的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以继续他的革命活动。

正是在流亡日本期间，他遇到了宋庆龄，并于1915年和她结为伉俪，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宋庆龄吧。

宋庆龄在她那一代人中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比孙中山晚了27年；逝世于1981年，那是孙中山逝世56年之后。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个人上讲，她都属于孙中山的晚辈，并且一直活到第三代人成长起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与孙中山是同辈。他出身农民，后侨居国外，和孙中山一样是中国早期的赴美留学生，这使他成为一名推行现代化的归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宋耀如先是做了基督教的牧师，后来成了上海的实业家。宋庆龄出生的那年，他已经参加了孙中山的政治团体。

宋庆龄的现代意识并非受教于人，而是她出生于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她出生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国资产阶级家庭，其生活方式亦颇为西方化了。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这些“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在她父母的家里，从建筑形式到生活设施、家具乃至饭菜都是西式的。孩子们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就读，学校所设的课程主要是用英文讲授的。由于宋耀如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所以孩子们也都被送到美国去读大学。然而，孩子们的父母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无意让子女久居国外，希望他们学成归来，为中国的进步效力。

宋庆龄是最严格信守父母这一教诲的孩子。她在美国求学时（1908—1913）所写的文章中先是号召改良，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又为之热烈欢呼。在她还不到20岁时就写道，归国留学生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按照西方的自由派传统，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以恢复其独立和强盛。这是宋庆龄的事业观。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孙中山几十年前年轻时的观念要狭隘一些。宋庆龄和孙中山不一样，因她既未经受过农民的劳作之苦，也未尝过华工远渡重洋出外谋生的艰辛。她只了解城市和校园。然而这位热情的少女热衷于投身改造饱经忧患的祖国的事业，并把孙中山视为这一事业的领袖。

正是这一原因，她做了孙中山的英文和机要秘书，后来又成了他的妻子和知己。从那以后，不仅仅是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他们还共同学习，结下了亲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所学的东西使宋庆龄受益终生，以至孙中山逝世后，她虽然是那样年轻，却能够继承孙中山的遗

志，几十年如一日，在空前严峻的考验面前，临危不惧，奋斗不已，直至取得空前的胜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是相互需要、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一婚姻基础使他们互相忠实于对方，幸福美满。婚后，他们互相关心，同甘苦共患难，直到10年后孙中山逝世，每天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在不懈的斗争和努力中，在1924年开始的新的革命中，他们总结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那就是，工人、农民、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为中国人民绝大多数谋利益的军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就没有现代化的新中国。

孙中山不断努力地推进革命斗争。在其被迫停顿的间歇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时间来规划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如他制定了“建国大纲”（1919—1920）。但只要革命尚未成功，这些计划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不是革命斗争本身而是革命胜利的姗姗来迟使中国现代化一直不能实行。杰出的中国妇女领袖，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历史地肯定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一位外国作家，马丁·威尔伯在他关于孙中山的论述中把孙中山的全面目标归纳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共和国”（孙中山早在1897年便开始接触国外社会主义思想，并一再重申，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第三项——民生——是和社会主义相同的，尽管他在如何达到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两个现代人物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是当时中国两个杰出的现代人物的结合，是政治和思想的一致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为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所不容。就连颇具先进思想的孙中山的一些追随者和宋庆龄的信仰基督教的父母对此也不能接受。当他们决定结婚时，孙中山已有妻室儿女。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孔孟之道，纳妾比离婚再娶要“体面”得多，也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然而对孙中山和宋庆龄这两个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人来说，纳妾是社会的腐败，是他们所抛弃的。

于是孙中山与前妻卢慕贞办理了合法的离婚手续，和宋庆龄举行了婚礼。卢慕贞是孙中山的父母按照旧传统在他17岁时为他娶的妻子。尽管她是个贤妻良母，但没有文化，于世事所知甚少。又由于多年不在一起，她早已不再起到妻子甚至是伴侣的作用。特别是她把孙中山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视为对家庭生活以及生命安全的可怕威胁，而孙中山则视革命为最宝贵的事情。

而孙与宋的结合，则是两个战友的结合。一方是中年教师和身经百战的宿将；另一方是年轻的学生，虔心的弟子。他们是出于斗争的需要，在流亡国外的危难之际结合的。对孙中山来说，他们的结合给了他以安慰，使他更加振作；对宋庆龄来说，则给了她能够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工作的机会，使她能够更好地帮助这位领导并充分体现这一事业的伟人。

宋庆龄在晚年回忆他们共同生活时，除了谈起当时的革命斗争，她还告诉朋友们，她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当年的情景，孙中山在房间的地板上铺开中国地图，一边查看，一边在上面做记号，向她谈起将来如何发展工业，如何发展水陆运输。无论斗争到了多么危急的关头，只要一息尚存，他从未忘却现代化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她多次赴外地视察中，宋庆龄有一次特别视察了河北秦皇岛港，提到当年孙中山在他全国运输现代化计划中特别强调了该港的扩建问题。

藏书之一瞥

书，书，到处是书，证明了它们的主人对知识的渴求。无论是参观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共同生活过的故居，还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个人在北京和上海的故居，人们都会惊奇地看到这一事实。他们的藏书可以看出他们不断努力地保持他们的现代性以及他们广泛的兴趣。

仅英文藏书，故居里就排放着满书架的有关各国近代史的书籍，其内容多是各国的民主立宪的历史以及政治家的传记、回忆录。

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既有俄国十月革命前的著作，也有革命后的。

关于国防问题，孙中山精心收集了成套的陆军及海军的年鉴，如《简氏世界舰船》等等。从这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注意随时了解各国在军事方面的新进展。

在社会学方面，除了其他选题之外，他们似乎特别重视各国的妇女地位问题。

许多医学书籍表明孙中山对他原来所从事的职业保持着不衰的兴趣。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对医学保持非专业性的浓厚兴趣，特别是预防和营养，她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并将这方面的知识用于她以后的事业——妇女和儿童的保健。

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关于财政和货币的书籍。

在技术方面有着各种有关工业、运输和城市建设等书目。

在农业方面有《土壤物理学》、《经济作物的疾病》等著作。

地质学的书籍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对应用科学以及在孙中山时代还提不到应用的《物理学·原子》、科学幻想小说《宇宙旅行》，甚至《动物的智能》等书籍均怀有特别的兴趣。

藏书中还有许多文学作品、外语手册、指南和修辞学著作等。他们有时分别阅读，有时一起阅读。当年的目睹者常常回忆起宋庆龄为孙中山朗读英文书籍的情景，她几乎每天都读上数小时。

遗憾的是，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没有在藏书角做眉批的习惯，所以我们无从窥见他们在读书时的思想活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在阅读，还是在进行其他活动中，他们总是为孙中山经常表达的一个思想激励着，那就是他们伟大和长期灾难深重的民族一定要名列现代世界先进之林，她的人民一定要生活得美好和幸福。

今天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和改革中经常提到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在本世纪初已首先提到了。

为了建设未来，他们勤奋地研究过去和现在。

国 际 主 义

孙中山和宋庆龄另一个突出的现代特点是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尽管他们是热忱的爱国者，他们从未认为中国是孤立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置身于整个世界进步范畴之内的。他们要自己的国家不仅分享世界进步的成果，同时也要尽力为之做出贡献。他们既反对民族自卑或虚无主义，也反对民族狂妄和大国沙文主义。他们尊重所有国家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积极和进步的事物，反对消极和反动的东西。在他们与压迫和攻击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时，他们与那些国家内主张进步和正义的个人和组织保持着坚定和长远的友谊。例如对日本，宋庆龄在30年代说过："中国的民族主义正以抗日运动的形式成长着。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对日本人民或其他外国人民的，那就错了。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中国人民一直是爱好和平的。现在他们更没有征服别的国家的思想或欲望。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无疑地，中国不仅能保卫现有的国土，而且一定能收复所有的失地。"

一旦中国实现它的爱国和革命斗争的目的，它并不想孤立自己或拒绝与其他国家合作。它只指出一个条件——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平等。

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在数十年间曾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国家，肯定了有关对中国的这些原则，并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孙中山和宋庆龄同革命人民的其他代表们一起，终于看到了苏联是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可靠的朋友。这是因为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最好的精神武器，中国一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体系，以应用于自己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问题。

特别是，在他们积极的一生中，他们的行为和语言证明，他们对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的人民及其反帝反殖斗争特别尊重并怀有共同的感情。

孙中山在对外关系中所强调的平等原则，今天已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这是一个更充分地发展了的公式，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所有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关系的基础，不论强国或弱国、大国或小国。

世 界 和 平

在世界政策方面，孙中山把重点放在国际和平上。他认为，一个强大独立的共和中国，应为此目的做出有力的贡献。这一点已经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纲领性文件中得到反映。对宋庆龄来说，早在大学时代她就在文章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她献身于世界和平，毕生为此而工作。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她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崇高声望，绝非空有虚名，而是她坚持奉献和努力的结果。

祖国的统一与台湾

孙中山经常强调祖国统一，这是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他着重指出，中国各民族在祖国的进步中起着平等的作用。外国侵略所夺去的一切都应归还给中国。对台湾，他早年即支持那里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反过来，他又得到了那里人民对他的反清、反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

1895年，当衰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中国领土台湾给日本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指出：丧失的国土必须收回。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振兴中华，收复台湾”的口号。1897年，他派遣陈少白到台湾去建立兴中会在那里的支部，目的在于“把台湾的中国人联络起来”。他曾亲自三次去台湾，最后一次是在1918年，他被当做中国革命的代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他在1925年逝世时，台湾人民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禁令，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大会的追悼词宣称：“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浪滔滔。先生……你的精神，你的理想虽未十分实现，但是你的毅力意气已推倒满清，建立了民国，吓坏了无耻的军阀和残酷的外国帝国主义，唤醒了四万万沉睡着的人们了。”从那时起，多少年来，每当孙中山逝世周年的日子，在台湾和在中国其他各地一样，人们以中国人深沉的感情为之举行纪念。

由此，我们又想起了他关于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历次声明：“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

便要受害。”

这些声明和立场，虽然是在不同场合表示的，但都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而宋庆龄毕生希望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同对待所有其他问题一样，忠于孙中山的思想精粹和目标。

新 旧 思 想

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经常自豪地提到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他们也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国家和人民实现现代进步的矛盾。在这方面，孙中山早年即对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嘲弄，在当地许多人的反感下，他推倒了他的家乡翠亨村一所庙宇里的神像。至于宋庆龄，她1937年即写过《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在文章里，她肯定了孔子在他的时代里所起的教育改革者的作用，也抨击了他对于政府主张家长式统治的观点。这个观点的论据是社会的每个阶层必须服从比它高的阶层（妇女则应服从男人）。这个观点使人民不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是与任何变革社会秩序的思潮相敌对的。

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她最后写道：“我们不需要儒教。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停止一切内争，准备收复失地。我们需要向欧洲、美洲特别是苏联的工业与农业的成就学习。这样，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向光辉的未来迈步前进。”

由于孙中山年轻时曾经信仰过基督教，而宋庆龄又诞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人们也许会问，基督教究竟对他们有过什么影响。当然，基督教的一些道德伦理对他们是有过影响的，但所谓的宗教虔诚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强烈的表现。就孙中山来说，可以说是有一些，那也只是在他的早年；而在宋庆龄的著作中，即使是在威斯里安当学生时的作品中，也看不到什么上帝或神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或意志之类的东西。在孙中山的离婚以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非宗教婚姻中，他们对于宗教方面的反对，不管其来自宋庆龄的父母或来自中外传教士，都勇敢地置之度外。但同时，他们又有亲密的基督徒朋友，特别是那些参加革命的或同情他们政治主张的人，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当

他俩共同生活以后，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教会，礼拜日也不去教堂。宋庆龄曾经否定过这种说法，即孙中山生前亲自要求过在他去世以后进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孙中山和宋庆龄两边的家庭的确在孙中山的非宗教葬礼以后，举行了这样一个仪式）。

笃信宗教对孙中山而言只是偶尔为之，对宋庆龄而言虽始于童年但未终其一生。两人均抛弃了宗教，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是部分接受，而宋庆龄则是彻底接受。

现代工作作风

宋庆龄的现代性的表现之一是她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她对时间的节约和计划，这是她在美求学时学到的，也是在和孙中山一起工作时学到的。宋庆龄严守时刻，对于和她约见的人，她要求不要早到也不要迟到。而她自己则做到绝不耽误别人的时间，只要客人一来，她就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的行动迅速敏捷，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这样，她几乎总是能够当天回复收到的大量信函。如果因病或急事耽误两天，她就会在复信中道歉并加以解释。她的这一习惯贯穿始终，从未改变，只要还能拿起笔。甚至在年近90、卧床不起时也是如此。

1981年3月，在她逝世的前两个月，孙中山故乡中山县一个小刊物的编辑来信，请宋庆龄为他们题写刊名。这是本以广泛散居在外地和侨居国外的同乡为读者的杂志。发信之前，编辑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人说，宋庆龄年事已高，恐体力不支；还有的说，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办刊物，怎好打扰如此重要的人物。然而他们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发出了给宋庆龄的信。而她几乎是在收到来信的当时，就题写了刊名，不是1份，而是4份，供他们选择使用，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使他们深受感动。2个月后，传来了宋庆龄逝世的噩耗，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她早已患了白血病。

这些琐事表现了宋庆龄的许多优秀品质，在这里我们只讲能够表现她现代性的部分。她不仅十分注意节约自己和别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从这件事看出她不分高低贵贱。从她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的痕迹，而等级观念是封建主义最顽固的遗毒。她作

风民主，身体力行。凡是记得孙中山的人对孙先生在这方面也都有同感。尽管孙中山国事繁忙，无暇会见许多达官显贵，但他总是抓时间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人交谈。

对妇女儿童的态度

我们已经谈过孙中山与宋庆龄对妇女权利的关切。他们夫妇二人都曾强调过妇女参政——参与规划祖国和世界的未来——及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孙中山把妇女的权利写进了国民党的章程，并于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更早些时候，在孙中山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暂任期内，首先颁布的一批法令中，他提出在全国小学实行男女合校制。这表明他是如何地把现代的教育观念，包括女子教育在内，视为革命目标之一。

宋庆龄于1926年在武汉领导了一个妇女党务训练班。后来这些学生都编入了北伐军充当护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又在上海发起组建了妇幼保健医院。这所医院在解放后经过扩建，成了国内在妇幼保健方面首屈一指的医院。宋庆龄把自己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10万卢布全部捐给了这所医院。她还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并坚决认为避孕不应该只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应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宋庆龄一向关心儿童。除了吃、穿和基本的卫生情况，她到幼儿园和儿童活动中心视察时，都进到厕所看看是否清洁。她还特别关心儿童智育和德育的发展。孩子是未来的公民，早在二十年代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的儿童工作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少年官和儿童艺术剧院都是她的创造——旨在为全国做出榜样。它们组建于1946年至1948年，当时经费少得可怜，活动又处于半地下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扩建。50年代初期，她将自己出版《为新中国奋斗》的版权税全部捐献给儿童艺术剧院。而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孩子们的。

制造飞机模型是少年官的一项活动。看到少年宫的这座建筑，人们不禁想到，中国最早的飞机之一是按照孙中山的命令，于20年

代初在广州制造出来的，命名为“罗莎蒙德”号。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宋庆龄就是登上这架简陋的竹框架帆布飞机，第一次飞上蓝天的。这就向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友出了信号，表明他们要征服的高度。

60多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为了纪念她，特向宋庆龄基金会赠送了一架小型的“罗莎蒙德”号复制品，存放在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该公园正在北京兴建，其科技馆已在198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对外开放。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为了适当地、积极地和永久地纪念这位伟大的现代女性。宋庆龄降生于19世纪，而活跃于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她毕生关心年轻一代，她也将活在21世纪变成社会主义栋梁之材的今日儿童的心中。

如果进一步探讨，我们还能看到，宋庆龄希望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都具有现代性。这不仅仅包括效率、技术和知识（当今世界使这些东西成为可能和必要），它的内涵远远地超过了这些；它旨在推进人类的进步，包括社会和道德两个方面，以及从贫困、剥削、战争、愚昧，以及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简言之，孙中山和宋庆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两颗升起的新星，而这两颗星也必将在未来的天空中继续闪闪发光。当时他们是现代人物；对我们来说，今后他们还仍然是现代人物。孙中山帮助开辟了道路，宋庆龄继续为创立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中国贡献力量。

（译者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附录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as Pioneer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 I. Epstein's Speech in Tokyo and Kobe in Nov. 1986

The topic you (the Soong Ching Ling Fund of Japan) have picked is good and timely. It also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study on this specific theme, which I have not done. Unfortunately the time I set aside to research background for today's presentation was broken by illness. So I come to you today only with some representative facts and initial thoughts, which may be of use.

Let us begin with the barest outlines of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se great and noble personalities.

Sun Yat-sen and His Times

Sun Yat-sen was born in 1866 and died in 1925, that is, his life spanned the last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our own — the twentieth.

At the time of Sun's birth, China, ruled by the last of the monarchic dynasties that had governed her for over 2000 years — the Qing — was staggering under her defeat in the two Opium Wars of 1840-42 and 1856-60. Through those wars, the western powers, already modern industrially and militarily while China remained medieval, had forcibly pushed China from her position of an independent and indeed regionally predominant state, step by step toward the abyss of colonial enslavement.

At the time of Sun's death, China was, mainly as a result of struggles which he himself had launched and led, officially a republic — she had been one for nearly 15 years. But this political change had not, as its originators had intended, restored China to equality among the nations nor brought her much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ead, she was no less, and in some aspects more, penetrated by foreign dominance politically and stifled by it economically than before. And feudal relations — the grip of the landlord class on the land and on the politics of the whole country — remained virtually unbleached.

So the end of Sun's life saw him embarking on a new and more fundamental revolution in China, not confined to political forms but addressed to her key national and social problems i.e. directed toward the toppling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the twin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the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that he and all true patriots wanted.

Dying in 1925, Dr. Sun did not live to see the tortuous but ultimately irresistible

development of this revolution and its final victo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e only in 1949, a quarter century after his time. But his lasting historic greatness lay in his ability to see and hail its dawning outlines. A dauntless and determined revolutionary, he stayed optimistic in the face of many grievous defeats. More, he was able to move ever forward in his ideas and, with youthful enthusiasm even when aging and ill, to help Chinese history enter on a new path. Toward this, he was strongly impelled by key changes internationally and in China following on World War I.

One great change was, externally, the Russian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of 1917. It broke through the imperialist encirclement that had threatened China with partition, save China's own revolution from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and brought to it the thought, method and long rang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Two other changes, internally, were the China-wide storm of the anti-imperialist May 4 Movement of 1919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1.

And Dr. Sun readily and gladly accep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partners in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and as awakeners and organizers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s a vast new force adding unprecedented weight and power to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uggles.

In China: Modernization Only Through Revolution

Now a question. Our theme is modernization. But we have been talking largely of revolution, continuing and deepening over several decades. Why? The answer is: China had to revolutionize before she could modernize.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this was not so. In Meiji Japan, for instance, and Bismarckian Germany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at a more incipient stage in the Russia of Peter the First or the Prussia of Friedrich the Third in the 18th, advances in modern development had come through reforms largely from above, and not popular revolutions from below. And indeed all these models — especially the Meiji model which lay so near in time and in geography — had been admired, studied and envied by early would-be modernizers in China.

Some of these were conservative imperial officials of the 1870s-1890s like Zeng Guofan, Zuo Zongtang and Li Hongzhang, who were interested largely in the arms industry and did not want change in the ol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r ideology. The others were the ill-fated liberal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 reformers of 1898 —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and Tan Sitong, whose plans went further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educationally and who in 1898 convinced the young emperor Guangxu to promulgate them from the throne itself, but all to no avail.

Failure of these initiatives pointed up a basic fact: in China things were different than in the foreign lands whose examples in modernization her reformers

wanted to follow.

Politically, unlike those countries, China had already lost much of her national sovereignty. Her territorial partition had begun. And her monarchy for decades had been identified not with national status or revival but with the sell-out of national interests.

Economically and in class terms, China did not have their degree of pre-modern growth of industrial or even mercantile capitalist forms or a corresponding developed bourgeois class. Modernization in these respects was barred to her by the inequities already imposed on her in unequal treaties dictated at gunpoint by imperialist: powers in their phase of most vigorous expansion, and at the height of their greed for so succulent field of exploitation as vast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brave, patriotic and inventive. All these qualities they had repeatedly proved. But the obstacles described above stood like mountains in their wa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rise and independent capitalist economy, much less a capitalist stat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Hence it was inevitable that Chinese who strove to make their country strong and modern, should conclude by the 19th century's end that the China's road to modern progress was not that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reforms a la Meiji but republican revolution a la George Washingt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de it equally inevitable, by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ey should further move on from the views and example of George Washington to those of Marx and Lenin.

Sun Yat-sen early in life made the first shift, and late in life was making common cause with the second. In both cases the choice was not caprice but a lesson drawn from China's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by an indomitable practical revolutionary seeking in constant action the road of modern advance for his country and people.

Dr. Sun's Personal Origins and Growth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refore, Sun Yat-sen was both Revolutionary and modernizer. Within the wider historical context, what were the personal roots which brought him to these positions?

Born in a poor peasant family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 of Guangdong, he inherited both the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hostility to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present in all classe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the specific resentments of the village poor against the landlords and the rich. The stirring stones of an older relativ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1851-64 Taiping Peasant Revolution fired him with boyhood admiration for this tremendous armed uprising which had not only come close to overthrowing the Qing emperors but had projected a program that

asserted the right of all to land, food and other necessities of life.

But while these were dreams,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oastal Guangdong, resulting from foreign aggression and internal misrule, was driving the sons of the Sun family, like so many other local peasant youngsters who lacked land and opportunities at home, to seek a living abroad. Sun's elder brother did so in Hawaii, where he worked his way up from laborer to small shopkeeper and later to large cattle-ranch owner becoming one of a new class so far as China was concerned, the bourgeoisie. And it was there, and later to Hongkong, that Sun Yat-sen was able to go for an education.

From then on, we can say Sun Yat-sen's thinking drew on three sources.

One was his never-forgotten toilsome peasant background.

The second was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emigrants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Overseas Chinese". Some of them had gradually advanced economically from poverty and back-breaking contract labor in the more modern environment abroad. But virtually all of them still suffered from a variety of discriminatory deprivations and humiliations which were directly traceable to China' s being backward at home and bullied from the outside. Therefore they longed for a modern and strong China not only for their ancestral homes and kinsfolk but also for own dignity and rights.

And the third source was the thinking of the young Chinese, many with some background of culture and property at home, who had gone abroad specifically to study. There they had become sharply aware of their country's disastrous lag in the world, and eager to take back what they had learned to modernize and revive China. Many of this group, the "returned students", also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advances they desired were impossible without a radical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in her position among the nations.

The organic fusion of yearnings and feelings from all these three sources in a man as historically representative, earnestly thoughtful and fearless as the young Sun Yat-sen, and as tirelessly determined to move from thought to action and to enlist and organize all possible collaborators in such action, was bound to crystallize into a potent political force for change — because he represented not just himself but a combin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ides.

Youthful contact with the modern developments of the West led Sun to ponder on how similar advantages could be brought to serve China and her people. His choice of modern medicine as a career was only one sign of this. We also find him, while still a student, proposing to the authorities of his native county, Xianshan xian in Guangdong, some practical means of improving its prosperity by new ways of agriculture and sericulture. In 1894, two years after receiving his medical degree, he went up from the local to the national level, journeying to northern China to present

to Li Hongzhang, a top-level imperial official already sponsoring defense and other industries, a set of proposals for the nationwide adop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ique. These were presented not in isolation but as a prelude to all-sided narrowing of the gap in development that was making China helpless before foreign encroachments.

But Sun Yat-sen's patriotic arguments were not even given a hearing. Then he decided irrevocably that China's monarchy offered no hope of reform or progress but instead barred the way. Therefore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its complete overthrow.

After 1911, when through ceaseless effort this aim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Sun Yat-sen was made provisional president of the new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he gave up this post to the military politician Yuan Shikai, a move he hoped would stabilize the republic and avoid civil war. Instead of the presidency, thinking the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devote himself to China's modern reconstruction, Sun willingly accepted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general of her railways, whose expansion was so essential to the task. With particular pride, he inspected the first entirely Chinese-built railroad, the line from Beijing to Zhangjiakou (then generally known abroad as Kalgan), built over difficult mountainous terrain by the "father of Chinese railway construction", the engineer and inventor Zhan Tianyou. Also he went on an inspection trip to Japan to study railway development there. But Yuan Shikai betrayed the republic, and Sun Yat-sen, bitterly disappointed but undaunted, had to go again into revolutionary activity in exile.

It was during this exile, in Japan, that he met and in 1915 married Soong Ching Ling. The rest of his life was their common life, so we will now turn to her.

Soong Ching Ling, in Her Own Generation, Finds Her Life's Road

Soong Ching Ling was born in 1893, twenty seven years after Dr. Sun, and died in 1981, fifty six years after him. Historically and personally, she belong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lived well into a third generation. It was her father, Sun Yaoru, not she, who contemporaneously with Sun Yat-sen had started as a peasant emigrant, an also like Sun was an earl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olded him into a "returned student" modernizer. Back in China he became at first a Christian pastor and later an industrialist in Shanghai. Also, by the year of Ching Ling's birth, he had entered Sun Yat-sen's political circle.

Soong Ching Ling herself was not converted to modernity but born in a modernized family. She grew up in the way of life of the somewhat westernized Chinese bourgeoisie of the "treaty ports", which by the middle and late 1890's had emerged in those cities to form a distinct stratum. In her parents' house the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furniture and even often the food, were western-style. The

Soong children were early sent to missionary school where the teaching was mainly in English. For their college years all were sent to America by their US-educated father. However, their parents were also patriots. They had no idea of their children' s staying abroad, and wanted them to return to serve and advance China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gained there.

Soong Ching Ling was the one who took this most seriously to heart. In her college writings in America (dating from 1908-13), she first called for reform, then ecstatically greeted the 1911 revolution. While still in her late teens, she wrote that the mission and task of "returned students" was to restore China to independence and greatness by reshaping her along modern, democratic lines in the western liberal tradition. That was a dedicated view, but at that stage still a narrower one than that to which the young Sun Yat-sen had come almost a generation earlier. For Soong China Ling, unlike him, had never yet known at first hand the life of the peasantry nor that of the Chinese toilers driven by poverty to work in far lands; she knew only the cities and the campus. But this ardent young woman was burning to throw herself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suffering country. Also she looked to Sun Yat-sen as the leader of that cause.

This brought her first to working with Sun as his English and confidential secretary, then to becoming his wife and closest confidant. Thenceforward, not only did she learn from him but they both learned together, in a close and unique comradeship. And what they learned became so much a part of her that, widowed at an early age, she was able for decades not only to uphold his cause but to carry it forward, facing new perils and new decisions in ordeals without precedent, till unprecedented victory.

The marriage of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was in effect their mutual marriage to the surging Chinese revolution, entered into in the light of its needs. This basis made it an invariably devoted and happy one, filled with deep mutual concern in the midst of shared perils and labor. Every day of the ten years they together until his death in 1915 was filled with practical work for their common aim. And the most decisive thing they learned in their unremitting struggles and effort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new revolution that began in 1924, was the fundamental and indispensable role of the workers the peasants and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army devo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great majority — lacking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modern new China.

It was during enforced intervals in his constant efforts to revive and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 that Sun found the most time to sketch out plans for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s in his "Outline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1919-20), etc. But so long as the revolution was not won, those plans could only remain on paper. So it was not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ut the delay of its victory that put

off China's modernization to the present. Deng Yingchao,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woman leader and widow of the revered late Premier Zhou Enlai was historically right when she referred to Sun Yat-sen, in a recent article, as "the great forerunner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foreign writer on Sun Yat-sen, C. Martin Wilbur, summed up his overall aim as "a modern republic with a socialist economy" (Sun Yat-sen ha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foreign socialist thinking as early as 1897, an repeatedly, stated that the third of his famous Three People Principles — the Principle of Livelihood — was the same as socialism, though his view of how socialism would com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arxist one).

Two Modern People

The marriage of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too, was a marriage between two people personally at the peak of modernity among the Chinese of their time — in politics and in outlook — and it was this that brought them together. By the traditional feudal mores of China, and even in the more advanced eyes of some of Dr. Sun's adherents and of Soong Ching Ling's Christian parents, their marriage was inacceptable, as when they decided on it Dr. Sun had a wife and grown children. In this family situation, by the old Confucian traditions, concubine would have been a more respectable and socially acceptable arrangement than divorce and remarriage. But to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both modern advocates of the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concubine would have been a more was a social outrage and out of the question. So Dr. Sun obtained an amicable divorce, legally certified, from his first wife Lu Muzhen (who had been chosen for him by his parents in the old way when he was only 17) to wed the young Soong Ching Ling. Though a good woman and mother, Lu Muzhen was barely literate and little informed about the world, and had long not been his workmate, or even companion, as they lived for years in sepa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thing that Sun Yat-sen most valued in life — his unflinching and constant revolutionary activity — was to her only a fearsome and disliked menace to the family's tranquility, livelihood and very survival.

The marriage of Sun and Soong, on the other hand, was one between two fighters, one a middle aged teacher and veteran of many battles and the other a young and eager disciple, on the basis of absolute commitment to the struggle and its priority. At a time of defeat and exile, it brought to him comfort and renewed energy, and to her the chance to help their common cause and the great man who led and most fully embodied it.

In her old age, remembering their life together, Soong Ching Ling not only recalled the revolutionary trials and triumphs but also told friends that a memory of Dr. Sun that frequently recurred to her was of how, spreading maps of China on the floor of their room, he would examine and mark them with an ey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industries and transport by both land and water. Whatever the exigencies of the fight at the moment, the aim of modernization was never out of his mind as long as he lived.

In one of her earliest inspection trip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ong Ching Ling made a special point of visiting the North China port of Qinhuangdao, on the expansion of which Sun Yat-sen had laid emphasis in his plans for modernizing the nation's transport.

A Glance at Their Books

Books, books everywhere testifying to their owner's thirst for knowledge. This strikes anyone who visits the homes where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lived together in Shanghai, and her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after his death. Their books show their constant effort to keep up to date, and the great breadth of their interests.

Among those in English alone, there are whole shelf-fulls on the recent history of various countries, with considerable stress on thei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on the biographies and memoirs of their statesmen.

On socialism, there are works dating back to before the Soviet revolution, as well as after.

On national defence matters, Sun Yat-sen carefully collected whole sets of army and naval annuals such as Jane's Fighting Ships, testifying to his constant effort to keep abreast of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y, among many themes, there is a noticeable stress on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various countries.

Many books on medicine show Dr. Sun's continued interest in his old profession. Soong Ching Ling, after his death, continued, to take a strong lay interest in medicine — especially preventive and in the field of nutrition — reading much on these subjects and applying her knowledge in her later undertakings for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care.

In economics there is much on fiscal and monetary questions.

In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titles on various industries, transpor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griculture (with such titles as "Soil Physics" and "Diseases of Economic Plants") has its share of space, as does geology.

Keen interest in science both applied and, in Sun's time, far from immediat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s shown by such books — as "Physics: toms" and science fiction items like "A Voyage Through Space".

There are also many literary works, manuals on foreign languages, rhetoric and the like. They read both separately and together. Witnesses of their married years recall how Soong Ching Ling read aloud in English to Dr. Sun, often for several

hours each day.

Unfortunately neither Dr. Sun nor Soong Ching Ling were in the habit of marking their books, and we have thus been deprived of valuable indications of what they thought as they read.

One thing, however, can be assumed as certain. In their reading, as in all their activity, they were inspired by the thought often expressed by Sun, that their great and long-suffering nation should take its place in the advanced ranks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that its people should live well and happily.

The slogan "revitalize China" which is so much used in the present drive for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was first launched by Sun Yat-se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y diligently studied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order to buil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ism

Another outstandingly modern features of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was their internationalism.

Although the most ardent of patriots, they never considered China in isolation but alway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rogres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they wanted their country not only to share but to greatly help advance. National arrogance and chauvinism were just as far from them as national self-deprecation or nihilism. They respected what was negative and reactionary, in all nations including their own. While they fought against imperialist governments which oppressed of attacked China, they had firm and long-lasting friendships with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ose same nationalities standing for progress and justice. With regard to Japan, for instance, Soong Ching Ling wrote in the 1930s, “Chinese nationalism is growing in the form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However, it would be wrong to think that Chinese nationalism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Japanese people or any other foreign nationals. In all our past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peace-loving. Now more that ever, they have no thought or desire to conquer another nation. The idea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s to resist the Japanese warlords who are invading our country.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ina will not only be able to preserve her present territory but will surely recover all her lost territory.”

Once the goals of China’s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were achieved, they had no thought of self-isolation or of shutting out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But for such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they set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respect for China’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 equal status.

It is a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Soviet Union founded by Lenin was the first, and for decades the only, foreign country to affirm and practice these principles with regard to China. Therefore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along with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 long saw in it their most reliable frien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it was because the socialist outlook was the best mental weapon for both her national and her social emancipation that China chose, and has maintained, Marxism-Leninism as the system of thought to be applied to her own problem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rticularly, as shown by their utterances and practice throughout their active lives, did this revolutionary couple respect and have common feelings with the peoples of what we now know as the Third World and their anti-colonial struggles.

Sun Yat-sen's key stress on equality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oday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 more fully developed formulation which serves as a basis for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countries of all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strong or weak, large or small.

World Peace

In world policy, strong stress was laid by Sun Yat-sen on international peace. A strong independent republican China, in his view, would strongly contribute to this aim. This was already reflect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Tong Meng Hui, founded in 1905. Soong Ching Ling, on her part, referred to it as ear y as in her writings while still at college.

Her devotion to world peace, and work for it, was to be lifelong. Her prominence in the world peace movement — from the late 1920's on — was not honorific but well-earner by constant devotion and effort.

Unity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Taiwan

Modern and timely still is Sun Yat-sen's constant stress on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ll the nationalities of China, he emphasized, had an equal part to play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All the fruits of foreign aggression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With regard to Taiwan, he early gave support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 against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among them, in turn, he found strong backing to 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In 1895, when the decrepit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signed the capitulatory Treaty of Shimonoseki which surrendered Taiwan to Japan, the Revive China Society headed by Sun Yat-sen said in its founding declaration that lost territory must be recovered. Subsequently he advanced the slogan, "Revive China, Recover Taiwan." In 1897 he sent Chen Shaobai to Taiwan to establish a branch of the Revive China Society there with the aim of "uniting the Chinese people of Taiwan." On his own three visits to the island, the last in 1918, he was warmly welcom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hen he died in 1925. A huge

memorial meeting held in Taiwan in defianc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re, stated in a mourning message: "When the news came, the people of our island were prostrated as though they had lost their soul, and looking west to China's Central Plain, could not restrain the torrents of their tears. Sir!... Although your spirit and ideas have not yet been realized, your mighty resolve to overthrew the Manchu Ching dynasty, set up the Republic, terrified the shameless warlords and cruel foreign imperialists, and aroused the 400 million people of China from their sleep." From many years from then on, the anniversary of Dr. Sun's death was observed in Taiwan with a deep feeling of kinship with the rest of China.

In this connection we recall again Sun Yat-sen's frequent statements that China was one inseparable whole, that "Unity is the will of the whole people. If we can unite the whole nation will be happy. If we cannot, we still suffer harm."

These statements and attitudes, though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ng as true today. And in Song Ching Ling's own constant expressed hope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with the mainland, she was, as in all else, loyal to Sun Yat-sen's essence and purpose.

Old and New Thought

While both Sun and Soong referred frequently and with pride to China's age-old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ey sharply pointed out the inconsistency of its inherited feudal thinking with modern progress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 Sun's iconoclasm in this regard was shown very early when, to the scandal of many people there, he overthrew the idols in a temple in his native village age of Cuihong. From Soong Ching Ling we hav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rticle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written in 1937. While affirming Confucius's role as an educational reformer in his own time, she attacked his paternalistic view of government based on submission of each level of society to each higher one (and of women to men) which gave no role to the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themselves and was hostile to the idea of any change in the social order.

In order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nd well-be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she concluded "We do not need Confucianism. We need unity. We need to cease every internal struggle and prepare to recover our lost territories,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Europe,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e USSR. Then we march forward to as glorious future."

Since Sun Yat-sen was a Christian convert in his youth and Soong Ching Ling was Christian-born, it may be asked what influence Christianity had on them. Some aspects of Christian ethics certainly did influence them. But neither showed any strong evidence of religious faith — in Sun Yat-sen there is very little reference to it and that only early, and Soong Ching Ling's writings, even in her student days

in Wesleyan, contained no mention of God or divine intervention or will in human affairs. In Sun's divorce and their marriage, which was a civil one, they braved and ignored opposition on religious grounds, whether from the Soong parents or from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foreign. While they continued to have close Christian friend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especially participants in the revolution or sympathetic to its political aims —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church membership or even Sunday church attendance in their life together. Soong Ching Ling later disputed the statement that Sun had personally asked for a Christian burial (his and the Soong family did hold such a service apart from the civil ceremony).

Religiosity was for Sun Yat-sen a very temporary phenomenon and for Soong Ching Ling the one with which she started in childhood but did not retain. Both left it behind, moving toward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ch Sun Yat-sen was to accept partially and Soong Ching Ling decisively.

A Modern Style of Work

One aspect of Soong Ching Ling's modernity, learned both in college 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her work with Sun Yat-sen, was her efficiency — especially her saving and planning of time. Extremely punctual, she expected people who made appointments with her to be neither early nor late, and herself never kept them waiting. Swift in action, she prized every working minute. This, along with courtesy toward others, enabled her to answer her voluminous mail almost always on the same day. If delayed by as much as two days by illness of pressure of duties, she invariably began with an explanatory apology. This was her lifelong habit. She did not change it as long as she was able to hold a pen, even when in her late eighties, bedridden in her last illness.

In March 1981, two months before Soong Ching Ling died, the editors of a small publication printed in Sun Yat-sen's native county for dissemination on among their scattered townsfolk elsewhere in China and abroad, asked her to inscribe the title of their magazine. Earlier, they had debated whether she was too old to make the effort, or too important to be approached by a mere local paper. Then they decided, with little hope of success, to write her anyhow. Almost by return mail, they received the inscription, written not once but four times so they could choose the best for their use. They were much moved, and even more so when, only two months later, news came of her death and of the fact that she had long suffered from leukemia.

This illustrates a combination of many of Soong Ching Ling's qualities, but here we are speaking only of those demonstrating her modernity. Added to her concern for her own and others' time, we see here her complete unconcern for relative rank or status. She had no trace of any feeling of hierarchy, that most persistent of feudal-inherited attitudes, and in general of bureaucratic traits. She was as democratic

in her behavior as in her convictions. Those who remember Sun Yat-sen tell of the same quality in him — even when he had little time for the prominent personages he found it when approached by ordinary folk and particularly by the young.

Attitudes on Women and Children

Sun Yat-sen's and Soong Ching Ling's concern for the rights of women had already been referred to. Both stressed the basic importanc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 in having a hand in shaping the nation's and the world's future — and of 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Sun Yat-sen wrote women's right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uomintang adopted at its first congress in 1924. Much earlier, he had introduced coeducation into the nation's primary schools in one of the first enactments of his brief provisional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in 1912. This showed how modern concepts of education, including that of girls, stood in his mind a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revolution.

Soong Ching Ling, in 1926 in Wuhan, headed a school for women political organizers, and enlisted them as battlefield nurses for the expedition against the northern warlords. After World War II she initiated a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 in Shanghai which, expanded greatly after the liberation, is a leader in these branches of medicine in China. To it she donated all the 100,000 roubles she received in 1951 as a Stalin prize for peace. She was a strong advocate of family planning, and thought contraception should not be left as mainly the concern of women — but that more should be done about male contraception.

Along with matters of food, clothing and basic hygiene — when she inspected nurseries and children's centers she never missed the lavatories — she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ir ment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s citizens of the future. Very early, such work for children which she saw in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late 1920's had impressed her deeply. The Children's Palace and Children's Art Theater in Shanghai were both her loving creation — intended to point ways for all China. Both originated in work done with, very meager funds and in enforced semi-clandestine circumstances in Shanghai in 1946-48, and became large-scal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lso in the 1950s she donated to the Children's Theater the royalties of a widely published book of her selected works — and it was for children that she wrote her last message in 1981.

Watching the building of model aircraft which is one activity of the Children's Palace, one is reminded of the fact that it was on Sun Yat-sen's orders that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airplanes was constructed in Guangzhou in the early 1920s, that it was called the Rosamonde which was Soong Ching Ling's English name, and that it was in this fragile bamboo-and-canvas craft that she took her first flight — among other things as a signal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specially Chinese women of the

heights they had to conquer.

More than 60 years later a small but accurate replica of the Rosamonde was presented to by the Chinese People's Air Force to the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established in her memory, to be kept in the Children's Science Park it is beginning to build in Beijing. The computer pavilion, its first edifice, was opened in 1985 0n June l,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The work of the Foundation, now and in future, aims at being a fit, lasting and living remembrance of this great woman.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active through most of the 20th, Soong Ching Ling concerned herself with, and will be alive in the minds of, the youngsters who become adult builders of socialist China in 21st.

Probing deeper we see again here that the modernity Soong Ching Ling wanted for her people and for all mankind embraces not only the efficiency,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ade possible and indispensable today's world. It goes beyond these things, being geared to goals for progress, both social and ethical — freedom from poverty, exploitation, war, ignorance and all forms of oppression.

In short, Sun Yat-sen and Soong Ching Ling were new-risen stars in the sky of their time which would go on shining in the skies of future. They were modern then, and continue to be modern for us. Because Sun Yat-sen helped pave the way for, and Soong Ching Ling lived to help establish and build, the new socialist China.

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

朱玖琳 译注

译者按:《我的父亲在中国》是美国监理公会在华传教士威廉·伯克(William B. Burke,中文名步惠廉)的生平传记,其中部分章节涉及威廉·伯克与宋氏家族的渊源。该书作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中文名布雅各)是威廉·伯克的第五个儿子,系威廉·伯克与其续弦莉拉·杰尔丁(Leila Gerdine)的次子。詹姆斯·伯克曾任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记者,为了撰写父亲的生平,他曾于1941年在香港访问了宋蔼龄和宋美龄。宋蔼龄在重庆时阅读并修改了该书中有关宋氏家族的章节。在撰写过程中,他还得到了许多其他有关人士的帮助。林乐知的外孙刘兆慧(George Loehr)为他提供了林氏的来往信件,他从中发现了宋耀如在美国写给生父的第一封信;其兄长、时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戈登·伯克(Gordon L. Burke,中文名步戈登)也积极地帮助了他;许多监理公会布道团传教士如约翰·克莱因(John W. Cline,中文名葛赉恩)、西德尼·安迪生(Sidney Anderson)、约翰·霍克(John Hawk,中文名霍约翰)等人也给予了他大力协助;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的父亲、该书传主步惠廉,步氏将自己长达55年的日记悉数交给儿子阅读,并充满耐心地回答了其子无数的问题。1942年6月,布雅各在华盛顿完成撰稿工作。随后该书在纽约和多伦多由FARRAR & RINEHART, INC出版。

1

酝酿中的传教士

比尔·伯克的房间没有多少神学院寝室的味道。

就此而言，这可能是卫斯理堂（Wesley Hall）[1]或者是整个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面之一。1884—1885学年，每当阅读希腊文或《保罗书信》[2]感觉负担，需要片刻转移精神的时候，神学家们就习惯地聚集在那里。事实上，这种“转移”是如此频繁，以至于比尔的一位不善社交的室友在该学年开始一个月后便申请住进了单人房间。

比尔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由于他擅长辞令。他绝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具有十分善良的本性。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那爱好争论任何话题的爱尔兰人习性，所以只要他的观点一有争议，他便自然成为大学讨论会的核心。

正是由于期盼这样一个讨论会，一天下午，几位年轻的神学者走上了通往这一房间的楼梯来开会。其中之一是一个矮小的中国人，他的名字相当独特，叫查尔斯·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Soon多年后改拼为Soong）。半个世纪以来，他被视作传奇人物，因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群兄弟姐妹的父亲，是中国无冕的“宋家王朝”的奠基人。然而，在范德比尔特，他只是查利·宋（Charlie Soon），一个安静的、刻苦的中国人，懂得如何友善地对待别人，尤其是他的大学同学，因为事实上他既不是洗衣工也不是厨师。

当同学们进入比尔的住所时，他们突然留意到眼前只有在肖托夸（Chautauqua）[3]阳台上才可能有的有趣景象。一只通常应靠墙放的小

---

[1] 范德比尔特大学内的一个学生宿舍楼。步惠廉和宋耀如均居住在此楼。

[2] 《新约圣经》中《使徒书信》的主要部分。传说是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教会或个人的信。依次编为《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卷）、《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书》（前、后卷）、《提摩太书》（前、后卷）、《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共十四卷。这些“书信”的大部分，都是长篇论述，广泛论述了信仰、神学、伦理等问题，成为后世基督教教义、教规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书信均以当时流行的希腊文写成。

[3] 即美国爱荷华州境内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写字台，被铺上毯子放在了房间中央。写字台上是一只从屋角的洗脸架上取下来的洗脸盆，里面盛满了水。盆底有一枚闪光的银币，透过水看上去放大了。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以外，盆旁还放着一只笨重的带金属手柄的熨斗。来访者看不见的是桌子底下的一组自制蓄电池，以及毯子底下一根通往熨斗底部和脸盆的细铜丝。

“快进来，快进来，”比尔一本正经地招呼道。他正坐在他的床边。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小伙子，体重两百多磅，身高六英尺二，体型匀称。他说话的时候，深灰色的眼中跳动着某种恶作剧的东西。

“今天，我为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奇观，”他宣布道，“是桌子上的那只熨斗。它是被施了魔法的，来自火雾山上的女巫洞。任何人碰到它便会失去意志力。为了证明这一点，你们中谁如果能在握着熨斗的时候拿起那枚银币，我就把它送给谁。”

没有人动。

“你怎么样，查理？”比尔问。

宋在叫声的刺激下小心地走上前去。他谨慎地盯着熨斗和盆中，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他一手握起熨斗的手柄，并把另一手伸进水里。带着一声惊叫，他被震得弹了回去，银币依旧留在盆底。然而，几乎在比尔爆发出大笑声之前，他惊讶的表情就已经转为羞怯的笑容了。正是这种从未逝去的幽默感使得两人自在范德比尔特认识的第一天起便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比尔于1884年秋进入田纳西的学校[1]读书。他只有20岁。就在一年前，在他19岁生日的前几天，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牛津市埃默里学院（即现在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靠近亚特兰大）的学士学位。后来，他把重心放在了医学上，并在昆西（佛罗里达州）高中谋得校长一职，他在他的寄宿处堆满了医学书籍，还有一副人体骨骼，为报考医学院作准备。但是教书以及作校长的巨大压力，一度遏制了他对自然科学的爱好。

暑假期间，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家中，比尔感受到了牧师工作

[1] 即范德比尔特大学。

的召唤。这一想法大概最早植根于他幼时与父亲约翰·W·伯克牧师(John W. Burke)一起驾着双轮单座轻马车去巡环[1]时,他父亲是监理公会南佐治亚州议会的会员。无论如何,他在昆西一年以后,这一想法成熟了起来。比尔辞去校长一职,注册进入范德比尔特神学院(Vanderbilt Theological School)就读。

比尔在范德比尔特燃起传教的热情是必然的。至于热情,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在八、九十年代,美国新教各布道团的巨大组织力量正在发展中。传教士们利用假期在教堂、大学演讲,为"基督在黑暗大地上的战线"征募人力和财力。传教团体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涌现。单监理公会女子传教团(Southern Methodist Woman's Missionary Society)就夸口在1885年有44,362名成员,并自称是"为上帝获得异教徒的真正有效的代理人。"青少年传教团也成立了,其成员被称为"小工人"。在铁路公司允许给会议代表特价的情况下,庞大的传教士议会会议和群众会议召开。

而且,在范德比尔特也出现了这一景象,查理·宋十分关注这些发展。宋准备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主要的"黑暗大地"之一。

近年来,虽然宋的早期冒险活动被添油加醋地反复述说,但却没有多少重要的事实。他出生在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的海南,在被一位没有孩子的堂舅收养后,最终在那个亲戚在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开的茶丝店当学徒。在那里,他经常与一群中国留学生交往,这些学生是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宋想要受教育的志向被刺激起来。1880年,14岁的宋逃离堂舅处,偷偷溜上一艘停在波士顿港里的沿海岸航行的明轮船。船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名叫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他被这个男孩的精神所打动,让他作为船上的一名仆役跟着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把他留在了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的一位监理公会牧师家里。在这位教区牧师的家里,在经过几天牧师的仁慈接待和每日祈祷后,这个易受影响的男孩皈依了基督教。他受了洗礼,

[1] 巡环(circuit):分散在相当距离之内的两个以上的地方教堂彼此联合起来,由一位牧师管理而构成一个牧区者。

取教名查尔斯·琼斯，以感谢船长。1880年11月7日的威明顿《星报》预告这次施洗仪式道：

“今天上午，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将举行洗礼仪式。一位中国皈依者将是这神圣仪式中的一员，迄今为止，他也许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两天后，在同一份报纸上，一报道形容该仪式“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仪式结束后，宋在教堂里来回走动，同每一个人握手。他告诉了他们一切，他告诉人们他是如何找到救世主的，以及他希望返回中国并向他的同胞介绍耶稣基督的救助。

善良的教徒们强烈呼吁派遣一名被救赎的异教徒回到异教徒当中去。达勒姆市的朱利安·S·卡尔（Julian S. Carr）将军对此十分感兴趣，他是一名南部邦联的退伍军人和富裕的烟草商。他把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带回家，并在作了少量准备工作后，把他送往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即现在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这时，宋写了两封信，它们也许是宋的人生到那时为止所留下来的唯一的第一手文献。一封信是给他父亲的，它被附在另一封给上海监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杨·J·艾伦（Young J. Allen）博士的信中。宋要求艾伦博士找到父亲并把信交给他。但是，从上海到华南地区就像从北卡罗来纳州到那一样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是这个中国青年所无法想象的。考虑到宋只有15岁，而且学英语才不到一年，这些信写得相当好，足以证明这个男孩的才智。给艾伦博士的信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艾伦先生

尊敬的先生：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已有六年，我希望我父亲能够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文昌县，

他们有帆船从澳门驶往海口[1]，约走六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是“Hann Hong Jos’k”[2]。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我已于数月前在北卡罗来纳威明顿市皈依，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校在帮助我，所以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国，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收到信后请回信，我为此非常感谢您。再见。

查理·琼斯·宋敬上

给他父亲的信较长，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现在在哪儿。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东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并幸运地找到了我们的救世主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上帝就在我的面前。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友善和上帝的仁慈告诉您。他派他的独子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有罪人受死。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我记得我小时候，您带我到大庙里去拜那些木头做的神像。哦，父亲，木头神像不会帮助人，纵然您礼拜一辈子也没有一点好处。在我们过去的时代里，人们对基督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我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安慰我。请您竖起耳朵听，你能听到神在说话，请你抬起眼睛看，您能看到上帝的光辉。我信赖上帝，希望凭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再见您。我们现在正在渡假，我住在达勒姆的J·S·卡尔先生的家里。收到我的信后请立即回信，我将非常高兴得到您的消息。我爱您，也请向母亲、兄弟和姐妹们转达我的爱意。下次写信时我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夫人一家是非常好的基督教家庭，在我认

[1] 本文译者曾误辨原文“Hanhigh”为“Nanhigh”，因而误译为“南海”（见《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62、281页）。百度知道网有关于Hanhigh是否是越南这一问题的答案（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7792073.html），根据答案的线索，译者查找南海地图（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South_China_Sea-zh.jpg）后发现，很明显，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海南地方发音来考虑，Hanhigh应该是海口。

[2] 即“韩鸿翼”的海南音。

识他们之前，他们就对我很亲切。

Hann Cardson[1]

查理·琼斯·宋

人们会猜想他父亲收到这封信并把它翻译出来后的反应。事实上，他从未收到它。艾伦博士没法找到他，便把信夹在他自己的文件中带走了。

有趣的是，这封信揭示了宋的原姓似乎本不是宋，而是韩。他的罗马注音（他自己的名字“Hann Cardson”和他父亲的名字“Hann Hong Jos’ k”）看来是一种中国南部的方言音。但是，宋还在信尾用中文写了名字。这些文字翻译成标准的中国官话注音应该是“Hann Chiao-shun”（宋的名字）和“Hann Hung-yi”（父亲）。这里的韩是一种常见的中国姓氏，起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王国韩国（不是大王朝）。宋没有改换他的名字“教准（Chiao-shun）”（用上海话念或者是“高真（Kyau-tsung）”），因为当他回到中国时，他仍然在使用此名。

在范德比尔特，宋从来不提名字的事情。当然，可能的假设是，因为那位领养了这个年轻人的堂舅姓宋，姓氏便随着领养关系而改变。这在中国是普遍的习惯。后来，在宋去世以后，他的孩子们以他本姓宋非姓韩为事实，给出了另一种解释。长女孔祥熙夫人写道：

“关于你在信中提到的我父亲自己署名为韩教准的事情，这很容易解释。他父亲的妹妹没有儿子，所以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被认作宋家和韩家两家共同的孩子，以保证每年清明时韩家坟前香烟不断。”

要不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一人同时代表两个家族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那么这个回答便是理由充分的。这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韩鸿翼只是他的养父，宋为什么不试图与生父联系。而且如果韩是没有孩子的姨父，宋为什么会在信中提到他的“兄弟姐妹”？更充分的解释可能要出自正宗的宋氏家族史了，该家族的成员目前正在考虑这项工作。

[1] 即“韩教准”的海南音。

给艾伦博士和“我的父亲”的信还提供了一个证据，即虽然这个男孩于1875年就离开了家，但他直到1878年才到美国。这与大多数称宋离家后就直接到了美国的描写相矛盾。这三年他和他哥哥在东印度或其他地方的活动只能是有趣的想象，因为从来没有人听他谈论过这件事。

最后，信里有很多地方显示了宋在宗教皈依方面的虔诚和他要回中国传教的热情。依旧在卡尔将军的资助下，这个年轻人于1882年来到范德比尔特学习神学的时候，这份虔诚和热情丝毫没有减少。之后的夏天，他用大有长进的英语水平再次给艾伦博士写了一封信：

范德比尔特大学卫斯理堂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3年7月27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您友好的来信已收到多日，我确实非常高兴收到它。我知道您将您的工作、生命和心灵全部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能按上帝的旨意很快见到您。我不知道我还要在美国呆多久，但我将尽可能彻底地作好准备。当我完成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无尽的惩罚中拯救出来。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监理公会的一位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寻常的怪问题，她说：“哎，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是否愿意为基督的事业蒙受一切磨难并且牺牲生命？”我认为对我来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我的良心，我据实回答。我回答道：“是的，夫人，如果上帝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基督受苦。”她又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并使我们以极大的热情侍奉他，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打了一场胜仗，从今以后，我将得到生命的荣耀。”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全部工作。

查尔斯·J·宋

伯克和宋在1885年春天离开了范德比尔特，暂时分开。这位年轻的佐治亚人还没有明确感觉到传教地区的召唤。他回到了梅肯，在

南佐治亚州议会上受按立[1]礼，并被派往佐治亚州西南部的巡环布道。宋在北卡罗来纳州议会上受按立礼。假如那时宋可以走自己的路，他会在回中国前紧接着他的神学外再进行一些医学知识的速成学习。可是教会的神父们却不这么想。会督[2]H·N·马克蒂耶（Bishop H. N. McTyeire）为宣布派宋去中国传教而给艾伦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持同一观点。会督信的全文如下：

范德比尔特大学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5年7月8日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宋和帕克[3]医生一起派去你处。我相信你会马上派他去做巡回布道工作，即使没有车马也要徒步而去。宋希望再多留一、二年学医，以使自己更有用处等等。而他慷慨的资助人朱利安·卡尔先生也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是我们认为，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的中国佬习性耗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并且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惬意。这不是他的错。

让我们的年轻人，这个我们在他身上付出辛劳的人，开始去工作吧。把他投入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去，而不是待在一边。他要学习医学的愿望已得到答复：布道团所需的医生已经足够了，多一个也不要。

我深切希望，在你的正确引导下，我们的宋会做好的。如果他做到了，将会使这里的类似工作大受鼓舞。他的情况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

你的主内兄弟

H·N·马克蒂耶

可惜，这位会督没有活着看到他最后的那句话是怎样的一个预言。

---

[1] 按立礼（Ordination）：即正式授予牧师职务的仪式。

[2] 会督（Bishop）：监理公会的总监督人员。

[3] 全名William Hector Park，中文名柏乐文。1858年出生。1882年作为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医师来华，协助在苏州建立博习医院，任外科主任三十余年。1927年去世。

3
黑 暗 大 地

……

那天上午[1]，会议在苏州的天赐庄教堂（Tien S Tsaung Church）[2]举行，正式称谓是“监理公会[3]在华布道团第二届年议会[4]”（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这次会议规模不大，因为布道团只有7名传教士，其中一个是中国人，伯克[5]在艾伦[6]博士陪伴下步入教堂院子时遇上了他。他一直没认出对方，直到艾伦博士说：

“伯克兄弟，请来见见宋兄弟，我们议会的第一位华人会员。”

伯克急步上前，说：“嗨，查理，真高兴又见到你了！有两年了！”

---

[1] 即1887年10月。

[2] 即今苏州圣约翰堂前身，1881年由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在天赐庄折桂桥弄口购地而建，是监理公会在苏州的首堂。

[3] 监理公会：也称监理会。美国南方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教会。美国独立后，卫斯理教派脱离圣公会而组成独立的教会。英文名称作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初无汉译。1844年该会南北分裂。南方于原名后加South（意为“南方”）一词，在中国译称“监理公会”，会本部设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1939年与美以美会、美普会合并为卫理公会。

[4] 年议会（annual conference）：简称议会。监理公会的基本行政团体，负责督导区域议会或中央议会所划定的区域之内的一切教务。该行政团体所管理的区域也叫做“年议会”。

[5] 全名William B. Burke，中文名步惠廉。1864生于美国。1884年入学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与同学宋耀如是好朋友，1885年同年毕业。1887年被监理公会派遣来华，在苏州传教，后调往松江，1934年退休回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回松江传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被日本人遣送回美国。1947年在美逝世。

[6] 全名Young J. Allen，中文名林乐知。1836年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幼孤，由姨父母抚养成人。毕业于佐治亚州埃温里大学。1860年被监理公会派来中国传教。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经费断绝，靠出租、变卖教会产业以及做煤、米、棉花生意维持。1864年，被上海广方言馆聘为英文教习。1868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为19世纪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1869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达十二年之久。为该馆翻译8种书。1877年，基督教在上海组成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写高级和初级两套教材。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1881年，他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的职务，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院长）。1895年，辞去监院一职，专事办刊和译书。在中国47年间，身兼教习、编辑、译书、传教士。常常半天授课，半天译书，夜间编辑期刊，礼拜天传教。译著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中东战事本末》初编8卷，由蔡尔康笔述，1896年4月出版。初版3 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897年又出续编4卷。1900年又出3编4卷。此书不单纯是翻译，间有编者的按语、评论，书中对甲午战争真相的披露，以及对中国存在的积习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知识界很有影响。所著《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列举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种种“益处”，建议中国东南选择两省“租给”英国，一切由英国人“管理”，五十年后“归还”等等。1876年，清政府为了表彰他译书和教学的贡献，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1907年5月31日在上海病逝。

他用双手紧紧握住宋的小手，使劲地握了足有半分钟。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比尔[1]！”宋高兴地说，“你的胡子让我没认出你来。”

“是呀，你的这身中式打扮也没让我认出你来。”伯克笑道，“我觉得它使你看起来好老。”宋身穿一件中国长衫，头带一顶丝质黑色瓜皮帽。他的脸更圆了，几乎鼓了起来。

一种熟悉的光芒出现在宋的眼睛里。他笑道：“你没把那个魔术熨斗带来吧？”

“没有，”伯克咯咯笑道，“但我想我得重装一只。”

4
投入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在会议的第一天之后，宋和伯克聚在一起召开了另一次范德比尔特的会议。宋第一次讲述了他的故事。

1885年12月，他和监理公会传教医师W·H·帕克[2]医生一起启程回中国。宋对这次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旅行记忆深刻。估计那时杰欧尼莫族（Geronimo）[3]的酋长在作战时，被反叛的阿帕切族（Apache）[4]人赶了出来。一天，当火车开过亚利桑纳州时，列车长跑到宋和帕克坐的车厢里来。他十分激动，指着一块平原说：那里有一队杰欧尼莫武士，那个可怕的酋长也许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赤身裸体，身上涂了颜料，排成一队，在他们的小矮马的背上，他们的身体整齐地向前倾着。

1886年1月，宋跟帕克医生抵达上海后，一起直接去了苏州，在

[1] 伯克的昵称。

[2] 全名William Hector Park，中文名柏乐文，1858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1877年进入埃默里大学就读，1879年先后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系和纽约大学的表维医学院（Bellevue）学习医学，1882年毕业后即被派往中国传教。是苏州博习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在当地有“柏好人”的美誉。1884年回美国继续深造。1886年完成学业重返苏州，直到1927年退休回美。同年12月14日在美逝世，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3] 即美洲印第安部落族。

[4] 即美洲印第安部落族。

那里与这位单身的外科医生在一个房间里共住了几个星期。后来，他搬到了一位当地牧师曹子实[1]的住处，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语言——这位中国南方的青年学习上海话之难，就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学习法语那样。

曹以他的教名查理·马歇尔（Charlie K. Marshall）著称，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从小就被D·C·凯利（D. C. Kelley）[2]医生带到了美国。凯利医生是上海监理公会的传教士之一。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时，凯利医生加入南军，成为一名上校。马歇尔作为他的仆人跟随着他，这使他常与其他南军军官的黑奴在一起。他在美国南部生活了14年，而这样的4年生活[3]使他的口音带上了浓重的南方土腔。

当宋跟马歇尔学上海话时，这位老人总用英语这一他们唯一可交流的语言来解释。听马歇尔讲话对他的这位受过较好教育的同伴来说是一种无尽的烦恼。语言课常常发展成宋纠正马歇尔的英文，而不是马歇尔纠正宋的上海话。一天，马歇尔终于发作了。

“你，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你！”他用浓重的美国南方土腔叫道，“你干吗老是用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来纠缠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给我滚开，别烦我。”

在布道团的最初这几天里，宋横跨上海跑到南翔一所教会女校校长洛克·蓝金（Lockie Rankin）[4]小姐处。蓝金小姐是监理公会第一位女传教士。因为是“一位精通古今语言的单身女性”，她被推荐给差会[5]，于1878年来华就职。她十分推崇中国古老传统中的许多保守的地方，尤其是青年男女在结婚前不可见面的习俗。在对此一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宋跑到南翔，以美国方式直接向蓝金小姐要求是否可以与学校里的一位年轻教师见面。这位善良的女士坚决地回绝了他，并把那位教师锁进她房里，直到宋离开镇上为止。

---

[1] 曹子实：浙江嘉兴人，监理公会在苏州博习书院的开拓者之一。
[2] 中文名雷大卫。监理公会传教医师。1854年来华，1886年因对林乐知不满而转赴日本传教。
[3] 指战争期间的4年。
[4] 中文名雷金贞。
[5] 差会（mission board）：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形式上多由教会办理，也有不从属于任何教会而独立组织者。

一位监理公会的妇女怎么会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这种古怪的想法怎么想都令人觉得好笑。

宋对部分传教士的严厉丝毫没有准备。这与威明顿、达勒姆和纳什维尔的友好的、助人为乐的气氛完全不同。布道团团长看上去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之一。宋对他的“专制方式”十分抱怨。而且，必须承认，艾伦博士有时是相当严厉的。也许在对待宋这件事上过分严厉了。在宋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来到布道团之前，他自己就已经下了结论。正如1886年1月12日他给差会写信所揭示的那样：

……还有一条——第10条——这是我希望提一提的——就是宋先生的薪水问题。他将于两天后到这儿来，我还不知道差会希望怎样对待他，怎样解决他的地位和报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令人为难的地方。我们中西书院的男孩子和年轻人远比他优秀——我指的是学习好的人——因为他们学贯中西，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在进行写作和翻译。他们的成果在传教士公开会议上进行展示和评价时，得到了最年长和最有才干的传教士们的赞扬。但宋决不会成为一个国学大师，最多只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人。除非给他的报酬和地位远远超过他所应得的，他是不会满意和高兴的。——结果是，我发现我们当中谁也不愿带上他。

因此，宋来到布道团时，已经或多或少地注定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在对艾伦博士的过分严厉表示反对之前，我们应该了解，这位老传教士对教育的热情和以教育为手段的传教方式。他曾经说，他的传教工作是“到一个由士大夫统治的帝国传教，是对那些唯有印刷品才能吸引他们的人传教。”他聚集了一些中国学者在身边，帮助他把他的思想组织成装腔作势、晦涩难懂的文理，或是书面语言，以使那种吸引得以实现，然后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写作和翻译。他的著作和小册子包含了社会学、政治学内容和宗教要义，上自皇帝下到一般官员都在阅读。作为回报，艾伦被政府授予官职[1]，他的住宅被尊称为官邸。

他对在文盲（占中国人口的90%）中进行直接的传播福音工作没

[1] 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一职。

什么耐心。事实上，很明显，他喜欢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官吏，而对普通人却很冷淡。除学者以外，他从不邀请中国人到他家中去，他歧视布道团中绝大多数华人布道员，包括宋本人。艾伦从不掩饰他对国内的教会和差会的不满，因为他们把如此仓促地接受肤浅教育的宋派出来给他。

艾伦的教育热情使他无视鼓舞着宋的传教志向和赤诚之心。这位年轻的海南人在他有限的机会中尽可能地做好。若不是马克蒂耶会督决定“他身上的中国佬习性不应被耗光”，他也许还能做得更好。如果能在艾伦那里得到些许同情，宋也许会把自己放在布道团更有用的位置上。事实是，这个小伙子发现自己受到的只有冷遇，不仅来自布道团团长，还来自上海当地的居民。

对上海人来说，宋是那种“没有国籍的中国佬”。他对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一无所知——中国南方的语言与北方的语言是非常不同的。他既因不能被当地人视为同类而得不到尊重，同样也因不是真正的西方人而被看轻。事实上，他毫无地位。当他出现时，孩子们尖叫着“洋鬼子”跑开，大人们叫他小矮子。宋痛苦地认识到，当美国教会热情地希望他成为一名传教士的时候，他们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教会的了解太少了。

宋不快的处境因为一群布道团成员的友谊而暂时得到改善。这些传教士是传统福音派的拥护者。他们反对艾伦博士的教育策略，相信学校应该“自然地增加而不是被人为地硬性建立起来。”他们属于传统的激进派传教士类型，热切地渴望像圣徒保罗那样传播福音。教育派和福音派之间的冲突，导致后者中的一些人在宋到达的几个月后，脱离了艾伦的管制范围，在日本建立了布道团。宋试图转到这个新布道团去，但没有成功。

在不到一年的基础学习和一些教学工作后，马克蒂耶会督的建议（“把他投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去”）被彻底地实施了。他被派往介于上海和苏州之间的昆山巡回传教。在那里，他独自一人生活，面对一个他完全不能适应的工作。

接着，牛尚周出现了。牛是在波士顿激起宋的年轻人志向的中国

留学生之一。宋回到中国后，两人又在上海再次相遇。牛对他的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表示同情，建议说娶个妻子至少能排解他在昆山的寂寞。宋表示同意，并详细叙述了他在那方面在蓝金小姐的学校所做的失败努力。不过，牛有答案。他知道宋在西方度过的岁月没有激发起他对中国传统的那种不识字的小脚贤淑女子的兴趣，出现在牛脑中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自己19岁的小姨子，倪珪贞小姐。牛做了详细的介绍。

倪小姐是徐光启的直系后裔，徐光启是著名的明代内阁大学士，1601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施洗皈依基督教。她的母亲出生在徐家汇（Zikawa是当地方言的拼法，更流行的拼法是Siccawei，位于上海西郊）的徐氏老宅，在嫁给倪先生之前一直住在那里，是一个天主教徒（自从先祖皈依基督教后，徐家人对天主教的信仰一直十分坚定）。倪是一位家庭教师和才华横溢的学者，但他没有选择成为天主教徒。相反，他由上海的伦敦会施洗皈依了基督教新教。他的妻子跟随他改信新教。

珪贞是倪家的第三个女儿——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排行。在她4岁时，她的脚被痛苦地裹了起来，每天紧紧地用布条裹成那时规定的形状。但她的反应比常人更糟。她每天晚上发高烧，不得不把布条松开。最后，她的父母决定，既然她是第三个女孩，而且她也不用非嫁出去不可，那就可以让她的脚自然长大。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中国士绅会考虑娶一个“大”脚姑娘。

珪贞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她很早就显示出对读书的兴趣，这一点令她的学者父亲感到满意。他鼓励她学。她5岁时跟着一个家庭教师学写汉字、读古籍，而不是做更多的诸如针线活这样的女工。在她9岁的时候，她进入由上海的女公会（the Woman's Union Mission of Shanghai）开办的教会学校裨文女塾（Bridgman School for Girls）[1]读书。

[1] 裨文女塾是上海开赴埠后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艾丽莎·格兰德（Eliza Gillette），于1850年4月15日创设于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隔壁（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经费大部分来自教会拨款和社会捐款，其中又以女公会所赠款数最多。1871年裨治文夫人去世，学校由女公会和圣公会管理。1881年移交女公会单独管理，原圣公会系统的教职员工及中学部学生并入另一所圣公会女校——文纪女塾，称圣玛利亚女中，并改为寄宿制，迁址圣约翰书院之北。原西门的裨文女校仍用旧名。早期实行免费教育，1900年起每月向学生收学费5角。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沪南女子中学”。1953年8月又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取消女中，遂改名“上海市第九中学”。

她在这所学校不仅为她日后浓厚的宗教个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且还养就了对数学尤其是三角学的嗜好。她18岁毕业。对家中的女性成员而言，她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不具备她这一性别该有的任何一种传统的优雅。

当牛结束这一故事时，宋很起劲，并且渴望马上见到珪贞。但是他们没有考虑长辈倪妈妈的因素。她以家族的高贵血统为荣，不会允许女儿打破自古以来的规矩，与一个未婚男子公开见面。如果宋想求婚，他应该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依靠媒人。

实际上，倪妈妈正在做对宋有益的事情。因为既然他不懂上海的讲话方式和礼貌方式，他无疑会比这个上海姑娘表现得还要糟得多，所以没有强迫他来求婚。正因为这样，牛毛遂自荐做媒人——这是一个在中国通常由干瘪老太婆担任的专职。他在两边来回跑，报告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宋被完全接受了，他和珪贞在一位监理公会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Clarence Reid）[1]的主持下结了婚。

最后，凑巧也单身的温秉忠与倪家剩下的一个妹妹结了婚。像牛一样，温是宋在波士顿遇到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们三人又像过去那样（聚在了一起），只是宋现在是连襟而不是一名圈外的茶丝店学徒。

那天，当伯克和宋结束他们的苏州会议时，已是深夜。伯克为他同学的婚姻而高兴，但是他们谈到的一件事使他不安。这就是宋披露的两派传教士在传教方针上的分裂。他立刻决定不让自己卷入任何这类冲突。他到中国来是为了传播救世福音，他希望看准了福音派或教育派再工作，但工作一定要做。争论一件事该如何做只会分散做这件事的精力。

苏州的年议会开了五天，最后一天公布了分派名单。宋被派回昆山，伯克则被派到上海地区的地方首府松江县去建立一个新的布道点。

休会时，伯奈尔[2]走向他旧时的学生，告诉他一个令人“欣慰”的

[1] 中文名李德。1879年来华传教，1896年转去朝鲜传教。
[2] 全名W. B. Bonnell，中文名冯昌黎。1884年来华传教，1895年返回美国。是步惠廉在梅肯读高中时的老师。

消息。前一年，一名长老会传教士在街上兜售宗教小册子时，人们向他扔掷石头，把他赶出了松江。几乎是同时，在那个城市，一群学生烧毁了天主教布道团的财产。

这些暴力事件并不限于1886年的松江。它们遍及全中国，以反对在美国发生的类似的某些不文明的反华暴力事件。天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尊重外国人。1887年，北京发布告示，号召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和睦相处”。美国教会赞赏中方的这种“自愿的”宗教宽容，但美国却依旧让它的中国居民面对暴徒的“仁慈”，依旧对羞辱中国的排华法案不置一辞。

6
过 境 昆 山[1]

……

当快轮停靠在昆山的茶馆码头时，天色已晚。伯克计划到宋处过夜。他已经给他的这位同学写过信，而后者正在茶馆等他。

“欢迎来昆山。”当这个高大的传教士登上码头时，他高兴地招呼道。人群开始拥到他们身边。昆山人和苏州人一样对外国人感觉好奇。

“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和一个小矮子。”一个看上去像乡巴佬一样的人大声庆祝道。

“比尔，你看到吗？”宋歪着嘴说。“外国人把我当中国人，而这儿你则看到一个中国人说我是外国人。”

两个朋友向15英里外的布道团教区牧师住处走去。那群人跟在后面。这天是年初四晚上，是持续一个月的庆典中的几个喧闹的高潮之一。当两人走在狭窄而弯曲的街道上时，到处都在放鞭炮，不断有铜锣声响起。

“并不是欢迎你，比尔。”宋揶揄道。“我很抱歉。这是为了迎接

[1] 这一章节的故事发生在1888年的春节以后，步惠廉从上海赴苏州的途中。

财神。”

如果这个年轻的传教士能透过已经拉上的木板，看到一家店的里面，他会看到一张铺了台布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它们都是生的，是为了纪念年初五的神而举行的盛宴用的。房间里面还会有财神本人，以三种形象被色彩鲜艳地画在长条纸上，注视着这些为纪念他而做的准备。一个不太幸运的观察者是饭桌上的一条活鲤鱼，被栓在绳子的一头，抽搐着。如果这条可怜的鲤鱼能够活到黎明，在被放生时活着游走，这家店的主人便会在这一年有好运。

在次日盛大的宴会上，这家店的伙计会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来年被继续雇佣。那些被邀请来赴宴的人是幸运者，而那些不被邀请的则明白他们被解雇了。这只是注重面子的中国人的另一个可爱的发明。

当到达住处时，宋停止了谈话。这是一个两层楼的瓦顶房子，挨靠在一排同一类型的房子中。夜晚，房屋沿街都已上了门板，他打开了其中一扇门。

“敬请光临寒舍。”他模仿东方式礼貌说。

经过一个小庭院，他们进了一间即是卧室又是会客室的房间。屋子的角落有一盏油灯，窗子上的裂缝用纸糊上了，以避免冷风吹进来。宋知道温暖的室内很舒适。他褪下外套，套上棉睡衣，并邀请伯克也脱去罩衫。

“我永远不会真正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穿着我所有的户外服装坐在冰冷的屋里。”他说。

不一会儿，年轻的妻子走了进来。她端着为这两个男人准备的两杯茶。当宋介绍她时，伯克有了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发现。她的稳固而完美的脚步，像任何一个美国妇女一样优美。他在中国所待的时间还不长，但即使这样，他也已经习惯于看见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挪着畸形的脚蹒跚地走进房间。他想起宋的关于倪家决定不再继续裹他们的第三个女儿的脚的故事。

三个人坐在屋里谈话。宋夫人用中国话讲，由查理翻译。她懂得一些英语，但不太敢开口讲（她终生都这样）。不过，查理的上海话越来越流利了，他翻译起来毫不费力。不知怎么，他们聊起了缠足

的话题。

“我想我妈妈是真正地比我爸爸更高兴不再缠我的脚，”这个年轻女子评论道。“她跟大家一样充分了解缠足的痛苦。你听说过她是如何用她缠着的小脚逃出太平军手心的吗？”

伯克没听过，宋便为他的妻子翻译。

当1850年太平军攻入时，宋夫人的妈妈还是一个小姑娘，住在徐家汇的徐家。她的父亲，谥号福运，是护卫徐家汇的清军统领。1853年，当叛军狂扫而入，攻陷上海时，这位父亲战死沙场，徐氏被迫举家逃命。

六英里之外就是公共租界，那是他们唯一的避难之地。他们没有运输工具，被迫徒步奔跑在沟渠和稻田间的狭窄小路上。对裹成小脚的宋的未来岳母和其他女人而言，这是一种折磨。徐姑娘一次又一次地感觉筋疲力尽，但想到身后成群的疯狂叛军，她不敢停下脚步。

在那次战斗中，令这个姑娘最揪心的事情是丢了家里的珠宝。她自己亲手把它们用布包起来，想带走的。但它们太沉了，她只好让它们被叛军抢走。从感情上说，这些珠宝是无价的。绝大多数取自一套礼服和头饰上，是明朝皇帝送给徐光启的那个以教名甘地大（Candida）而著名的女儿的。

宋继续更详细地介绍了甘地大。她是伟大的徐的寡居女儿，对基督教极度虔诚。她在全国建造了20个教堂和育婴堂，印刷了上百份宗教小册子和书籍。她把北京的盲眼说书人集拢起来，给他们灌输圣经知识。然后，他们分散开去，讲述刚学到的圣经，以代替他们以前的关于三国的剑与血的传说。皇帝对所有这些表示赞赏，授予她“贞女”称号，并送了那套礼服和头饰。

当宋结束这一故事时，她的妻子离开房间去准备晚饭。两个男人继续谈话。伯克认为宋虽然不曾求婚，但他是真正地爱他的妻子的。他还为她的血统而自豪。她的祖先在明代为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纯正的朝代，这一想法不断地激发起了他的爱国心。那时的宋也许已经考虑退出布道团，积极从事反对满族侵占者的革命活动；虽然这一想法是在他辞职的两年以前就有了。

“比尔，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真的从布道团脱身，我能够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在昆山的那天晚上，他就说了那句话。“你知道我在我所供职的布道团所施加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下的感受。”

宋总是那样坦白。他承认最主要的物质负担是他的薪水。他得到的是大约每月10美元的华人牧师的基础工资，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会再涨一点。然而宋认为他的位置相当于某些外籍传教士，给他的薪水带有不公平的歧视，他为此很不高兴。艾伦博士的预言应验了。

“但是请相信我，比尔，”宋迫切地要求道。“如果我确实离开了布道团，那决不意味我放弃了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折磨的基督传教。我将继续始终为这一使命而尽力。”

伯克相信他，尽管他希望查理不要离开布道团。他喜欢看见一个人坚持把一件事做到底，不管如何不平等。但他不想跟他的老朋友争论这件事。这也许是查理本人不得不作的决定。

21
义　和　拳

当伯克一家在1896年回到中国时[1]，中国的维新派正在对中日战争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并不仇恨日本人。更确切地说，这种感情是一种自我反省。败于自己所鄙视的“倭人”之手，这比之前所有的西方列强的痛击更能把中国从昏睡中震醒。“新学”的呼声更加高涨。外国教会学校不断涌现，留学潮也不断高涨——大多数学生去了日本！

在政治上，反对旧制度的激烈运动正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个是单纯对现存满族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另一个是推翻腐朽的王朝，建立由纯中国人统治的共和政府。同盟会是主要革命团体之一，由理想主义的广东人孙逸仙领导。孙因被悬赏捉拿而长期流亡海外，但他的秘密团体未受影响。它在上海尤为活跃，其成员之一不是别人而正是基

[1] 步惠廉曾于1895年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第一次回美国。

督教牧师查理·宋。

在伯克一家从美国回来的第二天，宋邀请他们去他家晚餐，他到码头迎接他们。他不再是昆山的那个收入微薄的监理公会传教士了。事实上，1890年辞职后，他就不再是传教士了。但他保留了他的传道执照，并继续活跃于基督教工作之中。他在主日学校[1]的一个班级里做老师，是组建中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跃分子。退出布道团后，他随即开办了他的主要企业，为他以前的雇主印刷中文圣经。他开办了一家小型的商业性印刷馆，并且很快赚到了钱，比他以前做传教士挣的要多。另外，他用他的印刷厂为同盟会印刷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传单和小册子。最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兴趣——面粉业。中国一个富裕的家族在上海造了一家面粉厂，他们正确地判断出宋在美国养就的率直性格会在现代商务中产生利润，于是挑选了他作经理，他一直担任此职直至去世。

宋在他的虹口新居款待他的大学朋友和妻子，那里离艾伦博士的“官邸”不远。可是当时他没有告诉伯克，他的家还是革命者的秘密聚会点之一。房子很大，这是正常的，因为宋家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当时有两个女孩蔼龄（Eling有时拼作Ailing）和庆龄（Chungling有时拼作Chingling）和一个男孩子文（Ts-vung）。在这个家庭的传教士朋友当中，这个儿子以他的洗礼名“保罗”（Paul）而著称。宋向伯克解释道他特别用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2]的名字给T.V.（当时而且以后，人们一直用子文的双音节中文名字的首字母叫他）命名，是希望儿子能继承他（宋）所放弃的事业。宋经常为退出布道团而表现出良心上的不安。

宋的宗教虔诚和他的革命救国愿望一样是毫无疑问的。他本不必如此执着于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因为他有一份稳定而宽裕的收入。宗教被积极地表现在这个家庭中，越来越虔诚的宋夫人支持她的丈夫，让全家遵循监理公会的方式生活。天天祷告，严格禁止打牌和

[1] 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称主日学，是教堂利用星期日正式礼拜前一个多小时，开设的一个宗教文化班。
[2] 即使徒保罗。

跳舞，而且星期天禁止任何娱乐。

……

伯克的另一位朋友也受到了这次反动恐怖[1]的影响。那就是查理·宋。他的革命活动以前就被人所知，但在提倡新学的时候，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2]。现在情况不同了。同盟会和同类组织隐藏得更深了。其中一些成员离开了中国。另一些人，包括宋在内，利用了投机的葡萄牙人提供的方便。只要一些“特殊服务费”，葡萄牙领事就能给任何一个人一张葡萄牙的护照。宋办了一些这类的文件，准备一旦被清政府逮捕，就宣称自己具有外交豁免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

22
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教士

1899年秋，正当义和拳蓬勃发展时，伯克被派往上海，在那一教区[3]担任主持工作的长牧[4]。这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他不愿离开松江。

他的新总部是慕尔纪念堂（Moore Memorial Church）[5]，位于汉口路和云南路口，一个街区以外的运河（即今天的虞洽卿路[6]，现在的教堂建在那里。）是跑马场[7]的分界线。牧师住宅在教堂旁边的云南路上。街角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是监理公会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一堵高墙立在学校后院和牧师住宅之间，但伯克家的男孩子学

[1] 指慈禧太后发动的镇压维新运动的戊戌政变。
[2] 指屠杀戊戌六君子。
[3] 教区（district）：年议会属下最大的行政机关，由年议会设立，由会督组织。其中包含几个牧区，由一位教区长负责督导。
[4] 长牧（Elder）：教会内教牧职分中第二个也是最高的职位。另一个职位是副牧（Deacon）。
[5] 慕尔纪念堂：监理公会教堂，建于1887年，由美国堪萨斯城慕尔兄弟捐款建造，位于上海汉口路、云南路口，1890年改称慕尔堂。1891年中西女塾就造在慕尔堂的左侧。后中西女塾搬迁，改名中西女中。1929年慕尔堂新堂在中西女塾旧址兴建，1931年落成，即今汉口路、西藏中路口的沐恩堂。
[6] 即今西藏中路。
[7] 在今西藏中路至黄陂北路之间，共计430亩地。

会了爬到家中后院的树上，去看中国女孩——在他们的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学校里的女孩之一是查理的长女宋蔼龄。

……

25
日 本 戏 剧

伯克和艾迪（Addie）[1]自从搬到上海来后，又增加了几个他们的小血脉。第四个儿子约翰在1902年2月出生。

那一年，这个高大的传教士看到了他的第一辆汽车（两辆1902年进口到上海的奥尔兹汽车中的一辆），它像受惊的野牛一样闪电般地穿过杭州路[2]。在义和拳之乱结束后，殖民地掀起了繁荣的波浪，有轨电车也随之出现。当地人认为无轨电车的电线里住着魔鬼，这想法一点儿也不坏。

那些日子里，伯克常常看见宋。这位牧师兼面粉厂主的家也扩大了。到1903年的时候有了5个孩子。第三个女孩美龄（Mayling有时拼作Meyling）和另一个儿子子良（约翰）是两个新增加的成员。庆龄已经继姐姐蔼龄之后到中西女塾读书去了。

宋热切地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像他一样去美国受教育。他经常同他的大学朋友谈论此事，他的朋友当然鼓励他，并答应在他最大的孩子蔼龄上大学的时候给予帮助。这一时候的到来比伯克预料的要早些。1903年5月，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伯克正坐在家中书房里，这时宋过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身材极矮小的中国人以他在美国养就的直率性格，直接切入主题：

“比尔，我想让蔼龄明年到美国去读大学。”

“但她只有13岁！”伯克反对道。

“我知道，”宋同意，“但她明年就14岁了，在美国再经过一年的家教或是专门学习，她就可以进入正规大学了。她的英语很流利，一直

[1] 全名Addie Gordon，步惠廉的妻子。
[2] 即今九江路。

在中西女塾接受良好训练。”

伯克点点头。蔼龄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良好训练，因为她一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她在5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学校读书了，年龄比其他新生还要小。而且14、15岁上大学也不算早。课程也不像今天这样高深。

“我猜想你是对的，查理，”他承认。“要么我替你写信给格里上校？你还记得我说起过他并建议你把蔼龄送到威斯里安去吗？”

“那正是我想要你去办的，比尔。我会为此而非常感激你的。”

杜邦·格里（DuPont Guerry）上校是伯克最亲密的朋友，他是梅肯威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的院长。和埃默里、圣三一和范德比尔特一样，威斯里安也是监理公会的，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经特许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查理一走，伯克就给格里写信介绍蔼龄。他概述了他与宋的长久交往，告知后者与布道团的早期关系并强调他的监理公会牧师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那年夏末，格里的答复来了。他非常热心于招收一个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这将是威斯里安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所学校里仅有的几名非白人学生是美国的印第安女孩，但格里确信一切都会顺利的。蔼龄可以生活在他本人的家里，直到她适应过寝室生活。根据他所了解的中西女塾的标准，她也许可以作为预备生马上入学。

伯克没有耽搁一点时间，立即把信给宋看。

“这让我太高兴了！”这个中国人大叫起来。随后，马上变得严肃起来，“现在，问题是如何把她安全地送到那里。我自己不能去，而我也不想让她一个人去。”

伯克用一只手掌抚摸着他蓄着胡须的下巴，犹豫着说：“这个，查理，我打算明年5月或6月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休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非常乐意带着蔼龄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直接到梅肯，并会一路照顾她。”

宋感激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伯克的休假实际上应该是在1903年，但因为这里的传教士不够，他被劝说延长一年。那年冬天，他但愿他没有答应过延期。艾迪倒在

了一种一直在中国流传的祸根上——伤寒。

她躺在家里好几个星期，几乎动弹不得。伯克停止了一切工作，呆在她身边，并请来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在他睡觉的时候接替他呆在她的床边。最后，在早春的时候，这个萎靡的、受发热折磨的病人能够坐起来了，以后又可以起床去乘坐一小会儿马车。医生认为到5月的时候，她可以经受得住回家的远洋之旅。三个星期的带着咸味的清新空气将有助于她增进健康。

在此期间，发生在1904年的两起事件使远东比平时更为动荡。第一起是日俄战争的爆发。2月8日夜，未经宣战，日本对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一次沉重的打击[1]。那天，傲慢的沙皇军舰正毫无防备地停泊在辽东半岛尖端的亚瑟港港口[2]，俄舰队司令斯特拉克（Starck）上将正在岸上为庆贺他妻子的生日而宴请他的军官们。当天晚上七点，俄鱼雷艇外出巡逻，所以当日本鱼雷艇在十一点从夜幕中轰鸣而出时，俄国人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船回来了。日本人得以在近距离连续发射鱼雷，击溃停泊的舰队。

高傲、强大的俄国人惊呆了。尽管圣彼得堡在对东京的最后通牒发出回复的过程中，尖叫着“背信弃义”、“海盗行为”、“不诚实”、“违反国际法”，但是只有法国人表示同情，并附和对日本人的指责。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乎是无动于衷。一位美国国际法专家艾莫斯·赫西（Amos Hershey）教授在他的《国际法和日俄战争的外交》一书中甚至指出“至少自十六世纪以来，各国的惯例明确地显示出，在战事爆发前宣战是相当罕见而且完全异常的。”

1904年，第二起打搅远东平静的事件是美国国会在4月通过的更为严厉的排华法案。对于期望把女儿送往美国的查理·宋而言，这比日俄战争要令人不安得多。

中国劳工自1882年以后被排斥出美国，因为美国某些部门怨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10年后，国会重新修订排外法案，又增加了规定，要求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不管何种职业都要登记。1894年，美国与中

[1] 指日本人对俄太平洋舰队分队发起的突然袭击。
[2] 即旅顺口。

国签订了体现这一新法案的十年条约。1904年4月27日，在中国拒绝续订这一侮辱性的条约后，国会千方百计地扩充和硬化法案。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关系因此而紧张。

移民限制一直针对劳工，并不禁止中国官吏、商人或学生进入，但即使是对待这些受到法律承认的阶层，美国似乎还是持敌视态度。至少在上海是这样，上海的报纸竞相报道进入美国港口的高等华人屈辱地被强迫监禁。

鉴于即将起程的蔼龄所要面临的所有这些情况，用上海人在黔驴技穷时是所说的话来讲，宋“发急”了，直到他想到了一张王牌。伯克竭力劝阻他，但查理一旦作了决定后就不肯改变。他去找葡萄牙人，向他们支付了特别服务费，为蔼龄搞了一张护照，像他以前用来使自己免遭屠杀的一样。宋争辩说，作为一个葡萄牙“公民”，蔼龄可以不受排华法案的影响，也不会冒被美国移民当局监禁的风险。

伯克决定乘坐高丽号太平洋邮轮，预定于5月28日离开上海。他和宋订购了船票，包了相邻的两个头等客舱（当时只有头等舱和统舱）。伯克和他的三个大儿子住一间，艾迪、最小的约翰和蔼龄住另一间。

5月上旬，宋氏一家人和伯克一家人全都十分兴奋和忙碌。两个家庭的传教士朋友们也来大力帮忙，他们替身体虚弱不能劳累的艾迪干了所有的打包活。在虹口宋家，邻居J·W·克莱因（J. W. Cline）[1]夫人监督了蔼龄所有外国式样的服装的缝制，她是监理公会的。在那之前，蔼龄只穿本国服装。

5月28日是一个明朗的春日。当高丽号的乘客准备登上维多利亚号勤务船时，亲朋好友们成群地聚集在外滩的公共码头上。巨大的远洋轮没有在黄浦江出现，而是停在长江上的吴淞口。

在等待上维多利亚号的一群人中有伯克、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宋和蔼龄。查理一直把他的女儿送到高丽号上。宋夫人和她家其他人没有到码头来。他们喜欢用感情不怎么外露的东方式风格，在这个

[1] 中文名葛赍恩。1897年来华，在苏州传教、办学，1911年任东吴大学第二任校长。1922年辞校长职，就上海监理公会司库。

女孩离家前，向她道别并祝福她。

苗条的蔼龄穿着一件新的西式服装平静地站着。像大多数14岁的中国女孩一样，她的外表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更为严肃。她的黑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辫子顶部和尾部系着黑色的蝴蝶结。她举止恬静、拘谨，丝毫没有泄露出她心中的兴奋和不安。甚至她那双明亮而智慧的眼睛也平静地凝视着前方。她身上有着一个中国名门世世代代精心教养所能教养出的所有镇静和自制。她的妈妈负责教养她。

在伯克的孩子中，只有最小的约翰接近蔼龄外表上的宁静。他神情麻木地站在妈妈的身边，拉着她的手。他的3个哥哥，穿着短裤套装、高统黑色长袜，带着黑帽子，在家人中穿进穿出喧闹游玩。12岁的威廉用做滑稽动作来带他们，尤其当兄弟四人中有谁表现出伤心的样子时。有一次，他在蔼龄身后奔跑，伸手猛拉了一下她的辫子。她烦躁地摇了摇头。但当戈登也想拉辫子时，撞上了他的父亲，后者命令立即停止“所有这种愚蠢举动”。

一个半小时以后到达了黄浦江口，高丽号停在那里，7 000吨的负荷使它吃水很深。船上的主要货物碰巧是538箱鸦片，对其所征收的关税可以为美国财政部增收25万美元。

因为船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开，宋得以和伯克一家和他的女儿一起上船，并逗留一会儿。行李很晚才装上船，体检也毫无希望地拖延着，因为乘客们不理医生的招呼，老是在检查时跑开。最后，在三点钟的时候——该船原定正午出发——一个船员带着一面中国锣出现在甲板上，敲锣要求所有送行人员重新登上勤务船。蔼龄和她的父亲在互相简单道别后分手了。

当小小的维多利亚号发动马达离开时，高丽号的乘客排列在上层甲板一侧的栏杆边。从两艘船上都冒出了叫喊声和舞动着的白色手绢。那一刻，这艘巨大的远洋轮响起了沉闷、震耳的汽笛声。一些乘客被吓了一跳，随即为自己刹那间的惊骇而大笑起来。对蔼龄而言，她对轮船汽笛声的突然震惊似乎更为强烈，搅乱了她训练有素的镇静。伯克低头看见她在轻声啜泣。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她流露出她的感情。

开船后，一顿迟来的午餐送上来了。后来，由于前几个小时的喧闹而略感烦躁的成年乘客，退回到了他们的客舱，或是在甲板上和娱乐室里懒散地闲荡。艾迪带着约翰回客舱休息，蔼龄和大男孩们则留在甲板上。

伯克在娱乐室里挑了一把软椅，打开他随身携带上船的一份《北华捷报》。这份周报上统统是日俄战争的新闻。日本人刚刚在佯攻亚瑟港时攻下了金州[1]，外国军事专家继续为这个小岛国的胜利而狼狈。一篇社论说，英国日报为日本的宣战而辩护，指出“日本未来生存的依靠的是阻止俄国侵占中国和朝鲜”。日本人也曾那样说过。

蔼龄是头等舱的唯一一名中国女孩，并因此而引人注目，所以马上就成了乘客和高级船员特别喜欢的人。不管她何时经过身边，他们都要跟她说话，她羞怯地以微笑回应，随后又恢复了她的镇静。

在海上的第三天晚上，也就是到达神户的前夜，乘客们在晚饭后聚集到甲板上跳舞。娱乐室的钢琴被搬出来放在上层甲板的角落，5名船上管弦乐队的乐手围坐在它旁边，演奏华尔兹舞曲。当伯克、蔼龄和大男孩们一起过来的时候，12对舞伴正在跳舞。这位高大的传教士移到旁观者的一边，想偷窥片刻“魔鬼的活动”。当他带着他的被托管人靠近时，船上的一名高级船员盯上了蔼龄。他以为对这个中国女孩来说他是不错的，于是走上前来邀请她跳舞。

“不，谢谢你，我不会。”蔼龄摇着头回答道。

“好啦，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来，我来教你。”这个高级船员坚持说。

“不，跳舞对我来说是不对的。”她坚定地回应。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徒，而基督教徒是不跳舞的。”

于是，这位年轻的高级船员连忙退下。

---

[1] 日军于5月5日至13日，在金州杏树屯以东两个海口猴儿石、小河口陆续登陆。为了打开通往旅顺的咽喉要地金州，日军首先破坏普兰店铁桥和沿途电话线，切断了旅顺和辽阳之间俄军的陆上通讯联系，又在金州南山展开争夺战。最后，日军攻下南山，打开了通往旅顺的道路，使旅顺要塞的俄军陷于孤立。

当高丽号开进神户港时，艾迪正在发低烧。她和她的丈夫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也许是出发时的过度劳累引起了伤寒的轻度复发，但是充足的海上空气和事先休息可以使她在到达美国之前再度康复。所以，当表示港口体格检查时间到了的中国铜锣声响起时，她来到了甲板上。日本人是这样一个多疑的民族，如果她待在她的铺位上，他们会认为她病得很严重并滞留整条船。神户的检疫官在这方面是出名的。

检查在头等舱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在下面的统舱，一名中国乘客在高丽号到达神户的前一天死了。那时，船上的内科医师诊断该病例是急性肺炎，但日本检疫官无视医生的意见，他嘘地倒吸一口气，坚称这一死亡病例“疑似瘟疫”。

还没有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当时令所有日本的卫生官员都恐惧得变态的淋巴腺鼠疫，但是对日本人来说这并不重要。这艘船和船上的每一个人在被允许去下一个停靠站——横滨港——之前都必须接受检疫。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检疫。所有的乘客将被带上岸，在检疫站浴室的消毒药水中浸泡，而高丽号也将被从头到尾地烟熏。这些仪式定于次日进行。

那天夜里在餐厅，西伯利（Seabury）船长试图劝说乘客们不要紧张。他指出日本人在运用他们新得到的西方知识时有时会做过头，但这件事，除了使人有些为难，他们的方法是无害的。他建议每一个人穿上旧衣服去浴室，因为衣服也许要经受相当彻底的脱菌处理。

早晨，乘客们听从建议，来到了充斥着强烈的樟脑丸味道的浴室。他们把自己的躯体深深地藏在破旧的衣服中。服从非日本的标准，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而衣服则被放在了一起。各个木桶盛满了冒着蒸汽的药水，乘客们被告知进去洗澡。然后，他们穿着发的棉质和服四散站着，直到漫长的衣服脱菌过程结束。这些衣服是不是挂在乘客客舱中的“脏”衣服，这对日本人来说没有明显的区别。

当“被弄干净”了的乘客们回来的时候，带着消毒喷雾器的日本人正把已消完毒的东西搬上船。天空把三个在甲板上的烟熏者衬得

特别醒目，他们就是在那里爬上通风管，向下喷洒每一个弯曲的暴露部分的。

如果艾迪的情况不是变得更糟的话，伯克也许会喜欢这种喜剧式的勤奋。经受了浴室的煎熬后，她发着高烧回来了，船上的医生命令她呆在自己的铺位上。同时，高丽号依然在检疫中。第四天，因为把艾迪滞留在这样一个炎热、肮脏的港口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伯克，气愤地去找呆在船上的检疫官。

“你们怎么在这件事上这么荒唐？”他发作道。“要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像这样滞留这条船！”

这个矮小的日本人鞠了一躬，紧咬牙关，从牙缝中发出一声客气的嘘声。“啊，十分抱歉。”他在吸了一口气之后，微笑着，心平气和地说道，“但是新规定禁止船在十天内通行。”

没什么好多说的。伯克怒气冲冲地走了。一直生活在随和的、通情达理的中国人当中的传教士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人毫无幽默感的规章手册式的逻辑。

当船在第十天被放行开往横滨时，艾迪已虚弱得不能起床了。伯克和医生到此时都真正地恐慌起来，决定送她下船去医院。

当高丽号一靠码头，一位乘客朋友立即去横滨总医院做准备。他带回了一辆马拉的救护车，伯克帮忙把妻子抬到车上的担架上。把她安全地送往医院后，他回来把孩子和行李带下船。

怎么安排蔼龄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宋托付他一路照料她，而他也不愿意让她在没有他照料的情况下继续旅程。另一方面，他不想耽搁她，而他又无法知道艾迪的病会迫使他在横滨呆多久。蔼龄本人非常愿意独自走。她是个有胆量的人。另外，高丽号上还有另一对监理公会传教士夫妇，他们是伯克的好朋友。于是这事就定了。他把蔼龄留给这对夫妇照料。

伯克和他的儿子们在医院里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一个传教士朋友从东京来把孩子接往他在那儿的家中。伯克留下来陪伴艾迪。她在绝望中挣扎了两个多星期后，死于6月30日，她39岁生日的一个月之后。她被葬在横滨。

26
欢迎来到美国

高丽号驶离横滨的那天下午，蔼龄离开她的寂寞的客舱，去拜访伯克托付照料她的那对传教士夫妇。他们不在，但是客舱的门敞开着，所以她坐着等他们。传教士夫妇不一会就下到走廊上来了。当他们走近时，那位妻子大声说：

“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一种解脱。我对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厌烦透了。但愿我今后再也不会看到他们了。”

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内心中的某些东西破灭了。当这对夫妇进来的时候，她站了起来并胡乱编了一个来访的理由。她原本想待在这聊天，但现在她希望返回自己的客舱。那个本不该由传教士的口中说出的倒霉的评价使蔼龄的心从此变得冷酷无情。

然而，第二天，一位另一种类型的传教士走进了这个中国女孩的生活。蔼龄至今只记得她是“蓝曼（Lanman）小姐”。当蓝曼小姐敲门并介绍她自己时，蔼龄正独自一人坐在客舱里。她是一位中年美国妇女。

“我来自朝鲜。我在横滨上了这条船。”她说。“我听说了在那位可怜的牧师妻子被带走的时候，你是如何被一个人留下来的。我想知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位陌生人的声音里的善意和真诚化解了瞬间的敌意，蔼龄完全被征服了，两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并且互相交谈。蓝曼小姐将要回家休假，她经常讲起她年迈的父亲，他病了，她急着想再见他一面。

在横滨搭乘高丽号的还有其他乘客和货物，其中有价值200万美元的日本黄金准备运去美国保管，还有杰克·伦敦（Jack London）[1]。两者都是日俄战争的积极提醒者。杰克·伦敦因被突然中止在朝鲜报道战争而回国。他在船上非常健谈，对日本人限制新闻自由愤恨地

[1] 美国著名作家。

抱怨不止，并预言俄国军队一定会胜利。

高丽号驶过金门大桥外浓雾弥漫的堤岸后，于6月30日早晨到达了旧金山。这一天是艾迪在横滨去世的日子，不过在日本是7月1日。移民局官员来到船上，锣声响起，通知大家在娱乐室检查护照。蔼龄自信地走向主检验官坐着的桌子。她递上她的葡萄牙护照。检验官绷起了脸。

“你想用这些东西过关吗？这种办法已经被很多其他中国人试过了，小姑娘。这不行。你就在这儿待着，直到我们准备好带你到拘留所去。”

蔼龄一下子完全失去了镇定。

“你们不能把我关到拘留所去，”她爆发了起来，扎着蝴蝶结的辫子劈啪作响。“我是头等舱的乘客，不是统舱的。”

那个吃惊的检验官正要说什么，这时蓝曼小姐停步在蔼龄身边。

“你们当然不可以把她关进拘留所。”她宣布，“我要跟她一起就待在这儿，看你们怎么样。”

两位女性所表现出来的气势显然使那个官员泄了气，因为蔼龄不去拘留所。但她也不能马上上岸。她一直待在高丽号上，直到船准备再次出航。随后她又被转到停在海港里的另一艘远洋轮上，然后是第三艘和第四艘。曾被伯克要求照看她的那个传教士家庭在高丽号一架好跳板后就离去了，他们仅仅令人讨厌地跟这个女孩讲了一声他们要走了。蓝曼小姐忠于诺言，独自留了下来，尽管她急于去见生病的父亲。

蔼龄的另一件幸事是克拉伦斯·里德在旧金山的出现，他是伯克在中国的第一位顶头上司，也是给她父亲证婚的传教士。他在任监理公会在太平洋东岸工作的主管人之前，驻加里福尼亚港。伯克曾经在横滨交给蔼龄一封给他的信，蓝曼小姐曾上岸送出这封信。里德得知老友女儿的处境后很苦恼，他给在纳什维尔的差会发了一份电报。差会接着上诉到华盛顿。最后，经过在旧金山海港内三个月的穿梭往来后，蔼龄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宋的女儿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那年夏天受到美国官员冷淡对待

的高贵华人——虽然因为她的葡萄牙护照，她有更多的理由被冷淡。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带领15名学生来美国读大学的华南两省教育监督陈靖陶（Chen Chin-taio）对记者说，他的这团人蒙受了“各种耻辱”，包括回答幼稚的算术问题（“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是多少？”）。如果不停止这种事情，陈威胁说，他将劝告他的总督将来把学生派往英国。

当然，当时要奉承天国人，在美华人的举动是不会被加以考虑的。当蔼龄在海港里漂浮不定的时候，旧金山的唐人街正在进行一场常年都有的帮会之争。四邑人[1]分崩离析，去追随中国教育会（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ociety）。事态的发展骇人听闻，其中之一是企图毒死四邑叛徒冯令（Fong Ling）。他的妻子阿嫂为他作了一碗放了砒霜的汤，但聪明的他没有去拿。几天后，另一个帮会合胜堂[2]加入了这场闹剧，七名合胜堂人因剪了一名萃胜堂[3]人的辫子而被捕。而且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实际上，这些参与帮会争斗的人并不一直代表中国人，但一般的美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同样，中国海岸的“美国姑娘”也不能让一般的中国人对美国妇女有大致的了解。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伯克带着他的四个没妈的孩子乘坐中国号轮船，正在来旧金山的路上。艾迪死后不久，中国号于7月初停靠在横滨。在上海乘坐中国号的J·W·克莱因[4]博士及其家人的出现，使伯克的不幸稍有减轻。克莱因是伯克的老朋友，又是传教士同事。克莱因夫人照料最小的约翰，她就是那个帮忙为蔼龄准备洋装的人。她自己的女儿玛丽的年龄和约翰差不多大，两人一起玩耍。

幸运的是，中国号的乘客在海上不看报纸，否则这次航行会是一场噩梦。当时的头条新闻正在叫嚣“美国船只任由俄国舰队摆布”。

---

[1] 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于1849年共同在旧金山成立四邑会馆，这一会馆是旧金山最早的华裔会馆。1854年，台山籍侨民（除余姓外）脱离四邑会馆，另成立宁阳会馆。1862年，台山的余姓、恩平的邓姓、胡姓等又脱离四邑会馆，成立合和会馆。新会与鹤山侨民维持原来的四邑会馆，易名为冈州会馆。

[2] 是美国华人社团北美洪门致公堂的12大堂之一。

[3] 是美国华人社团北美洪门致公堂的12大堂之一。

[4] 全名J. W. Cline，中文名葛赍恩。1897年来华，在苏州传教、办学，1911年任东吴大学第二任校长。1922年辞校长职，就上海监理会司库。

俄国奇袭者出现在日本东面的太平洋上。航运界很紧张，保险费率上升。危机随着英国二等爵士号轮船被俄国人击沉而出现。伦敦的《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称击沉轮船是“毫无理由的野蛮暴行”。

除了像杰克·伦敦那样的孤单的声音，全世界都在坚决反对“俄国大土匪”。甚至连《威斯里安基督教拥护者报》（Wesleyan Christian Advocate）也一反常态地暗示日本并不是俄国所形容的野蛮国家。这家监理公会的报纸说：

“俄国企图把目前的战争描绘为异教或东方异教徒与基督教之间的斗争；但这是一个日本是否和俄国一样不完全信仰基督的问题，如果不是根本就不信的话。”

“就是这样！”《拥护者报》的编辑可能会加一句。

当中国号于7月25日停靠旧金山时，前来迎接的蔼龄和里德站在码头上。她上岸已有三天了，但还没有动身去佐治亚州。里德给她看了告以伯克从横滨启程的电报，于是她决定等待。伯克夫人去世的消息令人伤心，因为，像蓝曼小姐一样，艾迪是那种让人们敬爱日增的传教士。然而，再次和伯克和这些男孩子们在一起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位牧师很高兴又有蔼龄同行，因为她知道如何比他更好地照料约翰。

在他们乘上火车横跨大陆时，伯克想把美国的风景指给这个中国女孩看。他也许会在她好奇和兴奋的反映中忘却些许悲伤。但他极端地失望了。他错误地以为蔼龄会像美国儿童那样“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小小的、严肃的东方人的女儿默默地看着所有他指给她看的东西。他还不如去招待一个石膏像模特，以唤回他所有被压抑的快乐。

在梅肯，当火车在8月2日夜晚抵达时，车站上有一大群表示同情的朋友在欢迎他们。对伯克而言，这次回家确实不是一件高兴的事。不仅因为他失去了艾迪，而且他的父亲也在他上次回家后去世了。

蔼龄自然成为梅肯人十分关注的对象。对一个中国女孩进入威斯里安读书，他们的意见有些分歧。第二天，《梅肯电讯报》（Macon Telegraph）非常详细地报道了她的到来：

今天凌晨零点三十分，中国女孩宋蔼龄小姐在W·B·伯克牧师的陪伴下，来到了梅肯。她在前往威斯里安学院的路上，在旧金山被扣留在船上。伯克牧师先生在从上海返回的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人们将铭记在心。这位中国女孩在旧金山受阻时，等候着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母亲的女儿，她在上海长大。她的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基督教的教育，以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作为一个孩子，她是我们自己的传教工作的产物。”威斯里安的院长格利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在今年夏季回来探亲时，高兴地带她一起来到美国。他当然为她首选了威斯里安学院，因为他的姐妹和侄女有很多人都毕业于此。”

伯克牧师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安排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此学习，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准备。

当伯克牧师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女孩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就不用单独一人横跨大陆来威斯里安了。据说这个女孩非常聪明。

“她当然不必强迫自己与别人交往，也不会被其他任何年轻女士强迫这样做。”格利院长进一步说。“她们将是自由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相处。我毫不担心她会受到人们和蔼而有礼貌的对待。”

就格利院长所知，即将成为该院学生的宋小姐是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但众所周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女孩来威斯里安读书。

正如上校答应过的那样，蔼龄在第一年与格利家生活在一起，这家人非常喜欢她。她也被威斯里安的学生热情地接受了。她根本不必“被其他任何年轻女士强迫”。其他的年轻女士反而强迫自己与她交往，并在一份学院的出版物上称她“很迷人”。到达一个月后，她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在星期天的早晨，她与其他年轻女士一起沿着长长的下坡道走到桑树街监理公会教堂（Mulberry Street Methodist Church）去，这个教堂是“佐治亚州监理公会母堂”。第二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她改变了发型，把辫子改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高卷发。

除了认真学习外，蔼龄还挤出时间去拜访华盛顿的外交界。她的姨父温秉忠于1906年1月随清帝国教育考察团[1]来到华府，从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一次，她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不忘提起她在移民官那里受到的待遇。罗斯福说他很抱歉。

蔼龄在威斯里安读了五年书后，于1909年毕业。那时，她的两个妹妹继她之后来到梅肯——庆龄开始了一年级的正式学习，而只有9岁的美龄则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直到1912年才进入威斯里安读书。次年，庆龄毕业以后，美龄去了麻萨诸塞州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在那里她可以与她在哈佛读书的哥哥子文离得近些。

有一则趣闻为宋氏姐妹在威斯里安的岁月增添了光彩。1909年5月15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院礼堂上演了两幕小歌剧《日本姑娘》。在菲奇（Fitch）小姐参加演出的声乐学生当中，有扮演日本皇帝的宋蔼龄和扮演皇帝侍从的小美龄。观众手中的绿色节目单背面，印着日本国歌：

愿我皇长治久安，
愿我皇千秋万代，
直至细石变成巨岩，
长出厚厚的青苔。

27
艾迪的闺中密友

蔼龄在桑树街主日学校的第一位教师是一位28岁的年轻女子，颇吸引人，头顶上的盘发是深红褐色。这个中国女孩得知她名叫莉拉·杰尔丁（Leila Gerdine）[2]，是已故伯克夫人的朋友。

[1] 即清宪政考察团。温秉忠作为端方的随从之一，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鸿慈、端方于1906年1月抵达美国，在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等考察后，于2月15日自纽约乘轮赴欧洲。

[2] 莉拉·杰尔丁与步惠廉于1905年10月26日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松江传教。

28
辫子飘舞

……

1912年5月，伯克又一个假期来临。他准备带莉拉、约翰和小卡罗琳（Caroline）去美国。当这家人在上海时，启航前一天，宋[1]和蔼龄来访。这是伯克自革命爆发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两人都已身处政治活动的旋涡之中。蔼龄——现在是一个22岁的年轻漂亮的小姐——是孙逸仙的秘书，她的父亲是这个广东偶像的主要心腹朋友之一。孙在上海的时候就把宋家（已从虹口搬往法租界）当作他自己的家。作为帮忙，伯克被要求带一些小礼物给在威斯里安的庆龄和美龄。他当然乐意效劳。

……

29
友人长逝

伯克于1913年返回中国前，威斯里安举行了毕业典礼。这位传教士参加了这些毕业典礼，以目睹他的老朋友的第二个女儿庆龄毕业。之后不久，他带着莉拉和约翰启程返回东方。

如果伯克在他返回之前认为中国人会推进他们新生的共和国顺利成长，他会失望的。那年7月，上海处于混乱之中。这个口岸城市是孙逸仙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总部。这座城市最为紧张忙碌的地方是位于九江路的一座建筑，孙的私人办公室就在那里。查理·宋在那里负责。伯克想顺道去拜访他，告诉他关于目睹他女儿毕业的事情。但是这位传教士的朋友克莱因[2]劝阻了他。宋在这些天里忙得不能见任何人。

“去年春天，在开仗很久以前，我到那里去设法让孙博士为学校演

[1] 即宋耀如。
[2] 即葛赉恩。

讲。”时任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校长的克莱因回忆道，“首先，我在大门口见到了宋的私人车夫。他在外面作警卫。如果他不认识我，我就没法进去。在他之后是另一个警卫，位置在楼梯口。在二楼，一个秘书在一间私人办公室外拦住了我，随后他进去把蔼龄带了出来。我只能见到蔼龄。宋和孙正在里面同党的领导人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过，蔼龄对我竭尽友善，知道我的来意后，她说她会安排的，后来她做到了。那个蔼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年轻小姐。她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

受克莱因的故事的影响，伯克没有设法去见宋，而是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给宋。之后，他就带着家人乘火车去了松江。

孙的二次革命是由于他和他的同盟会同事对袁世凯的野心和足智多谋估计不足而发生的。南京同盟会的人在1912年如此轻易地默许袁担任总统的一个理由是，他们相信在内阁和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可以控制这个北方军事家——就像其他民主国家那样。鉴于此，同盟会仿效美国模式，把自己从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一个政治党派。这个新党叫国民党，并逐渐在内阁和国会中获得绝大多数的席位。国民党还控制了许多省份，当地的革命英雄（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像钮将军[1]那样的老同盟会员）主持着由他们夺取的政权。

这时，袁世凯开始现出原形，最初十分谨慎。他先是撤除了这些省的一些革命英雄，换上他自己军队里的人。他采用了两个东方人喜欢用的手段——收买和暗杀。当1913年3月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在上海被枪杀时，这次暗杀或多或少地将他揭露出来。孙正要登上去北京的午夜火车，想去那就任总理并从野心勃勃的袁的手中夺取权力。[2]

紧接着可疑的暗杀事件，是袁在4月未经咨询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而同外国进行了一笔一亿美元贷款的谈判。[3]最后，在7月，袁世凯明目张胆地试图更换江西省当地的革命统治者李烈钧。李反对，

[1] 即钮永建。

[2] 误。孙中山当时在日本考察铁路，得知宋案后，从日本返回上海领导二次革命，并未去北京。

[3]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压服、消灭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特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获得2500万英镑的贷款。

其他三省的英雄担心如果李被撵走后他们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与李联合。孙逸仙因而宣布“必须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在长江下游流域爆发。

孙的麻烦是他对民心的估计不够现实。他期望他们起来为他的空想原则而战斗，就像他们在1911年所做的那样。他没有认识到人们在1911年的情绪是针对满族人的，而不是为了支持他的理想主义的共和政体计划。既然满族人走了，人们希望把和平与秩序建立起来。北京是那么遥远，他们并不关心到底由汉人的哪一方政治因素来统治。除了一些激进的学生和国民党员，没有人对1913年的再次反抗有什么热情。

松江的商会对打仗特别反感，因为松江可能是主战场之一。钮将军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大部队，显然意在等袁的北方军队过来后开战。商会决定影响这种战略，他们找寻必要的劝诱方式。最无争议的资源就是公办孤儿院，因此它帐上的2万美元转到了钮的帐上，这位将军体贴地带着他的士兵在20英里之外的龙华为孙的理想而作战。

就像其他“讨袁”军一样，钮被打败了，二次革命无力而终。南京是主要的受害者——就像它过去一样，将来还是会这样——梳辫子的野蛮人张勋（一只旧老虎，仍在感情上忠于被废黜的满人，拒绝剪辫子）为袁攻取了这座城市，并放任他的军队大肆奸淫掠杀。此后，为了全面报复在1911年打败他的革命党人，张重返北方，把袁的副官冯国璋[1]留在南京当江苏省省长。

同时，孙逸仙匆忙流亡日本。查理·宋和他的家人跟随着他。当宋家人隐姓埋名暂时在日本流亡时，蔼龄和孔祥熙结了婚，他毕业于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是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她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纽约，当时她是威斯里安的学生。孔家是山西一个经营钱庄的富裕家族，是孔夫子的嫡系子孙——祥熙本人是第75代孙。这次婚姻是这位年轻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以一种旧式的娃娃亲方式为他选择的）已经

[1] 冯当时统领禁卫军兼充总统府军事处处长。

去世了。

当宋和他的偶像孙于1915年返回上海时，庆龄已接替蔼龄的位置，担任这位革命家的秘书。作为监理公会教徒的宋家对此十分满意，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二女儿和孙出人意料地私奔到日本。[1]庆龄只有20岁，而这位广东人50岁。更糟糕的是，孙有一个和他同龄的妻子以及和她所生的三个孩子。确实，他在为革命闯荡世界的岁月里很少见到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与庆龄的婚姻成为一种完全合法的行为。庆龄可以被原谅。她年轻，虔诚地满怀政治理想。孙自然成了她的英雄。但是宋和他的夫人从未原谅这件事。[2]

此后有一天，宋童年时的恩人朱利安·S·卡尔将军来上海旅游，他们两人去松江和伯克一起共度了一天。这个矮小的中国人看上去病了。他正在遭受不久后夺取他性命的胃癌的折磨。只有一次他提到庆龄的事：

“比尔，我这一生中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伤害。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

查尔斯·琼斯·宋——偷渡者、传教士、面粉厂主，以及革命家——在追忆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于1918年5月3日去世，生前并未想到他的孩子和他们的配偶有一天会统治中国。

（译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1] 误。宋家人于1915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定居，但并不是和孙中山一起，孙在1916年才回国。1915年10月，宋庆龄在孙中山使者的陪伴下奔赴日本，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2] 孙中山是和原配夫人办妥离婚手续后才与宋庆龄结婚的，但是正如宋庆龄所言，他们的婚姻尤其不被传教士所接受。宋庆龄的父母虽然不同意女儿的婚事，但他们也没有“从未原谅这件事”。相反，他们后来给女儿补送了嫁妆，其中包括一套欧式藤木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和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1918年卡尔将军应宋耀如之邀来上海做客，宋耀如与孙中山一起招待了这位曾为资助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富商。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下）

任冉冉 编

总理灵榇奉移纪详

北平通信 总理灵榇于昨晨（二十六）子时由西山起程，至午后三时零五分上车，是日天气清和，□尘不起，万里澄清，颇呈一片和平气象。惟十二时余，灵至西长安街一带始起风，虽有尘土飞扬，亦不似当日飞沙闭目，故参加之民众，多至三十万人，成北平空前之盛举，总理在天之灵，当亦欢慰于中也。是日平中各商店住户均下半旗，晨六时余即满街飘扬，各机关之军警及办事人员，均臂缠黑纱志哀，兹分志各情形如次：

▲ 由碧云寺至西直门情形

▲ 家族祭奠　孙科及其夫人暨男女公子，及侄孙满，戴恩赛夫妇、陈铁珊夫妇、秘书梁寒操、陈君璞等，于前晚十时到碧云寺。孙等均着黑布马褂、黑色长衫，由迎榇专员郑洪年前导至灵堂左侧家属休息处休息。十时五十五分，孙夫人到寺，着黑布旗袍，由宋子安、宋子良伴侍，至休息处休息，并带来花圈一，至灵桌前，上款为“中山夫子大人灵座”，下款为“妻孙宋庆龄敬献”。宋子安、宋子良花圈各一，分置灵桌左右。于十二时十五分举行家奠，典礼员罗耀枢、祁云龙。祭奠礼节：① 孝子及家属肃立灵前；② 奏哀乐；③ 行三鞠躬礼；④ 献花；⑤ 奏哀乐；⑥ 礼毕。

▲ 专员致祭　家奠毕，迎榇专员致祭。何成濬于十二时到寺后，亦同与祭。林森、何成濬中立，吴铁城、郑洪年右立。致祭礼节：奏哀乐、行三鞠躬礼、何成濬献花、奏哀乐，礼毕。护灵处职员等于迎榇专员祭后，亦至灵前行礼。

▲ 奉移礼节　祭毕，即由林森出至前院，召集杠夫二十四人，至

灵堂内。护灵处主任马骧及护灵队卫士等，即率同杠夫，先将灵桌所供炉鼎陈列品移去，后将灵榇后遗容亭移出堂外，复将覆盖棺上国徽揭去，棺之四周所围粉红绫绸亦揭下，即换以薄棉蓝缎白里双肩棺套，棺套上面绣白日，四周亦各绣白日一，里层用带紧结于灵榇四周，外层亦用带扣结。时商震亦赶至，林森、郑洪年、何成濬及商等均亲在灵堂内指挥照料，孙科家族则均站立灵堂休息处门前。覆盖棺套后，同生照相馆至堂前用矿灯摄影，摄毕举行奉移礼节，时十二时五十分，于奉移礼节前鸣炮三响，为预备号。奉移礼节：先商震、何成濬、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五人在灵前肃立居中，一、奏哀乐；二、行三鞠躬礼；三、奏哀乐；四、谨敬奉移；五、奏哀乐；六、发引。于奉移礼后，鸣炮三响，为进行号。

▲ 发引情形　举行奉移礼后，商震等五人即入灵堂内，复将所覆国徽盖在灵榇上，杠夫旋将白漆木杠系蓝丝绳，于一时后，即擎杠架榇起行。杠长赵金受持香尺前导。榇之前后，各有杠夫二人，持手提玻璃马提灯随行。灵堂前军警一律举枪致敬。护灵处主任马骧及护灵处卫士八人，在灵左右行，郑洪年在灵前。灵后第一排为孙夫人，左右有宋子安、宋子良在旁扶持。第二排为孙科，左右为两公子，后为孙科夫人，孙小姐、孙满、戴恩赛夫妇、陈铁珊夫妇等次第行。来宾商震、何成濬、林森、吴铁城、熊希龄、黄祺翔、梁寒操等殿后。于一时三十五分，灵至大门前，将下石阶时，各报摄影记者竞相摄影，银光炫目，照耀如同白昼。灵下阶后，至山门前，即加棺罩，换用中杠举复起行，家属来宾等与行至碧云寺街东口中山纪念台时，即各乘汽车先回。孙夫人乘八六八号自由车，宋子安、宋子良同车行。

▲ 行列次序　一、东北边防军骑兵二十四名开道，阎连长率队在最先头，两旁杠夫二人随行。阎后骑兵两名，居左者左手执国旗，在右者右手执党旗，两人一排，背枪，枪口向下，马多棕色；二、河北剿匪司令部教导师军乐队三十名，四人一排，衣军装，由队长杨春发前领；三、第三十二师九四旅一八八团二营第五六七三连步兵，四人一排，背枪，枪口向下，由林营长乘马前领；四、香山慈幼院第四院学生十余人，荷大白素纱灯，灯一面为“恭迎国父灵榇”字样，一面为国党旗，二人一

排，着白布制服，嫩绿色裤，白操帽黑丝。后随第二院女生三十四人，四人一排，着制服，月白竹布旗袍，后为第二院男生六十七人，四人一排，一律着制服，男女生均执小纱灯，（样同大纱灯）及玻璃灯；五、遗容亭由杠夫二十人肩行，亭用旧白鹅绒缀成，亭中安总理遗像，高三尺，像前置孙夫人花圈一；六、香山慈幼院第三院女生百人，四人一排，一律着祠服，执小素纱灯及玻璃马提灯；七、提炉二十一人，二人一排，服色如杠夫，年均十六七岁左右，炉内燃檀香；八、慈幼院第四院学生三十人，着祠服，二人一排，荷素纱灯；九、灵榇；十、第三十八师二二七团一营七连，第三十二师九四旅一八八团二营八连，共步兵二连，四人一排，背枪，枪口向下；十一、第八师第十二旅骑兵连，二人一排，背枪，枪口向下。

▲ 沿途状况　昨晨一时起灵后，由碧云寺向城内进发。行列次序甚整齐，排比而行，长可四里，虽在夜间，而月色莹洁，道路可辨。卫生局派清洁队夫役十四名，持筐执帚，随开道骑兵后，沿途扫除。卫生局复有特别救护队医士两名，乘汽车殿后。自灵榇出碧云寺街，家族来宾均散归后，沿途由日升杠房经理孟传受等照料，沿途并有运输队六名、运输大车五辆、人力车两辆，以便搬运物件。杠夫由碧云寺至万寿山，中杠共分六班，每班三十二人，每班各执白布招一，上为“恭移灵榇第□班”等字样，每行五十步换肩一次；至万寿山换大杠后，共分三班，每班六十四人，各班各执蓝布招一，（同上）每行三十步换肩一次。道旁军警相间立，灵榇过时，举枪致敬。在距离骑兵前五十步，有保安马队十九人，二人并行，沿途巡查。各行列依次徐步缓行，途中寂无人声，颇为静肃。慈幼院第二三院男女学生，亦无倦容。三时余近玉泉山时，月已西偏，东方微露鱼肚白色，晨光熹微。过玉泉山后，略休息复前行。五时余至青龙桥，天已大明，各店户犹均双屏紧闭，而乡民伫立远望者已渐多。随监之第三十八师二二七团一营七连，即先归西苑。过青龙桥后，至颐和园北宫门首，有慈幼院四院男生五十人，三院男生二百五十六人，一律着制服，整队其候，即加入行列。三院学生二百五十人，在遗容亭前，四院学生五十人在亭后，原随行之三院男女生，则均回院。六时至颐和园前门牌楼，换棺罩，用大杠。棺罩系蓝

缎，四周各绣白日徽，棺罩四角云头，镀白银色，罩顶中央圆珠顶亦白银色，棺罩上层用白丝线作方形，并有白丝线下垂，棺罩左右，自两角两端，扣白绫下垂做弧形，并有白丝圈，每圈有白丝穗四，霍白相同，颜色鲜明，其形式与中罩同，换棺罩后，即前行。七时至海甸，各商店均下半旗，立巷口远观者颇多，而沿途□绝行人。开道□兵保安队十九人至海甸后即回，清洁队夫役十四名亦随同，但尚有清洁队夫役多人，沿途清扫，故自碧云寺一路行来，路殊平整，至九时至西直门。

▲ 警卫军警　碧云寺卫兵二连，碧云寺至玉泉山三连，海甸至西直门一营，另有公安局派警由玉泉山迤西山至碧云寺二百名，碧云寺内四十名，沿途保安马队三十名，并有侦探多名，沿途侦查。

▲ 由西直门至东车站情形

▲ 集合情形　七时以后，新街口即有民众聚集。延头西望，各军警分别设岗，参加送榇之军乐队及兵士，已先后至预定之行列内静候，各在道旁休息，架枪与前，且有数队即地做早操者。时观众尚少，各界仍得自由穿行，至八时余，则街中除少数洋车由西而来外，余均照相所用汽车来回飞驰。时由西街口至西直门一带住户门前，即三五成群停立，各团体参加代表亦先后集合于指定之行列内，时清道夫役结队荷带曳车由门外进城，行人交通几断。

▲ 家属马车　家属所乘马车均罩以黑纱，以绦铁纱为窗，内幕褐色，车右挥白旗，上书“家属马车”字样，共十七辆，于七时余结队出城。灵榇进城后，家属遂上马车，计第一号车为孙夫人及孙科之小姐，第二号原定孙科坐，嗣因孙欲步行，故二号车先为空车，至西单时孙始乘坐，三号为孙科夫人，四号为孙之两公子，五号为戴恩赛夫妇，六号为宋子良、宋子安兄弟，七号为陈秋先，八号为陈铁珊夫妇，九、十两号车空。

▲ 北关一瞥　灵榇至北关，已九时二十分，因未到预定进城时间，各家属均到休息室休息。前导之警察，即于环城车之栅门西，下马休息；次为军乐队。慈幼院送殡学生均着白布揭讳，成战队，列于北关南口以北；次提炉，炉均白铜制；次遗容亭，亭后仍为慈幼院学生，后即灵榇，杠夫虽称休息，而灵仍在肩，故较行动时尤觉费力，咸欲速行。

殿后之兵士，则均集于束墙下。休息二十分钟后，灵榇前进，前导亦上马待发。惟以未得命令，故灵至北关南口后稍息，杠夫因由十二时至此，均倦眼膝朦胧。时林森乘汽车由城内来，至铁路□门，即下车步行，至灵侧稍立即返。休息已十分钟，大队遂行，至十时十分进城，而林森则在城根汽车旁休息，帽执手中，灵进城后始随入城。

▲ 进城情形　灵进城后前导之警察及慈幼院学生即他去，迎榇专员办事处人员均在此静候，灵至城门内，即纷纷上前执绋，吴铁城为前导，孙科则立于执绋行列之中。时执绋者有郑洪年、张继及上海记者团等多人，日人菊良一法航空而尼亦在内。时照相者纷纷拍照，而观众则被军警驱于各胡同口内，距口一二丈，前有二名把守，故秩序颇整齐。

▲ 飞机翔舞　灵进城后，即有飞机三架，由西北飞至，在西草厂南口一带，环绕三周，复成二角而南去。及十时三十分，复有飞机二架，自南并列而北飞，继转西向，在新街口一带，亦飞绕三周，复南去。

▲ 新街口至西四　灵至新街口已十一时，恭送之人员各行列，均整队候于街心，各民众则立于马路旁两台墙上，各行列与灵前之军乐队，按时即奏哀乐前行，惟第七行列以下，则未及与后列相接即前进，故大队中断。时以烈日如蒸，街中泼水尽干，尘土复起，卫生局之泼水夫汽车即在中淅之处徐进，以水沥街压尘□。踱国寺口路西，有茶会摆桌献茶，备参加人之用，桌上佛龛供中山像，颇称异于一时。西四牌楼东西两街，均为观众所塞。复有茶会二，东西街道对列，警察应消防队二队，则于南牌楼全身制服，架水龙而立，以备临时之火警。时前队即停止进行，静待后队，两队遂结合为一，泼水汽车则由队西绕去，惟灵榇行缓，前队至此亦停进。参加之兵士均下枪，各指挥亦均下马休息，停二十余分始前进，灵过四牌楼已十二时半矣。

▲ 西四至西单　灵过四牌楼后，前导队步行较速，至十二时即全体过单牌楼而去，大队与灵复中断。西单为转长安街之路，由第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兵士环立南西两方，结队而立，照相汽车则停于前，警察在后。各铺户门南俱为观众所据，将一切陈列货物均遮蔽无遗，屋顶及电线杆上，均为参观群众，秩序颇难维持，人声亦极称惊，立于

烈日中，虽挥汗亦不稍减，东西街内，十余丈外，尚有观众登洋车上，或汽车上，延颈而亲。灵过西单时约十二时二十分左右，与前队相隔有二十分之久。

▲ 西长安街至前门　西长安街住户较少，故沿途观众，因此处为最少，惟市府前树荫中则聚集数十人，至府右街观众稍多，但均立于口内，因该处过于宽大，故亦未有拥挤状况，消防队亦于此时再见。双棚栅前，因观众过于拥挤，兵士与群众稍有冲突。南长街一带，短□之外，观众均由孔中内窥，故街旁无一观众。南长街口内，则均挤立桥头，中山公园门前，素日车马扰挤，此时则寂无一人，亦颇呈异。天安门前之观众均被驱逐至东三座门以外，前由警把守，不能进，十余丈外之树上，尚有人攀高以观，惟以人数过多，故不时前移，至灵至天安门时，前排渐入门内，排列于东墙之下。灵过天安门后，后面之民众即拥至，随之南行，至中华门前被阻，遂排立而观。中华门内，东西两路口戒备极严，群众为警士所阻，不得前进，前门内中华门外，两旁之群众，均被隔于一二两路电车轨道外。美国兵士亦立于兵营楼上窗内，向西瞭望。前门前戒备异常严重，军警密布，环南西两面，均为警察，而参加送殡之大队，凡无平津卫戍司令部所发给之月台证者，即由东面绕箭楼至天桥一带解散，以便秩序易于维持。凡持有月台证者，则均立于车站前门大街一带之群众，时而瞭望前门之灵榇，时而观街心之大队，一时有应接不暇之势，而前门东门洞所聚之民众，则直至东交民巷西口，尚甚拥挤。灵榇至前门，已三时三十分矣。

▲ 抵站与开车　灵榇于下午三时卅分抵东车站。总指挥商震及各指挥于抵车站口即离开大队，勒马指挥群众□□□□□之方法。其有月台证者，即在城门洞口集合，照预定秩序入站。灵榇入车站外灵棚后，各杠夫息肩于棚之中央，大杠离肩，并不落地，另有杠夫数十名，将棺罩揭去，由大杠上将灵榇移下，捧至特制之移灵安全车上。该车构造极精，左右箱板及上盖，均可卸下，俾灵榇移至后，再行扣合。车下有橡皮车轮四，灵榇装妥后，□由三迎榇专员及马湘、孙科等数人，恭自挽入车站，直入灵榇。当时群众甚拥挤，已挤入车站，致所订月台票办法，及站内秩序，均未能如法维持。灵榇登车后，即由车头拖

带至第二月台，与眷属坐车连接。

其衔接次序：第一辆为冷藏车；第二辆为行李车；第三辆为装有电机之发电车；第四辆为头等卧车；第五辆为大厨车；第六辆为杠夫坐车；第七辆为拱卫宪兵运车；第八辆为头等客属车；第九辆为灵榇车；第十辆泰山号包车（孙夫人及孙科夫妇姊妹均乘此车）；第十一辆为头等餐车；第十二辆为特等客属车（迎榇专员办公用）；十三、十四均为头等卧车，重要随员及日人梅屋等均乘此车。车辆接妥后，距开车时间尚早，孙夫人等及乘车人员，因忙迫将一日，纷纷向餐车索汽水及食物饮用。三十八师送榇部队一营，整队在站候送。车按原定钟点，于五时正开行。轮机甫动，军乐大作，送车群众，脱帽静立，呈肃穆悲凉之色，与此手造民国维一伟人之遗骸，作最后之诀别矣。

（《申报》1929年6月1日）

孙夫人今晚来沪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本定于二日上午九时出京来沪，已志前报，兹悉刻又改于今晚九时半乘专车来沪，约明晨四时可到。

（《申报》1929年6月1日）

迎榇日

国父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奉安首都八音密遏，四海震悼。二十八日上午为迎榇日，素车白马，云集江干。小子何幸，躬与大典。爰将江边目击情形，笔而出之。

▲ 江边　挹江门外越逸仙桥里许，即江边中山码头在焉，其地为灵榇升陆之处。迎榇专员于是晨八时即云集该处，奉安委员会特设招待处，款接来宾。里邻设第二救护队，担任工作者为卫生部及京卫生局职员。沿江一带，自微明起，即断绝交通。十时半狮子山鸣礼炮，知灵榇已安抵浦口矣。于是此间司仪诸员，即传命准备。少须，迎榇人员纷纷渡江而归，知灵榇行将过江矣。十二时礼炮隆隆，山岳震撼，军号声大作。遥见威胜舰，自江心徐驶近岸，既而下椗，更须臾，此世界伟人之铜棺，安然自舰中徐移登陆。随榇而行者，孙夫人暨家族亲故

迎榇专员在焉。

▲ 灵榇　灵榇置威胜舰碇尾，上盖蓬帐地铺毛毡，一尘不染，四周设藤椅十数，铜棺即安置其间。棺形甚小，上覆党、国旗，守灵者咸敬谨围立于傍。濒陆后，总干事孔祥熙，率榇夫三十二人登舰，用小杠将灵榇徐徐移登中山码头，而达江干。时江中中外各舰，均鸣礼炮，哀乐齐奏。孙夫人衣玄服、复玄纱，面呈哀容，随灵登陆，诸人亦络绎追随，庄严已极。宣赞员高呼行敬礼，参加人员咸脱帽肃立，军人则举手行敬礼。一时□审无谨，惟闻哀乐声自远而近。

▲ 灵辆　灵辆系纳雪牌轿式汽车改装，较长车为长，车尾二门可启闭，车中范铜作花形，覆以鲜蕊。司机者二人，衣蓝色制服，缘以白边，臂束臂徽。灵榇升轮时，中央委员及总理家族亲以手扶榇，□至护肃。是时各报记者环立摄影者，奚啻数十人，中以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臂缠红色标识，最为触目。

▲ 起灵　至一时许，灵榇已安置辆中，总干事孔祥熙乃往来指挥各中委及总理亲故执绋引导。绋以黑白二色布交互成长线，以国府副官四人执其一端。车行二绋间，执绋者均以一手扶之徐行。是日各中委一律蓝袍黑褂，白帽黑履黑袜。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蔡元培、于右任、戴季陶均与焉，惟国府主席蒋中正，独以白绸长衫异于众，且架深色目镜、蓄微髭，貌尤诚挚，居胡汉民氏前，步行烈日下，态度自若。车后为女宾车，孙夫人居第一乘，其介弟子安、子良与之同乘。第二乘系空车，第三乘为孙科夫人，其后则孙夫人之女弟宋美龄、蔼龄暨廖夫人何香凝均在。迫二时许，始告起灵，在哀乐不绝声中，灵车辗向中央党部而去。

▲ 护灵　中央为郑重将事起见，特派中央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参加护灵。由该校教育长张治中为指挥，灵辆两旁均由该校学生警卫，步伐整齐，军容严肃。未复殿以第六师之步兵马队，保护周密，行列迤逦，行一小时始尽，更途一小时，警卫始撤，交通尽复，威胜舰则仍泊中山码头焉。

（《申报》1929年6月1日）

总理灵榇到京一瞥

中山孙总理之灵榇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又十分安抵浦口，以十二时又五分抵下关，及安抵中央党部置于礼堂正位，而钟声通报三下。是日天气，不风不雨，不寒不热，中央财政委员张品三君，静江主席之犹子也，与愚同车前往下关，会口占此八字，可谓定评。在下关码头，与朱少屏君相遇，亦深以是日天与人助相庆幸也。

晨起七时，中央党部参加迎榇典礼之总指挥褚民谊先生亲以中央党部之汽车来迓，愚偕庞青城、叶惠增、张品三三君同往。车经迎榇大道，目击结队前往者，途为之襄。愚与庞君往东南饭店访许静仁先生，以不及待先行渡江，愚等乃雇一车，周行各处。码头上有极大之素彩牌坊一座，款题为南京特别市政府所献也。距牌坊数武，有席棚为休息处，坐愚次者为刘市长纪文，身衣军装。日人犬养毅、山田诸君，亦同在棚内。钟鸣十一下，礼炮之声隆隆然，飞机翱翔空际，时在码头鹄候者，不过百数十人。因参加之来宾，均不得立码头上，所守候者，除奉安委员会诸职员及中央党部之指挥人员及军警纠察队外，绝不许任何人逗留该处　盖均排队依序鹄立于迎榇大道矣。

灵辆既登码头，前导以六人成行之军乐队，均衣黄服，约四十余人。中央要人自蒋主席以次，均依次执绋，蒋独衣白袍黑褂，余均蓝袍黑褂，是有异于固定之服阙矣。又原定一律革履，惟吴稚晖氏黑袜布履，蔡孑民氏则白袜布履。灵榇之下，乘以双杠，由衣蓝衣白边之杠夫肩之而下。维时哀乐齐鸣，道旁鹄立者均脱帽行礼，敬仰之心不禁令人肃然而起。

张溥泉先生，不见将及一载，与愚等相遇，即握手为礼。愚询其夫人病状，张君言已霍然，并致谢意。愚因庞君不良于行，乃乘车先赴中央党部。自户外之甬道以达礼堂，长约半里，两旁均悬党旗无数。大门外之彩坊，宏伟异常。屋顶上之青天白日旗，临屋招展，似含有无限之哀思者。礼堂以内，覆以绿色崭新之地毯，花香扑鼻，令人心醉，上悬横额为“精神不死”四字，并置一木架，为安置灵榇之用，左右陈列奇花异卉无数，并有木架以盆花推成花山两座。愚等在楼上外宾候祭室少坐，及闻军乐之声，始由招待者引至门外恭迎，大门以外地上覆以

蓝布，杠夫鸣杠为号，由车肩下，以面外向，缓步退入。孔祥熙君衣白色学生装，黑皮裹腿，执旗指挥，在灵榇之前。及安置后，行礼献花圈毕，乃各退去。是日，赞礼者两次高呼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各部委员、各特任官、迎榇大员、总理亲故各就位肃立，每句长至二十余字，非声音宏大者，未易致也。礼毕，得造于右任先生，乃相约同乘。车偕庞、叶二君归寓，盖以钟鸣四下矣。此次典礼，极民国以来空前未有之盛，又奚止万人空巷已哉甚矣。总理遗教感人之深而且切也。

（《申报》1929年6月1日）

纪迎榇大典之一鳞半爪

空前绝后之迎榇盛典，经见各报矣。兹就琐屑、漏毫志之，以实本号。

▲ 二宋啜泣　依傍榇后之马车周围黑纱，有嘤嘤啜泣之声，隐的达于外，此即孙夫人宋庆龄也。乃妹美龄则与宋太夫人同亲一车，亦复珠泪盈盈，情殊悽切。

▲ 加长马褂　褚民谊氏之黑布马褂长几及膝，不亚时下盛行之旗袍，颇为别致。褚氏□往□来忙于指挥，小小之摄影机，为其唯一之爱物，不稍释手。是日收入镜头者，为数不鲜。

▲ 何来袈裟　耀眩人目之白色祠服□中，忽杂一披黄袈裟者徜徉于途。据闻系北来之喇嘛，说者谓总理遗教无远弗届矣。

▲ 肥人肥马　肥头异常之孔祥熙氏，当日乘肥马，手持总干事小旗，奔驰于各行列间，阳光剧烈，汗出如□。

▲ 谭、蔡同车　灵车左右有布索二端，执绋者挽之而行。谭延闿、蔡元培两氏则合绳。□良以体弱多病，不便长途徒步耳。或谓此小小之车辆中总揽全国行政监察之权也。

▲ 足履分阵　迎榇大道，而铺柏油。是日经剧烈阳光注射，类多溶化如胶漆。足重难据，鞋稍宽大，竟为之脱，即革履亦平添几分厚也。

（《申报》1929年6月1日）

迎榇道上

中山道既成之后即置以路灯，故道上照耀光明。入晚望之，连贯如悬珠。驾汽车疾驰而前，如置身银幕中矣。近总理奉安期内，高扎彩排以数十计，式样各个不同。电炬满缀，在亘长之道上，放射其闪闪之明光。大道全线以中山桥工程为最巨。前数日尚在加工建筑中，上面业已修竣，极稳固宽大。盖总理灵榇北来渡江登陆，以此为起点也。

此次参加奉安典礼者，军警政各界，故早已演习准备。而童子军于一星期前即尽警备之职。昨见中山路旁，已有露宿者。营幕上之红十字旗帜已在飘扬矣。闻上海党童子军，亦来京参加工作。

星期日之例假，各机关之职员皆以此为调剂精力之良机。此次总理奉安委员会函知各机关，在奉安期内，自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星期日暂不放假，以志哀敬云云。各机关职员闻之，无不愕然。盖此项纪念办法，实为向来所未闻，须知总理奉安，亦为空前绝后之大典也。

规定军人参加典礼时，须服草绿色军装，而平素军服多为灰色，于是均不得不重行新制。布业裁缝，遂大做其好买卖矣。各戏园游艺场，未免有向隅之憾。

（《申报》1929年6月1日）

奉安花絮

▲ 一宿十元　总理奉安大典国内外人士之前往参加执绋者，有如百川之注于海。致首都各旅馆莫不宣告客满，且临时增价，高至数倍。同事姚君拟往观光，曾于日前托京友代赁一旅馆，盖恐临时前往无由投宿也。乃一昨来书，谓中正街及下关等处之旅馆早有人满之患。各偏僻处之小旅馆，虽尚有余室，但每室一宵之餐至少须十金。姚君得信，几为之舌挢不下云。

▲ 钟山怪塔　首都自五月二十三大风后，遥见钟山上有物□然，俨似一塔。于是街谈巷议诧为奇事。有谓大风中由苏州吹来者，有谓自杭州吹来者。而每日登层楼层顶引颈遥望者，几无处无之。好事者咸思前往一观究竟。二十五日之晨赴总理陵墓之大道上，不期而往者

千余人，至则乃知系奉安委员会在钟山顶所建之纪念塔，工人正在工作，犹未竣事也。

（《申报》1929年6月1日）

孙总理灵榇奉安大典告成

孙总理奉安典礼，经长时期之筹备，于兹已告完成，关于是日奉安情形，爰为详志如次：

南京　一日上午二时起，全城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山路左右，民众参观，道途拥塞，极万人空巷之概。钟鸣四下，曙光初启，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迎榇专员、葬事委员举行移灵典礼。主祭胡汉民就位，与祭人员就位，肃立、奏哀乐、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读诔文、奏哀乐、行三鞠躬礼。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迎榇专员、葬事委员恭扶灵榇出祭堂，分左右肃立，恭候灵榇上灵车，奏哀乐，加入第七行列执绋。号兵发启行号，各行列依次前行，行列进行图如次：

出发状况

移灵典礼举行后，各参加专使外宾纷纷退出，至停放灵车右侧肃立。各中委、国委及家属，均在礼堂内，分左立，由总干事孔祥熙指挥杠夫，将灵榇奉移至灵车前，家属、中委等均后随至灵车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均在左侧肃立，蒋及宋美龄、蔼龄等均右立。灵榇上灵车时，蒋面露戚容，候灵车开行后，即随车出发。宋庆龄等家属，于出发前立于玄色功布内，然后上马车随行。灵车由中央党部出发将近五时，至九时抵陵墓。

送殡之行列

送殡行列原定八行列，临时又加两行列，共十行列。事先由奉安会布置组指定行列地点。是日上午三时起，令行列即集合于所指定地点，计第一行列在韩家巷；第二行列在焦状元巷；第三行列在同仁街；第四行列在鼓楼医院前；第五行列在鼓楼下；第六行列在新菜市；第七行列在中央党部马路牌楼前；第八行列在中央党部大门前；第九、第十行列在中央党部左侧马路。每一行列处，均有木牌及纸制高灯各一，

上书某某行列，以资识别。自第一列起，至第十列止，绵亘约五六里，为南京空前所未有。

行列之次序

第一行列：（一）骑兵官长一员，乘黑马执黑边白地之开道旗一面，上书“总理奉安开道”六字；（二）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三）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分执党国旗；（四）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五）军乐队；（六）骑兵一连，执长矛，矛上端均有党徽一，马头上亦均扎有黑色布球。

第二行列：（一）总指挥朱培德，乘马指挥，马前一兵执总指挥旗，骑兵三名随行，又号兵随兵四均步行；（二）军乐队，淞沪警备司令部；（三）步兵一团（枪口朝下）教导团；（四）中央党校全体；（五）农民代表；（六）工人代表。

第三行列：（一）海军军乐队，队前导以海军旗一面；（二）海军救护队；（三）海军陆战队（枪口朝下）；（四）海军官长士兵；（五）花圈队，全队共百二十余人，每人均持花圈。

第四行列：（一）警察乐队；（二）行列指挥姚琮；（三）警察官长士兵；（四）妇女团体代表，有京市妇协等；（五）全国铁路协会代表；（六）商民代表、回教代表；（七）学生团体代表，计有暨大学生军学校代表、学生团体代表、中央大学、市立私立各校代表、安徽一中、金大青年会中学、钟英中学、实验中学、文化大学、成美中学、光华附中、童子军、军警学校、晓庄学校、金陵女大、女子法政讲习所、钟南中学、东方公学、五卅公学、复旦学生军、两江女体党童子军、南京中学、南京女中等。

第五行列：（一）军乐队；（二）行列指挥谷正伦；（三）海外华侨代表；（四）蒙藏代表；（五）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代表，计为湖北各部队编遣区办事处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部、国军编遣会、中央第一编遣区、又经理分处、中央军校教职员、军政部、江宁要塞司令部、训练总监部、参谋本部；（六）各省市政府代表；（七）京内各机关职员，有交通部、邮政管理局、电政管理局、审计院、赈委会、中央研究院、农矿部、禁烟委员、赈务处、内政部、卫生部、工商部、建设委会、

江宁县政府、公安局、市政府、财政部、中央国术馆、外交部、蒙委会、教育行政院、教育部、司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法官惩戒委会、江宁地方法院、铁道部、财委会，监察院、考试院、立法院、行政院、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八）僚属团体；（九）各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代表，有军校特党部、各省市党部代表等；（十）京市及各级党部全体执监委；（十一）中央党部职员。

第六行列：（一）军乐队；（二）步兵一连（军官学校）（枪口朝下）；（三）遗像亭，及肃立敬礼旗两面。

第七行列：（一）各国专使；（二）军乐队；（三）手枪队；（四）国委及各特任官；（五）中执监委，前导中执会大旗；（六）总理亲故；（七）总理家属；（八）灵车；（九）家属马车。

第八行列：机关枪队。

第九行列：步兵一连（枪口朝下）。

第十行列：骑兵一队，殿后（执长矛）。

送殡之外宾

是日，参加送殡之各国专使，均着各本国礼服，有悬勋章者，有佩刀者。随员均衣白色制服，悬刀，左臂均缠黑纱一，极为整齐。各专使于灵车由中央出发时，即随行至十庙口，旋由外部招待，分乘直往陵墓，在专使招待处休息。随员则由中央直送之陵墓，沿途完全步行，日人方面如头山满、犬养毅等，亦均执绋。

灵车抵陵墓时情形

各行列按照指定地点肃立，执绋人员恭候灵榇，降车换杠。灵榇到祭室后，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迎榇专员、葬事委员、各国专使及全体参加人员，举行奉安典礼：就位、肃立、奏哀乐、哀词、行三鞠躬礼、献花圈、读诔文。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迎榇专员代表、葬事委员代表、专使领袖分列左右，恭移灵榇进墓门，奏哀乐哀词，全体默哀（正午十二时），敬谨奉安。

灵榇奉安后，恭移灵榇人员出墓门，各就原位肃立，祭堂内参加大典人员依次进墓门，绕场瞻仰，出就原位肃立，行三鞠躬礼，奏哀乐，

礼成，各依次退。

墓前之布置

出中山门达总理陵墓，沿途共有牌楼十四座，系贵州、绥远、陕西、四川、察哈尔等省政府，及卫生部、蒙藏代表团所敬献，上书“遐迩怀恩”、“浩气长存”等字样。沿途两旁电杆上，均有党、国旗两幅，花圈一枚。墓前石级下，陈列招待局及各分局所献之花圈，一高可丈余。石级两旁，有旗杆二，均下半旗，党旗居左，国旗居右，四周亦均悬党、国旗，及蓝红相间之纸灯。登石级不数□，左为第三、第五、第七行列进口处，右为第二、第四、第六进口处，两旁均陈设各机关所赠之花圈。石级右侧有芦棚四，系供休息之用，再次为专使外宾招待处，内部陈设甚佳。上石级最高处之两旁石栏内，亦均陈设花圈，布置极为井然。

陵墓概况

总理陵墓住于紫金山下之中茅山南陵，罔峦前列，嶂岭后峙，左邻孝卫，右昆灵谷，气象极为雄伟。自陵门至祭堂，凡三百三十九级。石级两旁有平坡，可容五千余人，最上三层石级，两旁均置石栏，最上部为大平台。中央建立祭堂，堂中均以大理石建成，平顶则以五彩马赛克，镶成青天白日徽，堂前廊庑，支以港石方柱四，堂前三个拱形之刻花港石，门檐上自东至西，刻有“民族”、“民生”、“民权”之阳篆。堂之四隅，均设小室，正面双箍间，嵌总理所书“天地正气”之直□。东西两壁分刻总理手书之建国大纲，左刻蒋、胡所书之总理校训，右刻谭所书之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墓门外框刻有“浩气长存”四字，墓门上刻“孙中山先生之墓”。墓之中央，设花纹大理石之场而护以同样之石围栏。场之中央直长约二公尺十三公分，深广各约一公尺六公分之墓穴，建筑极为精美。

飞机与礼炮

五时起航空署即派定飞机多架，在中央党部及中山大道一带天空巡视，并散发传单。至灵榇奉安后始停，灵榇由中央党部起灵一小时前，狮子山炮台即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至奉安陵寝时又鸣礼炮一百零一响，以示敬意。

中执委会通电

南京　中执委会二日通电云，本党总理孙先生灵榇业于十八年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之阳，大典告成，护电以闻。（二日专电）

各地举行奉安公祭

北平　今日未刻天安门遥祭总理，到五千余人，市指委商震主席并演说。同时河北省各界则在南海举行，由省指委梁子青主席，到三千人。（二日专电）

南昌　今午各界在体育场公祭总理如仪，到三万余人，主祭杨广笙，全市极其哀肃。（一日专电）

奉天　一日总理奉安，省政府举行公祭，全市停止娱乐，各报停刊，各机关学校放假。（二日专电）

青岛　今日公祭总理，午前英美德日各领事暨各外宾致祭，午后民众各团体暨个人致祭，全市休业。（二日专电）

徐州　东晨八时，各界在民众俱乐部举行奉安纪念公祭礼，到两万余人，十二时以电灯明炬为号，全部静默，停止工作三分钟志哀，是日全日休业。（一日专电）

济南　今早九点，各界在南圩门外公共体育场开总理奉安纪念大会，到三百余团体，八万余人，各领均到。（一日专电）

安庆　各党部团体机关学校，一日上午在省党部大礼堂逐次举行公祭。（一日专电）

苏州　各界一日在十九道门开总理安葬纪念大会，到万余人，刘和鼎主祭，全市商店休业。（一日专电）

清江浦　淮阴各界一日假淮中举行总理奉安公祭，午各商停市志哀，沿街由一师布局，断绝交通一小时许。（一日专电）

汉口　各界东晨七时在武昌首义公园汉口民众俱乐部公祭总理。武昌总祭台由中委何应钦主祭，汉分祭台由中委刘峙主祭，到各界民众共十万人。各国驻汉领事及侨民渡江致祭者百五十人，由交涉员李芳招待，正午各舰鸣礼炮百零一响。（一日专电）

汉口　各界纪念奉安会宣传队八组组长陈基鸿，演员徐峻祥、程

相达等，三十日在法界，阻止各剧团演剧，法捕房干涉，竟将徐程捕去，交署二十一已向法领严重交涉。（三十一日专电）

福州　党员及各机关长官各社团代表，午前九时在西公园公祭总理。（一日专电）

蚌埠　东日蚌埠各机关团体在铁路西会场举行奉安大会，主席耿廷桢，到会二万余人，会毕演新剧。（一日专电）

厦门　一日纪念奉安，厦□全休业停工，下半旗，各领外商外校，在港外轮均半旗。十时在党部开会，十一时二十分，“厦门”号飞机两翼引黑布绕空中。正午永续鸣炮二十一响，全市电灯明，静默三分，晚市内特戒严。（二日专电）

太原　一日早各界假中山公园举行奉安纪念，到万余人，苗培成主席，周飞等演奏。全市各军政机关商店学校工厂报馆等均悬半旗休假。（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3日）

王正廷招待外宾

蒋定今日宴犬养毅

南京　王正廷夫妇，二日上午在五洲公园，招待外宾，到各专使与参随人员，及唐绍仪、施肇基等百余人。王夫妇亲任招待，旋陪同游览湖景，并举行茶会，傍晚始尽欢而散。（二日专电）

南京　二日下午一时，刘纪文在市府欢宴参与奉安之十八国专使及罗马教皇之代表刚恒毅等五十余人，王正廷陪使席。刘纪文致欢迎词并奏中西音乐，三时半散席。各专联袂至五洲公园□□别墅，应王正廷夫妇之茶会。（二日专电）

南京　蒋定三日午宴犬养毅，表示欢迎，并邀戴传贤、王正廷等作陪。（二日专电）

南京　犬养毅、头山满预定五日离京，赴镇扬游览名胜，再转沪返国。（二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3日）

奉安日载兵汽车颠覆

南京　一日下午六时左右，有振裕汽车公司第四七八号汽车一辆，内载第六师士兵二十名，官长二名，由陵墓驰至电灯厂前面中山大道，因开行太快，以致翻倒，士兵官长均受伤，司机匠人受重伤，一说已被撞毙。该公司现因司机失踪，正在设法调查受伤士兵。当由卫生组救护队担架至帐篷内疗治，同时市政府卫生局，巡回救护汽车亦赶来疗治。（二日专电）

南京　奉安日振裕汽车压毙卫兵二人、乘车兵士三人。（二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3日）

前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

六月一日，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奉安之日，本埠各界，由市党部领导，在新普育堂举行公祭典礼。是日中外各机关，均停工一日，华洋各商店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均停止营业一天。全市民众，表现悲哀静肃状态，为前此所未有，兹将种种情形彙志如次：

市党部　前日为总理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市党部特召集全市同志及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代表，于上午九时，在新普育堂举行公祭典礼，到市执委施公猛、范争波、汤德民、吴伯匡、杨清源等，监委朱应鹏等，市政府秘书长黄伯樵、参事奚鸿钧等，及各部党部代表，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各男女学校代表共三千余人，各项情形，撰志如次：

▲ 公祭职员　主祭施公猛、范争波、汤德民、黄伯樵、奚定谟，襄祭何世桢、朱应鹏、陆风竹，司仪许也夫。

▲ 公祭秩序　① 全体肃立；② 奏哀乐；③ 唱党歌；④ 唱总理奉安哀词；⑤ 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⑥ 恭读总理遗嘱；⑦ 默念三分钟；⑧ 献花圈；⑨ 读祭文；⑩ 呼口号、奏哀乐，散会。

▲ 大会口号　① 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② 纪念总理革命的精神；③ 纪念总理伟大的事业；④ 安葬总理；要努力训政建设；⑤ 誓遵总理遗教；⑥ 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⑦ 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⑧

拥护中国国民党；⑨实现三民主义；⑩总理精神不死。

▲市执监委会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潘公展、吴开先、陈德征、钮长铸、范争波、黄行白、施公猛、汤德民、郑通伟，候补执行委员陶百川、后大椿、吴伯匡、杨清源，监察委员王延松、熊式辉、褚民谊、陈布雷、朱应鹏，候补监察委员许孝炎、陈君毅，率全市党员，谨致最隆重之革命敬礼，祭告于总理之灵：呜呼！民生久困，疆原耗领。哀我中华，时遭厄运。□维总理，攘臂而兴。为民留命，为天之极。蹈火赴汤，领导群伦。惟求解放，民族平等。清社既屋，民权是伸。于以建国，确立民生。乃有孽贼，操莽其心。挥戈再起，一扫妖氛。策进大同，主义三民。造党制说，诏示后人。举国景从，举世钦敬。如何不弗，巨星忽陨。呜呼！同声相哭，寰宇晦冥。幸有教诲，作民导引。威灵式凭，北伐功竟。政治统一，国基初定。敬遵遗志，奉安金陵。呜呼！赤□白祸，伏莽未清。谨掬血诚，昭告神灵。率我同志，谋天下平。青白践际，矢必完成。维我总理，来格来饮。尚飨。

海军司令部　高昌庙海军司令部及特别党部政治训练部，于总理奉安日上午十时，在司令部大草场，举行总理奉安公祭典礼。除司令部党部政训部三部全体人员外，尚有直属各小组全体党员，及驻沪各机关各舰艇党部代表、江南造船所党部全体执监委员等，约五百余人，由代理总司令陈季良主席，副官蔡道□司仪，秘书郑友益宣读祭文，行礼如仪，情形悲壮严肃，并摄影以为纪念云。

各机关　特派江苏交涉员徐谟，因本人赴京招待外宾，委派科长金献琛、朱鹤皋、秘书陈景虞、林新猛、副科长汪煜前往新普育堂参加公祭。会丈局局长宋子良，前因请假两星期赴北平迎榇，及参与奉安典礼，特委派翁长溥为代表，赴新普育堂参加公祭大典云。

邮政总局暨邮务管理局　六月一日总理奉安大典，交通部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暨上海邮务管理局各职员，八时半齐集四楼礼堂，共同致祭。林总办因赴首都参与奉安典礼，当推多福森会办主祭献花。管理局主祭献花者，推邮务长李齐。除总局祭文已见前日本报不录外，兹录管理局祭文如下：缅神州之板荡兮，天心有悔祸之萌。诞降国父

以救国民兮，提倡革命之先声。自粤东以发轫兮，翩下驾于东瀛。愤中法之役之丧失国权兮，结会党而罗志群英。嗟与中会之一蹶不振兮，渡大西洋而欧美是经。叹不渊之险遭兮，幸得康德黎之救星。历四十年如一兮，武汉起义，终摧残夫虏廷。幸共和之告成兮，复伤洪宪之□听。开非常国会于广州兮，巡征北地，惟国是之调停。胡遽山颓而木坏兮，罔弗怀遗嘱之丁宁。距精诚之永固兮，望阜钟而谨香□。沐遗泽之绵永兮，愿式妥夫神灵。尚飨。全体职员，均臂缠黑纱，默致哀怨，肃立无讳。人员中有英、法、丹、美、荷、俄、挪威、日本、西班牙诸国籍，无分中外，尽礼而退，亦可见总理精神感人至深矣。

两路党部暨工整会　两路党部路局暨工整会全体上海同人党员，前日偕俭德会举行总理奉安典礼纪念大会，到者近千人。会场布置，颇极庄严，中悬总理遗像，旁挂三机关恭挽一付："双手造共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名垂宇宙下为河□上为列星"。于十时正，摇铃开会，临时主席为王处吾（代表党部）、何礼文（代表路局）、彭学文（代表工整会），临时记录为胡琴轩、徐笃一，司仪王仁。会场秩序如次：① 全体肃立；② 奏哀乐；③ 向总理遗像灵位及党、国旗；行三鞠躬礼；④ 默哀三分钟；⑤ 读祭文；⑥ 献花圈；⑦ 主席致开会词（先后由彭何王三君致词，词长从略）；⑧ 演说。党部方面，一区党部代表朱铭新、一区二分部代表王仁；路局方面，总务处代表毛文□、人事课代表谈伯质。至十二时三十分散会，会场人数□多，而秩序井然。中间在十二时正依首都安葬时间复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以示尊敬。各代表演词，均能□于总理事业人格，作诚恳的誉扬，对于主义，有深切的认识，即对于纪念奉安真谛所在，咸能发挥尽致云。

各级党部　▲ 七区党部　前日上午九时在大礼堂举行江湾民众公祭典礼，堂内标语满目，哀联琳琅，布置整肃，备极庄严，公祭礼节，甚为隆重。参加团体有七区党部及各分部：复旦大学、暨校工会、劳动大学、暨校工会、三友实业社总厂、公安局、水工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江湾区市政委员会、江湾青年社、妇女协会、立达学院及江湾各小学。下午该区党部宣传部，复分队至各宣传处演讲，听众甚多，秩序井然，至七时许，始告完毕云。

▲ 八区党部　六月一日上午九时，召集吴淞区内各分部、各军政机关及各民众团体，在该部大礼堂，举行大规模之总理奉安公祭典礼。礼堂满挂各界所送之挽对花圈六十余件，布置庄严肃穆。到有各团体代表及民众三百余人，主席王祺，记录谢指刚，司仪吴人骐，及大会职员多人。公祭如仪，由主席献花，区党部及吴淞中学相□，致诔词。未由主席报告公祭总理应有之觉悟，继呼口号，摄影散会。

杨思区　杨思各团体于六月一日，假杨思小学校大操场，举行总理安葬纪念大会。先期由杨思小学校职员布置，会场中悬总理遗像，前供鲜花时果，两旁满悬各界挽联，颇为庄严肃静。上午九时半，举行公祭典礼，由五区二十三分部常务陈宝彝主席，顺序如下：一、鸣钟开会；二、唱党歌；三、主席就位；四、奏哀乐；五、向总理灵榇致敬礼；六、恭读总理遗嘱；七、静默三分钟；八、唱总理哀辞；九、献花；十、恭读祭文；十一、主席报告；十二、各界代表致纪念辞；十三、散会。是日到会各法团及本区民众约八百余人。

县属机关　上海县党部、县政府、及县属各局全体工作人员、及全体军警计五百余人，前日上午九时，齐集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公祭典礼，主祭钮长耀，与祭陆龙翔、宋昌、潘宝书、张启沃、李祖永，宣赞员吴景青、胡乃文纠仪员蔡炎，陈设员严明辽、余沅，秩序严。典礼秩序如下：① 就位；② 肃立；③ 奏哀乐；④ 行三鞠躬礼；⑤ 默哀三分钟；⑥ 献花（县党部朱志载、县政府陆龙翔、县教育局倪宗伊）；⑦ 读祭文（吴景青）；⑧ 奏哀乐；⑨ 三鞠躬；⑩ 向总理遗像瞻仰一分钟，礼成。祭文录下：维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六月一日，为吾党总理奉安之辰，上海县执监委员会暨全体党员及县属各行政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谨□馨香，昭告于总理之灵曰：呜呼！宏惟总理，先觉先知。创造民国，革命导师。三民主义，范古大献。五权宪法，匡济神州。推翻帝制，汉帜迎风。扶助弱小，天下为公。致力卅载，已濒已饥。一心一德，成败不疑。三年兢兢，统一告成。继承遗教，奋斗精神。首都磐固，庶政允臧。青天白日，黄胄重光。感召人类，尧舜禹汤。功列八表，史乘芬芳。紫金陵墓，□乎苍苍。龙盘虎踞，益愿雄芒。四方会葬，列强来盟。冠裳万国，大同之萌。遗容如生，瞻仰凄惶。精神不

死，历久而昌。□□哀思，山高水长。宏惟总理，万世无疆。尚飨。

商界　▲ 市商整会　祭文曰：维民国十有八年六月一日，总理遗榇，自北平碧云寺，奉安于新都紫金山陵墓。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追随各民众团体之后，参加公祭典礼，谨致辞，曰：呜呼！山颓木坏，国丧导师。为民尽瘁，万众含悲。煌煌遗训，昭若日星。后起努力，辛仆北廷。民物昭苏，刹极而复。八表同昏，至兹一豁。巍巍白下，吴越奥区。继承遗志，筑建新都。神灵如在，恍睹成功。紫金之麓，佳气葱茏。爰稽古昔，大起山陵。碧云移宅，神其式□。万人瞻礼，威仪肃穆。□山之碑，千秋户祝。尚飨。

▲ 商总联会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前日上午特召集各路分会全市代表，举行总理奉安祭礼，仪式如下：① 公推主席钱龙章，司仪郑葆元；② 全体就席肃立；③ 唱党歌（全体）；④ 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⑤ 主席恭读遗嘱（全体随声朗诵）；⑥ 默念三分钟；⑦ 哀读祭文（陶乐勤）；⑧ 主席报告总理历史情形毕；⑨ 王成栋、陶乐勤、张一□等相继演说（次从略）；⑩ 礼成。祭文附后。

维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六月一日，为我总理奉安之辰，上海各界商界总联合会领导全体会员，谨见香花清礼，虔诚致祭。曰：总理逝世，四载有余。总理精神，万世不灭。总理致力，国民革命。总理目的，自由平等。总理主义，厥名三民。总理宪法，独分五权。总理奉安，于北伐完成全体统一之日，可以含笑于天庭矣。溯总理生前，对我总会，抚掖倍至，期望靡切。视我总会，为唤起民众之具。视我总会，有革命运动之实。抚今追昔，声欸宛在。缅怀往事，能不依依。现在反动份子、封建势力、土劣贪污、帝国主义，犹为爝火，返照回光、穷义籍名、横行无忌。革命障碍，此起彼伏。流寇如毛，东奔西突。苛捐杂税，取消无从。集会结社，因失自由。此固人民之努力未逮，当亦为总理手定政纲时所不及料也。虽然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五权宪法已具雏形，军事已过，训政开始，假以岁月，三年有成，我总会会员，当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与反动份子、封建势力、土劣贪污、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以实现三民主义，而慰总理在天之灵。尚飨。

▲ 汉口路商联会　汉口路商界联合会，昨日举行奉安典礼大

会，到数十人。公推张秉鑫主席，记录毛尹白，开会秩序如下：① 向总理遗像暨党、国旗行三鞠躬礼；② 恭读总理遗嘱；③ 静默三分钟；④ 报告开会宗旨；⑤ 宣读祭文；⑥ 报告总理革命历史；⑦ 讨论事项。散会。

银钱两公会　本埠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为总理奉安大典，除公推代表晋京参与外，特于前日上午十一时，在香港路银行公会内，恭设灵几，举行公奠。到者如：（中央银行）顾贻谷、周德荪，（中国银行）员淞孙，（交通银行）李承翼、胡蒙嘉、唐寿民，（大陆银行）叶扶□，（兴业银行）徐新六，（中孚银行）孙景西，（浙江银行）俞春炎、陈慕陶，（上海银行）杨敦甫，（中华银行）姚德馨，（江苏银行）严锡繁，（中国实业银行）刘子诚，（新华银行）黄明道，（银行周报社）戴□庐，（福源庄）秦润卿，（顺康庄）李寿山，（宝丰庄）陈鹤年，（源升庄）赵玉如，（大德庄）浦实秋，（益大庄）冯斯发，（永余庄）何锦堂，（衡通庄）宋伯元，（元盛庄）胡炎生，（庆成庄）张似梅，严均安，（慎益庄）严洁身，（宝□庄）胡迟□，（安康庄）胡格生，（同泰庄，）陈尧根，（五丰庄）曹荫轩，（衡九庄）邱希尧，（鼎盛庄）赵五卿，（长盛庄）严德林，（春元庄）陈家泰、陆海藩、汪介眉、袁履敦、袁滋青、徐伯胸、冯月舫、张文锦等，都凡四十余人，咸臂缠黑纱，行礼如仪，极尽哀悼之致云。

工界　上海精业职工会，前日举行总理奉安大典礼，主祭翁瑞夫，司仪沈家滨，读祭文金楚相，献花吴泉。① 主祭与祭者就位；② 鸣炮；③ 肃立；④ 行最敬礼；⑤ 默哀三分钟；⑥ 献花；⑦ 读祭文；⑧ 行最敬礼；⑨ 主祭与祭者依次退；⑩ 摄影散会。

佛教团体　本市各寺庙及佛教团体，前日奉中国佛教会通告，召集全市僧众居士，齐集首刹留云寺，举行总理奉安祈祷大会。该寺先数日预为布置，门首高悬横额，大书“上海特别市佛教徒总理奉安祈祷大会”字样，全市满悬国旗灯彩，总理灵像设于该寺大礼堂内，香花围绕，倍形庄严。是日僧俗到者数百人，由德浩、王一亭主席。公祭后，举行祈祷。梵音唱和，极为肃敬，并有高开西藏僧众多人，参与典礼，颇极一时之盛。临时并有中国佛教会纪念总理奉安特刊，分送来宾，内容载有“佛学对于现代人类之贡献”及“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之关

系”等篇，甚为丰富云。

全市遏密八音　总理奉安日，华界遵令停止娱乐外，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各游艺娱乐跳舞场所之停止，先期由徐交涉员商请领袖总领事克宁汉，召集各国领事会商一致决议，令巡捕房通告界内各戏园游艺场等娱乐处所，停止一日，以表敬礼而志哀悼。闻是日租界内不特停止娱乐，及各洋行、各中外银行、西人商店亦均一律停止营业，俱见各国人士敬仰先总理之诚挚，为亘古以来所仅有之举云。

（《申报》1929年6月3日）

孙夫人昨晨抵沪

▲ 对时局无表示

▲ 将在上海小住

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于昨晨五时许抵沪，兹将抵沪详情列后：

▲ 欢迎人物　昨晨赴站欢迎者，有市党部代表汤德民、范争波、施公猛及六区代表，妇女团体代表亦有数起。宋宅方面，宋太夫人亦偕眷属来站亲迓其爱女。孙宅方面，孙科夫人及各报记者、铁道部某参事等数百人，各区党部及妇女团体，且多持旗帜，纷列站前，一时极为拥挤。

▲ 车站点缀　车站因总理奉安大典，本有灯彩及挂灯，至昨晨并添“欢迎宋庆龄先生回国”等标语，又上海特别市党部亦另制白布横幅大标语五六面分张车站四周。

▲ 车站戒备　昨晨除闸北驻军调有少数卫兵到站分立保护外，并由随车之徐源泉部之宪兵，于前晚即调来五十名，均持手提机关枪及盒子炮，于昨晨三时即来站等候，至宋之专车抵站时，即排列月台前，各将所携马刀擎出保护。

▲ 所乘车辆　孙夫人昨晨抵沪所乘专车，系铁道部孙科命路局专挂，为P.C.A.I.花车，花车前另挂二十八号卧车一列，花车后挂三等行李混合车一列，孙夫人独住花车内。

▲ 抵站时刻　专车于前晚十时十五分自南京下关开出，因恐抵站时欢迎之麻烦，故用专车，预计于昨晨四时许到沪，惟车至苏州时，已

昨晨三时许，因加煤至三时三刻始开出，直至昨晨五时四十分始到达北站。

▲ 同来人物　昨晨同孙夫人来沪者，有其弟宋子良、宋子安，及秘书刘某等三十人，均住二十八号卧车内，随员及随车保护宪兵十余名，则住三等车内，一行共五十余人云。

▲ 抵站情形　专车抵站后，欢迎者纷上花车诸谒，侍者忽出告，孙夫人尚未起身。宋庆龄女士自车后一门，偕其弟宋子安翩然下车，急步出月台而去。孙夫人衣玄色旗袍、玄色丝袜、玄色革履，手持玄色小皮夹一，神采奕奕，态度静肃，与民十一年随总理来沪时神彩极相仿佛。出站后乘孙科电命预备之一二零八号汽车赴莫利爱路孙宅，其弟宋子良亦同车前往，宋太夫人则与宋子安同乘车随行。

▲ 宋之谈话　本报记者昨晨在车站迎候，孙夫人下车后，记者即趋前叩以在沪将久住否、回国后有何感想及何时返京或出国。孙夫人仅答未定，即匆匆出站。至月台外，记者又叩如前，则由宋子安代答，谓现均未定，一切均不愿表示，上海或将小住。又铁道部某参事，随孙夫人出站，曾叩以将在上海久住否，孙夫人即答云NO.NO.盖不欲谈话也。上汽车后，各报记者又纷集车前有所问询，孙夫人仅谓“明日见”，车即开出。

（《申报》1929年6月3日）

奉安后中外时人行踪

▲ 财长宋子文、迎榇专员吴铁城、林森、郑洪年、监察院长蔡元培、候补监察委员褚民谊、驻意公使郭泰祺及杨杏佛等，于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后，均于前晚出京来沪，于昨晨七时抵埠。

▲ 铁道部长孙科于昨晚出京来沪，准今晨抵埠。

▲ 浙省府主席张静江，前日由杭晋京，参与总理奉安大典，兹悉已定于今晚出京，明晨抵沪。

▲ 晋京参加总理奉安之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头山满等，定今日由京赴镇参观，苏省府及各名胜当晚返京，定明日出京返沪。

▲ 沪交涉员徐谟，日前晋京参加孙总理奉安大典，兹悉业于

昨晨出京，即晚返沪。

（《申报》1929年6月3日）

总理奉安中之琐闻

▲ 吴稚晖焕然一新　吴先生素不修边幅，油渍衣袖，恒经月不换。此次因奉安委员会规定，国府中委人员须一体着蓝袍黑马褂，故是日吴先生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执绋灵车之前，位于胡汉民之后，虽汗盈面颊，而神态极为庄严。蒋主席则着白袍黑马褂，执绋灵车之后左方。蒋之后，为法人资道。

▲ 孔祥熙马上着急　午后二时许，第一列骑兵已行抵中央党部。遂依次分行鹄立与中山马路之两傍，恭候灵车先过。孔祥熙手执传达小黑旗，乘马前导，殆灵车已过三牌楼时，孔乘之马忽停不进，继而小遗。是时执绋前列已及马之后，孔急甚，猛鞭之，马始前进。

▲ 虞洽卿走投无路　是日各机关所派参加迎榇职员于上午六时即齐集下关。九时许，先由各队之队长依照行列守据指定之地点，以免临时紊乱。上海商会代表到时，各行列已整队肃立，虞洽卿率同人忽岔入外交部之行列，为执旗帜者排挤，虞不得入，又领率之他队，均被拒绝。又以虞未佩奉安典礼证章，故不识者以为彼系观众，咸目注之。虞往来匆匆，大有走投无路之叹。同事何志竞君笑曰：今日虞先生苦矣。

▲ 道旁拥挤之民众　九时左右，下关之中央党部已熙熙攘攘，人山人海。路旁住宅门首均已站满，而是日日光甚烈，一般时髦妇女多持伞遮蔽，红绿飘映于万头攒动之中。当第六行经过时，则由童子军以放音器呼民众脱帽肃立，致最敬礼。故灵车过时，登时壮观肃穆，静寂无声。（却酬）

（《申报》1929年6月3日）

奉安时节话苏州

本月二十六日，为先总理灵榇南运之第一日，国府规定，在奉安期间，举凡娱乐宴会等，一律停止七天，以重哀仪云。

▲ 火车站上哀仪重　苏州火车站因奉安典礼志哀，故在车站之旱桥上，扎有牌楼一座，中悬总理遗像。月台傍贴有各种关于奉安典礼之标语，车站出入口处，亦扎有牌楼，并缀以电灯。惟须俟奉安宣传列车到苏时，始放光明，旗杆上亦下半旗，以志哀思。

▲ 顽固乡民强演戏　苏乡黄石桥附近村民，原定于五月二十九三十两日搭楼演戏。当以总理奉安期间，一切娱乐均应停止。经往劝导后，村民方面以允停止演剧。讵定戏之排下，即发起人不听劝导。故昨日县公安局已派警察队下乡制止矣。

▲ 冷落了监生娘　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习俗相传，系监生娘娘之诞辰，一般游人咸往观热闹，其一举一动大半均属迷信。去岁汪吕兆璜任事后即革除陋习，并利用游人众多，特于是日开放全院，举行婴孩用品展览会，并于礼堂中举行娱乐会，以助余兴。本年，前院长虽已去职，但仍拟依照办理。惟以适逢奉安典礼，故此余兴未能表演。此监生娘娘一年一度之乐趣，乃顿感冷落矣。

（《申报》1929年6月3日）

蒋夫妇昨宴专使团

犬养头山定今晨出京

南京　蒋主席夫妇三日午假中央党部西餐室宴请和兰等十八专使，暨其参随员，教廷代表刚恒毅亦在被邀之列。陪席者有胡汉民、王正廷、蒋梦麟等，席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而散。（三日专电）

南京　犬养氏、头山氏因蒋主席之挽留，延期启程，并于七日赴蒋宅之宴会。犬养氏一行定四日午前七时启程赴镇江扬州，五日回沪。头山氏一行定四日午前九时启程回沪，六日偕犬养氏赴杭州，参列陈英士铜像除幕礼。头山氏一行定九日乘长崎丸由沪回国，犬养氏定八日乘大连丸由沪启程，偕芳泽公使赴北平。（三日东方社电）

南京　十八国专使欧登科等及教廷代表刚恒毅、外宾犬养毅、头山满等，均定四日离京赴沪，沪宁路已备专车。（三日专电）

南京　三日下午五时，励志社招待各国专使，外王亦到，该社总干事致欢迎词，并有国府军乐队奏乐、中央国术馆表演国术、顾宾连跳舞

等各种游戏，七时尽欢而散。（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4日）

各国专使相继出京

南京　法使三日乘兵舰赴沪，日使、捷克代表、波兰代表、土代办，三日晚车赴沪。葡萄牙代办、瑞典代办、巴西代办、挪威代办、比公使，四日早车赴沪。美使荷使、西班牙公使、丹麦公使、古巴公使、意大利公使、教廷代表，四日下午六时专车赴平。德、英两使尚留京，德使于本星期四返平，英使将赴汉口，日期未定。（四日专电）

南京　头山满四日晨快车赴沪，葡、比、挪、西四国专使特别快车往镇江，游览金焦，定夜车赴沪。蒋主席及戴季陶、刘纪文诸要人，均到站送行。（四日专电）

南京　各国专使四日晨，分谒蒋、谭、胡诸要人辞行。此次各专使由平来京参与奉安，所乘专车系由外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处长祁大鹏向张学良所借，计机车一辆，头二、三等并卧车、饭车共十八辆，俱系沪宁择最新、最□、最美者所购。张学良并派官长三员，警员十名，机匠九名，随车照料保护。各使到京后，专车停浦口站，刻各专使以奉安事毕，定四日下午五时，仍乘原车返平，外部派祁大鹏护送。（四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5日）

奉安会处务会议

南京　奉安委员会四日第二十六次处务会议，主席孔祥熙。决议：① 组织委员会，审查分配纪念章办法；② 决议总理故旧犬养、头山两氏浏览名胜所需旅费二千五百元，归预备费项下拨还；③ 决议照发追加杠夫费用共三千六百元；④ 决议本会限月终结束完竣，在结束期内仍为奉安会办公处名义；⑤ 决议由总干事商请主席委员，指定人员，组委员会处理各处赠赙物品。（四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5日）

总理奉安声中首都教育团体之表示

空前盛举之总理奉安，为千载一时之大典，举国各团体均有相当表示。首都全城教会同人，于奉安前一日下午四时，在鼓楼金陵大学，举行总理奉安纪念礼拜。余得躬逢其盛，摄述当时情形，以实本谈。

▲ 女乐员姗姗来迟　开会秩序第一节，为中华女中应喜吟女士所担任之奏哀乐，应女士到会较迟，以致李耀东主席报告秩序后，伫立台上立五六分钟之久，始见应女士姗姗而来。

▲ 张之江述总理之宗教生活　该会本请孔祥熙述总理革命史，因事不能到，由张之江代表。张备述总理为革命奔走，在伦敦蒙难时，竭忱祈祷，竟蒙上帝鉴纳，得免于难，其祈祷之力量，不在诸先知下云。

▲ 余日章述总理之私德　该会先期电请上海余日章君参加，余君竟按期而至。余略谓十余年前，总理在上海，《建国方略》之英文原稿正在起草。余常蒙见邀斟酌字句，总理对于出版新书，无不一一购置，且详加评注。最足使余仰佩者，即总理各人之私德，盖数于过从，未尝见总理有抽烟、打牌等嗜好云云。

▲ 全城女校乐歌选手之表现　秩序中特别诗歌一节，为全城教会女学校乐歌班选手所组合，仪容整齐，声调圆润，所歌“总理奉安”三节非常肃穆。闻编谱者为中华女中音乐教员某君，作歌者则为青年会教员朱锦江君云。

▲ 万目睽睽之女招待　是日到会者，约千余人，服装虽不一致，然全为黑白一类素色。讵有某女招待员，衣淡红色衣服，□□会场各所，会众多向之注视，大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概，而某女招待并不自觉云。

（《申报》1929年6月5日）

敬肃庄严记奉安

六月一日，总理奉安，中外硕彦，云集首都，参加盛典，敬肃庄严，前所未有。兹记琐闻一二，以供国人茶余酒后之谈助。

▲ 蒋宋二人鹤立鸡群　灵车左右，送殡人员为中央委员、特任官长、各国公使，咸率步行。其中年事最高者，为吴老稚晖，体格魁梧者，

有蒋介石、宋子文两同志，步履其间，大有鹤立鸡群之概。

▲ 三个团体服装特色　是日，海上上海团体代表，如巨贾阿德哥辈，蓝色长袍，黑纱马褂，类似委员官长。晓庄学校职员学生，蒲帽草鞋，绝肖农民。海上两江体专童车，黄冠白服，黑裙革履，结队成行，步伐整齐，巾帼英雄，令人钦佩。是三团体也，各具特色。余则文官白服，武官黄衣，殊属平常。

▲ 妇女代表叫苦连天　参加人员中之女同志，约兼百分之一二。彼辈平日兼以车辆代步，是日徒行十余里之遥，无不叫苦连天。□者谓，幸是日沿途无水可饮，否则排泄上岂不成为一大问题耶。

▲ 秽发污面参谒奉安　迎榇日因灵车南下，延误时刻，致及下午三时始奉移中央，参谒民众望眼欲穿，鹄立数小时之久，故是日多以清晨四时发引，恐难实行。及至哀乐盈耳，炮声隆隆，始起身前往，秽发污面，比比皆是。

（《申报》1929年6月5日）

公祭日

灵 前 一 瞥

予参与总理奉安大典曾将迎榇日江边一瞥，贡赞读者。日前复得忝列公祭，虽仅在灵前匆匆一瞥，而气象森严肃穆，永系我怀，何日忘之。爰再志所见，并摭拾所闻，绩成斯筹。

▲ 祭堂布置　总理灵榇，自江干移灵中央党部之次日开始公祭，分三日行之。祭堂左右辟二门：一为出口，一为入口。堂之上方缀“精神不死”四大字，中悬总理遗容，所摄系立象，神采奕奕，宛然如生。灵榇即置于堂之中央小平台上，台口为弧形，系特制以为安灵之用，四周绕以铜兰，上缀蓝色小电灯，光线四澈，做深沉之色。榇作古铜色，覆长玻璃一，俯瞻内部，织细毕露。榇之下端，有四铜环。榇前置灵几，供古鼎一，银瓶二，几前置花圈桌，其下为主祭者与祭者纠议员，均标以铜牌，祭时依次入席，可无凌乱。礼成后由主祭人率与祭者鱼贯登平台，缘铜兰徐行，瞻仰遗体而退。

▲ 瞻仰遗体　遗体陈铜棺中，总理瞑目仰卧，鬓发苍然，面目如

生，微形憔悴，肤现黝色，蓝袍黑褂白丝袜，登云头履。外传在平时御玄靴者，殆误也。手御白手套，交叉至胸前，状如安眠。遗体四周，椁以蓝白缎衾，瞻仰之余，令人肃然起敬，油然兴国家多艰之感。

▲ 公祭盛况　自二十九日起至三十一日，排日赴祭者，跻跻跄跄，争先恐后。第一日为京内各机关，第二日为民众团体代表，第三日为各国专使及总理亲故。三日中以民众团体参加人数为最众，盖一经奉安，总理遗容即永无再亲世人之日。千载一时之机会，俦肯交臂失之，是以凡未得与祭者，咸与向隅之憾。黠者则勾心斗角，各出奇智，以图混入其间，一快先睹，卒以门卫森严，被阻者日有所闻。公祭礼节与祭团体，必推一人为主祭者献花，惟海外华侨代表公祭时，不分轩轾，一律由朱培德等代表献花，蒙藏代表则各推一人为主祭人，同时而祭焉。

▲ 祭者哀音　与祭诸人，自中央委员以下，感于总理之伟大人格，奋斗精神，于瞻仰之时，莫不面现戚容。宋老夫人悼婿情深，亦老泪频挥。张静江以病足，二人扶之伛偻而上，瞻仰遗容时，泪如雨下。廖夫人何香凝亦痛哭甚哀。某中委以总理生前趋重平民化，对于公祭一节，力主公开若干时间，俾民众得人人瞻仰。闻中央已允纳此意，据在奉移陵寝后定期实行，以慰众望。诚然，则总理精神，将益见烂漫于宇宙间矣。

（《申报》1929年6月7日）

奉安日

陵 墓 一 瞥

予前记迎椁公祭二日情形，刊诸本报。六月一日为奉安之期，总理灵椁，自中央党部奉移至紫金山陵寝，昧爽起灵，到达陵墓时，为上午十时。奉安毕，适交正午，沿中山路观光者奚啻十余万人，仪节之隆重，参加之热烈，洵开国以来空前未有之盛典，乌可以不乱纪。

▲ 陵墓情形　参加行列，自中央党部迤逦而西，长约五六里。奉安委员会因徇各界之请，对于参加代表限制稍宽，沿途警卫，亦不如迎椁日之森严。参观者以中山路两傍行人道为界线，行列过处，民众咸

脱帽肃立致敬灵，及执绋情形，一如迎榇日。男宾中则加入各国专使及日人头山满、犬养毅等，中委中于右任氏病足未与，蔡元培、谭延闿二人亦因采薪之忧，中途改乘马车，余自国府主席以下，均步行至陵墓。当启灵时，晨曦未上，凉风袭人，微有寒意，过大行宫时，骄阳窥人，渐觉蒸热，至中山门则炎帝施威，各中委均挥汗不止，迨抵陵墓时，莫不人手一扇，且挥且行。张静江氏自别径先到，张氏素有□□，每出必挟一健仆以偕，司携扶之役，是日由二仆扶登预备肩舆，先趋祭堂。谭延闿、蔡元培二氏，旋乘车至，亦登舆诣祭堂，恭候灵榇。时陵墓前万头攒动，延头跷足而待者，达五十万人。予直趋陵墓最高处俯瞰中山大道，如游龙天骄，忽隐忽现，行列蜿蜒，蠕动如蚁阵。陵墓四周，遍悬党国旗，缤纷招展，颇为壮丽。须臾遗像亭至，置于空场上。逾时军乐前导，执绋者夹持灵辆徐徐而至，于是哀乐叠奏，灵辆遂止。

▲ 奉安情形　自平台至祭堂，凡石级三百余，颇不易登，殊与□年移灵碧云寺同一困难。故是日即仿照前法，将灵榇移入灵椁。椁系特制，为亭子形，上绣青白党徽，四角垂长穗。灵榇上杠后，以榇夫一百零八名舁之，拾级而行，复以青绳徐行至级巅，止于祭堂前之平台上。执绋者扶绋侍灵而行，国府乐府衣蓝制服，奏乐前导。孙哲生、戴恩赛玄服冠执绋在前引导，蒋主席、各中委、总理亲故、各国专使依次随行于后，孙夫人等居孝帏中行灵榇前，帏亦玄色与俗异。绋外两傍为参加致祭人员，亦遵石级而登。抵平台后，即特灵椁移去，家属等扶榇进祭堂，仍以击梆为号，亦步亦趋，悠悠入祭堂。堂内设增音机，备报告时传声之用。当灵榇移入时，梆声清脆，声闻于外，旋闻唱秩序声、赞礼声、读□文声、奏哀乐声，虽警卫森严，未能深入其境者，亦可知奉安时之情形也。

▲ 墓圹情形　自祭门至墓圹须经二门，外为堂门，即民生、民族、民权三门，是日均悬蓝色彩球。祭堂以极厚之毡铺置地上，履之毫无声音。中为墓门，中铸“浩气长存”四字，悬党国旗，左右陈列花圈无数，均各专使所献。门内即墓圹，作圆穹形，以白石为之，敷深黄色，中有方穴，深可丈许，即灵圹也。圹穴巅围以栏干，依栏观穴中情形，清晰异常，灵榇即奉安于此焉。灵榇移入时，系用绳索缓缓垂下，正向

后即宣告安葬完毕，由家属将墓门严闭而退，大典乃告完成。

▲ 墓外情形　当总理灵榇移升石级时，各报记者及摄影者均□集石级上，采集材料。警卫组纠察初以摄影者妨碍秩序，驱之至石级傍禁其摄影，而各新闻记者亦同被摈绝，拦之立阶旁。致祭代表中除各专使各团体代表外，有东方弱小民族代表印人韩人亦参与其列。某日妇首披黑纱，一衣华服之日本少女侍行，不知是否宫崎夫人与白浪滔天女士也。西妇参加亦有十余人，面现哀容，缓步于后，总理感人之深，虽异族亦同此哀悼焉。

（《申报》1929年6月8日）

记大阪之总理奉安遥拜仪式

秦立凡自日寄

六月一日，为我先总理奉安之期，留日大阪中华人士，有遥拜式之举行。是日也，天气阴森，似亦为我先总理示哀者。遥拜式场，设大阪西区本田川口町之中华总商会。川口町为我华人士侨居最多之地，多菜馆、旅社、俱乐部、商肆，俱为华人所经营，故日人有“支那街”之称。中华总商会所为红砖建造三层大洋楼，尚属堂皇富丽，沿街铁门上，饰“奉安”二大字，党国二旗，矗立两旁，旗杆顶之大金球，蒙以黑布，屋顶国旗半下，所以示哀也。拾级而登，入一穿堂，右为签名处及祭文预呈处，左为手荷物寄存所，其余如来宾休息所、团体招待所等，均应有尽有。壁上满悬挽联，不可尽忆，夹道架上，花环并列。祭堂在二楼大礼堂，正中悬总理遗像遗嘱，除普通之挽联鲜花及电饰而外，白色之蜡炬高烧，木雕方形之香炉甚多，香气氤氲，殆循日风乎。遗像两旁，则为中国国民党及中华北帮同人之挽联，中国国民党大阪直属党部全体党员之联云：“遗未尽功业付诸同志；存千秋主义一贯精神”，中华北帮同人之联云：“昔日革命家，今称模范人，总理之德，惧使家齐人治；左顾紫金山，右盼扬江水，先生之风，同此山高水长”。中华总商会主席王岐山氏之联云：“伟绩者环球，典型具在，尤勉同胞须努力；雄才迈今古，大功既定，从容命驾竟归真”。其余日人方面之敬礼，有大阪府知事力石雄一氏及市长关一氏之纪念树各一

对。树为常绿之杉类，高触室顶，植于方形青竹片组成之大盆中，甚为别致。其余如朝日新闻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本棉业同盟会、中日亲和会。

（《申报》1929年6月8日）

奉安大典中之琐闻续志

总理奉安大典中，珍闻甚多，连日本报已有刊载，兹再就国人所见者，摄拾数事如下：

▲ 参加者之辛苦　移灵时间，本规定一日上午六时，由中央党部至陵墓。路有十五六里之远，且礼节隆重，灵车行动又极迟缓，恐正午十二时不能准时奉安，乃于二十九日由中央决议，改于上午四时移灵，凡各参加奉安人员均须于三时前齐集中央党部，恭候移灵。因此凡参加人员均修夜未能就寝，且须步行近十五六里而至陵墓，又无时间进餐，盖以炎日逼人，飞虫满途，而饥肠辘辘，果腹无从，莫不辛苦备尝云。

▲ 倒车之惨剧　奉安典礼之庄严隆重，空前绝后，故是日中山路两旁之参观民众，人山人海，拥挤异常，尤以逸仙桥东之明古宫空地及黄埔路一带为指定之民众参观区域，故该处之人较他处尤多。不料在灵车经过之后，有摄裕公司长途大汽车一辆，由中山路转□至黄埔路，在此十字路口，人又众多，司机少一不慎，车轮陷入路旁水沟，汽车翻倒，立于路旁之民众，不及走避致被车压伤者，有十数人之多，头破血流，惨不忍观。当场毙命者，有武装同志及党童军各一人。

▲ 茶监之投机　灵车于九时一刻即到达陵墓前，各机关参加人员，于到陵墓后，即纷纷离开行列，向各处觅茶水及食物。有少数机关固早已准备茶水及干点分发于本机关职员，惟人数既多，难于偏及，饥渴之下，有皇皇然四顾者。投机之满洞春菜馆，备有蛋糕及杏仁酥等在场零售，不数分涤出售一空，其余在中山陵园旁之汽水小贩，亦莫不利市三倍云。

▲ 银幕之珍影　灵车到达陵墓时，各记者及影片公司，均竞争摄影。有某影片公司特请吴稚晖先生在灵车旁暂停片刻，以备摄取活动

影片，素不喜拍照之吴先生，亦将一露真面目于银幕上矣。

▲ 蓝伞之注目　总理家属及亲故各女士，于移灵出中央党部时，即用黑色幕布，四周遮围而行。及至鼓楼左右，始换乘马车十余辆，车节亦均用黑纱□围。到陵墓各人下车后，时正炎日当空，乃用蓝色小洋伞两顶，架于黑围布之上以遮日光，使一般摄影记者，均无法摄取参加奉安之总理家属情形，因莫不注视此蓝色小伞，极为懊丧。

▲ 时间之经济　参加奉安之外宾以日本人为多，如头山满、犬养毅、床次等七十余人，于三十一日夜十二时由沪专车抵京，下车时由招待组派员到站迎迓，直至中央党部参观移灵后，即随同行列执绋，并由励志社干事张冠春君雇汽车十数辆妥为招待，于奉安礼毕之后，即乘车赴社午餐。识者莫不赞许日人之精于时间支配，故能如此准时参加云。

（《申报》1929年6月9日）

孙夫人将赴西湖蒋庄

▲ 日内将偕宋太夫人同往

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此次因总理奉安归国，大典告成，即行来沪久住，暂时不再去国。复以沪上繁嚣，拟下居西子湖头，较为静适，曾派其秘书赵德森，于前日赴杭觅赁相当房屋。经觅得里西湖之蒋庄房屋，较为合宜。现赵氏业已昨晨乘早快车，由杭返沪报告。闻宋女士将准备行装，日内即偕宋太夫人同车赴杭，短期内当不再来沪云。

（《申报》1929年6月13日）

中央审定奉安影片

▲ 大中华百合公司所摄制著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承中央宣传部特约摄制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纪念影片”，剪接竣事后，遵照中宣部之规定，即派员携片赴京，呈送中央审查，刻已由中央审查完竣，认为完美无疵，准于在片首加中央审定之字样，即日发行，并予以国内外售租之特殊权利。按中宣部前会登报通告，关于奉安一切影片，均应经中央郑重审查，凡未经中央审

查之奉安影片，各地各戏院一概不准开映。该公司摄制之奉安影片，事前既由中宣部所特约，临时复有中宣部专员之指导，事后又经中央审查通过，则其内容之完备美好，可想而知，而其享有国内外售租之专权，自为当然之事实，片中所摄，有始有终，连贯一气，凡沿途各站民众之热烈欢迎、北平碧云寺总理易棺移灵、中外要人之公祭、灵榇自碧云寺登灵车、灵车南下抵浦口、过江到中央党部、三日之公祭、紫金山之奉安等等，无不尽量“□□”。又有在飞机上所摄之北平全景及首都全景等，尤为空前之特点。不仅为总理奉安之永久纪念，抑亦为国产影片之特别巨制，刻由中央审查通过之奉安影片，只有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之一部，故国内外各地片商，均纷纷与该公司接洽订购或租映之约，盖若购租未经中央审定之奉安影片，必受各该地当道所禁映，受损将不赀也。

（《申报》1929年6月13日）

（全文完）